

苏联历史  
档案选编

第31卷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31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叶书宗



A103858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叶书宗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2.8

(内部发行)

ISBN 7-80149-634-5

I. 苏… II. ①沈… ②叶… III. 历史档案-档案资料-  
汇编-苏联-现代 IV.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922 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31卷**



---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叶书宗

**责任编辑:** 章若男 刘仲亨

**责任印制:** 盖永东

---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本《选编》正文用纸由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8

**字 数:** 432 千字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

ISBN 7-80149-634-5/K·086 全套定价: 4000.00 元

---

内部发行 不得公开引用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任：王忍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主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丁明*  | 于沛   | 王正   | 石泽   |
| 叶军   | 叶书宗* | 刘逖   | 刘仲亨* |
| 邢广程  | 孙凌齐* | 沈志华* | 吴伟*  |
| 杨存堂* | 杨建国  | 金雁   | 郑异凡* |
| 张盛发* | 赵国顺* | 闻一   | 姚海*  |
| 徐天新* | 薛衔天  | 戴隆斌* |      |

秘书：方琼

编务：罗淑娴 闻静 胡甫强 宗静

注：\*为分卷主编。

- 本课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
- 本《选编》为国家“九五”规划重点图书
- 本课题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
- 本《选编》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理论部门及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 从事苏联东欧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或教学的具有正高以上职称的人员；
-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级社会科学院及党校图书馆。

##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 34 卷（包括总目录 1 卷），总计近 2000 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sup>①</sup>。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118～119 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 体例说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34卷(包括总目录卷1卷),收入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10000余件,文献上限为1917年初,下限至90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苏联历史档案包括 8 个专题。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专题，包括从 1962 年至 1976 年索尔仁尼琴与友人之间的通信、《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古拉格群岛》等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瑞典皇家学院授予索尔仁尼琴 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过程，苏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和反应，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处置索尔仁尼琴的历次讨论记录，以及处置索尔仁尼琴的具体安排过程等。

“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二）”专题，包括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收集、整理国内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苏共中央政治局历次有关会议对青年学生思想状况的分析和针对性措施研究等。

“关于库兹涅佐夫事件”专题包括库兹涅佐夫生前的历次申诉，库兹涅佐夫死后，其家属和部分苏军将领的历次申诉，苏共中央书记处对这些申诉信的处置，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恢复库兹涅佐夫的苏联海军元帅军衔、恢复名誉的决议等。不过，此时已是戈尔巴乔夫当政了。库兹涅佐夫第一次向苏共中央提出申诉是 1957 年 11 月 8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给予平反已是 1988 年 7 月 26 日，从库兹涅佐夫提出申诉到得到恢复名誉，前后达 30 多年。

“苏联与‘布拉格之春’”专题包括苏联驻捷大使馆关于捷克局势给苏共中央的历次报告，苏共中央政治局分析捷克局势和苏联应

对措施的历次会议记录，以及苏军入侵捷克后，苏军总政治部关于捷克局势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苏联与80年代的波兰局势（一）”、“苏联与越南战争（二）”专题，包括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与波兰、越南（包括南、北方）各级党、政领导人会见、会谈记录，苏共中央政治局研究相关问题的会议记录等。“苏美谋求缓和”的专题包括1976、1977年苏美两国大使之间的相互往来，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往来信函。“苏共与法共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专题主要是有关苏共与欧洲共产主义的争论的文件。

本卷档案涉及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国内外基本决策，反映了苏共中央领导对国内外形势的估计，苏共中央对各种重要问题的决策性讨论，以及勃列日涅夫本人对各种重要问题的认识、选择。

叶书宗

1999年3月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主要编辑出版发行人

出 版 人：谢曙光

编 审 人：刘仲亨 陆象淦

发 行 人：胡鹏光 王 菲

编辑主任：程晓燕 许春山

编 辑：章若男 陈云卿 徐文渊 周绍珩

封面设计：孙元明

内文设计：范 迎

责任印制：盖永东

编 务：宗 静

# 目 录

本卷前言 ..... 31-1

##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

(1962年11月至1976年1月)

专题说明..... 31-1

**№03429**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2年11月) ..... 31-3

**№03430** 沙拉莫夫的生活札记(1963年7月) ..... 31-19

**№03431**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3年8月14日) ..... 31-22

**№03432**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不晚于1963年9月10日)..... 31-24

**№03433**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不晚于1963年11月)..... 31-25

**№03434**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3年12月28日) ..... 31-28

**№03435**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年1月21日) ..... 31-29

- №03436**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 年 5 月) ..... 31 - 31
- №03437**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 年 5 月) ..... 31 - 33
- №03438**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 年 11 月 1 日) ..... 31 - 35
- №03439**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 年 11 月 15 日) ..... 31 - 39
- №03440**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1965 年) ..... 31 - 40
- №03441**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6 年上半年) ..... 31 - 45
- №03443**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1966 年) ..... 31 - 57
- №03442**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6 年 8 月 6 日) ..... 31 - 60
- №04031**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阻止向亚·伊·索尔仁尼琴  
授予诺贝尔奖的措施送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0 年 10 月 1 日) ..... 31 - 62
- №04030**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决定  
(1970 年 10 月 8 日) ..... 31 - 66
- №04032**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针对授予亚·索尔仁尼  
琴 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挑衅行动的措施”的决定  
(1970 年 10 月 9 日) ..... 31 - 67
- №04033**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关于针对授予亚·索尔  
仁尼琴 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措施”呈苏共中央  
书记处的报告(1970 年 10 月 9 日) ..... 31 - 68
- №04034**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  
问题上外国记者和苏联知识分子的反应呈苏共中  
央的通报(1970 年 10 月 10 日) ..... 31 - 70



- №04035**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关于在苏联报刊上就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发表文章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0月12日) ..... 31-72
- №04039**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俄罗斯思想》报涉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的材料呈苏共中央的通报(1970年11月14日) ..... 31-73
- №04036**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反应呈苏共中央的通报(1970年10月17日) ..... 31-74
- №04037**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有人传播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一事呈苏共中央的通报(1970年10月17日) ..... 31-77
- №04038** 苏联新闻社理事会“关于新闻社就授予亚·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宣传措施”呈苏共中央宣传部的情况说明材料(1970年10月23日) ..... 31-79
- №04040**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关于《俄罗斯思想》报的言论呈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70年12月28日) ..... 31-82
- №04041**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拒绝瑞典科学院秘书吉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律师赫伯入境一事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72年4月4日) ..... 31-83
- №03150**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置索尔仁尼琴的会议记录摘抄(1974年1月7日) ..... 31-84
- №03151**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决议(1974年1月7日) ..... 31-96
- №03152** 安德罗波夫就处置索尔仁尼琴事致勃列日涅夫的信(1974年2月7日) ..... 31-97

- №03153**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处置索尔仁尼琴事致苏共中央的信(1974年2月9日) ..... 31-102
- №03154**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索尔仁尼琴事给苏联驻波恩大使的指示(1974年2月11日) ..... 31-105
- №03155**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及其影响日益减少的情况通报(1976年1月4日) ..... 31-107

## 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二)

(1966年11月至1982年11月)

- 专题说明** ..... 31-113
- №03322**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记录摘抄(1966年11月10日) ..... 31-114
- №03323**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记录摘要(1966年11月10日) ..... 31-133
- №0332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记录摘抄(1967年3月28日) ..... 31-134
- №03386** 苏共中央科学与学校部等机构就支持拨款修缮“马克思之家”博物馆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67年6月26日) ..... 31-135
- №02481**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 ..... 31-138
- №03362** 科兹洛夫斯基就创办音乐学校问题致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信(1969年5月28日) ..... 31-166

- №03363** 库哈尔斯基就不支持科兹洛夫斯基的请求事呈苏  
共中央文化部的报告(1969年8、9月)…………… 31-168
- №03364** 里亚博夫就不支持科兹洛夫斯基的请求事呈  
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10月16日)…………… 31-169
- №03365** 库哈尔斯基就不能接受科兹洛夫斯基的请求事呈  
苏共中央文化部的报告(1969年10月20日)…………… 31-170
- №03366** 绍罗就科兹洛夫斯基的信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12月30日)…………… 31-172
- №03156**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斯大林诞生90周年报刊如何发  
表文章问题的会议记录  
(1969年12月17日)…………… 31-174
- №04441** 托尔斯塔娅关于拉恰达的剧本《祖国和异国》给苏  
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的信  
(1974年10月11日)…………… 31-183
- №04442** 谢尔比纳关于剧本《祖国和异国》给苏共中央文化  
部的报告(1974年11月10日)…………… 31-186
- №04443**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祖国和异国》呈苏共中央的  
报告(1974年11月15日)…………… 31-189
- №02482** 苏共中央书记处就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青年学生  
情绪的报告的决议(1976年12月28日)…………… 31-190
- №03351**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现西方宗教神秘主义教派信  
徒呈苏共中央报告(1980年)…………… 31-206
- №03348** 阿克肖诺夫致勃列日涅夫信  
(1980年4月8日)…………… 31-208
- №03349** 苏共中央文化部就处理阿克肖诺夫申请出国定居  
的意见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5月8日)…………… 31-210

- №03387** 苏共中央文化部就日瓦涅茨基创作晚会的情况  
呈苏共中央报告(1982年6月18日) ..... 31-211
- №03320** 莫斯科市法院刑事审判庭对伊万诺夫的  
裁决书(1982年6月28日) ..... 31-212
- №03321** 关于谢马诺夫被捕的情况  
(1982年10月15日) ..... 31-215
- №03384** 莫斯科市安全委员会就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  
发生流氓行为事呈苏共中央报告  
(1982年11月15日) ..... 31-219

### 关于库兹涅佐夫事件

(1957年11月至1988年7月)

- 专题说明** ..... 31-220
- №03184** 库兹涅佐夫要求恢复名誉致赫鲁晓夫信  
(1957年11月8日) ..... 31-221
- №03185** 库兹涅佐夫要求恢复名誉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信(1969年3月31日) ..... 31-232
- №03186**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致勃列日  
涅夫信(1981年4月9日) ..... 31-233
- №03187**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致安德罗  
波夫信(1983年8月5日) ..... 31-236
- №03188** 一批海军将领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致契尔  
年科信(1984年10月24日) ..... 31-242
- №03189**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致契尔年  
科信(1985年2月6日) ..... 31-248

- No03190** 海军上校巴加耶夫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致  
苏共中央政治局信(1985年3月5日)…… 31-253
- No03191**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致戈尔巴  
乔夫信(1986年1月1日)…… 31-255
- No03192**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库兹涅佐夫原苏  
联海军元帅军衔的命令(1988年7月26日) … 31-258

## 苏联与“布拉格之春”

(1968年3~12月)

- 专题说明**…… 31-259
- No01082** 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的积极分子  
的通报(1968年3月23日)…… 31-260
- No01093** 苏共中央联络部关于东欧四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  
态反应的报告(摘录)(1968年4月26日)…… 31-266
- No01083** 卢科韦茨就苏驻捷使馆对局势的估计给齐米亚宁  
的公务报告(1968年5月20日)…… 31-275
- No01084**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  
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 31-277
- No01094** 勃列日涅夫与斯姆尔科夫斯基为首的捷克斯洛伐  
克国民议会代表团成员的座谈记录  
(1968年6月14日)…… 31-280
- No01095** 鲁萨科夫就邀请杜布切克等来苏休养事给苏共中  
央的报告(1968年6月26日)…… 31-290
- No01085**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捷共中央主  
席团委员会谈和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  
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  
(1968年8月8日)…… 31-291

- №01086** 苏共莫斯科市委关于莫斯科市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的通报(1968年8月21日) ..... 31-298
- №01096**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1968年8月23日) ... 31-303
- №01087** 叶皮谢夫关于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紧急措施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9月4日) ..... 31-311
- №01088** 马梅多夫和雅科夫列夫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首要措施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9月6日) ..... 31-315
- №01089** 莫罗戈夫就苏联出兵事给谢列平的信(1968年9月15日) ..... 31-321
- №01097** 多勃雷宁关于美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宣传的主要方向的政治信函(1968年10月3日) ..... 31-323
- №06173** 苏联军方对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经验总结(不晚于1968年10月16日)..... 31-332
- №01090** 扎哈罗夫就联邦德国对苏捷会谈的反应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2月17日) ..... 31-343

## 苏联与80年代的波兰局势(一)

(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

- 专题说明**..... 31-346
- №01547**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1980年8月25日) ..... 31-348
- №01549** 苏共中央关于同波兰领导人谈话的提纲(1980年9月3日) ..... 31-349

|               |   |          |
|---------------|---|----------|
| <b>№01550</b>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发展与对策的会议记录(1981年4月23日) ..... | 31 - 354 |
| <b>№01548</b> | 勃列日涅夫与雅鲁泽尔斯基的电话谈话记录(1981年8月19日) .....     | 31 - 363 |
| <b>№01551</b>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发展的会议记录(1981年11月21日) .....   | 31 - 366 |
| <b>№01552</b>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分析的会议记录(1981年12月10日) .....   | 31 - 372 |
| <b>№01553</b> | 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局势给兄弟国家领导的通报(1981年12月13日) .....   | 31 - 383 |
| <b>№01554</b> | 关于苏联援助波兰贷款的备查材料(1981年12月) .....           | 31 - 385 |

## 苏联与越南战争(二)

(1968年12月至1972年12月)

|                   |  |          |
|-------------------|--|----------|
| <b>专题说明</b> ..... | 31 - 387                                     |          |
| <b>№01842</b>     | 季尔维科夫斯基与阮富帅的谈话记录(1968年12月30日) .....          | 31 - 389 |
| <b>№01843</b>     | 切谢夫与波兰驻越大使馆一等秘书弗巴杜拉谈话记录(1969年1月23日) .....    | 31 - 392 |
| <b>№01841</b>     |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7月19日) ..... | 31 - 395 |
| <b>№01840</b>     |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8月15日) ..... | 31 - 401 |
| <b>№01839</b>     |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9月1日) .....  | 31 - 407 |

- №01836** 米赫也夫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的  
调查报告(1969年9月25日) ..... 31-413
- №01838** 苏驻越大使关于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老挝地  
区形势调查报告(1969年9月29日) ..... 31-418
- №01837** 苏外交部东南亚司关于老挝战争形势的简略报告  
(1969年10月24日) ..... 31-420
- №01831** 谢尔巴科夫与越副外长阮基石会谈纪要  
(1970年1月3日) ..... 31-423
- №01832** 梅尔库洛夫与越南外交部苏东司副司长康塔霍的  
谈话纪录(1970年11月7日) ..... 31-426
- №01833** 国际调查委员会代表团走访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  
告(1970年11月13日) ..... 31-428
- №01834** 伊沙耶夫与越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阮文光的谈话  
记录(1970年11月13日) ..... 31-437
- №01823** 谢尔巴科夫与越副外长黄文进的会谈纪要  
(1971年2月2日) ..... 31-439
- №01822**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美国在老挝战争升级的  
声明(1971年2月10日) ..... 31-442
- №01824** 苏外交部东南亚司副司长弗多文与越驻苏大使馆  
参赞武俊的会谈纪要(1971年2月25日) ..... 31-446
- №01830** 佐林与越驻法总代表团团长武文松的会谈纪要  
(1971年3月17日) ..... 31-450
- №01828** 谢尔巴科夫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会谈纪要  
(1971年3月26日) ..... 31-453
- №01829** 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  
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的政治信函(1971年5月21日) ..... 31-455



- №01826** 谢尔巴科夫与越副外长阮基石的会谈纪要  
(1971年7月1日) ..... 31-471
- №01825** 苏外交部东南亚司副司长库兹涅佐夫与越驻苏大使馆参赞武俊的会谈纪要  
(1971年7月9日) ..... 31-475
- №01827** 苏驻法大使佐林与出席巴黎越南问题会议的越代表团团长春水会谈纪要  
(1971年7月15日) ..... 31-477
- №01835** 伊万舒津就越南形势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72年11月27日) ..... 31-483
- №01844** 关于在越南美国战俘问题的报告  
(1972年12月1日) ..... 31-486

## 苏共与法共关于人权问题的争论

(1977年2~4月)

- 专题说明** ..... 31-492
- №04086** 苏共中央国际部关于《致法共中央非公开信》的请示报告(1977年2月16日) ..... 31-493
- №04087**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给法共中央一封信》的决定  
(1977年2月22日) ..... 31-496
- №04088** 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共中央致法共领导人信及发信时间的决定(1977年3月15日) ..... 31-497
- №0408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将苏共中央致法共中央的信通报给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决定  
(1977年4月4日) ..... 31-510

## 苏美谋求缓和的接触

(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

|   |          |
|---|----------|
| 专题说明  | 31 - 512 |
| №02509 多勃雷宁与哈里曼的会谈纪要<br>(1976年12月1日)            | 31 - 513 |
| №02510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br>(1977年1月26日)               | 31 - 517 |
| №02511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的信<br>(1977年2月4日)                | 31 - 520 |
| №02512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br>(1977年2月14日)               | 31 - 524 |
| №02513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就“人权”问题与万斯会谈的<br>决议(1977年2月18日) | 31 - 530 |
| №02514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的信<br>(1977年2月25日)               | 31 - 534 |
| №02515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br>(1977年3月4日)                | 31 - 540 |
| №02516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的信<br>(1977年3月15日)               | 31 - 544 |
| №02517 多勃雷宁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谈话纪要<br>(1977年3月21日)        | 31 - 548 |

## 【专题说明】

#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

(1962年11月至1976年1月)

亚·伊·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12月11日，1941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数学物理系，卫国战争爆发后入伍。1945年2月，他在服兵役期间，因与友人通信中批评斯大林而在前线被捕，直至1957年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并恢复名誉。此后，他定居梁赞，在一所中学任教，并开始文学创作。1962年11月，他创作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由于小说的题材是描写劳改营生活，加上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立即轰动了整个苏联。苏联文坛也从此涌起一股所谓“劳改营文学热”

随后，索尔仁尼琴又创作了几部以劳改营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构成“劳改营文学热”的主流，索尔仁尼琴也从苏联文坛的新星变成批判对象。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被开除苏联作家协会会籍。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世界都接受和承认了索尔仁尼琴。1970年，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政府在种种阻止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努力失败之后，只能阻止索尔仁尼琴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2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派学术秘书基耶罗前往莫斯科，向索尔仁尼琴颁奖。此计划也终因苏联政府拒发入境签证，使基耶罗只能望“苏”兴叹。1974年2月，索尔仁

尼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这倒使他有可能于1974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领受诺贝尔奖。

索尔仁尼琴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数1973年在巴黎出版的，自传兼特写性3卷本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小说以揭露俄国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苏维埃政权下的非人残暴统治为主题，对20世纪的现代社会文明生活来说，确是震慑人心。此书的出版，也成为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苏联的直接原因。勃列日涅夫曾恨恨地道：“索尔仁尼琴这个流氓分子也太过分了”；“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世界政坛和文坛都构成一股冲击波。

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是复杂的，是一个大的研究课题。本专题档案共33件，大致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沙拉莫夫致索尔仁尼琴的信（B. T. 沙拉莫夫，苏联作家，遭迫害在劳改营里度过10年。平反昭雪后1964年5月得到每月42卢布30戈比的养老金。经过奔走呼号，1965年终于得到每月72卢布的养老金）；第二部分是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后，苏共中央的反应及对策研究；第三部分是索尔仁尼琴在国外发表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后，苏共中央就处置索尔仁尼琴的方案研究及决定。本专题档案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索尔仁尼琴问题”。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王希礼、吴能、乌传袞）

No 03429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2年11月)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我两夜没有睡觉，——在读这部中篇小说<sup>①</sup>，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回忆着……

小说写得和诗一样，——其中一切都尽善尽美，一切都恰如其分。每一行，每一个情节，每一段描写，都那么简洁紧凑，巧妙绝伦，细腻精致，而又深邃奥博，以至于使我认为：自《新世界》问世以来，它从不曾刊发过如此结构严谨，如此强劲有力的杰作。而且，这又是一部如此必不可少的作品，因为不是真心诚意地去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文学还是社会生活都不能向前发展——一切欲言又止、搪塞回避、哄骗虚构的作品，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只会带来危害。

请允许我向您，向我自己，向数以千计幸存在世上的和数以十万计（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话）死去的人表示祝贺，要知道他们也和这一部确实精彩无比的中篇小说一起活了下来。

也请允许我倾诉一下自己对于这部小说，以及对于劳改营的感受。

小说是十分精彩卓越的。我曾多次听到对于它的反应，——因莫斯科全市都曾企盼着它的出版。甚至就在前天，当我买了一本第

---

<sup>①</sup> 即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载《新世界》杂志，1962年11期。

11期《新世界》杂志，拿着它走到普希金广场时，在20~30分钟时间内竟有3、4个人问起：“这是第11期吧？”——“是的，是第11期。”——“就是描写劳改营的小说的那一期吧？”——“是的，是的！”——“您是从哪里搞到的？在哪里买的？”

我收到过几封信（这我在《新世界》向您说过），都极力盛赞这部中篇小说。但是直到我自己读完小说之后，我才看出，那些赞誉是难以比拟地评价过低了。看来，问题在于：这里展示的是这样一种材料，那些不了解劳改营的人们（幸福的人们！因为劳改营是一所反面学校，一个人一小时也不应当待在劳改营里，一分钟也不应当看到它）不可能认清这部中篇小说的全部深度、细微精致之处和真实性。这一点从书评中也可以看出来，无论是西蒙诺夫<sup>①</sup>，还是巴克拉诺夫，或者叶尔米洛夫<sup>②</sup>写的评论，都是这样。不过，关于书评我不准备在信中向您说了。

这部中篇小说写得精美巧妙，才气横溢。这是劳改营中“干大活的”（他手艺精细，善于“挣钱”）眼中的劳改营，而不是采扎里·马尔科维奇眼中，也不是海军中校眼中的劳改营。这不是一名没有“游到岸边的”知识分子在诉说，而是一个经受过并经受住了这种重大考验的农民如今在风趣诙谐地叙述过去的事。

小说中的一切都真实可信。这是一所“轻型的”劳改营，并不是绝对真正的劳改营。真正的劳改营在小说中也有所展示，而且展示得极好：这个令人恐怖的劳改营——舒霍夫的伊日马劳改营，它像是从阴冷的板棚缝隙中渗出的白色烟雾那样在小说中蜂拥而出。在那个劳改营中，干大活的人们在伐木场日以继夜地劳作，在那里

① 西蒙诺夫，康·米·（1915~1979）苏联作家，曾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6次获苏联国家奖，并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② 叶尔米洛夫，弗·弗·（1904~1965）苏联文学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曾获苏联国家奖。

舒霍夫因坏血病而失去牙齿，那里刑事犯抢食物吃，那里人们满身是虱子，饥肠辘辘，那里因为任何原因都可以立案定案。你要是说，监狱外面火柴涨价了，就会给你立案。那里在最后要延长期限，直到用一定的“重量”，7克重的“干粮”把他打发走。那里比“不挂号码”的流放地要可怕一千倍。在流放地，在特别营地，就要比真正的劳改营松快许多。管人的是雇佣的看守（在伊日马，看守是上帝，而不是舒霍夫值班时去他家擦地板的那个饿鬼），在伊日马……那里刑事犯占据统治地位，刑事犯的道德准则不仅决定着犯人们的，而且决定着长官们的行为举止，特别是那些在舍伊宁的长篇小说和波戈金的《贵族们》教育下成长的长官们的行为举止。在舒霍夫服刑的苦役营中，他有一把勺子，而在真正的劳改营中，勺子是一种多余的工具。汤也好，粥也好，都稀得可以用嘴就着碗边喝光。在卫生所旁边有一只猫在走动，这在真正的劳改营也是不可思议的——在那里早就把猫吃掉了。这些可怕的，令人恐怖的去，被您展示了出来，而且通过舒霍夫的点滴记忆，通过对伊日马的回忆，展示得极具感染力。伊日马这所学校，正是饶幸生还的舒霍夫曾经在其中学而有成的学校。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所有这一切都在大声疾呼地响彻耳际，至少对我是如此。

还有一个极其重大的长处——这就是深刻而又细致入微地描绘出舒霍夫的农民心理。如此精细准确而又具有高度艺术水准的作品，老实说，我很久没有接触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被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的农民——对“用镂孔模板印染粗地毯技术”饶有兴趣、十分好奇、天生的敏锐机智、有设法使自己活下来的能耐、观察细致、小心谨慎、考虑周密，对于各种各样的采扎里·马尔科维奇们，以至对于所有不得不对之恭敬从命的掌权人物，又都怀着些微嘲讽怀疑的态度。善于自由自在地过日子，善于听从命运的安排，善于适应环境，而且毫不轻信——所有这一切都是普通老百姓的特点，

农村人的特点。舒霍夫洋洋自得地认为：他是个农民，他活了下来，他有能耐活下来，而且还善于把烘干了的毡靴恭敬地“奉献”到富有的组长手中，还善于“挣钱”。我不准备一一列举能说明这一点的所有艺术细节。您自己对此十分清楚。

任何一个老囚犯都有的，而舒霍夫同样也有的那种规模比例移位描述得淋漓尽致。这种规模比例移位不仅仅涉及食品：如吞咽一片香肠想象成为最高享受，而且影响到更加深刻的事物，比如，他同基尔加斯谈话比同妻子谈话更加兴致勃勃，等等。这是极其深刻的真实。这是劳改营中极为重大的问题之一。因此，要使一切复位，至少需要2~3年的“缓冲”康复期。关于收取邮包时的心情描写得非常细腻而温馨：尽管写过信说不要寄包裹来，但总还是在等邮包。要是能活下来，总能活下来，要是活不下来，靠邮包也无济于事。我就这样写过信，在包裹收件人名单前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有的生活细节，具体过程，以及所有人物的举止言行都非常准确，但又非常新鲜别致，令人头晕目眩地那么新鲜别致。只要回忆一下被舒霍夫擦地板用过的抹布不经拧干就扔到炉灶后面的细节吧。这样的真实细节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成百上千，而不新鲜的、不真实的细节根本没有。

您成功地找到了具有特殊感染力的形式。问题在于，没有骂娘的话，没有最最粗鲁的骂人话，劳改营的日常生活、语言、思想都是不可思议的。在其他场合，这样写可能是有所夸大，但是在劳改营的语言中，这则是生活的典型特征，没有这些，顺利地解决（更不要说生动形象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您解决了这个问题。所有这些脏话都是恰到好处，准确如实，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们就不行。这些“脏水”正是来自刑事犯，来自伊日马，来自整个劳改营。

小说中另一个不亚于主人公的异常真实可信的人物，即作家的



成功塑造，我以为是教派信徒阿廖什卡。为什么呢？经过我在劳改营中和在劳改营附近 20 年的生活，我得出一个坚信不疑的结论——也是我多年来大量观察的结果——，如果说在劳改营中果真有人经历了各种可怕的折磨、饥饿、挨打、酷寒、力不胜任的劳作，而仍能努力保持住了真正的人的特征，那么这就是一些教派信徒以及一般的虔诚教徒，其中也包括东正教的神甫。当然，其他居民群体中也有个别的好人，但这仅仅是个别人，而且似乎是在还没有达到最艰难的时候。教派信徒则在任何时候都始终是人。

在您那个劳改营中爱沙尼亚人是好人。诚然，他们还没有尝到苦难，他们有烟草、食物。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带受饥荒之苦比俄罗斯尤甚——那里的人们体型高大，而粮食配给量是一样的，尽管连马匹的给养日份也是依据体重而有所不同。最早“饿垮”的总是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这就是因为他们身材高大，还因为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我们略有不同。劳动营的生活差别更大。也有过这样一类的饶舌者，他们对此妄加嘲笑，说什么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敌不过俄罗斯人，——这种卑鄙下流行为是到处都有的。

这个队长为人极好，是可信的。从艺术上说，这样的人物形象无可指责，虽然我无法设想我会去担任这样的队长（有一段时间几次要我担任），因为照我的理解，在劳改营中，没有比命令别人干活，比担任这样的职务更坏的事了。他们必须强迫囚犯干活，不仅强迫饥饿不堪、体弱无力的残疾老人干活，而且还要强迫各种各样的人们干活——因为据我计算，在不断挨打、每天干活 14 小时、长时间站立、经常饿着肚子，又在零下 50~60 度的严寒之下，把一个人搞垮并不要很长时间，仅仅三周就够了。一个完全健康、体魄强壮的人，在行家手里只要三周就会变成残废，变成一根“灯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去当队长？我看到过几十个上百个例

子：在和体弱的搭档一起干活时，身体强壮的只是一声不响地干活，准备承担一切重负，但绝不会咒骂同伴。为了同伴可以蹲单间牢房，甚至增加刑期，甚至去死。有一点不能干，那就是命令同伴干活。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当上队长。我想，这还不如去死。我在10年的共同工作中没有舔过碗底，但我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事，这是可以的。而海军中校干的事情是不能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当队长，而且整整10年在科雷马从工作面到医院来回折腾，被判了10年刑期。人们不允许我在任何一个办事处工作，我也没有在办事处工作过一天。4年内没有让我们看任何报纸和书籍。许多年以后，我看到的第一本书是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我翻看着，翻看着，不时撕下一张，卷烟抽了。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像您所描述的那种队长很多，人物塑造得很好。又是这样，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具体行动，都很真实。他的忏悔也很精彩，符合逻辑。这样一类人，一旦内心有所触动会突然之间把什么都讲出来。其中包括，他帮助了少数几个帮助过他的人，以及他为敌人死去而高兴。一切都真实可信。无论是舒霍夫，还是队长，他们都不想理解劳改营的最高智慧：永远不要向自己的同伴下命令，特别是不要命令他干活。也许他有病在身，也许饥饿难忍，也许他比你体弱许多倍。正是这种善于相信同伴，才是一个囚犯的最大勇敢。在海军中校与费久科夫争吵时，我的同情全部在费久科夫一边。海军中校，这是未来的豺狼。不过，关于这些以后再说。

在您的小说一开始就说到了：规律是弱肉强食、生存竞争法则，人在这里也得活着，死去的是舔碗底的人，常去卫生所的人，以及常去找“干爹”的人。实际上，整篇小说写的就是这一切。不过，这是队长的道德。经验丰富的队长库焦明却没有告诉舒霍夫劳改营的一句重要谚话（队长也不能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在劳改

营中杀人的是大份额口粮，而不是小份额口粮。你在工作面上工作，领1公斤面包，最好的伙食，还有售货亭，等等，但你却会死去。如果你当值勤员、鞋匠，只领500克面包，却可以活20年，而且活得不比维拉·菲格纳和尼古拉·莫罗佐夫差。舒霍夫应当在伊日马得知这句谚语，并且懂得这样干活——重活不要干好，而轻活，力所能及的活要好好干。当然，一旦游到对岸，关于轻活的质量也不会再提起。但这是一条可靠的法则，救命的法则。

您的主人公所不熟悉的这种论点，在某一方面也可以从卫生所的工作得到证明。因为，不言而喻，在伊日马只有医生能够治病，只有医生能够救人。尽管那里也有许多劳动疗法的拥护者，而且医生会空口许愿，并收取贿赂，但只有他们能够救人，并且也救过人。

能否设想，让别人利用你的意志来压服别人的意志，来缓慢地（或迅速地）把他们杀死。在劳改营中最坏的事便是命令别人干活。队长是劳改营中令人害怕的人物。有人几次想要推荐我当队长。但我下定决心，就是死，也不当队长。

当然，这样的队长喜欢舒霍夫们。队长只是在海军中校身体垮掉之前不打他。关于在劳改营内只打身体垮掉的人这一点，观察的是正确的，在小说中展示得很好。

对于舒霍夫和别的队长们在砌墙时对活计十分投入这一点，描写得细腻而真实。队长和副队长很愿意活动活动筋骨。对他们而言，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其他人也热衷于沸腾的干活场面，总会全身心地投入。这是真实的。这就是说，干活还没有使他们完全精疲力竭。这种对工作的勃勃兴致十分接近于当看到两队饥饿不堪的人相互你追我赶时的振奋心情，这种心灵中的幼稚状态也表现为对一名迟到的摩尔达维亚人狂叫谩骂（这类感觉舒霍夫也完全拥有）所有这一切都细腻动人，真实可信。很可能，正是对干活的这

种全身心地投入，救活了许多人。只是应当记住，在劳改营的工作队中，总会有新来人和老囚犯——他们不是规则的维护者，只不过是更有经验一些。重活都是阿廖什卡、海军中校这样一些新手干的。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而队长们却活着。人们都愿意去工作队干活，而且服满过几个刑期，其主要原因恰在于此。

在伊日马的真正的劳改营中，早上喝的菜汤只够在酷寒中干一个小时的活，其他时间人们干活只是为了达到足以暖和身体的程度。中午的菜粥也只够下午干一个小时。

现在谈谈海军中校。这里有一些“意外的洋相”，幸好还并不太多。如在第一个情节中——值更时，说“您没有权利”，等等。这在时间上略有提前。海军中校是38年时期的人物。当时几乎每一个人都这样大喊大叫。所有这样叫喊的人都被处决了。在1938年，说这样的话不会被看做为“反革命活动”。到1951年，不管海军中校是什么样的新手，他就不会这样喊叫了。自1937年起，在14年时间内，他亲眼目睹大量枪决、迫害、逮捕的事实，他的同伴被带走，并永远失去音讯。而海军中校对所有这一切竟不肯费神去想一下。他乘车外出，沿途都看到林立的劳改营岗楼，也不肯费神对这一切去想一下。最后，他经历了侦讯，他是在侦讯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来到劳改营的。他仍然什么也没有想过。除非在两种条件下他可能看不到这一切：或者海军中校整整14年远航在外而且是在潜艇上，14年不曾浮上水面；或者整整14年无忧无虑地当兵，当自己被逮捕时已经身心交瘁。海军中校也不想一想那些他不愿意和他们蹲一个牢房的宾杰里人（但和间谍呢？和祖国的叛徒呢？和弗拉索夫分子和舒霍夫呢？和队长呢？）要知道这些宾杰里人就是这样的宾杰里人，正如同海军中校是间谍一样。要知道，并不是英国制的高脚大酒杯害死了他，而是人们根据名额分配，根据侦察监视名单把他送来的。这是您的中篇小说中惟一的失实之处。

不够典型（也有这样的一些寻根问底的人，整日争吵不休，过去、现在、将来都有）。而这样的人物能够具有典型意义，则只是在1937年（或者是1938年——指劳改营而言）。在这里可以把海军中校理解为未来的费久科夫。第一次挨打，也没有海军中校。海军中校只有两条路：或者走向坟墓，或者如同费久科夫一样，舔碗底（而费久科夫是原先的海军中校，已经蹲了3年）。

到1938年，在工作面上，在板棚里，都杀人。规定的劳动日是14小时，人们日日夜夜干活，而且干的是什么样的活。要知道伊日马的伐木、运木材，干这样的活，是科雷马<sup>①</sup>所有矿工的盼望。为了帮助用第58条消灭人，又吸收刑事犯参加——为了有别人的敌人，这些罪大恶极的刑事惯犯被视作为“人民的朋友”，以区别于被派到科雷马的敌人，而这都是些肢体残缺，眼睛失明的和年迈老人。只要有莫斯科的“特别指示”就行，而没有任何医务部门的限制。1938年时，人们看寒暑表什么时候达到零下56度，1939年至1947年是零下52度，而1947年以后则是零下46度。我的所有这些说明，显而易见，不会降低您的中篇小说的艺术真实性，也不会缩小这些说明背后的实际情况。只不过是另有其他一些判断。就我所知，主要的在于：1938年的劳改营是一切恐怖可怕的，令人厌恶的，腐烂透顶的罪恶的顶峰。所有其他年份，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战后年代，也是阴森恐怖的，但与1938年都无法相比拟。

让我们再回来谈这部小说。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这部中篇小说中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种启示。毫无疑问，这是我国文学中第一部既大胆无畏，又具有艺术真实性，而且符合人们确实经历过的，人

<sup>①</sup> 信中的科雷马劳改营，在苏联亚洲东北部马加丹州境内，注入东西伯利亚海的科雷马河上中游地区。该地区早在17世纪即发现有储量十分丰富的金矿，由于气候极端恶劣，几次讨论有关开采的问题都没有结果。斯大林年代在这里建立规模巨大的劳改营，利用囚犯开采金矿。

们一再感受到的实际情况的文学作品，是关于人人都在谈论而谁也不曾写过的第一篇文章。自从20大以来，谎言已经不少了。例如，谢列斯特<sup>①</sup>的令人厌恶的《一块荒金》或涅克拉索夫的纯属虚构的，不值一提的中篇小说《基拉·格奥尔吉耶夫娜》。在劳改营中没有关于战争的爱国主义谈论，您避开了这一种虚构，很好。战争是以悲切凄凉的声音通过惨遭摧残的牺牲品和罪恶性的错误在那里表现自己的。还有一点。我以为，不提到刑事犯在其中的作用是无法理解劳改营的。正是这群刑事犯，以及刑事犯的准则、伦理道德和美学观点，腐蚀着劳改营所有人的灵魂——包括犯人、长官和旁观者。几乎苦役犯工人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内心生活，归根到底都是由刑事犯决定的。许多年来由波戈金的《贵族们》和列夫·舍伊宁的拙劣作品引入我国文学的种种谎言不知道有多少。把刑事罪犯加以浪漫主义化的作法带来巨大的危害，解救了刑事犯，把他们说成是可以信赖的浪漫主义者，而其实刑事犯根本不是人。

在您的中篇小说中，刑事犯人群只是叙述的缝隙中渗透了出来。而这样做很好，这样做是对的。

而粉碎多年以来存在着的关于浪漫主义者刑事犯的神话，正是我国文学事业的紧迫任务之一。

在您所写的劳改营中没有刑事犯！

您的劳改营没有虱子！警卫部门不负责执行计划，不用枪托打人。

猫！

马合烟用杯子量！

不连拖带拉地送往侦查人员那里去接受审讯。

---

<sup>①</sup> 谢列斯特，Г. И. (1898~1965)，作家，曾受到迫害。短篇小说《矿石场》刊于《通报》1962年11月5日。

下工后派人去 5 公里以外的林子里运木柴。

不打人。

把面包留在褥垫里面。留在褥垫里面！而且还是厚实的褥垫里面！而且还有枕头！穿得暖暖地干活。

面包留在屋子里！有勺子吃饭！哪里有如此奇妙的劳改营？

真想当时能在那里蹲上一年。

当即可以看出，舒霍夫的手没有被冻伤过，他竟把手指伸进冷水。已经过去了 25 年，可我至今仍不能把手伸进冰水。

在 1938 年采金季节的掌子面工作队中，到采金季节结束时，到秋天，只剩下了队长和值班员，所有其他人都离开，或者去了“土岗下面”，或者去了医院，或者去了别的，仍在干辅助工作的工作队。或者被枪决了：在 1938 年暮冬以前每天早上派工时宣布前天，或三天以前枪决的名单、生病，或者吃枪子儿，或者在队长、警卫、派工员、理发师和值班员的殴打下去见阎王。我们那里所有的掌子面工作队都是这样。

好吧，够了。我离开了话题，没有控制住。没完没了地清点人数。——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准确的，非常熟悉的。这五大员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烤饼边，中间碎饼块，都不会忽略。用掂量口粮的多少，心里暗暗地希望被偷走的不多，——这一切都真实而准确。顺便说起，在战时，当运来美国的（揉进有玉米粉的）白面包时，没有一个切面包的人提前切好。300 克的面包一夜之间会少掉 50 克。有命令下来说，面包要按分量不切开发到工作队，然后就在临派工之前切开分发。

正是 KЭ - 460。在劳改营里，所有人都说“KЭ”，而不说“KA”。顺便说起，为什么是“ЗЭК”<sup>①</sup>，而不是“ЗЭКА”。要知道

<sup>①</sup> 囚犯一词的简称。

写法是：З/К，而变格的方法是 ЗЭКА，ЗЭКОЮ。仅仅舒霍夫那块在值更时扔到炉子后面的没有拧干的抹布，就值得写整整一本长篇小说，而这类地方有成百上千。

采扎里·马尔科维奇同海军中校以及同那个莫斯科人的谈话，也取用得很好。把关于艾森施泰因的谈话讲出去，对于舒霍夫而言，是匪夷所思。这里作者显示出自己是一名作家，稍稍摆脱开舒霍夫的面具。

[劳改营犯人]语言贫乏，想法简单，一切思维的规模比例都产生了移位现象。

作品极其简赅紧凑，像一根弹簧，像一首诗。

还有一个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舒霍夫解决得十分真实可信：谁处于最底层？恰恰是在上面的人。比他们一点也不坏，甚至还更好一些，更踏实牢靠一些！

舒霍夫受侦讯时在审问记录上签了字，这样做十分正确。尽管我在2年侦讯期间没有在任何一张揭发指控我的记录上签过字，而且没有交待过任何口供，结果反正都是一样。怎么也要判个刑期。在侦讯期间也没有打过我。要是真打了我（如同1937年下半年及以后那样），我不知道，我会做下什么，会如何行事。

结尾精彩极了。使幸福的一天宣告结束的这一片香肠。并不贪婪的舒霍夫发给阿廖什卡的那一块点心极好。“我们还能赚到。”他是走运的。唉！……

告密者潘捷列耶夫写得很好。——“带着他在卫生科里转！”什么是告密者，一心想永远能同时代步调一致的可怜的沃兹涅先斯基一直没有搞清楚这一点。在他的《三角梨》中，有关告密者的诗句，但这指的是不折不扣的美国告密者。我开始什么也没有搞清楚，后来弄清楚了：沃兹涅先斯基是把跟踪监视在编特工、“密探”称之为告密者，他在回忆录中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这件艺术织品竟如此精巧纤细，让人能把拉脱维亚人同爱沙尼亚人区分开来。爱沙尼亚人和基尔加斯虽然同在一个工作队，却是不同的人。十分精彩。基尔加斯沉闷忧郁，更愿意接近俄罗斯人，而不是向波罗的海沿岸的邻居靠拢，这是十分真实的。

关于舒霍夫在室外吃掉多余的食物的事，也描写得精彩绝伦。怜悯慈悲原来根本是不必要的，这种思想影响到每一个囚犯，这一点表现得十分精彩。

克列夫申这样的人，以及所有后来从德国集中营转移过来而无意被关进来的人，人数很多。典型人物很真实，也很重要。

关于“拖欠不还”星期天的看法十分真实。1938年内，在科雷马，上掌子面是不休息的。我第一次得到休息日是1938年12月。整整一个月劳改营全部人犯都被赶到森林里去运柴。只要有一次休息，就兴高采烈，而不想到长官们反正要扣除的。这是因为囚犯并不能自己安排今天晚上往后的生活。有了今天就行，至于明天怎样——到时候再说。

关于辛苦干活时候的两种汗水，写得好极了。

关于从小牛犊身上传染来的梅毒。在劳改营中没有人是这样受传染的。在劳改营中人们并不是因为这种原因而死去。

相互不断争吵的老年下等囚犯，飞到电线杆上去的毡靴。舒霍夫把两只脚伸进棉袄的一只袖筒里。这一切都绝妙。

舔碗底和用一小块面包刮碗底并没有多大不同。表现其间的差别，只在于强调表明，在舒霍夫住的地方还不挨饿，还能够生活下去。

压低嗓音说话！“伙食又有人搞鬼了。”以及“晚上某某人又被宰了。”

行贿受贿——都很真实。

毡靴！我们没有毡靴，只有用穿用过多次的破烂衣物制成的套

鞋。我是在挨过10年劳改营生活之后当上了医助才穿上第一双毡靴。我常把套鞋不是送到烘干房，而是送去修理。在鞋底、鞋掌上不断打上补钉。

寒暑表！这一都极为精彩！

在小说中，关于劳改营可诅咒的特征也描写得极其生动：千方百计寻找一些帮手，“六大员”。打扫卫生的工作，最终还是由那些干大活的人在掌子面艰苦工作之后来完成，而且常常搞到天亮。人管人，这也不仅仅是劳改营所独有的。

在您的中篇中，对有些长官（大的长官，直到矿业管理局的局长）描绘不足。他们通过值班犯人按5个卢布一支的价钱在囚犯中出售马合烟。不是一杯，不是一包，而是一支。从这类长官手中买一包马合烟要付100~500卢布。

——把门拉上！对于早饭、菜汤，囚犯们经验丰富的鹰样锐利的目光——这一切都真实可信，而且十分重要。鱼一定要连骨头吃下去，这是法则。那一只比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命还要珍贵的长柄勺。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亲自经历，亲身感受，都描述得生动有力和准确无误。

热乎乎的稀菜汤！吃饭在囚犯的生活中占十分钟。面包都是单独吃的，以便使吃东西的乐趣能延长一点。这是一个普遍的，不令而行的法则。

1945年，来了一批遣返人员，到科雷马北方矿业管理局矿区接替我们。他们不胜惊异地问：“为什么你们那些人在食堂里只喝菜汤和粥，而把面包带走？难道不应该……”我回答说：“要不了2个星期，你们就会理解，而且也定将这样做。”果然不出所料。

在医院里躺一躺，即使死在干净的床铺上，而不是死在工棚里，掌子面上，在队长、警卫和派工员的脚下，这是每一个人犯的向往。卫生科的整个景象十分美好。当然，卫生科看到过更加可怕

的事情（例如，医生从干大活犯人冻坏的手指上钳下指甲丢入铁盆时发出的叮咚声，等等）。

每天派工前的那一分钟，也十分美好。

一大堆糖。我们那里，糖从来不发到手中，总是放到茶里。

总的说来，舒霍夫任何时候，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很好，十分公道诚实。

至于采扎里·马尔科维奇，这正是涅克拉索夫《基拉·格奥尔基耶夫娜》中的主人公。这样的采扎里·马尔科维奇获释回家后会说，在劳改营中可以学习外语和票据法。

早晨和傍晚的“寂静时刻”十分美妙。

您的整篇小说，是人们企盼已久的真话，不说这样的真话我们的文学无法前进一步。谁避而不谈这一点，谁歪曲这些真相，谁就是无赖。

关于前院和各个工作队依次列队的广场，也写得很好。我们也有这样的前院。在大门的山墙上（按照上级下发的专门命令，劳改营的所有单位都是如此）用红色横幅写着：“劳动是荣耀的事业，光荣的事业，勇敢而豪迈的事业！”看看吧！

我们那里每个人犯都能倒背如流的警卫人员的传统警告是：“向右跨一步，再向左跨一步，认作为逃跑；向上跳跃，认作为鼓动！”且看，到处都不是闹着玩的。

信。十分细腻，十分真实。

关于“染坊”，不曾有过更加灿烂鲜明的画面。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一切都真实不假，一切都是实话。

请记住，最主要的是：劳改营对任何人来说，从第一天起到最后一天止，都是反面学校。一个人，无论是长官还是囚犯都不应看到它。但是，既然你已经看见了，那就应当说出真相，而不管这真相多么令人可怕。舒霍夫仍然成为一个人，不是因为劳改营的缘

故，而是违反了劳改营的意愿。

我很高兴，您知道我的诗。有机会请告诉特瓦尔多夫斯基，我的诗在他的杂志编辑部里已经放了一年多了，而我却无法让人们交给他看。在那里放着的还有一些短篇小说，我在其中力求按照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的认识来展现劳改营。

祝您一切幸福，事业成功，创作力充沛。还有，体力充沛。

1958年(!)在波特金斯克医院，人们填写我的病历单就像在侦讯时作审讯记录一样。于是，半个病房的人都鼓噪起来，喊道：“不可能，他说些什么呀，他竟这样说!”女医生说：“这不是大肆夸张吗，难道不是吗?”还拍拍我的肩膀，要我出院。直到编辑部出面干预，才迫使院长把我转到另一个科，在那里我获得残废证明。

正因为如此，您的书就有了任何事物（无论是报告，还是信件）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重大价值。

再一次感谢您的中篇小说。望来信，也请来这这里。我这里任何时候都可以住人。

您的 瓦·沙拉莫夫

就我自己来说，我早就下了决心，正是要把自己有生之年用于揭露这些事实真相。我写了上千首诗，上百篇短篇小说，好不容易在6年内才出了一本残诗断篇的集子，因为其中每一首诗都被删节篡改得面目全非了。

在我们论及破冰船和灯塔的谈话中我讲的话绝非偶然说起。揭露事实真相的阻力很大。要知道，人们既不需要破冰船，也不需要灯塔，他们需要的是不需要任何破冰船的自由水域。

B. 沙·

No 03430

## 沙拉莫夫的生活札记

(1963年7月)

### B. T. 沙拉莫夫的生活札记

5月30日收到来信后发出一封电报，开始等2日即星期日日本人来到。

6月2日。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为了事业的利益》。

“我认为您是我的良知，请您看看，我是否不由自主地做了可能被看做为怯懦胆小、看风使舵的事。

剧本《鹿和小窝棚》是因我的主意而搁置下来的。剧院（叶夫列莫夫）一再坚持交给剧院诵读，以便稍作准备，但我断然予以拒绝。我写了2个剧本（《鹿和小窝棚》和《风中残烛》）、一部长篇小说、电影剧本《劳改营的起义》。

收到大量信件，写了500封回信。这里有两封：一封是某个内卫部队人员写的，他大骂《伊凡·杰尼索维奇》；另一封热情洋溢，维护这本书。也有囚犯来信，诉说劳改营长官不发给他们《小说报》，要求由最高法院进行干预。几个月以前我在最高法院做报告，这是惟一的一次例外（还有一次是去年在梁赞学校的晚会上）。最高法院把我列入某一个监督劳改营生活的协会，但是我拒绝了。第二个剧本（《风中残烛》）将交给小剧院诵读。”

### B. T. 沙拉莫夫的生活札记

亚·索尔仁尼琴。1963年7月26日。他从列宁格勒来，在那

里的档案库中为自己新的长篇小说搜集资料，工作了一个月。现在和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sup>①</sup>一起去梁赞作一次自行车旅游（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然后再沿河向前走）。精力充沛，有许多打算。“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为了事业的利益》将在《新世界》第7期上刊登。有过一些不大的改动，但却是令人不快的改动。国外对《伊凡·杰尼索维奇》发表了许多评论，英文的文章（约有40篇）我是查着字典看的。立场各不相同，千差万别。有的说，这“全是政治”（《伊凡·杰尼索维奇》的译本是平庸之作，意蕴丧失殆尽）；也有的说，这是“真话的发端”，是创作的巨大成就。全世界都翻译了这部书，只有民主德国是例外，那里乌布利希禁止它出版。

《新世界》。特瓦尔多夫斯基表示赞许。编委们对索尔仁尼琴仍然无动于衷，作家们也是如此！

——我本想写一写劳改营，但您的短篇小说出来以后我想不必了。因为我实际上只有4年的亲自感受（4年顺利如意的日子）。

他发表了他本人这样一种观点，即作家不必对材料知道得太清楚。

关于契诃夫的谈话。我说：契诃夫一生都想写长篇小说，但未能写出也不会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没有意思的故事》、《我的一生》、《一个无名氏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只是写长篇小说的尝试。这是因为契诃夫只擅长于不停顿地写下去。但不停顿地写，只能写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

索尔仁尼琴说：我以为，原因要更深一些。契诃夫本人没有不断向上的愿望，而这则是长篇小说家所必不可少的，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

<sup>①</sup>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一个妻子。

关于契诃夫的谈话至此结束，我后来才想起来，博博雷金<sup>①</sup>、谢勒-米哈伊洛夫<sup>②</sup>并没有任何不断向上的愿望，却也写出了大部头的长篇小说。

索尔仁尼琴说：带来付印的诗（《不愉快的诗体中篇小说》）是从一首长诗里根据规定的篇幅选辑而成的，而那首长诗依我看有些地方很不错。

邀请我于9月份去梁赞休息。

---

① 博博雷金，彼·季·（1836~1921），俄国作家，自1914年侨居国外。

② 谢勒-米哈伊洛夫，亚·康·（1838~1900），俄国作家。

№03431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3年8月14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一直急于等待刊载那则短篇小说的《新世界》第7期出版，用另一种眼光来看一看它。难道不是这样吗：手稿是一回事，打印稿又是一回事，杂志上的文本更是另一回事，而成书以后则是又有不同。再版后，在“选集”中，文本又会给人不同的感觉。

我对于《为了事业的利益》的欣喜又提高了。短篇小说的题目就十分准确，详尽无遗。不可能有更好、更加意味深长、更为恰如其分、更加冠冕堂皇的题目了。

哈巴雷金的形象有所损伤是可以感觉到的。这个形象中暗藏着格拉奇科夫对于哈巴雷金的思考，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段落（它全部保留了下来——关于应当驱逐出党的共产党员那一段），但是似乎悬在了空中，原先它有更好的铺垫衬托。据我看，并没有很大的损失，而且对于读者，这也不是损失。不管怎么说，原先更好一些。

《为了事业的利益》，正如我曾经对您说过的那样，是一部十分精美的作品，是完全不同的、意义有差别的事件的独特反映，是作者对于小说内容根本无法尽述的那些问题的答复。

这则短篇小说的主要之点在于：提出了一个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思想，即向青年扯谎说“热情当然还会出现，不断出现，但是……”是三倍的犯罪。所有这一切不是都留存下来了，受到损害的只是哈巴雷金和关于“内部资本主义”的议论。



我躺着，心情愉悦地仔细玩味着那风景——那些迅速掠过的白云、正在来临的骤雨，那让人们多少凉爽一些、清新一些的气氛。

在读第一稿时，觉得克诺罗佐夫的细节描写得极好，还有费多尔·米赫耶维奇托住右手的左手也写得很好，以致我没有理睬女会计的到来，致使她竟咬着嘴唇拂袖而去。

衷心地祝贺您。

昨天我做了一次试验。11月份我拿着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新世界》第11期走过一段路，沿路有4次被人拦住询问：“杂志出版了？出版了？出版了？有这篇小说？是吗？您从哪里拿到的？”这次我走过同一段街道，手里拎着一玻璃罐炼过的熟油。只有两个人问我：“在哪里买到的？”这就是精神上的需求：人不仅仅靠面包活着。

您和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骑自行车旅游，情况怎样？道路好走吗？南下的计划能否实现？等您来莫斯科。祝您健康、精力充沛，并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以亲切的敬意。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向你们两人致意。

您的 B. 沙拉莫夫

№03432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不晚于1963年9月10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8月28日，我在“苏维埃作家”出版社交出了一本新的诗集。这不是说它将付印（距这一步还早），但手稿已被列入计划（9月份）并通过了第一编辑的梳理扒弄（扉页上将印上他的名字）。除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外，还有两次审校。《树叶簌簌响》（这是诗集的书名）手稿的一份样本我为您和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珍藏着，准备见到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时交给她。其中许多首您已看过，也有一些新作。如同《火镰》一样，《树叶簌簌响》更多是编辑的成果，而不是作者的成果，不过我已不耐烦再加以反对。而这已不是我想要拥有的集子了。

很有可能，到9月10日这本书差不多可以通过所有各种程序。

我想除了空白稿纸以外还带上《伪造的材料》<sup>①</sup>去梁赞，您意见如何？感谢邀请我去别墅，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一定来。请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转达我衷心的问候。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向你们两人致意。

带上《布尔斯克监狱》、《医务中校》。

您的 B. 沙拉莫夫

---

<sup>①</sup> 即沙拉莫夫的《罪恶的世界梗概》。

№03433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不晚于 1963 年 11 月)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来过我这里，她的殷勤亲切的谈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说好，我不是在 9 日，而是在 11 日前来。所以推迟……是因为我希望快些把书交出去。两年来的活动行将大功告成（是否告成呢？），书稿已列入 9 月份的计划。本来他们想排到 10 月份，我请求列入第二个季度，后来他们将它提前到 9 月份（这还在收到您的信之前）。我盘算好 8 月份一定把书交出去（果然交了出去）。但是要预测编辑审读的时间十分困难，结果出版社的专业顾问（我前进路上的主要人物）直到 9 日（而不是原定的 1 日）才拿到书。我请求他在一两天内看完。

我本可以抛开任何事情，于 9 日前来，因为这次会见对于我无比重要，但我毕竟不能置交出书稿的事于不顾。

这样，如同和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约定的那样，我就不能于 9 日或 10 日来到，我会发电报来。不过，这会比 10 日或 11 日可能再晚一些。

现在，谈谈文集本身。您记得，当我们在《新世界》第一次见面时，您说过现在该是出版好的文集的时候了。但这样的集子现在仍不能出。所有关于科雷马的诗，都按照编辑的要求给删掉了。其余部分，除 2~3 首之外，都经过删节修改。编辑们大砍大伐，把茂密葱茏的原始森林变成了稀疏不堪的林子，以便高级长官（以高

雅名义出现的政治领导)能够很方便把自己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变成威严可敬的公园。他们还想抬一两尊雕像到公园里去。我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您,是为了让您深刻体验到我的情绪。要知道,就在这几天几乎要决定书的一切。这个“几乎”包括报刊保密检查局以及某一些无可抗拒的力量。但是,在那里我是软弱无力的,于是,虽然已处于后卫战中,我仍在为捍卫每个诗行而搏斗。

祝您和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一切顺利。

一旦作出了决定而我的在场已不再必不可少,我将当即前来。我本可以于9日到达,以便于15日离开。但是这样的造访不好,而且会是心神不定的。因此,请原谅我这次万不得已的推迟行期。我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带的东西,也想好了带上什么去工作。

致以衷心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B. 沙拉莫夫

[另一份信稿]

在我参加学习的医助训练班上,有一位“内科病”教员,马林斯基。他在课上一再重申:“在你们未来的实际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学会相信病人。如果你们没有这种信任就成不了医务工作者。”

我怎么会想起了这件事。家里任何一个人(也包括最亲的人)都不理解我病得有多么严重(或者说有多么困难),以及我究竟是什么病。

在昨天同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作了详尽而真诚的谈话以后,我还是不得不婉谢您的邀请,不到您那里去。原因在于如下的情况。

坐火车到梁赞再坐火车到索洛查,毫无疑问必然会使我好几天无法与人交往,而且很可能还要请医生来看病,等等,而躺2~3个昼夜是必不可少的。

其次。我已经七年自己烧饭，不能去任何食堂用餐。这种仔细的饮食制度，正是我的成就之一，我不能把多年以来的积蓄孤注一掷地拿去押宝。我不食用任何肉类、任何肉汤、任何罐头食品、任何用罐头食品做的菜肴、任何煎炸过的东西。

最后，第三，唉，那就是严寒。而我又完全无法在木屋里长期生着炉子。

这就是我无法外出的十分实在的个人原因。请不要在这样的婉谢之外猜想什么别的原因（像捷乌什或特瓦尔多夫斯基可能做的那样）。我是很想去的。我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收集了伪造的材料），何况和您交谈是我心向往之的事，但是，唉，我不可能去过别墅条件下的生活。请原谅我。也许等到明年，当您在梁赞有了较为宽敞的住房以后再说。

祝您成功，工作精力充沛。请来信。

您的 B. 沙拉莫夫

№03434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3年12月28日)

亲爱的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谢廖沙<sup>①</sup>和我衷心地向你们祝贺新年。新年是我庆祝的惟一节日。

预祝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取得成就，以及在列宁奖评选委员会摆弄的复杂纸牌卦中得到好运。尽管看来似乎毫无疑问，但总怕有个万一。我的书一出版就立即给您寄去。这是一本微不足道的书。

祝你们两人心情平和、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宁，感谢你们的美好吉言。这段时间内，在真正的好书中读了普拉托诺夫的《贾恩》<sup>②</sup>。

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目前在戈利钦的所谓创作宫，这是一座精灵的房屋。

您的 B. 沙拉莫夫

1963年12月28日于莫斯科

---

① 谢廖沙是语言学家谢·尤·涅克留道夫的呢称。

② 普拉托诺夫，安·普·（1899～1951），苏联作家，以创作讽刺散文和叙事散文著称。

No03435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年1月21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受到上面压力的莫斯科文学界人士变成了唯美主义者，把普拉托诺夫如同卡夫卡一样推崇备至，并将尽一切可能（而不是尽可能，指出两者的差别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继续对他进行吹捧。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抬出普拉托诺夫来同莫斯科人所不喜欢、不相信的（要相信什么？）索尔仁尼琴相信的（要相信什么？）索尔仁尼琴相对抗？人们秘而不宣的原因在于：莫斯科人不相信在梁赞等某个什么地方会有可能出现一个卓越的人才。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作家（当然也包括费定<sup>①</sup>在内）的“上升之路”，都无一例外地是一条漫长的，需要多年攀登的道路，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前进，需要相互扶持（而且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相互扶持）。这是一条乌龟缓慢爬行之路，在爬行过程中乌龟们都已经学会相信，没有任何其他的进入文学之路。作家协会，也根本不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组织形式，而是一种与此类缓慢爬行相适应的组织。

甚至连帕斯捷尔纳克<sup>②</sup>也没有破坏这个程式。但是，索尔仁尼琴却在破坏它，于是人们就在他身上百般找茬，力求加以贬低，绕过不提，等等。

<sup>①</sup> 费定，康·亚·（1892～1977），俄苏作家，科学院院士。

<sup>②</sup> 帕斯捷尔纳克，鲍·列·（1890～1960），俄苏作家，诗人。《日瓦戈医生》作者。

稍稍有一点自信，稍稍有一点过于相信自己猜透别人心思的能力。和沃尔夫·梅森一样，抓谈话对方的手臂，不由自主地牵动着，看来，这也在向他讲着什么。由于自信而陷入盲目——未能很清楚地理解和感觉到我离开梁赞的原因。但是，这一切都是小事。



№03436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年5月)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您一定已经回到梁赞了。希望您不要因为报纸上的任何文章而感到不安。列宁奖金评选委员会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不选中您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是苏联文学中，以及几十年来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

握您的手，我相信真理一定会取得胜利。感谢您对《树叶簌簌响》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毫无疑问，您提到的诗（还有《既非走兽，也非飞禽》）是集子中最重要 的诗作。至于《不可接受的》和过分随意地引用自然现象，那么这不过是因为：诗歌，是普遍通用的语言，而其博大精深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足可以把生活、科学、社会的任何现象都“转译”为自己的东西，从而不断拓展自己的道路。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像人们经常喜欢表达的那样，新的“现实”，而在于运用任何一种生活素材（也许除掉淫秽材料之外）的愿望和可能性。诗歌，这是一个普遍适应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有机会我们再谈。您可知道，不久前有谁来过我这里？是瓦尔帕霍夫斯基<sup>①</sup>。我有一次不是说过，我在科雷马就知道他。1942年我们曾在同一批内被押往杰尔加尔特别营区——那是当时斯大林式

---

<sup>①</sup> 瓦尔帕霍夫斯基，列·维·（1908～1976）苏联舞台戏剧导演，曾受迫害，与沙拉莫夫在科雷马劳改营相识。

的奥斯维辛之一。我被一直押送到那里，几个月后宣布判决（10年）。押送去大概就是为此目的。而瓦尔帕霍夫斯基在押解途中的最后一个夜宿点得到他的科雷马朋友的辩护而获得解救。两年之后，我遇到过他。这一次他来找我，是为了要看《科雷马的故事》，他不知从哪里得知此事。我让他看了。他说：列昂尼德·维克托罗维奇，您手头就有一个精彩的剧本——索尔仁尼琴的《风中残烛》。

——我看过了。我感到像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要有什么地方读读《鹿和小窝棚》呢。您有吗？

——没有。可是像安德列耶夫不好吗？

——是的。索尔仁尼琴的感染力在于他的现实主义。不错吧？

——列昂尼德·维克托罗维奇，我在任何艺术中都不能确切地看清现实主义的界限。日本的一位线条画家画了广岛。不过当面再说吧。

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意。

您的 B. 沙拉莫夫

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和谢廖沙向你们致意。

№03437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年5月)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接到您的来信，感到由衷的高兴。讲台上对您的挑衅<sup>①</sup>，是斯大林时代道德败坏的典型表现，让人们回忆起数十年来大量见到的从来未受惩罚，至今仍不受惩罚的类似罪行，致使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历历在目地重新回忆起这一切。不过我们还是希望这一切终将结束。

关于《风中残烛》，我持有独特的意见。这不是您的失败。《风中残烛》提出和解决的问题仍和您的其他作品一样，但采用的是另一种独特风格，而这种独特风格并不是在安德列耶夫的阴影下产生的。

我听说我的短篇小说正在莫斯科销售。问题恰在于，由于头痛等等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当然，我没有放弃，也不会放弃这项工作。但这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很困难。我的下一项任务，是描述捷尔加尔，描写整个科雷马特别营区（斯大林式的奥斯维辛之一），我在那里待了几个月并接受宣判。不久前遇到一桩十分有趣的事。我试图办理地下操作十年工龄的证明（以便按残废证退休），但是

---

① “讲台上对您的挑衅”是沙拉莫夫顺应索尔仁尼琴的话说的。“讲台上的挑衅”据索尔仁尼琴所说是指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巴甫洛夫，在列宁奖金评奖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反对提名索尔仁尼琴，说索尔仁尼琴所在的不是一个政治营垒，而是一个刑事营垒。

从马加丹通知我说，我在矿务管理局（按照他们的材料）工作了9年零4个月，因此我关于要求发给十年地下工龄证明的请求被驳回。但与此同时，我却得以了解到一个情况。原来，人犯的所有“案卷”、劳改营的全部档案被销毁，因此，关于马加丹当年的长官、侦查人员、警卫人员的任何材料都找不到了。我那厚厚一包“案卷”中装得满满的大量旁证材料也一张都无法找到。销毁文件的行动是1953~1956年之间发生的。给我的正式答复是：关于您所从事工作性质的材料未见保存。在沃尔库塔也同样发生这种情况，这样，斯大林的两个最大的特别营区的做法如出一辙。

请来我们这里，等待您的到来。住房正在修缮。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和萨沙住在别墅，不过有时来这里。我则一直在家，只在去商店购物时可能离开一会。

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以衷心的问候。奥利加·谢尔盖耶夫娜向你们俩衷心致候。

两年以前，《旗》杂志约我撰写题为《二十年代》的回忆录，写20年代的莫斯科。我在一个星期内写了5个印张。题目很壮观，因为未来的所有善事和一切罪行都是在20年代开始萌发滋生。不过我只撷取文学方面的内容。这篇东西未予刊用，手稿至今在杂志社放着。

№03438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年11月1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在您关于《安娜·伊万诺夫娜》<sup>①</sup>的信中有一句话，一条意见，我将留在以后较详细地向您作答。

您写道，最好让《安娜·伊万诺夫娜》的主人公手中拿的不是写诗的本子，而是别的什么。把本子改成基巴利契奇的图纸之类的东西很容易。但是，需要的完全不是这一点。我以为，作为惯例因袭下来的恰恰是描写科技活动家一类人的英雄气概。作为惯例因袭下来的，是害怕把艺术界人士描绘成更加敏锐的人（而情况却正是如此，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其次，我知道几则关于对劳改营中的文学活动作出最重惩罚的事例。《安娜·伊万诺夫娜》的题材是由死者，被杀害的人们的活生生的真实事件作为佐证的。

至于写诗的罪名是劳改营中最坏的罪名之一，就不必去说了。因从事文学活动而受到惩罚的事例，仅我所知道和看到的就肯定有10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由此可见，就生活的真实而言，不存在不足或歪曲的问题。

但是，问题的实质要比劳改营的视野，比剧本的主题发展要广泛、深刻得多。问题在于，所有科学家（任何范围）和所有的工程师（任何水平），在任何政权之下都处于政府的“哺乳”、供养之

---

① 《安娜·伊万诺夫娜》是沙拉莫夫创作的剧本，载于《戏剧》杂志1989年第1期。

下。他们受到的伤害要少得多，而且他们的精神生活也稍稍偏离激越热情的道路。这只要回忆一下不久前基泰戈罗斯基教授对《文学问题》杂志调查问卷的回答就足够了。那次可怜的宇航员被忘得一干二净的事件<sup>①</sup>，使我们真正了解到了文学，以及生活和科学的真正的范围有多大。（无论宗教神秘剧《蓝色的十字架》怎样要求各级予以关注，在意识形态热情极端混乱的情况之下需要的是另一回事——“蓝色的血”。）

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公呢？我认为，每一个诚实的作家的责任，恰恰在于为人文知识分子塑造英雄形象。他们无论何时何地当政府更替时总是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这不仅仅发生在劳改营之中，而且发生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同“意识形态”作斗争也是从这个领域引发的。

这方面几乎没有例外，也许只有费尔马和杰米多夫<sup>②</sup>不在其列。

基泰戈罗斯基教授在对《文学问题》杂志调查问卷作回答时说到，物理学家们什么书也不看——无论是经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家的书——什么书也不看。而且他们也没有读书的必要。所有这一切，基泰戈罗斯基都是以“代表”的身份讲的，不断提到“我们”，“在我们这里”，等等。他说，科学家只看侦探小说，而对于读那些揭示人们心理的长篇小说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精神力量。承认这一点说明，科学家是什么书也不看的，因为看侦探小说，这是一种“调

① 沙拉莫夫是隐喻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免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事件。因为在赫鲁晓夫当政年代，苏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和载人宇宙飞船，苏联宇航员加加林成为第一个飞离地球，进入太空的人。沙拉莫夫的隐喻含有嘲弄的意味。

② 杰米多夫，格·格·（1903～1987），物理学家、工程师，因受迫害而服苦役，与沙拉莫夫相识于科雷马劳改营，是沙拉莫夫所尊敬的人。

剂性”阅读，是任何一个作家、科学家、艺术工作者都必不可少的。这里的实质在于，脑子处于低速转动状态，但并未完全停下来（如同某种划小船游览或锯木柴那样）。作为一种调剂性阅读，海明威也看侦探小说，而且作了很详细的描述。对于很多人而言（如格林），则用翻阅百科词典、参考书之类的书来起这种调剂性阅读的作用。我也为此目的而翻阅参考书。作家还有一种阅读的方式，那就是所谓的“刺激性”阅读（帕斯捷尔纳克读古典作品，维·米·英贝尔读狄更斯，您读达里词典）。对于您的工作来说，达里词典是完全不必要的，但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兴奋剂使用则是可以允许的。

下面谈谈家事。不久前我收到一封来自作家协会沃洛格达分会的信，要我给他们一本书，并写一份“作家”自传。作家自传必须（按信中的文字）写得“生动”、“形象”。说真的，竟真的这样写，信在我这里。

沃洛格达从没有找过我。在我30年代写的短篇小说中，确有依据沃洛格达的素材写成的东西，但没有任何人从那里对此说过任何话，也没有写过信来。自1957年起，人们开始刊印我的诗，还说作者是沃洛格达人。在沃洛格达的报纸上也没有发表过任何评论。1961年《火镰》出版，在几座城市倒是出现了书评，不过其中并没有沃洛格达。1962年，我有一次坐在《文学报》一位负责同志的办公室里。这位同志说：“您，瓦尔拉姆·吉洪诺维奇，要不要我给您安排出版一本诗集？”那还用说。

他拿起话筒，要了沃洛格达的电话，5分钟以后他不知是同马林科夫，还是同马尔科夫<sup>①</sup>讲了起来。

——明天沃洛格达会出诗集。听着电话。

---

<sup>①</sup> 马尔科夫，弗·米·，沃洛格达出版社经理。

——我不听电话。

他把对方的答复轻声向我重复着。

——不行，这很困难，我们自己的书很多，您又提出一个什么沙拉莫夫。那么，一定要某一位莫斯科作家写一篇序。

——任何一位莫斯科作家都会认为给沙拉莫夫的诗集作序是自己的责任。

——那，好吧。我们自己给他写信。请把他的地址告诉我们。

对方记下了我的地址，这样就一切定当。

我的支持者很不好意思地和我见了面。

《树叶簌簌响》的出版，对沃洛格达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直到英贝尔在《新世界》发表了一篇书评之后，他们才又突然给我写信，要我“生动”而“形象”地写自传，并且寄2本已经出版的书去，由他们从中选一本。

我想说的是，谈话的起点不对，他们本应当请我提供一本未刊印的诗集或散文集，但我改变了主意，写了一封短信予以拒绝。

我在这里沉湎于大讲我自己有关沃洛格达电话交谈的故事，而忽略了我要告诉您的主要内容。我开始写自传了，而且已经写了4个印张。想交给您看一看。这东西不是给沃格达的，篇幅过大，可以称之为《我的几次生命》。题目是否有些标新立异？您看呢？

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以衷心的敬意。

您的 B. 沙拉莫夫



№03439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4年11月15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给您写整整两封信，但是由于真实意义上的运输不便和重量受限，我没有发出，想在见面时交给您。里面有我对您“因职责所在”而进行审读的意见。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以及《风中残烛》取得成功。

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以衷心的敬意。

您的 B. 沙拉莫夫

№03440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5年)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收到您的来信十分高兴。只是可惜您压缩了谈话的范围，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尚未能触及。但是，在其他问题上的“意味”也明显表现了出来，而且“封死”讨论的结果还早。

作家的责任，恰恰是在于表现知识分子、作家、诗人的英雄行为。他们对此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拥有无法比拟的更加大得多的权利（不应当认为，其他阶层就没有这种权利）。问题在于程度不同，在于相比较而言，在于社会的道德责任。这里，把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命运加以对比是不可避免的——“受损害”的差别过于悬殊。您清楚地知道拉姆津<sup>①</sup>先生的奇遇，他竟愿意参与一场闹剧——把荣膺勋章的《愉快的结局》和一桶这一类的劝善说教浇到观众和听众的头上，这是对科技界“自由思想”代表人物进行“可怕”、“极端”的惩罚的惟一事例。所有其他人付出的代价还要轻些（如沙赫特分子<sup>②</sup>等）。

对于诗人和作家则采取另一种做法。曼德利施塔姆<sup>③</sup>、古米廖

---

① 拉姆津，列·康·（1887～1948），苏联热力学家，全苏热工学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第一任所长，1930年因莫须有的工业党案而遭谴责。

② 沙赫特案件是1928年苏联制造的迫害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遭迫害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被诬为“沙赫特分子”。

③ 曼德利施塔姆，奥·埃·（1891～1938），俄苏诗人。

夫<sup>①</sup>、皮利尼亚克<sup>②</sup>、巴贝尔<sup>③</sup>（还有数以百计的其他人，他们的姓名还没有刻上作家协会的大理石纪念碑，尽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过在战争中死去的人）当即就被消灭了。尽管任何一个单流锅炉和任何一架宇宙飞船的价值要比曼德利施塔姆的诗小几百万倍。

普希金、勃洛克、茨维塔耶娃<sup>④</sup>、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利施塔姆的生命，对于人们来说比任何一种宇宙飞船的任何一个设计师的生命，要无可比拟地更加珍贵。诗人和作家是以自己全部悲剧般坎坷艰辛的命运而赢得被塑造为英雄的权利。这里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意味”。这个问题正应当这样地提出和加以解决。这是社会的道义责任。可竟有人说什么，描绘死去的艺术家就如同是“艺术家在描绘自己的工作室”！要知道艺术家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被杀害的。

在关于“工作室”的问题上是您错了，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即使按照您的理解来看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文学的历史上，而且也包括人类灵魂的历史上，就有过不止一个这类由艺术家描绘的“工作室”，《童年和少年》就是例子。难道艺术家托尔斯泰描绘的不就是“工作室吗”？当然是“工作室”。在散文作品中，这类“工作室”很多，它们的教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在诗歌中要援引这样的例子也同样很容易。

“从窗间镜里一杯可可悄悄消失，  
透花窗纱徐徐摆动——沿着一条

① 古米廖夫，尼·斯·(1886~1921)，俄诗人。

② 皮利尼亚克，鲍·安·(1894~1941)，俄苏作家。

③ 巴贝尔，伊·艾·(1894~1941)，俄苏作家。

④ 茨维塔耶娃，玛·伊·(1892~1941)，俄女诗人。1922~1939侨居国外。

笔直的小路奔向花园，  
奔向枯树和乱石，  
奔向秋千架的是窗间镜。”

是“工作室”吗？是工作室。别墅。而与此同时，这些句子又是20世纪（俄国文学中一个硕果累累的，由不少光辉的姓名装饰起来的世纪）俄罗斯诗歌的最高峰。

这是按您对“工作室”的理解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对我来说，艺术家的“工作室”——这是他的灵魂，他的个人经历，整个一生全部积累的奉献，至于这表现在哪里，注意力集中在哪里，并不重要。会有天才出现，也会有新的事物出现。会有新的事物，会有意外收获，也会有胜利。艺术有许多起点，但它的目的是一致的。

依我看来，您对于诸如谢列斯特和阿尔丹-谢苗诺夫<sup>①</sup>一类现代“风俗派作家”也持有不够正确的立场。这里仅仅提出“真实”和“不真实”的论据是不够的。为什么呢？要知道，阿尔丹-谢苗诺夫也可以说，他，阿尔丹-谢苗诺夫，对于“所经历的事”描写得真实，而索尔仁尼琴在撒谎。阿尔丹-谢苗诺夫会说，谁给了索尔仁尼琴判断劳改营中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的权利，如果索尔仁尼琴并不了解劳改营（为什么、什么原因），而他，阿尔丹-谢苗诺夫曾在科雷马（竟在科雷马！）待了多少年，而且能够提出文件和平反的材料来作为证明。而关于提供文件证明的事不是已经有过一次意外事故，您有一次曾经写信向我说过<sup>②</sup>。按照我的观点，您（或者代表您的利益的人）根本不需要提供什么能证明自己

① 阿尔丹-谢苗诺夫，A. И.（1908~1985），作家，曾遭迫害。

② 指索尔仁尼琴1964年5月13日给沙拉莫夫的信。

曾被监禁的文件。这样做，就是要把两个作者都从文学界中赶出去——让他们在报纸上决斗好了。真实在哪里呢？19世纪的俄国如此耳熟能详的两种真实，即事实的真实和公正的真实，又各自在哪里呢？

为什么您会觉得阿尔丹-谢苗诺夫或季亚科夫<sup>①</sup>在撒谎，而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的故事》中不是在撒谎呢？

且看阿札耶夫<sup>②</sup>，这类文学的经典作家，他介入金矿开采，随后写了一篇《车厢》。其中党员主人公们痛打呜呜乱叫的人和用纸牌玩“甲虫”游戏，尽管自从出现苦役和“甲虫”游戏以来，在车厢里人们从不玩“甲虫”游戏。看，阿札耶夫也不提交证明文件。这简直是“金羊皮”骑士。

请您原谅，我竟把您的名字和阿尔丹-谢苗诺夫并列，但这只是一秒钟时间，是为了说明您的错误思想。让那些不是作家的人去争论有关“真实”和“不真实”的问题吧。对于作家而言，则可以谈论艺术的软弱无力，对主题的恶意滥用，利用别人的鲜血投机倒把，以及议论阿尔丹-谢苗诺夫在编造自己的无稽之谈时不能代表劳改营人犯讲话——不是因为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如何，而是因为他缺乏禀赋。这里又是才能的问题，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履行作家的职责正是与才能联系在一起的。恰恰因为如此，譬如说，重要的是您的意见，而不是阿尔丹-谢苗诺夫的意见。或者说，讲得再广泛一点，重要的是普希金关于鲍里斯·戈都诺夫（他在历史上，实际上并不是如同普希金描绘的那样）的意见。才能，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责任。不过，这已多少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想这样回答您的问题。这类说谎的人：谢列斯特、阿尔丹-

① 季亚科夫，B. A. (1902~ )，作家，曾遭迫害。

② 阿札耶夫，B. H. (1915~1968)，作家，曾遭迫害。

谢苗诺夫、谢列布里亚科娃<sup>①</sup> 本不该让他们进入文学界。他们之所以是撒谎者，正是因为他们毫无禀赋。世界上有成千种真实（也包括事实的真实和公正的真实），但真正的真实只有一种，正如同只有一种不朽之作——艺术一样。

---

<sup>①</sup> 谢列布里亚科娃，Г. И.（1905～1980），作家，曾遭迫害。

№03441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6年上半年)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高兴地收到您的信。在阿谢耶夫的晚会上未能出现，简单地通知我说晚会改期，后来我从报上看到晚会举行过了。《小诗》将等待着您，而且完全不是“暂时地”。听到关于《风中残烛》的消息十分欣慰。按照我的观点，那里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关于季亚科夫、谢列斯特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作品，我要详细一点写给您，虽然这些作者只值得对他们说几句简短的，然而却不客气的话。

当《伊凡·杰尼索维奇》问世时，设想有两种可能：或者这部中篇小说将成为一艘破冰船，它为真理通向社会，通向青年而开辟道路，于是有大量的新的船只进入浮冰已被清除的水域；或者《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出版只不过是钟摆摆幅的一个极点，并随即开始倒退。而一旦出现这种令人痛苦的第二种场合，应该想到那些处处狡猾机灵的人会把水搅混，并且出卖自己的血（要是出卖别人的血那就更加糟糕得多）以求牟利。

“阅历丰富”的三个人——阿尔丹—诺苗诺夫、谢列斯特和季亚科夫可能会拥有读者。加林娜·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令人起疑的经历在这里显然是不合适的。至于说到那几篇以《人仍然还是人》为题的文章的作者，那么看那类作品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其主旨在标题中已经显示了出来。在劳改营条件下，人从来不会仍然还是人，劳改营并不是为此而建立的。至于人是否能比任何动物更加经受得

住折磨——38年的主要规律——这一点看来作者们是未予考虑的。

阿尔丹-谢苗诺夫是报纸杂志圈中人所共知的人物。由于一再“歪曲”事实真相和闹出各种“笑话”，此人一再受到斥责。只有一点从来没有人指责过他：说他阿谀奉承得还不够。由于完全没有力量和情绪，他的这一品质使他得以“创作”出（如同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岩石上的浅浮雕”。

我偶然看到一篇刊登在《马加丹真理报》上的大块文章，它对季亚科夫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文章推崇季亚科夫，认为他达到了真正的艺术高峰，等等，而对阿尔丹-谢苗诺夫则给以批评，认为他描绘的劳改营长官不是典型人物，说劳改营在战后已经经过整顿，摆脱了长官们的控制（接着列举的一些“条款”明显说明，此文作者对于那些年里劳改营组织机构的种种变动知之甚详）。阿尔丹-谢苗诺夫受到赞赏之处，是他对于“浅浮雕”这种实质上以某种形式“占有一席之地”的现象予以关注。

您觉得，阿尔丹-谢苗诺夫是“解除看管的人”。问题在哪里呢？科雷马劳改营区是一个遍布在苏联八分之一面积上的庞大机构。在这块地面上，在最恶劣的年代里，羁留着80万~90万人犯。（也就是说，比德米特罗夫劳改营区还少一些，在莫斯科运河时期那里竟有120万登记在册的人犯。）

在那时的科雷马，有好几个规模巨大的矿山工业管理局（北方、南方、西南、西方、坚金斯科耶、柴乌里英斯科耶等等），下属各种金矿、锡矿，以及一些秘密的“小金属”采掘场。金矿的工作日夏天为14个小时（工作定额就是按14小时计算的）。夏季没有任何休息日，每一个掌子面工作队的“在册名单”一个采金季节内要更换几次。“人力废料”是用棍子、枪托、撬棒，以及饥饿和寒冷送出掌子面的，送往医院、送到土冈下面、派到残废营去。从海上，从押运站毫无限制地送来新手接替他们。黄金生产计划必须



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完成。工作队的“在册名单”（工作队中除了队长没有任何活物）是按照“计划要求”予以保证的。

黄金、金矿，这就是科雷马之所以存在的主要目的。要知道，关于科雷马有黄金这件事，300年前就已有所闻。但是，从来也没有谁敢于在如此严酷的条件下动用囚犯的劳动。在这类问题上总有某种道德上的界限，极点。然而，结果发现，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跨越这个极限，而且还不仅仅是“迫使”囚犯完成计划，而且还强迫犯人认购国债（这是定期进行的）。而且还不仅仅是认购国债，还曾要求征集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签名。

比这一切更加蔑视人，更加蔑视劳动的事是不可能有的。因此，那些颂扬劳改营劳动的人，在我看来，是和那些在劳改营大门口钉上“劳动是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业、英勇豪迈的事业”的人并无不同。

来到金矿，就是进入了坟墓。这是命运的偶然性所致，因为当时正有一份名单一裁为二：一批人送去受死，而另一批人有可能活下来和工作，而这又是可以经受，可以熬得过的工作，人可以活下来。难道不是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份名单被一裁为二吗。这是涉及每个人命运的名单。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种偶然性。不过，有时也可以看到意志的力量，如同我在文集（《科雷马的故事》）中最后一篇《伤寒检疫》<sup>①</sup>中所揭示的那样。

想从金矿摆脱出来，想获得拯救，只有伤残一条路。（这里都是自残、自伤的人，不知有多少）。虽然从法律上说，自残者并不享有残疾人的地位，但实际上已无法强迫他工作了。

要被确认为伤残从而有权领到“残疾证”，需要有马加丹中央医疗委员会的认定，由它开出正式记录。在其他情况下，所有医院

<sup>①</sup> 沙拉莫夫的《伤寒检疫》载《新世界》1988年第6期。

都会把伤残人员送回原地。

科雷马 90% 的劳改营居民都集中在各个金矿中。

第二个最大的机构是公路局。科雷马的中央“大道”长约 2000 公里。这条干线有几十条通向各个金矿、海港和极地机场的支线、专线。

公路局职工负责修建“公路”。那里的所有“公路”都是所谓“美国女郎”（路面覆盖极薄，必须不断地进行预防性养护维修）。全部公路职工（遍布边疆区全境）分成两大类：建筑人员和养护维修人员。公路局建筑人员干的活，比在金矿干活要轻松得多。（那里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补充人员，也就是说要像爱惜牲口那样爱护人力，而且体制也与金矿不同）。公路局的工人干活比在金矿轻松得多，虽然那里也是地面、小推车和镐头。养护维修工人（当我在科雷马期间，其中大部分是“自由人”，即原先的人犯）用锹和扫帚干活。

公路建筑工人都是犯有不同条款的罪犯，判有短暂的刑期，但是都未附有莫斯科“关于只能使用于干重体力活的特别指示”，等等。在公路管理部门中没有水洗季节，没有“金属”。那里实行 10 小时工作日制，有正常的休息日（每月 3 天）。“按照想象”，道路工人应该比金矿工人吃得差一些，实际上一切恰恰相反。那里所有的人，不管完成定额多少，都发给同样数量的面包，“八百克一个的”。在道路工人中刑事犯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并不多，即使有也是在“看管下”沿途出差。这类差旅行动（作为一种威慑其他道路工人的手段）只是在某些“正面较宽”的地段上存在，在人员不断变换的特别惩罚区中存在。其他道路工人都是“解除看管的”。正是在这样一类管理机构中，在阿尔卡加拉附近某处，阿尔丹-谢苗诺夫工作过几年。他，第一，是解除看管的；第二，他同金矿上干的活没有丝毫关系。

除了公路管理局以外，科雷马还有一个煤炭管理局（远东煤炭建设管理总局），它所属的矿井遍布科雷马各地，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也仍有自己的特点，是采煤式的，而不是“采金式的”。他们干的活比“采金”不知轻松多少。还有一个河运管理局，负责科雷马河和因迪吉尔卡河的航运。那里则完全是天堂了。另有几个地质勘探局，只住着大量享用“干口粮”的解除看管人员。在那里雇佣的自由人同囚犯的交往要比在金矿密切得多，因为在偏远的勘探角落中，当没有坐探们的监视和中央部门的机构时，有时人也仍然是人。

有一个“第二金属”管理局，即锡石矿区（布图特卡格、瓦利库梅），人们都称之为“臭骂”（在俄语中与“锡石”读音相近）。还有几个秘密的管理局，那里的囚犯是七天作一天计算时间的。这是些铀矿、钽矿、钨矿。这些企业中犯人很少：都是涉及“B”款、“Г”款、“Д”款等等的人们。

有国营农场管理局，那里的囚犯活的时间要长一些。不管他们去时身体多么虚弱，在那里，如同在马林斯基营地区一样，总有些什么东西可吃——麦粒、甜菜、马铃薯、白菜。到那里去的人都（公正地）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整个鄂霍次克海沿岸一些大的渔场也隶属于国营农场管理局。要活下来不死，到那里去就足够了。戈尔巴托夫将军<sup>①</sup>在马加丹干道23公里处的医院住院之后，便来到了这样一个救命的渔场。正是在这个医院中，当残疾人戈尔巴托夫在那里住院的6年以后，我在那里结束了拯救了我性命的医助训练班的学业。

<sup>①</sup> 戈尔巴托夫，亚·瓦·（1891～1973），苏联大将，曾获苏联英雄称号。30年代大清洗时期受迫害，1939年被解往科雷马劳改营服役。卫国战争爆发后再返军队，1943年起是几个集团军的指挥者。战后曾任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著有回忆录，刊于《新世界》1964年3～5期。

我也曾到过奥勒河一带（戈尔巴托夫在那里工作过），不过已经是1952年，而我也已是受雇佣的医助身份了。不过我的履历对于“民族地区”是不合适的。（那里也是科雷马的特殊生活，有埃文基人<sup>①</sup>、尤卡吉尔人<sup>②</sup>、雅库特人、楚克奇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苏维埃政权，不隶属于国家建设局远东建设分局）。那里也有囚犯，是偶然流落到那里的个别人。

有一个汽车运输管理局，是个很庞大的机构，拥有自己的各种修理工场、汽车基地。至少有1000辆汽车不分昼夜，不分寒暑地工作。那里囚犯很多。有司机，也有修理工，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当然也都不是金矿。

有一个辅助企业管理局，下属各种各样的缝纫工场，但决不是个体缝纫铺。如果说，为了在诺曼底登陆需要天文数字的士兵军服纽扣，就要在英国建立一个庞大的机构；那么，也就需要那么多工人来不停地用旧衣服缝制那么多劳改营所需要的“棉靴”（主要是不停地修补）。

有若干修理工厂，但它们早已不再是修理厂了，而成了制造车床的机械厂（以便科雷马摆脱必须从“大陆”“进口”机器之类物品的依附地位）。

有生产阿芒炸药、电灯泡等一类物品的各种工厂。到处都是囚犯在干活。有卫生管理局的住宅区，那里又实行自己的规定，有自己的生活。

总之，在科雷马不仅要“从大的方面”交好运——获得一份好的工作，当上“侍从”，或者获得“镶边”，而且还要看进入几十个

① 以前称通古斯人，苏联的少数民族，居住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境内的埃文基自治区及远东地区，总人口不满3万，操通古斯语。

② 尤卡吉尔人、雅库特人、楚克奇人都是居住在楚克奇自治区境内的苏联少数民族。楚克奇人约15000人，其他人的人数也很少。

管理部门中的哪一个。在科雷马，每一个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不同的生活。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最倒霉不过的，就是金矿、采金场。什么地方也无法和它相比。如果说在其他地方要渡过几个月的困难时期，或者有难以忍受的惩罚区，那么，在金矿里，任何一个最令人满意的采金场都要比任何一个其他管理机构的任何一个惩罚区更加艰难和可怕。被赶到金矿去，这是任何地方，在任何管理部门中最令人耽心的威胁。而在采金场干活的人，又占到科雷马全部人数的90%。为了充实这些掌子面劳动力，各管理机构都有一些委员会不停地工作着，其责任就是为了把每一个最有劳动能力的人赶到采金场去。

人们日以继夜地处于这种恐惧心理之下，囚犯为自己的命运担心，长官则担心自己的警惕性不够高。这也是劳改营生活中败坏人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在谈谈戈尔巴托夫将军，谈谈我们的第四位回忆录作者。他的回忆录是我看过的描写科雷马的最真实、最诚挚的作品，因而我认为戈尔巴托夫是一个正派人。他不想忘记，也不愿意隐瞒当他面对在“马利季亚克”采金场（当他于1939年被送到科雷马去时）看到的景象时自己惊恐到何种程度。请计算一下时间，从他来到并开始掌子面上工作，到他生病后被当作不可治疗的残废人送往马加丹（23公里处的医院）为止。那里是囚犯的中心医院。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医助训练班，并描述过那个训练班的事（当然不是当时，而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把所有日期一算，您就会发现，戈尔巴托夫在“马利季亚克”一共只待了2~3周，最多不超过一个半月，而已经被作为人力废料从掌子面永远扔了出去。然而要知道，这是1939年，恐怖的浪潮已经消退，正在消退。戈尔巴托夫来到科雷马只不过是“蜻蜓点水”，却已经惊骇不已，一辈子胆战心惊

了。关于“马利季亚克”采金场本身，戈尔巴托夫知道得并不多。这是一个巨大的采金场，而戈尔巴托夫的只是其中一个工段，那里一共有800人和一个担任医助的囚犯。当时担任“马利季亚克”卫生处主任的，是一名年轻的妇女，青年女医生塔季扬娜·列皮耶娃。她在科雷马的行政当局和军官口粮竟令她如此喜欢，以至于她决定留在当地度过一生。还有1~2年前，当庆祝国家建设总局远东分局成立25周年时，她还得到了一枚重要的勋章。获奖名单曾在《真理报》上刊载。

关于窃贼，关于他们撒谎骗人、他们对待“傻瓜”们的道德规则，关于公开的抢劫等，戈尔巴托夫都作了真实的描述。

进入哪一个管理机关，是偶然的事。当然，这是说如果不提各种各样的“特许卡”、“做工作”和“便函”的话。但是，每一个先前的囚犯，如果愿意代表劳改营区科雷马说话，就没有权利忘记金矿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不管他本人是什么人：筑路工人也好，解除看管人员也好，甚或在劳改营文教处担任统计员的坐探也好。因为金矿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此外，对于任何一个在科雷马的任何部门干过一天活或一年活的人来说，荣誉和良知应是主要的问题。难道可以歌颂在棍棒逼迫之下的体力劳动，而这里讲的是完全实实在在的棍棒，决不是转义地指某种细微的精神压力。难道可以谈论强制劳动的无比美好？难道颂扬这样的劳动不是对人的最卑劣的侮辱，不是最残酷的精神毒害？劳改营只能培养对劳动的厌恶。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劳改营中，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曾教育人们劳动。在劳改营中，没有比强制性的沉重到致命的体力劳动更加卑劣、更加令人屈辱的事了。

没有什么东西比挂在所有劳改营大门上的那块“劳动是光荣的事业，荣耀的事业，是英勇豪迈的事业”的横幅更加厚颜无耻的了。

在《科雷马的故事》中，我就力求指出人在酷寒的环境下既冷又饿，还横遭殴打的条件下必然产生的行为的重要规律。

刑事罪犯们（这一批本应予以无情消灭的东西）不愿干活本应受到尊敬，如果他们逃避干活不是以大量别人的血，不幸的“傻瓜”们的血作为代价的话。

对于这一个重要的问题，戈尔巴托夫是这样解决的：“只要能够，就拖下去。”戈尔巴托夫作为半死的人们（他们感到欣慰的是，没有被派到金矿的掌子面上去）在劳改营劳动的典型画面而加以描绘的那种肩扛原木的一个个身影像电影镜头那样移动的场景，是十分生动逼真的。这种“只要能够，就拖下去”的说法，是同颂扬劳改营的体力劳动相去很远的，是同颂扬强制劳动的英雄豪迈，同向棍棒拍马溜须相去很远的。

我也是“只要能够，就拖下去”，但是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心灵的每一丝感觉，都在憎恨这种劳动。对于劳改营的棍棒溜须拍马，作为一个人，没有比这样做更加屈辱自贱的了。

在卡里亚金<sup>①</sup>的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恰恰作了不真实的说明。而这正是文章中的主要错误。但是，有幸的是，这是一个错误。如果《伊万·杰尼索维奇》竟把强制劳动美化成英勇豪迈的事，那么，这部中篇小说的作者就不会受到欢迎。

这是劳改营题材的主要问题之一。我愿意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讨论这个问题。

在劳改营中（在索洛维茨时期），对于强制劳动总是打折扣计算工时的（我清楚地记得，不知为什么按定额的40%计算）。但是，“改造”和在“白海运河”名义下得知的一切情况说明，囚犯

<sup>①</sup> Ю. 卡里亚金的文章《当代思想斗争片断》载《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4年第9期。

可以比自由人工作得更好、更多，如果能够规定一个“肠胃”的尺度，一个在劳改营中始终一贯的，经过多年经验验证的原则，并制订一个登记工作日的制度。前一个更加重要一些，第二项重要性稍差一些。这里便触及了人们灵魂中某些重要的内心底层的東西，而这是动物所根本无法理解的。马就不会认购公债，也不会把自己的蹄印按在斯德哥尔摩宣言上。

“改造”是人的灵魂走向败坏腐朽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当一个坏蛋毫无缘由地被关进监狱时（这在斯大林时期经常发生，因为所有人都会被逮捕，而坏蛋也不是始终能够逃脱的），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是无辜的，而其他人都人民的敌人或这一类人。这正是坏蛋与正派人不同之处，而正派人在监狱想的是：既然会无辜地被关进来，那么我的邻室也未必不是这样。季亚科夫属于第一类人，而戈尔巴托夫则属于第二类。不管将军多么天真，他竟认为道德败坏的原因在于经不起拷打。似乎只要经得起拷打，所有人都会被证明无罪而获得释放。不，那些经受住了拷问的人也都死去了。而且，认定能够经受拷问就证明戈尔巴托夫具备特殊的精神品质，是不正确的。我也没有在任何足以使我“罪有应得”的东西上签字，但在审讯时也并没有打我（在劳改营中不知道挨过多少次打，但两次审讯时我都没有挨打）。而且我也不知道，如果用针刺进我的指甲盖，我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在劳改营中我遇到过一个在这个问题上与戈尔巴托夫持同一信念的人。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诺夫哥罗德内务分局局长，被判有期徒刑。与大多数侦查员、检查官、党的工作人员不同，他不能隐瞒在入狱前从事什么工作。相反，他就这个问题同任何人都争吵（我是在某次途中，而不是在金矿遇到他的），而且大喊大叫：“唉，你竟然在我们，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臆想出来的假供词上签了字。既然签了字，那就是说，你就是敌人。你给侦讯造成了混乱，向苏维埃政权撒了谎。如



果你不是敌人，你应当忍住……人们打你，你要忍住，不要让苏维埃政权丢脸。”记得我听这位先生说话时，听着，听着，我最后说：“听你说话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是该哈哈大笑呢，还是应当打你一个耳光。看来，还是第二种办法更正确一些。”

这就是我对于戈尔巴托夫作为一名回忆录作者的惟一的批评意见。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第一类回忆录作者。存在一种一定要塑造“坚持下来的人”的意愿。这也是道德败坏的一种。劳改营中的道德败坏种类繁多。有一次我在《消息报》上看到谢列斯特的《一块荒金》，为歪典事实本身的卑劣和厚颜无耻而大感震惊。要知道，私藏荒金在科雷马是要被枪决的，这被称作为“偷盗金属”。至于这块荒金要不要交上去，既然有4个人（或者3个人，我不记得了）发现和看到它，除了坐探以外，没有人敢提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作者——季亚科夫、谢列斯特和阿尔丹-谢苗诺夫，都是庸碌之辈。他们的作品都是平庸之作，也就是说，都是艺术水平极低的。而您和我竟要“因职责所在”不得不去读这些短篇小说，并且还要判定这些并无艺术价值的呓语是否符合实际，真是极大痛苦、荒谬至极，令人颇感屈辱。难道对于广大读者群众只要简单提一提事件过程，就可以立即把这种作品捧进文学的范畴，捧入文学散文作品的领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意义十分深远。我早在年轻时就力图理解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短篇小说的外形和灵魂，似乎懂得了为什么莫泊桑的《菲菲小姐》中不停地下着雨，下着鲁昂的大雨。可这一切谁都不需要了吗？而需要的只不过是编出一份罪恶的清单和善举的清单，也不必从文风上和文字上进行修改，就可以出版、付印。要知道我的诗和我的短篇小说中有某一种文风的统一，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下了许多功夫，直到我感觉到出现了我的面貌，出现了我对世界的感受为止。也就是说，如今并不需要契诃

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不必为“表现”问题而苦恼，因为读者除了各式各样的阿尔丹-谢苗诺夫、季亚科夫和谢列斯特以外什么也不需要。

为什么我们——您和我——一定要花费时间读这些作品，判定它们的“实际”内容？如果读者接受这样的作品，那就是说，人们根本不需要艺术、文学。

以上大体就是我想就“因职责所在”进行审读而得出的印象而要对您讲的主要三点。

请原谅，我的信写得太长。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长篇小说获得成功。

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以衷心的敬意。

1964年11月15日于莫斯科

No03443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6年)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我读完了您的长篇小说<sup>①</sup>。这是一部意义巨大的作品，世界上任何一位作家都可为之而感到自豪。请接受我为时已晚的，然而却是最高度的赞扬。构思本身，题目设计（如果词语可以这样搭配的话）是灿烂辉煌的。把苏联社会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斯大林到斯皮里东——作了地质学式的分解。顺便说一句：在我看来，在斯大林的性格描绘中您没有触及到他最为本质性的特点。斯大林写过一篇题名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可随即加紧集体农庄运动升级；他宣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可随即不断杀人。

我不同意认为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这种形式将永远长存的意见。长篇小说已经死亡。正因为如此，作家们才努力辩解说什么是从实际生活中撷取来的，甚至连姓名也保留不变。对于臆想出来的题材，经历过广岛事件、奥斯维辛毒气室和集中营，看到过战争的读者们，会感到十分屈辱。在今天的散文作品中，以及在最近将来的散文作品中，必须超越文学的界限和形式。不是去描写生活中的新的现象，而是去创造出新的描写方式。没有典型描写，没有典型人物，没有个性刻画，没有性格的发展的散文作品，是有可能出现

---

① 指索尔仁尼琴196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一圈》。小说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生活，在国外发表。

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份文献（魏斯在《调查》<sup>①</sup>中的做法只是一种尝试，但其中已有了真理的萌芽）。还有柳比莫夫和塔甘加。所有这一切不应当是文学，而应当毫不停顿地读下去。不是文献，而是人们像读文献那样得到感受的散文作品。我多次想向您陈述事情的实质，于是选择了一个我赞颂您的长篇小说，赞颂您在古典的、合乎经义的形式中，因而也必然是在保守的形式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来说。经验表明，最受读者欢迎的是以最粗浅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平庸常见的主题。我指的不是您的长篇小说，但是在《癌病房》中这样的主人公和主题是存在的（在病房中阅读《人们靠什么活？》的那个病人）。

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格拉西莫维奇、阿布拉姆松都写得很好，特别是格拉西莫维奇。廖瓦·鲁宾写得很好。鲁宾和因诺肯季的那一场闹剧写得细腻、精致。佛陀的微笑<sup>②</sup>处于长篇小说之外。这从基调可以看出。在玩笑之下看不到流血（在我们的问题中玩笑是不允许的）。

斯皮里东写得不够有力，如果指坐探和特工这类题目时更是如此。农民当坐探的特别多。农民出身的守门人一定是特工，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人民受难者的形象，这样的人物是不合适的。笔力欠缺的是妇女的形象。作者的声音分配给了上千个人物——涅姆金、索洛戈京、鲁宾、娜佳、阿布拉姆松、斯皮里东，甚至斯大林也分到不易察觉的一小部分。

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的重要而鲜明的证明，是一篇有说服力的诉状。想一想吧，这样的有力器械以及类似的数以百计的东西

---

① 彼得·魏斯（1916~1982），德国剧作家。《调查》是魏斯创作的反法西斯剧本，剧本采用纪实的方法，发表于1965年。

② “佛陀的微笑”是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第一圈》的卷首语。

竟然能得以产生，而有的人紧张地工作着只是为了给那个伟大的切面包者（如同在科雷马人们称呼他那样）偷听某一次电话谈话。

握您的手。向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致以衷心的敬意。

您的 B. 沙拉莫夫

No03442

## 沙拉莫夫致亚·索尔仁尼琴的信

(1966年8月6日)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

收到您的信很高兴。《文学报》刊登诗的过程是这样的。3年以前，自纳罗夫恰托夫<sup>①</sup>进入《文学报》编委会以后，我送去了150首诗作，全是科雷马的诗（1937~1956年），大约一年以后同纳罗夫恰托夫谈过一次话，回答是断然拒绝刊登有关科雷马的作品。“如果您交给我们的的是当今的东西，我们可以给您腾出半个版面。”我一直记得杂志的实际做法：经过几个环节对上百首诗进行审阅，然后选出几十首最无害的，最偶然的作品。对于作者的这种“帮助”（“我们挤出版面，把它登出来！”），所有杂志都在施舍：《新世界》、《旗》、《莫斯科》、《家庭与学校》、《农村青年》——苏联所有大大小小的杂志都在这么做。这种丝毫不指出上面或站在侧面的人们意见的做法是最为有害的。这就称之为帮助、争取、态度良好，等等。

可惜的是，作者在物质方面的事情又不允许断绝这类交往。这样，我关于科雷马的诗在《新世界》、《旗》、《莫斯科》、《青少年》，都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但是，对于《文学报》，鉴于是第一次发表，我决定采取不同的做法，预见到会有这样一番谈话。

——我看不出有可能提供什么别的东西。《文学报》刊登过有

---

<sup>①</sup> 纳罗夫恰托夫，谢·谢·（1919~1981），苏联作家，劳动英雄。

关我的4篇文章，对之大加赞扬的正是科雷马的诗。而当谈到要登载时，却对我说：给我们别的什么吧。

——您可以把自己的诗拿回去。

——十分乐意。

参加谈话的有涅恰耶夫，他是那4篇评论我的文章的作者之一，当时在《文学报》机关工作。

——不，留下吧。也许我们能选出些什么。

这次谈话是2年以前的事，而我一直没有问起这些诗作，可是星期五，7月29日，我被召唤到《文学报》去（在那里工作的已经是另外一些人了），新的诗歌部主任扬斯卡娅说：“请您看一看，这些诗是否在别的什么地方刊登过，要知道已经过去了2年。”

我看了一下。

——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呢？

——或者明天，或者永远不拿来了。

为什么我要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您呢？是为了揭露所有的“自由派”，因为他们的帮助是真正的假话。

1966年8月6日于莫斯科

№04031

##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阻止向 亚·伊·索尔仁尼琴授予诺贝尔奖的 措施送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0年10月1日)

苏共中央：

今年7月，“艺术与进步”协会的一些法国活动家（作家阿尔曼·朗·、电影导演雷诺·克勒尔、社会学家雷蒙·阿朗等，共约50人）提名亚·索尔仁尼琴申报1970年的诺贝尔奖。

这项提名活动的策划者向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许多文学艺术活动家发函，请求支持亚·索尔仁尼琴入选。

例如，苏联作家协会书记米哈尔科夫同志就收到过此类信件，他在寄给“艺术与进步”协会的回信中指出，他认为协会的行动是“又一次旨在反对苏维埃文学的政治挑衅，而与真正关心文学发展的行动毫无共同之处。”<sup>①</sup>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马尔科夫同志<sup>②</sup>、沃龙科夫同志，苏联新闻社社长乌达利佐夫同志，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团体的代表们提出

---

① 米哈尔科夫，谢·弗·（1913～ ），苏联作家，1970年的职务是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寄给《艺术与进步》协会的信是指1970年7月3日，米哈尔科夫致《艺术与进步》协会总书记T. 巴斯克恩的信。此处的引文是信中的一句话。

② 马尔科夫，格·莫·（1911～ ），苏联作家，当时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1977年起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一系列如能实现即足以制止向亚·索尔仁尼琴授予诺贝尔奖的建议。

建议采取的措施有：

1. 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刊登简短的材料，向社会公众表明，提名亚·索尔仁尼琴受奖一事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文学方面的问题，是由不明情况的和公开敌视苏联的人士予以支持的。例如，白卫杂志《哨兵》1970年第8期上发表的文章就可用作这方面的材料。

2. 通过新闻社（乌达利佐夫同志）准备一个苏联社会人士代表（作家、学者、教师、工人等）就此问题的集体访谈，并向国外散发和用电台予以广播。

3. 利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鲍·列·苏奇科夫同志前往法国的机会，由他与著名的法国文学家进行私人接触，向他们说明苏联作家协会对亚·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和社会行为问题的立场。

4. 也许应当责成苏联驻瑞典大使迅即查清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中涉及提名亚·索尔仁尼琴问题的有关情况，作出详细通报，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5. 如有必要，也可以责成苏联驻瑞典大使向瑞典政府作出非正式口头说明，告知苏联公众认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有意向亚·索尔仁尼琴授奖是一种不友好行动，可能影响我们两国作家之间文化交往的发展。

6. 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向我们的朋友们提出请求，要他们采取可能的措施，淡化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中支持亚·索尔仁尼琴的宣传运动。

此外，还有其他意见。

例如，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科济列夫同志、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波

列伏依<sup>①</sup> 同志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苏联报刊上的言论和国家方面的外交行动未必能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产生什么影响。按照他们的意见，只有在该委员会通过关于向亚·索尔仁尼琴授奖的决定时，苏联报刊的表态才是适宜的。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博布科夫<sup>②</sup> 同志）赞同这个意见，但是认为，苏联报刊可以刊登讽刺小品，嘲讽西方那些热衷于策划这一挑衅行动的某些人们。

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宣传机构仍然卖力地利用亚·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作品以求达到他们的反苏目的。

美国、联邦德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报刊不断刊载吹嘘亚·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文章，发表“捍卫”这个文学家个人的言论。

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出版社“普尔摩尔出版社”准备出版一本论述亚·索尔仁尼琴创作的书。加拿大已经有一部集子问世，题名《索尔仁尼琴案件》（俄文本），其中搜罗了有关把亚·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的各种“材料”：包括通常由亚·索尔仁尼琴本人炮制的各种“速记记录”，他的“公开信”。

据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告知，在今年10月间将要召开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有意提出选举亚·索尔仁尼琴为笔会名誉会员的问题。

苏联作家协会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于亚·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和卑鄙行为的态度，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发表了一系列立场鲜明的文章、材料和答记者问，向苏联和国外读者揭露了亚·索尔

① 波列伏依，鲍·尼·（1908～1981）原姓卡姆波夫，苏联作家，时任《青春》杂志主编，苏联和平基金会执行局委员。

② 原文如此。博布科夫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局长，1967～1982年5月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尤·弗·安德罗波夫。

仁尼琴的真实面目。

鉴于国际笔会领导机构企图选举亚·索尔仁尼琴为这个组织的名誉会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马尔科夫、奥泽洛夫和沃龙科夫同志曾经和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第一书记亨尼赫尔同志、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主席贾加罗夫同志、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达尔瓦什同志进行磋商，他们声称，他们的与会代表将尽一切可能粉碎笔会活动家的又一次挑衅行动。

劳动作家协会已向苏联驻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发去信件，陈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并请求将这一立场告知所在国家作家团体的领导机构。

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 瓦·绍罗

№04030

##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决定

(1970 年 10 月 8 日)

秘密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第 111 号，第 10C 项关于亚·伊·索尔仁尼琴责成苏共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交换意见就此问题准备必要的材料。

苏共中央书记 米·苏斯洛夫

№04032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针对授予  
亚·索尔仁尼琴 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  
挑衅行动的措施”的决定

(1970 年 10 月 9 日)

秘密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摘抄第 112 号，第 12C 项关于针对授予亚·索尔仁尼琴 1970 年诺贝尔文学奖挑衅行动的措施。

同意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报告中陈述的建议（附后<sup>①</sup>）。

苏共中央书记 米·苏斯洛夫

---

<sup>①</sup> 见本卷文件 №04033。

№04033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  
“关于针对授予亚·索尔仁尼琴  
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措施”  
呈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70年10月9日)

苏共中央：

今年10月8日，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瑞典斯德哥尔摩市）授予亚·索尔仁尼琴1970年文学奖，其措词是：为了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显示的美学力量”。众所周知，过去几年来索尔仁尼琴一直被提名授予这个奖项。

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和行为早就被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利用于反苏目的。授予他诺贝尔奖旨在进一步强化这种宣传运动。

我们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 在苏联报刊（《消息报》、《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上刊载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的简要报道，说明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文学方面的问题。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处的报道可以采用答《消息报》记者问的形式。

2. 在《文学报》上刊登一篇抨击文章，揭露西方国家围绕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所玩弄的政治把戏的实质。

3.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拉宾同志）和新

关于“索尔仁尼琴事件”

---

闻社（乌达利佐夫同志）就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决定准备一批必要的宣传材料，并通过相应的渠道散发到国外。

4. 向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用口头形式）通报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挑衅性质。

苏共中央文化部

苏共中央宣传部

№04034

##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 问题上外国记者和苏联知识分子的反应 呈苏共中央的通报

(1970年10月10日)

苏共中央：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知的情报，关于1970年10月8日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消息，使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明显地活跃起来，有人向他发去了一系列祝贺的电报和信件。

挪威《晚邮报》记者海格同索尔仁尼琴取得了联系，并从他那里获得以下声明：“我对受奖表示感激并接受这份鼓励。我准备按传统的做法前去亲自领奖，如果这一切都仅仅取决于我的话。我身体健康，而旅行对于健康不是坏事。”

在苏联各类知识分子中，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决定基本上不受欢迎。许多作家、电影工作者、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认为，向索尔仁尼琴授奖是又一次反苏行动，他们讨论的是应如何作出反应的问题。

具有代表性的言论如下：

苏联科学院阿·马·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学术秘书 A. 乌沙科夫说：“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政客从文学方面获得了一切：出书、出名、受到承认。现在他甚至可以死了。看来，在不久的将来西方报刊将会掀起一场喧闹，而且必不可免地会具有反苏色彩。正是这种情况恰恰将显露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决定所具有的政治性



质。固然，许多方面将取决于我们的立场。

至于说到索尔仁尼琴这个人，那么这是一个敌人。我本人无法相信，他那时会偶然被关进劳改营的，本不该把他从那里放出来。”

作曲家 Л. 阿法纳西耶夫说：“近来索尔仁尼琴走上了反苏道路，对于我国现实的描绘比法西斯下流作家的污蔑还要丑化。正是为此才授予他诺贝尔奖的。”

作家尤·特里丰诺夫说：“对于向索尔仁尼琴授奖的事给予过多注意是愚蠢的，不应当小题大做。”

作曲家尼·博戈斯洛夫斯基说：“看来在我们的报道和言论中不必采用‘令人遗憾’、‘感到委曲’之类的话。在我看来，尽可不予理会，或限于就问题的实质作严格据实的报道。”

作家 B. 马克西莫夫说：“现在很难决定该怎么办，因为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驾驭的人，会不顾一切地干事。我们可以设想，可以订出措施，而他却会突然发表一个‘辉煌夺目’的演说，于是一切烟消云散。”

有个别的知识分子对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表示了肯定的态度。

院士安·科尔莫戈罗夫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 1970 年诺贝尔奖，这很好，是他应当得到的。令人感兴趣的是，会不会让索尔仁尼琴出国领奖？”

文学评论家，《新世界》杂志撰稿人 Л. 列维茨基说：“这是我们的大喜事，要知道索尔仁尼琴最早是《新世界》发现了他和刊登他的作品的。这是应得的奖赏。”

关于领奖的事，索尔仁尼琴本人声称，只有在他能得到回程入境签证的情况下他才去瑞典领奖。

作为通报告知如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4035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关于在苏联报刊  
上就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  
发表文章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0年10月12日)

苏共中央：

“新闻”社就授予亚·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准备了一篇题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哪里寻觅作家的天才和荣誉》的文章，已在外国散发。

上述文章也应在苏联报刊（《共青团真理报》）上予以发表。

文章附后<sup>①</sup>。

请予审查。

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 瓦·绍罗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A. 雅科夫列夫

---

<sup>①</sup> 文章刊于《共青团真理报》1970年10月17日。

№04039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俄罗斯思想》  
报涉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  
一事的材料呈苏共中央的通报**

(1970年11月14日)

秘密

苏共中央：

兹送去一份1970年10月15日在巴黎出版的反苏侨民报纸《俄罗斯思想》，其中刊有涉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诽谤性材料。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茨维贡

№04036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  
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授予索尔仁尼琴  
诺贝尔奖的反应呈苏共中央的通报

(1970年10月17日)

秘密

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又获得一批有关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对于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的反应的材料。

许多文学、科学、艺术活动家对此表示气愤，认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决定纯粹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乌克兰文艺学家 A. 特里波利斯基说：“向索尔仁尼琴授奖，这是又一次针对我们的思想意识上的破坏行动。”

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导演 M. 安札帕里泽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位好作家，但他不配获得诺贝尔奖。奖项被生意人和政客们变作为一种武器了。”

散文作家叶·佩尔米京说：“涉及索尔仁尼琴的问题，这不是文学，而是政治，这与我们无关。在这方面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某些创作人员在此期间议论到索尔仁尼琴去瑞典的事，也对我们可能的回应措施作了评论。

散文作家 Г. 德罗博特说：“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造成了

某些困难。我们的对手始终有可能讲，是给在苏联出版的作品发奖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奖项具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肖洛霍夫领了奖。”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分部副主席、哲学科学副博士 M. 加波奇卡说：“我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看做为我们的思想意识对手的一种政治行动，其目的在于支持我们社会中诸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等一类投机分子。但是肖洛霍夫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造成一个先例，因此，苏联政府看来很难对索尔仁尼琴采取他理所应得的严厉措施。”

散文作家 П. 卢克尼茨基说：“不允许索尔仁尼琴出国去瑞典是不可能的，这会给西方宣传机构制造一个长期可加以利用的‘热点’。但是，如果索尔仁尼琴在斯德哥尔摩发表一项反苏性质的声明，而他几乎是肯定会这样做的，那么就有权取消他的苏联国籍，禁止他进入苏联。”

作家谢·扎雷金说：“由于受奖索尔仁尼琴有可能去国外。想提醒一点，布宁不是在一天内死去的……索尔仁尼琴有话可讲，而他看来是会这样做的。”

作家 B. 涅克拉索夫在评论我们报纸上的消息时说：“如果就到此为止，那倒也是最明智的一步。《消息报》的报道甚至比人们设想的还稍微克制一些。应当就此划上一个句号。”

个别作家对于索尔仁尼琴受奖感到欣慰。列宁格勒的散文作家 Л. 达尔（维·潘诺娃的丈夫）说：“尽管费定们、索博列夫们、米哈尔科夫们一再寻衅挑拨，俄国文学还是又一次得到全世界的承认。我和维拉·费奥多罗夫娜（潘诺娃）目前简直跟过节一样。关于举世承认索尔仁尼琴的写作成就和精神功勋的消息，令人欢欣鼓舞和感到十分幸福。”

作家尤·纳吉宾说：“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有助于我们反对

保守主义者的斗争。”

作家韦·卡维林认为，向索尔仁尼琴授奖是公正的。他同时强调了这一行动的政治性质，说：“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的决定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而且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索尔仁尼琴目前住在大提琴家 M. 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别墅里，在拍发给瑞典科学院的电报中重申了自己对于获奖的态度：“收到您的电报，表示感谢。我把授予诺贝尔奖看做为是对俄国文学和我国苦难的历史的尊重。我准备在传统沿用的那个日子里前去斯德哥尔摩亲自领奖。”

以上作为通报告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4037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在莫斯科有人  
传播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声明一事  
呈苏共中央的通报**

(1970年10月17日)

秘密

苏共中央：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材料，一份支持索尔仁尼琴的声明正在莫斯科一定范围内流传，其内容如下：

“得悉亚·伊·索尔仁尼琴荣膺诺贝尔奖，我们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获得全世界公认的当代大作家亚·伊·索尔仁尼琴在作品中表现的高尚激情、哲学深度和精到的艺术技巧，以及他英勇地一贯努力捍卫的人道主义立场，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无愧于如此荣耀而崇高的奖赏。

我们向亚·伊·索尔仁尼琴表示由衷的祝贺，祝愿他不断取得新的创作成就，在他艰难的道路上身体健康，勇敢无畏。我们为我国的文学深感自豪，尽管障碍重重，它还是推出了这样一些第一流的大师。与此同时，我们也准备面对这样的事实，即授予亚·伊·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可能成为继续对他进行一直在进行着的迫害的新的借口，这种迫害我们看做是一种民族耻辱。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有

责任再一次为亚·伊·索尔仁尼琴付出的高尚的劳动对他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署名的人中，有以其反社会行为而闻名的亚基尔、克拉斯诺夫—列维金、布科夫斯基、叶菲莫夫和斯特罗耶娃。

上述声明的文本已被他们转给了外国新闻记者，而后者称之为“苏联知识界人士的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4038

**苏联新闻社理事会“关于新闻社就授予  
亚·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宣传措施”  
呈苏共中央宣传部的情况说明材料**

(1970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宣传部：

“新闻”通讯社采取措施向国外居民解释了苏联对于授予亚·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观点。塔斯社的报道《不体面的赌博（关于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当天就经由技术通讯渠道发往45个地址。题为《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哪里寻觅作家的天才和荣誉？》的评论于10月9日通过技术通讯渠道发往64个地址。这份材料10月17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刊登。

新闻社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评论刊载于驻丹麦、瑞典、芬兰、澳大利亚、日本、意大利、瑞士、英国、加拿大、法国、刚果（布拉柴维尔）、摩洛哥、塞内加尔等国苏联大使馆和新闻社的简报上，它们还见诸新闻社在日本办的杂志《今日苏联》和在英国办的报纸《苏联》，新闻社在其他国家的出版物也刊登了上述材料。

在社会主义国家，《农业旗帜报》（保加利亚）、《匈牙利新闻报》（匈牙利）、《红色权利报》和《真理报》（捷克斯洛伐克）刊登了评论文章《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哪里寻觅作家的天才和荣誉？》。

在南斯拉夫，《政治快报》在“挑衅行动”和“不体面的赌博”

的大标题下刊登了新闻社的评论文章，同时指出：“新闻社单独开始直截了当地对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人和一名文学家，作总的清算。在新闻社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说，索尔仁尼琴‘由于自我孤立创作出的不是悲剧，而是一笔交易。’”

这名被除名的作家被指责为，他是从自命不凡到病态程度的人，“很容易在别人的阿谀奉承面前失去主见，而这样做的人则是为了反对苏维埃制度而不择手段的人。”南通社发表的评论指出，索尔仁尼琴有可能前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奖。《政治报》以这句话作为自己新闻的标题。

贝尔格莱德《政治报》刊载了自己驻莫斯科记者 M. 马尔科维奇的报道，其中说：“除了不久前俄国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文学报》又参加了进来。这家报纸近日来一直较多地谈论到索尔仁尼琴，看来是因为此人的书对于年轻一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份共青团中央的机关报转载了几天以前苏联的通讯社《新闻社》发表的十分严厉的抨击文章。这个通讯社的新闻稿简报主要是发给外国报刊编辑部的。……”这家报纸说：“看来，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宣传运动正在加强，它将不仅影响作家前去斯德哥尔摩的愿望，而且还将影响他今后创作的命运。”

据新闻社代表从布加勒斯特报告，罗马尼亚报纸的编辑们声称，从新闻社收到的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将不予披露，因为他们“不介入此类有争议的问题”。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人也向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公开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新闻社的立场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新闻界引起重大兴趣。评论文章《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哪里寻觅作家的天才和荣誉？》由挪威最大的报纸《晚邮报》全文刊载。荷兰报纸《誓言报》也摘要予以刊登。在瑞典，哥德堡的两家大报《哥德堡海运贸易报》和《哥德堡邮报》刊登了评论文章的简介。瑞典共产党的机关报《北

极光报》登载了全文，《Седерхамнскуринен》和晚报《快报》刊登了简介。在芬兰，《赫尔辛基新闻》报公布了评论文章。

在西欧，巴黎的《世界报》刊载了新闻社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材料详细介绍。在瑞士，瑞士电视台在涉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节目中，作为新闻社的观点使用了评论文章（随后又加以批评）。在美国，《每日电讯报》和《卫报》介绍了新闻社的材料。

在日本，《苏联新闻》和《日本之声》两家报纸全文刊载了评论文章《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在哪里寻觅作家的天才和荣誉？》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和《澳大利亚社会党人》刊载了全文。

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引起了中近东和非洲国家新闻界的注意。在摩洛哥，《舆论报》刊登了新闻社的材料。在阿尔及利亚，国内最大的报纸《圣战者日报》刊登了这篇评论文章，大标题是“新闻社。索尔仁尼琴的选择像是开得不恰当的玩笑”。《人民报》刊登了评论文章的简介。在黎巴嫩，《前锋报》和《军旗报》刊登了新闻社有关索尔仁尼琴的材料。在马里，《发展报》刊印了评论文章的一些段落。

法共机关报《人道报》和意共机关报《团结报》实际上借口索尔仁尼琴因反对个人崇拜而“受害”，出面为授予他诺贝尔奖进行辩护。有鉴于此，新闻社于10月15日散发了政治评论员B.阿尔达多夫斯基的评论文章《授奖因为什么？》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在于给兄弟党的报刊使用，因此并不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朋友们进行争辩，而是分析他们的论点，以及解释清楚索尔仁尼琴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敌人的真实面目。关于这篇评论刊登的情况还没有收到。

新闻社还在继续进行工作，以求把说明苏联社会公众对于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的观点的材料进一步传送给外国报刊。

总秘书处

№04040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关于  
《俄罗斯思想》报的言论呈  
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

(1970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

在巴黎出版的白俄侨民反苏报纸《俄罗斯思想》在今年12月15日的一期上刊载了一系列涉及授予亚·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诽谤性材料。

苏联作家协会（马尔科夫同志）和《文学报》编辑部（恰科夫斯基同志）了解了上述材料的内容。建议他们在揭露围绕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作品掀起挑衅宣传运动的西方宣传机构的活动中加以利用。

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Ю. 梅连季耶夫

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Г. 斯米尔诺夫

№04041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拒绝瑞典  
科学院秘书吉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律师赫伯  
入境一事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2年4月4日)

秘密

苏共中央：

西方的反动人士利用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证书的准备活动，继续围绕着他进行反苏喧嚣。

为了破坏预订于4月9日进行的这一活动，已经拒绝应前来颁证的诺贝尔基金会秘书吉罗夫进入苏联国境。在国外代表索尔仁尼琴权益的赫伯律师的入境旅游签证也予作废。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排除：诺贝尔基金会可能会利用外交或其他渠道把授奖证书送进苏联，并委派我们不知道的瑞典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颁发证书，这就大大增加了制止实现这一阴谋的难度。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3150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置索尔仁尼琴的 会议记录摘抄

(1974年1月7日)

会议由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

参加人员：尤·弗·安德罗波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尼·柯西金、尼·维·波德戈尔内、阿·特·波利扬斯基、米·安·苏斯洛夫、A. H. 谢列平、彼·尼·捷米切夫、米·谢·索洛缅采夫、德·费·乌斯季诺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康·费·卡图谢夫同志。

关于索尔仁尼琴

勃列日涅夫：根据我国驻外代表机关的报告和外国报刊的报道，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一部新作——《古拉格群岛》。苏斯洛夫同志告诉我说，书记处决定在我国报刊上开展工作，揭露索尔仁尼琴所写的货色和这本书的出版而掀起的资产阶级宣传运动。目前还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但其内容已经为人所知。这是粗暴的反苏诽谤。我们今天需要就此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

以前，我们曾经把雅基尔、李维诺夫等等关进监狱，判处了他

们，后来一切都结束了。出走去国外的有库兹涅佐夫、阿利卢耶娃<sup>①</sup>等等。一开始曾大肆喧闹了一阵，然后一切都被人忘记了。而索尔仁尼琴这个流氓分子也太过分了。他对什么都指手画脚，对什么也不在乎。我们对他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现在对他加以制裁，那么这样做对我们是否有利，要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呢？我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只是想交换一下意见，商议一下，作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柯西金：关于这个问题有安德罗波夫同志的一张便函。便函中提出了一项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就这个问题我同安德罗波夫同志谈过。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应当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不必经他同意。当年驱逐托洛茨基出境也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

勃列日涅夫：看来，索尔仁尼琴本人不会同意这样做。

基里连科：可以不经他同意将他驱逐出境。

波德戈尔内：会有这样的国家不经同意即接受他吗？

勃列日涅夫：要考虑到，索尔仁尼琴甚至没有出国去领取诺贝尔奖。

安德罗波夫：当建议他出国去领取诺贝尔奖时，他提出能否保障他返回苏联的问题。同志们，我从1965年起就提出了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如今他在自己的敌对活动方面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正试图在苏联内部成立一个组织，从过去坐过牢的人中拼凑起这个组织。他反对列宁，反对十月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所写的《古拉格群岛》不是一部文艺作品，而是一份政治文件。这

<sup>①</sup> 阿利卢耶娃，斯维特兰娜·约瑟夫娜，生于1926年，是斯大林的女儿，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她在几次婚变之后，1964年与当时在苏联的印度共产党员布拉杰什·辛格同居。1966年10月，辛格病故于莫斯科，12月斯维特兰娜送辛格的骨灰去印度安葬，并没返回苏联，半年后移居美国。

十分危险。我们国内有数以万计的弗拉索夫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分子，以及其他敌对分子。总之，有成千上万的人可能支持索尔仁尼琴。现在，所有人都在看我们将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们将对他进行制裁，还是让他平安无事。

不久前，克尔德什同志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我们不对萨哈罗夫采取措施。他说，如果我们对萨哈罗夫听之任之，那么今后卡皮察、思格尔哈特等等一类院士将会怎样行动呢。

所有这一切，同志们，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全欧会议正在召开。

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对他运用苏联法律。现在许多外国新闻记者、许多其他不满意的人，都纷纷前来找索尔仁尼琴。他同他们举行座谈，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们可以假设，我国存在敌对的地下组织，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发现这一点。但是，索尔仁尼琴是公开行动的，而且采取厚颜无耻的方式行动。他利用苏联政府的人道主义态度，不受惩罚地从事敌对行动。因此，必须采取我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所说的一切措施，也就是说要把他驱逐出境。我们可以事先请我国的大使们试探一下驻在国政府的口气，看它们能否接受他。如果现在我们不驱逐他，那么他仍将继续进行敌对活动。你们知道，他写了充满敌意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写了充满诽谤的《古拉格群岛》，现在正在写《1917年10月》。这又是一部新的反苏作品。

因此，我提出建议以行政方式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同时责成我驻外大使向一些国家（我在便函中列举了一些国家）作相应的探询，看能否接受索尔仁尼琴。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我们的全部宣传工作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如果我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无线电台讲到他，但不采取措施，那么这一切都将是空话。必须明确决定，我们对索尔仁尼琴怎么办。



勃列日涅夫：要是把他驱逐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呢？

安德罗波夫：列昂尼德·伊里奇，社会主义国家未必会接受这种做法。因为我们送给他们的是这样一个货色。也许我们问问伊拉克、瑞士或别的什么国家？在国外他可以过不坏的日子，他在欧洲银行里有 800 万卢布的存款。

苏斯洛夫：索尔仁尼琴变得太厚颜无耻了。肆意诬蔑苏维埃制度、诬蔑共产党，他竟向最神圣的人物——列宁——动了手。

如何处理索尔仁尼琴的事是个时间问题：或者将他驱逐出境；或者按照我们苏联的法律加以审判——这是必须做的。为了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某种实际措施，应当使我国人民有所准备，因而我们必须通过开展广泛的宣传来做到这一点。我们对萨哈罗夫的处理是正确的，当时就进行了相应的宣传工作。实际上，自那以后就不再有涉及萨哈罗夫凶狠的信件了。千百万苏维埃人在听广播，在听关于评论这些新的作品的节目。所有这一切对人民会起作用。

我们应当发表一系列文章，来揭露索尔仁尼琴。这是非做不可的。

根据书记处通过的决议，应当在《真理报》上，在《文学报》上发表一二篇文章。人民将会知道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当然，不要围绕这事开展一场宣传运动，而是发表几篇文章。

基里连科：这只会引起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注意。

苏斯洛夫：他也不能保持沉默。

波利扬斯基：应当把鼓动措施和同时采取行政措施结合起来。

葛罗米柯：索尔仁尼琴是敌人，因此我赞成对他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至于采取宣传方面的措施，则应当逐步进行。要仔细进行考虑。但是也不能否定安德罗波夫同志提出的那些步骤。如果我们不经本人同意而将他驱逐出境，那么必须考虑到，资产阶级宣传工具

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最好是经本人同意将他迁出，但他是不会同意的。也许，我们再忍耐一段时间，先让欧洲会议开完？即使某一个国家同意，现在就将他迁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可能引起一场反对我们的广泛的宣传攻势，而在全欧会议正当结束时这样做对我们不会有好处。我是说再等上三四个月，我要再说一遍，我原则上支持采取严厉措施。目前应当把索尔仁尼琴监控起来，让他这几个月内处于隔离状态，不允许那些可能让他利用来进行宣传的人接近他。

列昂尼德·伊里奇最近要出访古巴。这事目前也对我们不完全有利，因为会登出许多各种对苏联的材料。在国内应当采取必要的宣传措施，来揭露索尔仁尼琴。

乌斯季诺夫：我以为应当着手实现安德罗波夫的建议。与此同时，应当公布揭露索尔仁尼琴的宣传材料。

波德戈尔内：我想这样提出问题：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哪一种行政措施：按苏联法律在国内对他进行审判，并让他在我们这里服刑；还是像安德罗波夫同志所建议的那样把他驱逐出境。关于索尔仁尼琴是敌人，是卑劣、凶恶的敌人，以及他率领着一些背弃信念的人，这是毋庸争辩的。至于说他现在不受惩罚地做这一切，这也是我们都知道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怎样做对我们更为有利，采取哪一种措施对我们更为有利，审判，还是驱逐出境。在许多国家——在中国是公开处决人；在智利，法西斯政权在枪毙和折磨人；英国人在爱尔兰对劳动人民采用迫害的办法，而我们面对的是凶狠的敌人，而当他向一切事物泼脏水时我们却视而不见。

我认为，我们的法律是人道的，但与此同时对于敌人则是严厉无情的，因此我们应当按照苏联的法律在我们苏联的法庭上审判他，然后让他在苏联服刑。

捷米切夫：当然，国外会有一阵喧闹，但是我们已经公布了索

尔仁尼琴一些新书的材料。我们应当继续开展宣传工作，因为沉默不语是不行的。如果说在自己的《胜利者的饮宴》一书中索尔仁尼琴说，他这样写是因为对苏维埃政权忿恨不满，那么在他于1965年写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他就更加卑劣地、更加明目张胆地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党了。因此我们必须我国的报刊上予以尖锐地抨击。在我看来，这不会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全欧会议产生影响。

苏斯洛夫：各级党组织在等待，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等待，看我们对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将作出何种反应。资产阶级报刊正在大力鼓吹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所以我们不能沉默。

卡图谢夫：我们所有人对索尔仁尼琴的行为看法完全一致。这是一个敌人，必须对他有相应的处置。看来，我们无法不立即决定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需要综合地加以解决。一方面要动用我们的全部宣传机构反对索尔仁尼琴；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按照安德罗波夫同志便函的精神采取措施。

看来，可以通过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将他驱逐出境，并在报刊上予以说明。他损害了我国的主权、我国的自由、我国的法律。应当为此受到惩罚。

关于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的谈判，看来需要花费3~4个月的时间，但是，我重复一句，这个问题必须综合地加以解决，而且将他驱逐出境也是越快越好。

至于说我们的报刊，是要发表文章的。

卡皮托诺夫：我想对这个问题作这样的考虑：如果我们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那么，我们的人民会怎样理解这一点呢？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私下议论、飞短流长，等等。用这种做法我们能表现什么呢？自己的力量还是软弱呢？我想，不管怎么说，这样不能表示我们有力量。我们目前还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把他的面目揭

穿，因此实际上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事对人民什么也没有说。而应当做到这一点。应当首先着手进行揭露索尔仁尼琴的工作，剥开他的画皮，到那时任何一种行政措施都会为我们的人民所理解。

索洛缅采夫：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人民的凶恶敌人。如果不是苏联目前正在实行的外交行动，自然应当毫不延迟地对问题作出决定。但不管怎么说，任何决定总都要对我们的外交行动产生影响吧？但是，看来，无论怎样我们都要把有关索尔仁尼琴的问题该讲的向人民讲清。应当对他的行为，对他的敌对活动，进行尖锐的抨击。人民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对索尔仁尼琴不采取措施？例如，在民主德国，已经刊登了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是这样。我讲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我们的报刊却沉默不语。从广播里我们听到许多关于索尔仁尼琴的事，关于他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而我们的广播却保持缄默，一言不发。

我认为，我们不能沉默不语，人民等待的是果断的行动。报刊上应当提供揭露索尔仁尼琴的尖锐有力的材料。看来必须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同各资本主义的共产党就它们将在本国采取的宣传措施进行磋商。

我认为，应当按我国的法律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

格里申：看来，安德罗波夫同志应当找出一个同意接受索尔仁尼琴的国家。至于揭露索尔仁尼琴的事，现在就应立即开始这样做。

基里连科：每次当我们讲到索尔仁尼琴这个反苏分子和苏维埃制度的死敌时，都恰好遇到某些重要条件，我们也就推迟了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当时，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可是现在不能再推迟对这个问题的决定了。已经写了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这是好的，但是正如这里同志们所说，要写得更加有分量，更加尖锐有力，更加论据充分。例如，波兰人民共和国作家克罗里科夫斯基写了一篇关

于揭露索尔仁尼琴的很好的揭发性文章。目前，索尔仁尼琴越来越卑劣无耻了。他不是孤立的，他和萨哈罗夫保持着联系。因此，已经到了应认真处置索尔仁尼琴的时候了，但是这之后应随时将他驱逐出境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

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说，但愿这个措施不要反过来反对我们。但是，怎样才能不让它反过来反对我们呢，不能把问题这样搁置起来。既然敌人在对我们捣乱，我们就不能对此保持沉默。甚至许多资产阶级报纸现在也谈论索尔仁尼琴，声称他看来将按苏联法律受到审判，而且他已经违犯了我们加入的关于保护著作权公约。

我赞成安德罗波夫同志提出的建议。

报上应当发表文章，但要发表论据十分充分的，像样的文章。

柯西金：同志们，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对以上所说的完全同意。

几年来索尔仁尼琴一直在试图肆意妄为地影响我国人民的思想。我们似乎害怕触动他，但人民对于我们处置索尔仁尼琴的行动是会欢迎的。

如果说到国外形成的舆论，那么我们应当这样来研究：看哪一种做法危害较少——是揭露他、审判他、把他关进监狱，还是再等几个月，然后将他迁往别的国家。

我想，如果我们现在就果断地处置他，按苏联法律加以审判，损失倒会少一些。

显然，在报纸上应当发表关于索尔仁尼琴的文章，但必须是有分量的文章。索尔仁尼琴是被资产阶级的公司、代理机构收买的，在为它们工作。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是恶毒的反苏作品。我就这个问题同安德罗波夫同志谈过。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不会接受索尔仁尼琴。我赞同由安德罗波夫向资本主义国家试探一下，看哪一个国家能够接受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丝毫不害怕对

索尔仁尼琴采取苏联法律的严厉措施。就拿美国为例，那里消灭着成百的人。或者说智利吧，那里也一样。

应当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并且公布他的事情。可以把他送到魏霍扬斯克去服刑，外国新闻记者谁也不会到那里去：那里很冷。我们不能向人民隐瞒。应当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波德戈尔内：索尔仁尼琴进行狂热的反苏活动。以前，我们对于一些还不如索尔仁尼琴危险的敌人，曾经驱逐出境或加以审判，而对于索尔仁尼琴我们至今还未能处置，一直在探寻一种方法。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这本书则提不出对他加以宽大的任何理由。

当然，应该设法不使这项措施危害其他行动的实施。索尔仁尼琴是有不少追随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的行为视而不见。

我认为，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要在报上刊登文章，但必须是论据十分充分的和令人信服的。现在人们关于他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他最近一本书也知道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和别的电台都在广播。无论是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在等待，看苏联政府对索尔仁尼琴采取什么措施。他还有恃无恐，以为对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

我认为，甚至尽管正在举行全欧会议，我们也不能不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措施。而是甚至不管是否召开全欧会议，都要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要让人们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实行的是原则性的政策。我们对敌人不讲任何宽容。

我认为，我们如果不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措施，不管在国外是否会掀起一阵喧闹，我们倒是会给我们的共同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当然会出现各种议论，但是我国人民的利益、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我们党的利益对于我们来说是高于一切的。如果我们不采取果断措施，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我想说我主张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审判。如果把他驱逐出境，这

只能证明我们的软弱。我们应当着手准备进行审判，在报刊上揭露索尔仁尼琴，对他立案、进行侦查、通过检察院移交法院审判。

波里扬斯基：在审判前可以把他逮捕起来吗？

安德罗波夫：可以。我和鲁坚科商议过这个问题。

波德戈尔内：至于驱逐出境到某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同意是绝对不适宜的。

安德罗波夫：我们着手进行驱逐出境的工作，但同时就要对他立案，把他隔离起来。

波德戈尔内：如果我们把他迁出国外，到了国外他仍将危害我们。

葛罗米柯：看来，我们还是要立足国内这个方案上。

安德罗波夫：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处置索尔仁尼琴的事拖延下去，情况会更糟。

波德戈尔内：也可以把索尔仁尼琴的案件拖长一些，譬如，拖长侦查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应当让他蹲在监狱里。

谢列平：当我们3个月以前在柯西金同志那里开会讨论应当对索尔仁尼琴采取什么措施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宜对他采取行政措施。当时那样决定是正确的。现在出现了另一种形势。索尔仁尼琴开始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苏维埃国家。因此，我以为在欧洲会议结束前决定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对我们较为有利。这样可以证明我们始终一贯的原则性。如果我们在欧洲会议之后再采取这个行动，人们会指责我们在会上不真诚，待通过决议就开始破坏这些决议，等等。我们有一条清楚而正确的路线。我们不容许任何人违反我们苏联的法律。驱逐出境，我认为，并不是恰当的措施。在我看来，不要把外国拖进这件事。我们有司法机关，让它们着手侦查，然后进行审判。

勃列日涅夫：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简单

的问题，而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资产阶级报刊企图把索尔仁尼琴的事情同我们所采取和平调整的重大措施联系在一起。我们究竟如何对待索尔仁尼琴？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根据我们苏联的法律行事。

全体：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国的检察院可以开始侦查，准备公诉，并在公诉书中详细说明他有什么罪。索尔仁尼琴曾进过监狱，因粗暴违反苏联法律而服刑，后来被恢复名誉。但是，他是怎样被恢复名誉的呢？给他恢复名誉的是二个人：沙图诺夫斯基卡娅和斯涅戈夫。应当根据我们的法律，在侦查期间剥夺他同国外联系的条件。侦查应公开进行，要向人民展示他的反苏敌对活动，说明他如何污蔑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攻讦伟大的领袖、党和国家的奠基人弗·伊·列宁，侮辱伟大卫国战争的牺牲者，为反革命分子辩解，直接违反我们的法律。应当根据我国的法律对他进行审判。

我们当时就不怕站出来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势力。我们不怕让阿利卢耶娃出去。这一切我们都经受住了。我想，现在这件事我们也能经受住。应当发表论据充分的文章，给予奥尔索普这样一些记者写的东西一个严厉而明确回答，也要在其他报纸上发表文章。

我同葛罗米柯同志就我们对索尔仁尼琴采取措施对全欧会议的影响问题作过交谈。我想，这不会产生很大影响。把他驱逐出境看来并不合适，因为谁也不接受他。库兹涅佐夫和别的人自己跑出去是一回事，而我们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则是另一回事。

因此，我认为必须责成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检察院拟定一个追究索尔仁尼琴法律责任的程序，并且根据今天这里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内容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波德戈尔内：应当逮捕他，并对他起诉。



勃列日涅夫：请安德罗波夫和鲁坚科两位同志根据我国的法律按要求拟定起诉的全部手续和其他一切必要事项。

我以为应当委托安德罗波夫、捷米切夫、卡图谢夫等同志准备一个发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书记以及给其他兄弟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关于我们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的通报。

所有人：正确。同意。

会议通过下列决议。

关于制止亚·伊·索尔仁尼琴反苏活动的措施

1. 鉴于亚·伊·索尔仁尼琴进行了恶毒的反苏活动（表现为：将包含有诽谤苏维埃制度、苏联、苏联共产党和它们的对内对外政策，玷污列宁和苏共及苏维埃国家其他活动家的光辉形象，污蔑伟大卫国战争和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牺牲者，并为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及敌视苏维埃制度的分子和集团的行动进行辩护的各种内容的书稿、书信、访谈录交给外国出版社和新闻社），以及鉴于他粗暴地破坏（日内瓦）国际著作权公约关于在外国出版社印行自己文学作品的规定，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2. 责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和罗·安·鲁坚科同志根据政治局交换意见的结果拟定对亚·伊·索尔仁尼琴进行侦察和审判的程序手续，并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

关于侦查和审判的过程按工作程序向苏共中央通报。

3. 责成安德罗波夫同志、捷米切夫同志和卡图谢夫同志根据政治局会议交换意见的结果草拟一份给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第一书记的关于我们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的通报，并提交苏共中央。

4. 责成中央书记处确定将这份通报发给各兄弟党的时间。

№03151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决议

(1974年1月7日)

就此问题仅限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意见。

中央书记

No03152

## 安德罗波夫就处置索尔仁尼琴事 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4年2月7日)

列昂尼德·伊里奇：

向您送呈直接负责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切布里科夫同志和博布科夫同志准备的资料。从这份资料可知，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超出了刑事案件的范围，变成了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性质的重要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苏联人能够正确认识对索尔仁尼琴的批评。但是，正是从这一方面人们越来越经常而且也越来越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观点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更加凶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当局为什么不对他采取措施？”

使我特别担心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军人中和一部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揭露索尔仁尼琴的书的反苏性质，但这本书总是得到创作知识分子中某些代表人物的同情。例如，某些著名作家在谴责《古拉格群岛》的反苏性质时说，这本书中描写的事实确实存在过，这部作品应能引起苏联领导提高警觉，因为他们似乎正在实现“再斯大林化”。有的人则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书“很有益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中央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创作知识分子的关注”。

我们得悉在个别工人和大学生中有这样的说法，即索尔仁尼琴

呼吁苏联领导降低消费品价格，停止援助古巴和发展中国家，以便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这种思想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并没有提到，但是，您一定记得，这种思想是在索尔仁尼琴那封臭名远扬的《致苏联人民的领袖们》的信中讲到的。按照我们掌握的情况，索尔仁尼琴一方面拒绝在近期发表这份材料，但同时却通过自己周围的人透露这份材料的内容。

列昂尼德·伊里奇，根据以上所述，我以为继续拖延决定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尽管我们认真希望不要损害国际事务，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继续迟疑不决必将在国内酿成极其不利的后果。

正如我在电话中向您报告的那样，勃兰特发表声明说，索尔仁尼琴可以在联邦德国生活和自由地工作。今天，2月7日，克沃尔科夫同志起飞去和巴尔会面，以便讨论把索尔仁尼琴从苏联驱逐出境迁往联邦德国的实际问题。如果到最后一刻勃兰特也不胆怯，而克沃尔科夫的谈判也顺利结束的话，那么2月9~10日我们将会会有一个协商一致的決定，我会立即将情况告知您。如果上述协商一致的決定能够成立，那么依我看不迟于2月9~10日就应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褫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驱逐出境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的行动可以在2月10~11日进行。

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要迅速完成，因为从业务文件可以看出，索尔仁尼琴开始猜到我们的打算，因而可能公开发表文件，这将使我们和勃兰特均处于困难的境地。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的措施未能成功，我想，那么应在2月15日之前对他进行刑事起诉（包括逮捕）。检察院已对此作好准备。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在发出此信之前，我们在委员会中又一次十分仔细地考虑了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和逮捕可能产生的

各种麻烦（逮捕他比驱逐出境麻烦更多一些）。但是，可惜并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行为不受惩罚已经在国内造成麻烦，这些麻烦远比将其驱逐出境或逮捕在国际上可能产生的麻烦更加多得多。

致以敬意！

尤·安德罗波夫

附 件

秘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我们在谍报业务工作过程中继续收到有关居民对索尔仁尼琴反苏行动的反应的消息。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苏维埃人大都能从政治上正确认识索尔仁尼琴的诽谤言论和他敌视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并表示愤慨。这一部分居民中没有产生索尔仁尼琴是否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问题。即使提出这个问题，那也只是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即应当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以及还允许他用多长时间来检验苏维埃政权的忍耐程度。

其间还常有因未对这个明目张胆的反苏分子采取措施对政权机关的责难。这种议论在各阶层居民中，包括在军队中都有发现。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事实证明，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出版自己的作品得到了一部分创作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接近文学的人们的支持和同情。也有说法认为，不管索尔仁尼琴的诽谤性作品多么严重，但其中确包含有若干事实，这能迫使领导机关注意改善知识分子工作。虽然某些有反苏情绪的人对于索尔仁尼琴肆无忌惮的诽谤和明目张胆地进行敌对行动不免吃惊，但他们仍然

认为他是值得仿效的榜样。一部分人表现为愿意收到一笔外汇稿酬，另一部分人则表现为想重新致力于发展所谓的“私家出版社”。

由于索尔仁尼琴在不同年份几次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但却都属于运动性质，而事后又没有随之采取制止其进行活动的措施，于是索尔仁尼琴便成为一个不受惩罚的特殊事例。这就引发一种传闻，说这一次也不会对他怎么样。有人又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谁只要公开反对苏维埃制度，就会受到西方的可靠保护，索尔仁尼琴的事情就是这样。

许多反苏分子认真注视着将如何处置索尔仁尼琴，通过研究我们对他的态度来揣测我们对他们的反苏活动的态度。索尔仁尼琴的一个稔友，住在列宁格勒的教授埃特金德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那我们就准备迁往以色列，因为形势将发生变化，不会再容忍我们。”

索尔仁尼琴的恶劣影响，他所煽动起来的反社会行为，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有时它直接向人们传授，应当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发表什么样的作品。例如，他呼吁萨哈罗夫准备文件来说明我国似乎存在隐性失业现象。从他那里得到此种建议的还有发表了诽谤性文件的其他一些人（巴拉班诺夫、楚科夫斯卡娅、鲍里索夫等）。有时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又被利用在例如《时事纪要》、《市民会议》等这样一类秘密散发的文件中。其中常有在索尔仁尼琴影响下撰写的材料。一些反社会分子力求与他接近，以便听取必要的忠告。

近几个月来，发生了一系列由于索尔仁尼琴的行为而直接引发的现象。例如，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有人散发传单，号召为他辩护，其中并包含有反苏攻击的内容。在索尔仁尼琴及其出版物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更大范围内的不健康情绪。工人中有人议论说，

他反对的似乎是降低物价<sup>①</sup>，是以援助阿拉伯国家的名义把人民必需的商品输出到国外，等等。同时，这些传闻证明，索尔仁尼琴正在逐渐传播他在所谓《致苏联领袖们》一信中所写的内容。

总之，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把狂妄无礼的反苏分子、各种牢骚满腹的分子，以及甚至政治上觉悟不高的人们联合在一起的因素，结果形成了相当广泛的规模。

所有这些情况，中央和地方的国家安全机关均仔细加以研究，正在采取措施预防发生敌对性活动，制止索尔仁尼琴活动的有害后果蔓延，以及防止在他的反苏作品影响下发生的消极现象有所滋长。

可以设想，如果对于追究索尔仁尼琴责任的问题继续迟疑不决，必将造成对我们不利的局面，产生不健康的情绪，并且最终，在此基础上，为敌对分子加强活动提供某些阵地。

切布里科夫

博布科夫

1974年2月6日

---

① 原文如此。

No03153

##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处置索尔仁尼琴事 致苏共中央的信

(1974年2月9日)

苏共中央：

送上直接负责索尔仁尼琴问题的切布里科夫同志和博布科夫同志准备的资料。从这份资料可知，这个问题目前已经超出了刑事案件的范围，变成了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性质的重要问题。从中可以看出，绝大多数苏联人能够正确认识对索尔仁尼琴的批评。正是从这一方面越来越经常而且也越来越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观点受到批评以后不仅没有放下武器，反而更加狂热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当局为什么不对他采取措施？”

使人特别担心的是，这样的问题在军人中和一部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另一方面，存在一个引人关注的事实：尽管我们采取了揭露其反苏性质的各种措施，索尔仁尼琴的书总是得到创作知识分子中某些代表人物的同情。例如，某些著名作家在谴责《古拉格群岛》的反苏性质时说，这本书中描写的事实确实存在过，这部作品应能引起苏联领导提高警觉，因为他们似乎正在实行“再斯大林化”的过程。有的人则认为索尔仁尼琴的书“很有益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中央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创作知识分子的关注”。

我们得悉在个别工人和大学生中有这样的说法，即索尔仁尼琴



呼吁苏联领导降低消费品价格，停止援助古巴和发展中国家，以便提高苏联人民的福利。这种思想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没有提到，但是，如所共知，这种思想是在索尔仁尼琴那封臭名远扬的《致苏联人民的领袖们》的信中讲到的。按照我们掌握的情况，索尔仁尼琴一方面拒绝在近期发表这份材料，但同时却通过自己周围的人透露这个材料的内容。

根据以上所述，继续拖延决定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尽管我们真希望不要损害国际事务，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继续迟疑不决必将在国内酿成极其不利的后果。

如大家所知，2月2日勃兰特发表声明说，索尔仁尼琴“可以在联邦德国生活和自由工作”。2月8日，我方代表已同勃兰特的委派人员会晤，以讨论有关将索尔仁尼琴从苏联迁往联邦德国的实际问题。

对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按照联邦德国代表的提示，达成以下解决办法。2月12日晚上，苏联驻波恩大使法林同志向国务秘书弗兰克（一定要是他）提出2月13日8时30分就紧急问题接见他。

2月13日8时30分，法林同志将受到弗兰克的接见，届时将向他提出驱逐索尔仁尼琴出境的声明（声明文本将会同外交部另文送呈）。10时召开内阁会议。勃兰特委托巴尔、弗兰克和外交部的代表作出肯定性的决定。根据西德当局的要求，载有索尔仁尼琴的飞机应当作为班机，于2月13日当地时间17时到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自索尔仁尼琴走出飞机时起，苏联代表就不再参加行动。

为了严格遵守法律，苏联检察院应当在今年2月11日对索尔仁尼琴提出刑事诉讼（已与罗·安·鲁坚科同志协商一致）。然后，今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应通过关于褫夺亚·伊·索尔

仁尼琴苏联国籍和将其驱逐出苏联国境的命令。

就在这一天，应对索尔仁尼琴实行拘留，并关入侦讯隔离室，由检察长向他宣布已因反苏活动对他进行刑事起诉。

自这时起不再放索尔仁尼琴回家，而在2月13日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并于几小时后实现驱逐出境的行动。

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都要迅速完成，因为从业务文件可以看出，索尔仁尼琴开始猜到我们的打算，因而可能发表公开文件，这将使我们和勃兰特均处于困难的境地。

如果勃兰特在最后一分钟，尽管他作出了一切保证，因某种原因改变自己的决定，那么仍应拘押索尔仁尼琴，并由检察院对他的案件进行侦讯。

在提出上述建议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十分仔细地考虑了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可能产生的麻烦。但是，并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索尔仁尼琴的行为不受惩罚已经在国内造成远比将其驱逐出境更加多得多的麻烦。

请予审核。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03154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索尔仁尼琴事  
给苏联驻波恩大使的指示**

(1974年2月11日)

批准对苏联驻波恩大使指示的文本（附后）。

中央书记

第125号记录第113项的附件

波恩

苏联大使：

鉴于已通过的关于褫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和将其驱逐出苏联国境的决定，根据按非官方渠道与联邦德国达成的协议，您应于2月12日晚通过电话与外交部国务秘书弗兰克本人取得联系，声称正等待莫斯科的紧急重要通知，请求于2月13日上午8时30分接见您。其间您可以说，问题的性质您暂时尚不得而知。

在2月13日与弗兰克会晤时，请通知他以下内容：“苏联检察院已对索尔仁尼琴进行刑事案件起诉，按照苏联法律他将因反苏活动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并根据2月2日勃兰特总理关于索尔仁尼琴可以自由地在联邦德国生活和工作的表示，

以及注意到联邦德国宪法的相应条款，苏联有关机关决定将索尔仁尼琴于今年2月13日用民航班机驱逐出境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并请似乎以自己名义补充说，考虑到联邦德国与苏联之间日益加强的友谊，我们希望有关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的情况事先不予透露，且不被利用于宣传目的。

最后请说明，我们希望部长和勃兰特总理亲自以善意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

执行情况请报告。

№03155

##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 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及其 影响日益减少的情况通报

(1976年1月4日)

苏共中央：

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于所获得的有关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和被褫夺苏联国籍后的材料进行了分析。

身居国外，索尔仁尼琴积极设法发表他在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前所写的，并经由非法渠道转送到西方国家的卑劣作品（《古拉格群岛》、《致苏联领袖们的信》、《普鲁士之夜》）与此同时，还上演了索尔仁尼琴的“剧作”《劳动共和国》（联邦德国）、《第58条》（加拿大），拍成电影的有《坦克知道真相》（法国）。

在资产阶级传媒工具的影响下，一部分国外社会人士一开始对索尔仁尼琴本人表现过兴趣。这一情况被西方最反动的集团用来煽动又一次反苏浪潮。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特别是“自由”电台和“德意志浪潮”电台，试图利用卑劣作品《古拉格群岛》的出版策划一次广泛的诽谤宣传运动来诋毁苏联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苏联的外交政策。

为了消除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的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74~1975年向西方推出对我们有利的材料和文件，揭露了诽谤者的真实面目和他仇恨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根源。以下一些出版物在

这方面引起的反响最大：《索尔仁尼琴出卖了我》——作者维特克维奇，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索尔仁尼琴与人民劳动联盟》，载美国《俄罗斯之音》报；《卖身投靠者和老实人》，作者雅科夫列夫、载法国、美国《祖国之音》报；《我的丈夫——索尔仁尼琴》——作者列舍托夫斯卡娅，意大利、日本出版；《谎言的群岛》——作者雅科夫列夫，以及原来熟悉索尔仁尼琴并一度同意他的观点的列舍托夫斯卡娅、雅库博维奇、卡甘、维特克维奇等人的电视访谈。

在西方披露的使索尔仁尼琴名誉扫地的消息，促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本人作出重新评价，有助于人们对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和历史可靠性产生和增加了怀疑，并导致西方进步人士发表了一系列正面的文章和言论。例如，著名的瑞士作家阿尔瑙在《索尔仁尼琴——众所周知的被揭露的说谎者》一文（载瑞士《妇女》杂志）中指责索尔仁尼琴“为了获取诽谤自己祖国的高额稿酬而蓄意在西方读者面前制造对共产主义恐怖气氛”。在西方享有知名度的作家迪格尔曼、施塔格尔、达尔勒等也发表言论尖锐地批评索尔仁尼琴。

上述措施大大降低了索尔仁尼琴敌对性作品的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公开声明自己的反苏主义者的真实政治立场。很能说明问题的是，索尔仁尼琴越来越公开地试图同捷克斯洛伐克侨民中的右翼机会主义集团的代表人物联合起来，意在利用他们来宣传自己的反苏作品。但是，他的企图未能得逞，因为按照一些捷克斯洛伐克侨民领导人的看法，索尔仁尼琴在同他们的交往中像是“一个自命不凡的沙俄沙文主义者……并且否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把捷克斯洛伐克“看做为……一个省”。

1974~1975年期间，一些反动集团曾为索尔仁尼琴安排在瑞典、瑞士、法国、加拿大和美国发表演讲。其间，他继续恶毒地攻

击共产主义，而且有时只不过发表一些连他的同伙也为之深感震惊的疯狂的政治宣言。例如，在一次为庆祝卑劣作品《牛犊抵橡树》在法国出版而举行的电视访谈中，索尔仁尼琴竟宣扬极其反动的观点，致使电视节目策划人不得不在报刊上为他的个别观点作出“解释”。贝赞逊在一篇文章中承认，索尔仁尼琴的发言许多电视观众并不理解，尽管他力求证明，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西方的人们不能想像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生活。

在一次经美国劳联 - 产联主席约翰·米尼出面组织由他在华盛顿“希尔顿”饭店发表演说时，索尔仁尼琴特别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在讲演过程中，索尔仁尼琴竟尖锐地批评胡佛和罗斯福政府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进行经济援助的做法，批评他们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批评美国站在反希特勒同盟国家一边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还攻击前总统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对苏联作出“让步”。他指责美国统治集团干涉苏联内政不够积极，“让苏联人民听凭命运的摆布”。索尔仁尼琴呼吁：“干涉吧，干涉吧，再干涉吧，尽一切可能干涉吧。”接着，索尔仁尼琴又指责美国政府把越南“送给了”共产党，并声称：“人民解放力量在柬埔寨和越南的胜利，是这两国人民所能遭遇的最坏的事情。”

根据情报来源提供的材料，听众对索尔仁尼琴在“希尔顿”饭店的讲演作出毫不掩饰的反应。演讲开始一个小时之后，许多参加者离场而去。美国《华盛顿邮报》承认，在听索尔仁尼琴演说的人当中，不时响起评论声：“这个家伙想让我们为他火中取栗。”

有一事实也能说明问题，即当索尔仁尼琴在华盛顿发表演说之后，在美国社会人士和实业界中关于他理智不健全的说法流传越来越广。例如，在今年7月3日《纽约时报》的一则简讯中指出，在研究福特总统是否有可能接见索尔仁尼琴时，列举的理由之一是对索尔仁尼琴的“智力是否平衡”抱有怀疑。《华盛顿明星报》在指

责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妄言的狂热性质时指出：“只有宗教狂才会把类似的建议当作实际的外交药方提出来，但对于对外政策来说仅依靠狂热主义是不够的。”接着又说：“蠢话，即使是由索尔仁尼琴说将出来，仍然还是蠢话。”有影响的美国评论家约翰·克拉夫特在今年7月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指出，索尔仁尼琴号召美国后退到恢复冷战的作法，再一次让美国人相信，“要少听别的劝告，努力用自己的头脑生活”。

作为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和缓和国际局势的政策坚定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在1975年7月向《纽约时报》发表讲话时，把福特总统参加即将召开的赫尔辛基会议称作为“出卖东欧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在多次讲话中一再尖锐批评西欧各国和美国，说它们为了自身的福利和安宁一贯把国际舞台上的阵地拱手让给“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

索尔仁尼琴的上述言论，他的无比狂妄的野心和荒谬绝伦的反动观点，以及政治上的全然无知，完全摧毁了关于他是“民主斗士”的神话，并且把著名的自由派人士、某些政治活动家，以及西方科技和创作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从他身边推开。有一个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索尔仁尼琴一再试图取得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国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却假借种种好听的理由至今回避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就回答索尔仁尼琴说，移民问题“不属于总理的职权范围”。

瑞士的一批国务活动家则毫不含糊地表示，希望和索尔仁尼琴及其挑拨活动划清界限。今年8月28日，在瑞士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上，瑞士联邦总统格拉贝尔在回答一名议员提问时（这个议员援引说，索尔仁尼琴对赫尔辛基会议的作用评价不高），驳斥了这种引证的合法性并以尖锐的口吻宣称，瑞士人“自己有能力判断会议的作用”。今年9月16~17日，瑞士议会民族院外交委员



会主席连施勒在民族院辩论时直截了当地把索尔仁尼琴的言论称为蛊惑人心，而格拉贝尔在回答少数几名诽谤者的辩护士之一约·施瓦尔岑巴赫时激动地声称：“施瓦尔岑巴赫应当少看些索尔仁尼琴的书……而应多关心瑞士的作家”。

为了表示对瑞士这个传统中立国的关心，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报《国民日报》今年7月30日在一篇分析索尔仁尼琴活动的文章中指出，他的行为“不属于能促进瑞士和苏联发展关系的因素”。

索尔仁尼琴的政治信念、夸大妄想和自封为“最高法官”、“先知”的做法，成了他和许多最近从苏联走到西方国家的人们（西尼亚夫斯基、马克西莫夫、涅克拉索夫）出现深刻分歧的原因。

由始终感觉到不仅在西方而且在留居苏联的少数同情者中对自己本人的兴趣日益减少，索尔仁尼琴决定能通过建立一个旨在援救在苏联似乎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人士的所谓“俄罗斯社会基金会”，以求恢复自己摇摇欲坠的“威望”。但是，组织“基金会”对于索尔仁尼琴来说只不过是宣扬自己的名字的一个广告，而把微不足道的一些钱转给某些以反社会活动而为人所知的苏联公民（金兹伯格、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等）只不过是对他们提供的诽谤性信息的小小一笔施舍而已。

索尔仁尼琴毫不掩饰的敌对活动和他在《从大石块底下》和《致苏联的领袖们》两篇诽谤文章中表达的反动政治立场，引起苏联科技和创作知识分子方面的负面反应，而《牛犊抵橡树》这篇索尔仁尼琴对著名苏联作家和整个创作知识分子进行侮辱性攻讦的诋毁性文章的发表，则促使诽谤者本人即使在原先实际帮助和支持过他的人中间也彻底名誉扫地了。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女儿发表在《团结报》上的激烈地谴责索尔仁尼琴那封公开信，这封信受到苏联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赞许。

索尔仁尼琴最近的几次公开演说遭到我国作家们的最为强烈的

谴责，因为这些演说实质上是直接呼吁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发动战争。

目前，只有原先和索尔仁尼琴有过联系而今留居苏联的人们中间的少数几个人（帕斯捷尔纳克、金兹伯格、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秋林、布哈林娜、鲍里索夫）继续同他保持联系。索尔仁尼琴的敌对活动甚至受到像楚科夫斯卡娅、科佩列夫这样一些他最接近的朋友的谴责。能说明问题的情况是，如果说以前，当索尔仁尼琴居住国内时，每当苏联报刊发表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如同他的诽谤性作品在国外出版一样，总会在某些反社会行动方面（传单、标语，等等）有所反映，那么，如今这类现象实际上已看不到了。

最近，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不仅苏联人，而且西方社会也已对他不抱好感，于是力求不惜代价重新围绕自己的名字制造一番喧嚣，并为此更加频繁地求助于西方最反动的极端势力，以及各式各样的反苏组织和白俄侨民社团（“人民行动联盟”、“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等等）。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同相关的机构和主管部门继续设法进一步消除索尔仁尼琴的影响。

特此通报。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 【专题说明】

# 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二）

（1966年11月至1982年11月）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就大抓意识形态工作。1966年11月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勃列日涅夫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思想。收入本专题的有22件档案。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有王伟文、王希礼、吴能、曹介民、  
赵迎菊、温耀平、陈俐佩、徐锦栋、乌传袞）

№03322

##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 问题讨论的记录摘抄

(1966年11月10日)

会议由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

参加人员：沃罗诺夫、基里连柯、柯西金、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谢列平、格里申、杰米契夫、乌斯季诺夫、安德罗波夫、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同志。

### 28.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在我们党、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十分明确地制定了发展的前景，已经可以看到苏共中央十月（1964年）全会<sup>①</sup>的卓有成效的结果。我们所有人，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农业方面，特别是最近一年，以及在工作方面，都感觉得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这些问题召开了多次全会，十分仔细地讨论了这些领域的状况，并且规定了明确的前景。尽管时间不长，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些措施极有成效。但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有一个领域我们做的还很少，这就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缺点，而在有些地方则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已经开始让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它们不能不令我们忐忑不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警惕。

---

<sup>①</sup> 1964年10月14日开始的中央全会，赫鲁晓夫被撤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勃列日涅夫被推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在十月全会前的十年以来，在这方面所犯的的错误并不比其他领域少，甚至还多些。而最主要的是，这些错误并不像在某些其他领域中那样容易被我们克服。过去和现在我们都清楚不过地知道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但是，我以为，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对于我们党和国家总的工作中这一个重要方面应负的责任。讲到责任，其意义在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

有一种情况特别值得引起警觉，那就是某些意识形态工作手段，诸如某些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以及报刊，在我们这里竟被利用来污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而有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假借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摆出种种貌似高尚的出发点。这样做更坏，危害更大。

例如，前几天，有人向我讲到康士坦丁·西蒙诺夫的一篇新作品。它的题目好像是《战争的一百天》<sup>①</sup> 在这部作品中，西蒙诺夫就给我们出了难题。在有些作品中，在杂志上，以及在我们的其他出版物中，人们竟把批评的矛头指向我国人民心中最为神圣，最为珍贵的东西。要知道，我们的某些作家（他们的这些作品居然还能够发表）甚至讲到似乎不曾有过“阿芙乐尔”号的炮声，说发射的是空炮弹等等；甚至讲到不曾有过 28 名潘菲洛夫师英雄战士，<sup>②</sup> 人数比这个数字少，说这个事实几乎是杜撰出来的；甚至讲到不曾

---

① 《战争的一百天》刊于《新世界》杂志 1966 年第 9 期上。1966 年 10 月，西蒙诺夫就这篇作品的问题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一封信。

② 潘菲洛夫，伊·瓦·（1892、1893～1941），1940 年授少将军衔。他率领的步兵第 316 师于 1941 年 11 月 18 日改编为近卫步兵第 8 师。潘菲洛夫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牺牲，1942 年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有过克洛奇科夫<sup>①</sup>其人，也没有过“我们身后是莫斯科，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退却了”的口号。有的言论则甚至直截了当地对十月革命和我党及我们苏联人民英雄历史中的其他历史阶段进行诽谤。

难道这些还不应引起我们的认真警觉吗？这一切之所以必然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因为，对于以上事实和对事实的歪曲，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抵制。前几天，叶皮谢夫<sup>②</sup>同志对我讲了以上事实，以及其他一些事实。我们自己每天也感觉到，我们的思想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不仅要议论，看来还应当对之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想，还有一点也是不正确的，即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得不到有关党内，国内意识形态工作状况的周详而系统的情况通报。不是为通报而通报，我指的是真正的，充满党性原则的，目的明确的情况通报，并且附有具体的建议。我们拥有这样的关于国际政治和实际问题的、国内经济建设问题的情况通报，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问题方面，我们却没有这样的情况通报。

同样值得忧虑的是，我们至今没有一本关于我们党的历史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你们都记得，曾经有过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简明教程曾经不仅是每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我国每一个劳动者案头的必备之书。不仅对于这本书的编纂，而且为了宣传这本书，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整整一代人通过这本教科书受到了教育。党史简明教程以后我们有什么呢？据说，编

---

① 克洛奇科夫，B.Г.（1911～1941），为潘菲洛夫近卫第8师的一名指导员，1941年11月16日率28名战士，奉命防守莫斯科近郊的杜博谢科沃车站附近阵地，与进攻的成倍德军奋战4个多小时，击毁德军坦克18辆。“俄罗斯是辽阔的，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退却了，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这是在阵地最危急的时候克洛奇科夫喊出的激励战士的战斗口号。阵地终于守住了，直到增援部队赶到，克洛奇科夫率领的28名战士，几乎全部牺牲。

② 叶皮谢夫，阿·阿·（1908～1985），苏联大将，1962年起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1964年起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了一本历史教科书，但在我们这里并没有得到普及，出了第二版，现在说正在准备第三版。然而与此同时，能够真正成为案头必备之书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充分的、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捍卫我们党免遭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者攻击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至今仍然没有。要知道一个党，任何一个党，尤其是我们这个人数以百万计的大党，按照列宁的遗训生活，真诚地力求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应当有一面旗帜，而我们的旗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在这样优越的成果卓著的基础上，依靠列宁遗留给我们的深邃而全面的思想，再结合国际国内变化了的形势，难道竟会写不出一本这样的教材，这样的党史，使之确实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案头必备之书，使之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不仅陈述和记载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揭示我们整个运动的发展前景。

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教科书，才使得一些各种各样的“批评家”得以任意篡改我们的历史。我们不是有这样一批理论家吗？他们谈论所谓过早取消了新经济政策，批评党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以及在我们党同托洛茨基主义及其他反党集团坚决斗争中突出的地位。

特别时髦的是，批评党按照列宁的教导不惜一切地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避免同德国法西斯发生冲突。关于伟大卫国战争更是写得无奇不有。而在所有这一切之中，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报纸，我们的党的刊物，却不进行深刻的，论据充分的分析，也不对于对党的这种诽谤进行真正的党性的批评。

要知道，至今为止确实谁也没有站出来从党的立场出发批评伊万·杰尼索维奇<sup>①</sup>这一本书，批评西蒙诺夫的某些观点，批评在我

---

<sup>①</sup> 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小说，最初刊登在1962年的《新世界》杂志上。

国出版的、包含严重错误的大量回忆录。至今为止国内宣扬赫鲁晓夫在卫国战争中起过突出作用的书还在流传。

波诺马廖夫：这是在简史中写的。

勃列日涅夫：也不仅在简史中有。要知道，同志们，我们这里事情已经发展到，上述种种批评开始从各个方面指向列宁了。因此，我们应当按照布尔什维克的高度原则性站出来反对此类的批评。我们绝不让任何人污蔑列宁。但是这不能只在口头上说，而要实际地，在实际行动上，有充分论据地、科学地证明列宁思想的正确性，不仅要制止反对列宁的此类言论，而且也不容许这种思想存在。

可是，事实上我们这里果然存在真正滑稽可笑的事实。刚才同志们说，德国人说我们党的历史是错误的历史。而如果我们看一看，在列宁以后直到现在这一段长时期内我们编撰出了什么呢？除列宁著作以外，我们能用什么来教育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呢？我刚才讲过，我们有过党史简明教程，但已被批评得体无完肤。在它之后我们拿出过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在我们党、我国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丰富的时期，我国在所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都应当给以科学的思考，以使用来教育人民。同志们，我们确实需要把列宁和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这一个时期连结起来，编写一本作为由党中央奉献给党和人民的教科书，把我们当代人的所有优秀思想、把我国人民和我们党在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一切都汇集在这本教科书中。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以此为起点，揭示我们为共产主义而继续斗争的前景。我认为，这不仅是我国内部的事，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具有极其巨大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而我们应当能够编写出一本确实真正像样的我们党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可以在中央、在政治局、也许在党的中央



全会上进行讨论，使之成为我们全国人民的财富。

杰米契夫：我同意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状况，以及对于我们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关注。不过与此同时我想提请注意的是，两年以前我们遇到了什么，以及是谁在宣传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完全正确地提到的那些不正确的观点。作这种宣传的是《新世界》杂志。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三个派别。一派知识分子集合在《新世界》杂志周围，第二派汇集在《十月》杂志周围。一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说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是一连串的错误。看来，在我们这里确实存在自由主义。举例说吧，有同志说到要撤销特瓦尔多夫斯基<sup>①</sup>的职务，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撤换他，他会像一个英雄一样地离去。

在知识分子中确实存在许多各种各样的议论和说法。但这只不过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所有这些人，也知道这些不健康的议论来自何方。例如：就说最近在各共和国刚刚召开的最近的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吧。这些会都开得很好，只有白俄罗斯除外，但那里只是一二个人发表了类似的批评。

我们编写党史的事确实不好。在所有其他科目上我们如今已经编出了教材。历史方面也做了一些事。例如，正在为编写六卷本的党史进行庞大的工作，一本普及性的教材——《历史简编》——已经出版。我们的各个意识形态部门正在进行大量工作。但是，看来我们仅仅靠意识形态部门本身无法把这项工作全部抓起来。我们需要帮助。

我们国内的精神局面比过去已经好了许多。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在工业、农业，在党中央和我们政府的正确政策方面，在外交和内政方面，取得了成

<sup>①</sup> 特瓦尔多夫斯基，亚·特·（1910～1971），苏俄诗人。时任《新世界》主编

就。

我们这里十分薄弱的部门是电影。我想，现在该是把罗马诺夫<sup>①</sup>调离这个工作的时候了。他是一个聪明而又有知识素养的人，但却又是一个大自由主义者。看来，我们应当从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发表的严肃认真而又完全正确的意见中得出结论。我想，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勃列日涅夫：我希望同志们能正确理解我提出的问题。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没有批评任何个人。就是现在我也没有讲，在我们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有大量缺点，具体应当谁负责。现在谈的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其中也包括我，要认识到自己对于这一方面工作的责任，要理解如果我们对这些缺点和平共处，那就不能再容忍下去。

我知道，杰米契夫同志进行着大量的工作。看来，我比其他的人知道得更多，因为我每天不得不接触到意识形态各部门的工作。现在讲的不是谁做得多、谁做得少的问题，而是指根据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我们大家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

波德戈尔内：我完全同意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事实上确实如此。请同志们看看我们的党报《真理报》、《消息报》，以及《共产党人》和其他党的刊物。在这些报刊上你们能发现有关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讲到的那些问题吗？几乎一点没有。

也许说，有评论，对缺点也在批评。是的，在某些报刊上有此类评论。但那是在哪里呢？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在《红星报》上。而现在看来，据我对勃列日涅夫同志讲话的认识，问题不在于个别的，偶然的缺点。这样的缺点是有的，将来也会有。问题在

---

<sup>①</sup> 罗马诺夫，阿·弗·（1908～ ），1961年起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电影事业委员会主席。后被调任《苏维埃文化报》总编辑。

于，要看到，要及时发现并且批评这些缺点，而主要的是，必须有这样一份文献，使整个我们党的政治工作可以围绕着它开展起来；必须有这样一份文献，其中能使所有理论问题、历史问题各自得到正确的说明。

确实，同志们，意识形态工作的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所有人的警觉。不久前，当赫鲁晓夫担任领导工作的时候，我们受到巨大的损害，简直是在一切方面，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工作。我们欺骗了、败坏了知识分子。在中央做出的决定是一个样子，所有人都同意，包括他本人也同意，但是一走到知识分子那里去，或者走向其他广大听众面前时，他讲的又是另一个样子，与集体通过的自相矛盾。

你们记得，关于《战火中的十月》这样的错误作品同赫鲁晓夫谈了多少次。谁都知道，这是一本民族主义的书，可是赫鲁晓夫偏要求予以出版。还有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我们争辩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而他却支持所有这些劳改营文学。当然，肃清中央十月全会前10年间发生的所有错误需要时间，这也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说现在该是做些什么，该是对于具体工作部门追究责任的时候了，也是正确的。

我们最薄弱的方面是电影。对此确实应当加以思考。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影响我国千百万人的意识形态手段。我们对于意识形态各个部门的关注、监督很薄弱。你们看，至今为止这个讹诈者斯涅戈夫<sup>①</sup>还在到处游荡。对此我们也不知讲过多少遍了？

勃列日涅夫：可实际上他不仅到处游荡，而且据说中央所有的部，政府其他部门，都在接待他。那为什么不能制止这件事呢？

---

<sup>①</sup> 斯涅戈夫，A.B.（1898~1989），党和苏维埃工作者，大清洗年代被捕，在劳改营里度过18年，1954年恢复名誉，重新恢复党籍，激烈地反对个人崇拜。

苏斯洛夫：我们的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是编写真正科学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而且不仅仅是党史，还有人文历史，这不仅是为了大量的普通读者，也是为了中小学学生学习历史之用。这可以说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这个任务是正确的。

我想，我们应当建立一个集体，以便着手准备编写一本确实真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科书，并立即开展工作。

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例如说特瓦尔多夫斯基，我们如果撤销他的职务，他当即会成为一个英雄而离开职位。这是什么观念？如果不能撤换他，那我们就选派一名真正的有党性的同志去当他的副手。总之，看来必须提高我们所有的意识形态工作人员为自己的工作向党承担责任的意识。在这方面我们必须下一番功夫。这个问题提得十分正确，十分及时。

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的这些问题依我看来，十分正确，也十分急迫。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个别严重的失误和缺点，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

确实，中央十月全会前的时期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也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我们知道，赫鲁晓夫利用意识形态为自己的个人目的服务，利用来自我标榜，他并不关心党的利益，而我们还存在许多缺点。同志们，就以高等学校的青年来说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曾多次说过，但我以为在改善青年教育工作方面我们做的并不多。而实际上，我们用一种教科书教育他们，说应当如此；现在我们又用另一种教科书，是说没有教科书，而是推荐一些教材，而确能揭示在党和人民的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深层次实质的真正的教科书，几年来我们并没有拿得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头脑中，特别是在我国年轻一代的头脑中出现一片混乱的原因所在。

我们没有统一的观点。我指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看法。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对我们党的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形成统一的观点。

要阐明有关斯大林的问题，有关卫国战争的问题，有关我们国家和党的发展前景问题，等等。正如勃列日涅夫同志所正确说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朋友，以至全世界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在请求和期待我们这样做。

确实需要一本教科书，一部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这本书应能阐明我们时代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这本教科书必须经过政治局批准。也许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对这本教科书的基本问题预先进行一次像样的讨论。我们确实出现了理论上完全毫无道理的失败，特别是在列宁时期和当代之间这一段。要知道，在这个时期仍然有党，有苏联人民，进行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说法却忽东忽西，于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就追随着我们依样重复，而且不止是重复，我们的敌人则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

我们知道，不久以前哥穆尔卡<sup>①</sup>说列宁关于集体化的学说对波兰人不适用，看到没有？

勃列日涅夫：当我们谈到在报刊上什么登和什么不登以及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时，我记起了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件事。当列宁获悉高尔基——这位我国文学巨匠——的错误观点时，决定禁止刊印他的作品，高尔基自己回忆起这件事时充满了对列宁的感激之情。

我们不需要行政命令，但我们应当具有彻底的原则性。

安德罗波夫：我们应当认真地考虑一批问题，并且根据党的第

---

<sup>①</sup> 哥穆尔卡，符·（1905～1982），1956～1970年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予以阐明。确实，从召开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在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多少精辟的主张，但在宣传工作方面我们并没有把这些主张真正奉献给人民。我们必需结合苏维埃政权建立 50 周年和列宁诞生 100 周年十分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一句话，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今天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这些问题是十分正确的。

还有一点意见。我不太清楚：有人谈到行政命令。但是，目前，第一，在这方面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并没有任何行政命令，谁也举不出这类事实；第二，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共产党员，西蒙诺夫是共产党员。刚才提到的和没有提到的犯有严重意识形态错误的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没有权利对他们，作为共产党员，追究责任？他们是否同我们一起分担我们党的党章和党纲所要求的责任？他们归根结蒂是承认这两份文件，还是不承认它们？我想，有党的组织，它们应当要这些活动家们承担责任。而这方面一点行政命令也没有，而只不过是正确的党的态度，正确的党性要求，任何地方都应当是这样的。

波诺马廖夫：越往后，意识形态工作问题越应当在我们全党的工作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比编写出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我们党的历史的教科书更为重要的了。我们应当在这本教科书中全力展现出列宁和列宁主义。这本教科书将具有国际意义。

我们正在准备苏维埃政权建立 50 周年的宣传提纲。在这份提纲中应当系统而明确地在原则上阐述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我们的确需要草拟一份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问题的完备而详尽的决议。

如果考虑到我们的某些蹩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败坏我们党的基础，正在败坏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基础，再加上中国正在进行反对我们和我们党的宣传，那么可以清楚地设想到，这在当前确确实实

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

谢列平：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我完全支持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们全都应当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必须使自己提到现在在这里，在政治局会议上概括的高度。而我们在日常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注意个别的事实。

确实，在我看来，最不理想的情况是在电影方面。近期以来我们出了多少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影片，而它们正在上映，人们在看。那么，通过这样的影片，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用什么和怎样教育我们的人。或者，举演出活动这样的问题来说吧。我感觉，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这里任何一种监督检查也没有。从我们剧院的舞台上我们常常听到各种庸俗下流的东西，有时则就是直言不讳地反苏宣传。同样不能不使我们警觉的是，我们没有真正深刻的，具有政治思想内容的话剧。如现在在剧院上演的是《我在拍电影》<sup>①</sup>之类的不成体统的话剧。我们必须认真提高对有关部长们和委员会主任们以及所有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人们们的要求。

必须进行真正的党性斗争，以反对意识形态战线的垄断状态。我们的作者群范围太小，而实际上我们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我们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有许多各种各样并无需要的出版物，有的甚至还是有害无益的。

关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我认为我们已经讲得很多了。应当干脆解除他的职务了。这一点可以不在中央处理，作家协会就可以这样做。

确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人员进行着大量的工作，我们的各个部门也是，不过从以上所说我们应当得出严肃的结论。

---

<sup>①</sup> 《我在拍电影》是Э.С.叶甫图申科编导，1965年上演的电影。

沃罗诺夫：提一点想法，即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应当对原则性问题公开表态。我写了一篇文章，但至今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对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沉默不语，不写文章，不发表讲话。不久前，我看了一篇新的作品，叫做《一千天》或者《站在地球仪上》。这是一篇有害的作品。应当加强对发表的东西、出版的东西进行监督，应当加强对我们工作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监督。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确实存在不明确的地方，谁也不想把它搞清楚。看来，应当由党中央责成具体的人去做。

基里连柯：我们都同意要关注意识形态工作中状况，要关注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正确指出的那些缺点。

据我理解，这里指的不是个别的不足和弱点，而是要把事情真正有效地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想讲，要提高到党的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的水平，提高到整个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水平。首先，我们确实需要编写一本关于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祖国的历史的，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科书。我们也确实需要自己就个别问题公开发表意见。应当提高对于意识形态工作中缺点的具体责任心，并予以追究。

例如，我们讲到特瓦尔多夫斯基。我们早就在讲他的作品站不住脚，特别是他的《焦尔金游地府》更是十分有害。但这些作品至今仍在剧院上演，而剧院有党组织、共产党员院长，我们有相关的部，谁也不过问。要知道，确实如此，要是工厂出了某种废品，那谁都会过问，无论区委、市委，还是上级机关，还要处罚人。在这里，在意识形态工作中，人们歪曲列宁主义，对我们造成无法纠正的危害，而谁也不管不问，而我们却说什么“行政命令”。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观念。

我想，该是认真追究部长们、其他负责人员的责任的时候了，而且也该考虑考虑，在知识分子中党的工作、政治工作究竟应当怎



样进行。

我们说，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发表出来，但要知道书报检查是一直存在的，在生活和活动的所有时代都存在，甚至在沙皇时代也存在，我们也有检查制度，但如果我们让乱七八糟的东西发表出来，那么这些检查制度有什么用呢？我想，我们都应当从勃列日涅夫同志刚才提出的那些问题中得出严肃的结论，而且确实就此订出一个明确具体的行动计划。

佩尔谢：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同志十分正确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现状的问题。确实如此，我们对所有问题都有情况通报，而且是相当详尽有时甚至是过分详尽的情况通报，但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却没有这样的通报。我对于杰米契夫同志所讲我们有什么三派知识分子，一派以《新世界》杂志为中心，另一派以《十月》杂志为中心，第三派我还没有听清，是以谁为中心，而且他们围绕这些杂志汇集起知识分子中不正确的观点，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进行不正确的，不符合党性精神、时代精神的工作，感到十分奇怪。同志们，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些杂志分成派别进行工作，而我们不采取措施？我们有绝好的榜样——列宁。他是怎样对待历史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怎样领导干部在这些事情上严格要求的呢？

在这里正确地提出了编写教科书的问题。只要我们不仅在教科书中，而且在整个我们的实际意识形态工作中，不是像原先那样把问题同某一个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是把所有的问题同整个党、同党的活动、同人民、同人民的英勇劳动联系在一起，那么一切都会各就各位，正常运转起来。

我想，我们为此确实需要写出一个文件，其中应体现出列宁给我们留下的遗训，说明党在列宁之后做了些什么，我们的人民做了些什么。

波利扬斯基：在这方面我们做了不少事情。我们可以拿意识形态工作的任何一种样式举例，甚至电影也可以：我们也有好的影片，我们也有好的话剧，但是，第一，这样的作品太少；第二，除了好的作品以外，我们可惜却有很多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以为，我们太醉心于创办新的杂志、新的报纸。例如，《信使》杂志。谁需要它，它的对象又是谁？而这份杂志却在我们这里发行着，有人读它。

勃列日涅夫：或者说《无线电和电视》杂志吧，我前几天看了一下。用的纸张很好，但谁需要这样的杂志，完全无法理解。

波利扬斯基：我想，刚才勃列日涅夫同志讲得对，我们需要党史教科书，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现在所有的，不能使任何人感到满意。

我以为，说要责成某一些部门或一些同志编写这样的教材是正确的。关于对《十月》杂志的意见，说那里集合了一批平庸之辈，我不同意。我们有许多有意义的作品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或者举《巴比亚尔沟》<sup>①</sup>这一部作品吧，是发表在《青少年》杂志上的。令人懊恼的是，好的作品由于各种不好作品的充斥也显得黯然失色。

格里申：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问题是正确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民中间有许多优秀的，精彩动人的事例，但我们未能把这些在报刊上，在刊物上加以宣扬。我觉得，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中有某种惰性存在。

我们确实需要群众能够阅读的教科书，我们也需要中小学用的

---

<sup>①</sup> 《巴比亚尔沟》是叶甫图申科创作的诗，插写法西斯德国入侵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枪杀和平居民的暴行，发表在1961年的《青少年》杂志上。

教科书。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深思熟虑到目前时局和我们党的主张的在历史、艺术、电影，和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方针。

必须好好地准备纪念苏维埃政权建立 50 周年的提纲。我以为，需要集中一大批意识形态工作者，向他们说明我们的看法，回答所有热点问题。

库拉科夫：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而且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不管我们负责的是那一方面的工作。例如，我从自身感觉到，在我们的各种农业书籍中刊登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而农业书籍中都是些什么呢！我们都记得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业，以及特别是关于集体农庄联合会的提法。可是，不久前，在《共产党人》杂志第 11 期上凯宾<sup>①</sup>同志发表文章，竟完全推翻了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讲到和通过的上述这些思想。

我认为，在我们的书籍、报刊中，在我们所有的出版物中随意性太大，缺乏真正的党的监督。

卡皮托诺夫：我认为勃列日涅夫同志提出的所有问题都是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在大背景下进行思考。我们确实必须在所有基本问题上，包括历史、理论，给我们所有党的干部，对我们所有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一个明确的观念。在我们的党的工作中、宣传工作中、鼓动工作中，有许多好的、有益的倾向，但确实也有很多缺点，而且这些缺点盖过了我们的好的方面。

我认为，我们的某些协会存在严重的不妥之处，那里也没有认真开展党的工作。我以为，正确做法是，应当考虑毫无例外地在所有意识形态机构：电影、剧场、报刊等等，如何开展党的政治工作

---

<sup>①</sup> 凯宾，伊·古·（1905～ ），1950年起任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你们如此广泛而细致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令我十分满意，尽管事实上，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同志都没有准备好拿出一张现成的药方，呈献出完备的真理。但是，同志们，我坦率地告诉你们，这个问题近来一直使我极为不安。尽管十月全会以后我没有像去年那样写过任何信函，但这一次我草拟了一份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函，准备转发给你们，但决定还是先商议一下再行发出。我想，现在我就不必发这个信函了，因为我感觉到，中央政治局所有同志观点完全一致，都能充分而正确地理解意识形态工作中所有已经成熟了的问题。

同志们对我的发言作了很好的、正确的补充。这就是说，提出这个问题本身确实已经成熟，而提出问题的这种形式也是正确和及时的。我再重复一次，我并不想伤害或批评哪一个人，而且你们，同志们，也知道，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涉及国家的利益，涉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这时在一切问题上，除了充分的党性原则以外，不应当有任何别的标准，而现在谈到的，如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恰恰是涉及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问题。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央委员会、各次中央全会、党的二十三大的各种决议正在党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同时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些决议在工业、农业、人民的物质生活方面的成果。但在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种问题方面还有许多令人懊丧的地方，许多事情我们还没有做，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看来，我们必须全体一致地把我们工作的这一个责任重大而又有全党意义的工作抓好，而其中居于首位的，据我的感觉和理解，你们也都同意这一点，那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心轴，我想就是一个核心，围绕着它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所有问题、所有各种形式，都会随之形成。也就是说，要编写出一本这样的党史，使它真正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教育我们所有

人，教育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也就是要有这样一本文献，以便围绕着它开展我们全部的党的工作。

我想，应当责成书记处认真思考所有这些问题，充分考虑今天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然后拟订一份旨在从根本上改善我们全部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计划，并要规定完成期限和负责人员。我们还要仔细认真地考虑苏维埃政权建立 50 周年的提纲。这一点不能再拖延时日，现在就要做。这方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而且不能只有提纲，还要着手与苏维埃政权建立 50 周年有关的所有一系列问题。

同志们，我还认为，在进行所有这些工作时，我们必须牢记列宁的有关教导，即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更不用说在意识形态方面，人是决定一切的，干部是决定一切的。你们记得，例如关于讲课人方面列宁是怎么说的。我们今天不说要撤换谁，调动谁——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好，西蒙诺夫也好，其他人也好，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所有方面的责任感。这里讲的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年轻的创作知识分子，不能不认真地提高他们，而不是始终围着特瓦尔多夫斯基和西蒙诺夫转，而看不到在他们周围正成长着优秀的干部、优秀的人才。要提高他们，及时向他们作些提示，帮助他们。我们应当找到这样一种形式，让艺术、电影、文学、报刊中的任何一种新的现象能及时为人们发现，并得到支持。

例如，我记得这样一件事。你们记得，当电影《夏伯阳》<sup>①</sup> 发行的时候，随即在《真理报》上刊发了一篇精彩的社论，对电影《夏伯阳》进行介绍，同时围绕着这篇社论开展了盛大的宣传工作。

---

<sup>①</sup> 夏伯阳（又译恰巴耶夫），瓦·伊·（1887～1919），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在战斗中牺牲。作家富尔曼诺夫，德·安·（1891～1926）将其事迹写成小说《夏伯阳》，后来又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夏伯阳》，于 1934 年上映。

你们也都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夏伯阳活生生地走进我国人民。但是，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近期以来，对于文学艺术中的哪一种现象发表过这样的社论，作出过某种决议呢？并不是说，要原原本本地重复过去的做法，但是可以找到一种新的形式，而且不只是《真理报》，党中央也可以通过决议，发表公开信，或利用其他方式，指出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一种样式中存在的优点和缺点。我认为，同志们，意识形态工作的状况要求我们，而且是我们全体，予以真正巨大的关注，而且不止是关注，看来我们也需要认真审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物质基础。我们应当记住列宁在这方面的有关指示，即对于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宣传工作，不能吝惜钱财，而在我们深信能对我们，对党带来好处的那些领域也是一样。在这些场合，我们不应吝惜钱财，也不应吝惜时间和其他手段。

我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在新的起点上，在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之上，把我们祖国的历史，以及卫国战争的历史，首先又是我们党的历史，真正系统地整理起来。

我们自己必须更多地去观看戏剧和电影。一句话，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意识形态工作。我认为，这种紧迫的需要是生活向我们提出来的，是今天党面临的任务向我们提出来的。

我想，应当责成书记处拟订具体措施，并加以贯彻，必要的问题可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这要在近期内完成。所有成员，包括苏斯洛夫同志，以及基里连科同志和谢列平同志，都要参加进去，我就不谈杰米契夫同志要进行这件工作了。一句话，所有党中央书记，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投入这项工作。

№03323

##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意识形态 问题的记录摘要

（1966年11月10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处：

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格里申、杰米契夫、库纳耶夫、马谢罗夫、姆扎瓦纳泽、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安德罗波夫、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25号）摘抄

1966年11月10日

关于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1966年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些问题。

责成苏共中央书记处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为基础拟订并实施具体措施。

必要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

苏共中央政治局

№03324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意识形态  
问题的记录摘抄

(1967 年 3 月 28 日)

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 (第 22/2C 号) 摘抄

(1967 年 3 月 28 日)

苏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和学校部、文化部 1967 年执行党的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指示的具体措施。

仅限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交换意见。

中央书记处



No 03386

苏共中央科学与学校部等机构就支持  
拨款修缮“马克思之家”博物馆  
致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7年6月26日）

目前英国正在为修缮伦敦的“马克思之家”纪念博物馆而进行募捐。

博物馆馆长罗特施泰因同志请求苏联各社团部门（今年5月10日专电第641号和今年6月15日专电第858号来电）从财力上支援5000英镑。英国朋友建议把这笔钱按正常方式由苏联国家银行转汇到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记入“马克思之家”纪念博物馆捐助基金会名下，捐献者按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平均分摊。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约翰·高兰支持这项建议。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务委员会正在准备改进“马克思之家”陈列品有关材料，并请求指示苏联财政部拨出5000英镑作为修缮这所纪念博物馆之用。

关于为修缮“马克思之家”捐款一事，苏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5月18日“关于纪念卡尔·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决议中作了规定。

苏共中央科学与学校部、苏共中央国际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认

为，为修缮伦敦“马克思之家”捐赠 5000 英镑是可能的。已同苏联财政部（马列京同志）商定。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科学与学校部副部长（切哈林）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别里亚科夫）

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

1967 年 6 月 26 日

### 苏共中央书记处同意拨款的会议纪录

秘密

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第 29 号，第 26 项）摘抄

1967 年 7 月 3 日

#### 关于拨款修缮“马克思之家”

1. 接受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关于捐赠 5000 英镑修缮伦敦“马克思之家”的建议。

2. 责成苏联财政部（加尔布佐夫同志）拨出 5000 英镑，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和马克思恩格斯博物馆名义平均分摊，转汇给伦敦记入“马克思之家”纪念博物馆捐助基金会名下。

3. 同意致苏联驻英大使馆电报文本（附后）。

伦敦

苏联大使馆

641号。朋友们关于拨款5000英镑修缮“马克思之家”的请求已予满足。款项将以您第858号专电所列社团部门名义转汇给“马克思之家”纪念博物馆捐助基金会名下。

№02481

##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 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年11月5日)

秘密

国家安全委员会收到一份文件，其中陈述了有关当代大学生的许多意见。

文件的作者是一个高校的大学生，他跟许多青年诗人、国家演员都有来往，参加“小机伶俱乐部”组织的竞赛。

尽管作者并不成熟，在分析一些问题时有明显的主观主义，但在我们看来，文件还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的许多论点跟我们的其他来源的资料的意见是一致的。

考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些资料，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研究青年中的消极过程并防止在此基础上产生政治上有害的表现。

附件：33页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安德罗波夫

附 件

### 第一章 大学生是一个社会群体， 他们内部是形形色色的

在我们国家，“大学生”这个概念包括大量的人。但是这个简

评是用来描述和分析全日制大学生的行为，这些大学生在社会方面由于许多潜在的因素是全体人口中最不稳定和最活跃的群体。这些因素是指较年轻，每天跟自己相似的这类人打交道有较大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家庭的物质义务等等。

我国一个年轻公民在上9年级和10年级时就坚信他一定要上大学。他们实际上意识不到与资本主义国家同龄人相比他的特殊的地位。这是年轻人世界观形成的第一阶段——中学阶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缺点。学校教育缺乏现实的因素，阐述复杂的历史事件主要靠的是虚伪的激情和浪漫主义，不善于与青少年不可避免的夸大个人意义的尝试作斗争，这就导致青年人在中学毕业后处于生理“剪刀”之间——学校形成的关于现实的概念和现实的真正状况之间的“剪刀差”。因此纠正中小学教育的错误的主要角色要由高等学校来承担。

对未来大学生个性一个重要的评价就是他所选定的专业。在这个问题上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我们不善于预见事件和支持本来就很强大的趋势。自然科学的分支（物理、数学、天文学等）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方面。这些学科的成果比社会科学的成就更加现实和更加明显，官方的方针表现在创办大量的物理、数学学校，进行奥林匹克竞赛等等方面。有鉴于此，在中学应届毕业生中本来就很流行的轻视人文科学的思想更加严重，这是由于人文科学似乎不学自明，缺乏轰动效应的结果等。这种政策导致两种负面效应。

1) 更加强了未来专家对社会政治科学的轻视。

2) 最有天赋和才能的人都去研究技术科学。因此还在选择未来专业过程中年轻人就形成了他对负有形成自己世界观使命的许多社会科学的态度。

根据述评作者的资料，到文科学校上学的是想在党政方面飞黄腾达的人。他们认为，文科教育在这方面有助于他们，而且升迁要

容易得多。这些人还在学习期间就对所学的课程形成一种看风使舵的态度，他们完全缺乏对具体情况的分析。当了社会科学教员以后，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促使大学生那种没有原则和不问政治倾向的发展。这一点以后在一些具体事例中都有所表现。

当代大学生基本上是17~18岁的青年（指一年级大学生）。他们来到学校时带着求知的渴望，对以后专业模糊的理解和尚未形成的世界观。这类青年的基本特点是对聪明人的钦羡，对一切社会现象尖锐的反应，对“集体农庄人员”（他们对来自农村同学的称呼）的假斯文态度。

一年级大学生，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危险，因为在这一阶段他们很害怕行政措施和学习过程本身。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谨慎从事是由于他们对自己所考取的学校毕恭毕敬的态度。

前两次考试使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中学毕业生慢慢地变成了大学生，他研究大学生活的细微末节，他明白，如果不冒失蛮干，就可以安宁地“随便怎样学习都行”。对学校的崇拜消失了，而代之以心安理得的态度，有些地方甚至还有些藐视。在敖德萨没有世界闻名的高等学校，因此这里不可能有像在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或者莫斯科大学那样把自己的学校和学习过程奉若神明。大学生逐渐转入第二类，即最有趣和最危险的一类——中年级大学生，这类学生包括二年级、三年级和部分四年级。

必须指出，一年级大学生要学习苏共党史，当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死板的研究，教员只要求记住而不是理解，直到增强记忆的法则——怎样记住讲台上讲的俄共（布）历次党代会召开的日期，迫使大学生对社会政治课程就像对待积累事实，对待令人生厌的次要的义务一样。正是在这里形成社会科学“不是课程”的观点。

对许多人来说，在一年级也第一次接触对大多数城市居民隐瞒了的农村生活。许多人到集体农庄去有真正的意外新发现。由于形成对农民的敌视态度（“为什么我们要替他们干活？”），加强一年级大学生原来就很紧张的作息制度，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寒假，第一次使他们养成可以无所事事的习惯，农村劳动对处于中游的学生来说，使城乡打成一片的说法变得滑稽可笑。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点社会经验，他们将把这种经验推广到以后的谈论中去。不文明的酗酒，对城市的敌视引起他们的注意。在和农民的谈话中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阴暗面，正如他们认为的，以真正的形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对所看到的一切充满感情色彩的理解也就由此开始，这是现代大学生的一个特点。在集体农庄里大学生分化成彼此亲密的小团体，出现了一些领袖人物和部下。大学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社会群体。许多人自豪地叙述在农庄里为救助受处分的同学而举行的罢工。

从二年级开始大学生行为的性质逐渐起了变化。在年龄方面这是情窦初开，探求真理、什么书都读的时期。从教学的观点来看，大学生对付各种诡计相当有经验，这些诡计使他毫不费力地在该学校进行学习。顺便说说，只有极少数人成为优秀学生。奖励在这里不能使为达目的所付出的花销得到补偿。因此在高等学校学习优秀的学生主要是两种人：

1) 公认的优秀生，对他们来说，“5分”已经成了个人学习成绩的证明。

2) 从小就灌输学习优秀可以路路通的犹太人。

中年级大学生是大学生中最危险的社会群体。他们在自己学习的城市里受到同化，根据兴趣与其他高校的学生交朋友。他们原则上没有很大的物质方面的忧虑，因此他们的课余时间都用去认识周围的事物。正是中年级大学生倾向于改变职业。有创造性才能的年

轻人的独立工作通常在中年级开始。在所有的画展上，在每次有趣的结伴游玩之中，您都能看到中年级大学生；忙于毕业论文的五年级大学生或者专心致志死背功课的一年级大学生是不会到那里去的。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按兴趣聚到一起。高校中班级（指大学生的班级）生活都很薄弱。班级生活归结起来就是交换教学资料等，而学校规定的监督时间只是装装门面或者研究教学大纲。对敖德萨处于中游的大学生来说，典型的行为模式是这样的：到校上学（准确地说、听三次课和不能不搞的实验室工作），然后就是与同伙会面和一起继续消磨时间。这必然要去酒馆，此后便是长时间地一起闲逛、谈话、交换意见。这种谈话的典型主题是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学校新闻，最主要的话题是淫欲和喝酒。正是在这些会见中大学生了解到新的“歌曲创作”，在这里传播一些奇闻逸事等。必须指出，大学生的社会积极性正好表现在这种群体的人们中间。学校组织的星期日义务劳动他们总想逃避，只有一些行政措施才能保证。

大体上从四年级中期开始，大学生的兴趣便取得了比较具体的性质。他们多数人在这段时间跟某人的关系已固定下来，它在以后应当发展为婚姻关系。不管你选择的学校是好是坏，你都必须读完它。而且在大学生的社会探索中安定的阶段来到了，它主要是由个人福利的因素和周围人“胳膊扭不过大腿”这类理由决定的。大学生已转入高年级。

这些人的举止老成持重和小心谨慎。他们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争取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显示自己的诚意。在四年级或五年级时没有加入共青团的学生便争取入团，就在这一阶段也有人争取入党。行为逐渐变得比较接近现实和小心谨慎，在意识中充满更多的一致性。然而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对敌人宣传更强的理解能力。这不



仅因为增长了对事件分析态度的反应能力（这种态度西方评论员都很赏识），而且出于对今后前途渺茫的具体经济分析。把西方同行的状况（纯经济的）和自己的工资进行对比就得出很有趣的结果：

1. 分析的结果一些人得出必须“向上爬”，也就是千方百计给自己开辟道路，保证有高的生活水平。正是这些人急切地想考研究生，企图利用社会地位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没有原则，会说漂亮话，有蜕化变质的极大危险，是青年人的反面榜样。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外观无可挑剔，因为他们相当小心谨慎，只向少数信任的朋友吐露自己的观点。

2. 另一些人决定随波逐流。但是这个决定以后给他们带来不少痛苦和烦恼，因为在他们眼前有着一帆风顺的朋友的榜样。因此这一类人是传播一些流言蜚语、奇闻逸事等的最好范围。其中某些代表人物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诋过于周围的人，这些人对西方的宣传有很偏的理解能力，因为它们认为“自由世界”是普遍繁荣的地方。

在敖德萨这类人特别有影响，因为这里把个人物质福利成功进行对比的人物势力很强大。这种观点纯粹是犹太人思维的产物，但许多其他民族的大学生很容易接受这种观点。

大学生毕业和得到文凭使大学生转入青年专家的社会阶层。虽然该述评不应当涉及到这类人，但是指出这类人以后的心理嬗变是很有趣的。实际上一接触到生产范围，许多人便对作为共产主义建设最先进队伍的工人阶级的信念动摇了。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对能够管理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的信任。

许多企业中组织得不好、杂乱无章的劳动使他们得出一种看法，就是我们工业中——“到处杂乱无章”。

述评的作者不止一次地有机会听到一些年轻工程师声明愿意到科学界去工作——“那里至少秩序好”。他们很愿意在高校或企业

中大谈陶里亚蒂市“费亚特”厂的劳动组织情况。关于工厂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那是一个使你失去作为专家的专门技能的地方。

## 第二章 大学生总的世界观的形成， 国立高等学校在这方面的作用

刚入大学的中学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毛坯”。他们的信念是一个有趣的大杂烩：有中学生的浪漫主义，也有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仰，还有对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开始怀疑。然而大多数中学生衷心期待所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希望将来都能实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相信共青团，准备为大家的福利去工作。一些政治委员，巴维尔·科甘一代小男孩，西伯利亚一些城市的建设者是这些人眼中的英雄，《双桅帆船》过去和将来都是他们的赞歌。

### 1.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在大学生中间威信很低，在那些不把社会科学作为主要课程的高等学校，它们被看做“废话”。在这个问题上教师首先有责任，他们在课堂上几十次、上百次地向学生讲述教科书的提纲或者论点。讲课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索然无味，因此党史、哲学、科学共产主义原理等课程用来准备家庭作业，开心的抄写等，课堂讨论变成轮流发言，而不发言的人便于自己的事。此种教育组织导致学生习惯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没有根据，这是一个教条式僵硬的科学，它不能解释，也不能预见事件的过程。教师们或者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或者对这些问题进行含混不清的回答，这使所有学生沉闷无趣。一年级时曾试图积极思考的学生在快毕业时又默默地“从这里到这里”地背诵。结果思想意识课只得“认输”，而不是成为以后文化教育的基础。社会科学教学性质本身使大学生

常常把它们叫做“神学”。

一些社会科学教师虽然对经验批判主义和与之同时产生的哲学流派进行了毁灭性批判，但对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却不予注意。这就导致学生对尼采、胡塞尔、柏格森、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杜威<sup>①</sup>的哲学一无所知，因此一接触到他们的哲学便引起极大的兴趣。大学生在哲学上如此无知，据该述评作者的见解，在10个提问的学生中就有6人甚至没有听过“经验批判主义”这个术语。因此经验批判主义者和其他最新流行的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还是一片完全未被耕耘的思想意识方面的处女地，所以它们的影响力多次得到增强。

学生们习惯于轻而易举地证明自己的理论体系，一遇到稍有经验的争论者或者思想意识方面的对手很容易“心灰意懒”。他们不习惯于争论，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论点提出论证。因此他们会立即几乎站在对方的立场或者给对方留下一个印象，似乎他们是一些对自己是否有理没有把握。

学生们对列宁和马克思的著作不感兴趣。反对强制的心理效应就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籍没有人去翻阅。大家都在读介绍原著的文章，而不读原著。一个大学生在《共青真理报》上号召读《资本论》就引起我的许多朋友的讥笑：这是专家的事，而且我们也读不懂这个《塔木德》<sup>②</sup>。敖德萨市一些大学生把市委图书馆当作学习精密科学最方便的地方——这里从来没有人，非常安静。学校中最受人欢迎的地方是党史或者政治经济学资料室——这里无人妨碍一个人干自己的事情。

---

① 杜威，约·（1859~1952），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提倡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教育学说。主要著作有：《心理学》、《经验和教育》等。

② 塔木德，犹太教经典。

社会科学教师在学生的观点形成中的作用是毫无疑义的，然而他们在学生中间极不得人心。他们大多数人不善于跟学生交往，对追求知识的青年来说他们显得才气平庸。一些工科院校的社会科学教师对最新科学技术动向一无所知，这更使学生感到自己的优势地位。此外，许多教师也不掩饰自己对一些事件与官方不同的态度。这一明显的“二重人格”，使个人在许多问题上都可能有两种意见——可以到处发表的官方意见和许多人都知道的个人意见。教师对激动人心的事件反应往往落后于学生从其他方面所得到的信息。这种实际上与官方报道没有任何不同的解释更降低了教师的威信。

## 2. 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

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党委在学校的作用常常只限于对学生采取这种或那种思想措施和在这时扮演极不招人喜欢的角色的监督人的职能。多数人对党委形成一个印象，就是其成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不可救药的人。高等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人不懂流行音乐，青年热爱的英雄人物的观点，青年对上级同志的要求，其中许多人没有高深的文化知识（这是许多客观原因造成的），这就导致党组织的代表人物与青年一代接触中被大学生认为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和顽固落后分子。这往往是由于他们不会令人信服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委书记在学生眼中成为愚蠢的化身。比方说，敖德萨一所最大的工科学院<sup>①</sup>的前党委书记，叶·亚·萨姆科夫在自己的活动中表现极不明智，以至在学生中流传一则可笑的寓言：“从前一个老头有三个儿子。两个很聪明，第三个叫萨姆科夫”。学生们跟他谈话之后，含意深刻地用手指敲着桌子。正是像萨姆科夫这样的人使学生形成一种思想，就是党的领导

<sup>①</sup> 指敖德萨工学院。该院创建于1918年，60年代有近万名在校学生。

人是从一些愚蠢的人中挑选，对他们不能委以重任。

学生党员在班上不是宣传鼓动者和组织者。他们与一般学生不同之处也许就是比较努力学习，他们对自己的同学在思想意识方面没有影响。绝大多数学生党员是复员的战士，就总的文化程度而言，他们落后于学生的基本群众。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中“党员”的概念就跟智力修养较差联系在一起。

团委会在学生眼中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组织。在所有争论中团委会总是诉诸党委。团委会没有纯思想措施。许多星期日义务劳动和会议仅仅形成这种工作的假象，因为学生对这些活动更加漠不关心。

现在我们以节日游行为例来看看党委会和团委会的作用以及学生对官方措施的态度。

参加游行并不是真正自愿的。节日及其3~4天的休息往往是非城市学生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但是在敖德萨的某些高等学校，比如邮电学院，不参加游行就取消奖学金。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感情搞许多恶作剧是很清楚的。节日游行的实质被阉割掉了。它被看成是与朋友会见和再次与老师喝酒。“五一”节的回忆总是使人想起这个或那个老师喝醉酒的情景。学生们极不乐意接受党委和团委交给的抬标语牌或者党和政府领导人肖像的任务。在节日游行队伍中途逗留时，领导人肖像被堆放到一起，游行结束后找不到愿将这些东西抬回学校的人。述评作者在两年前曾看到过一个可怕的情景——弗·伊·列宁的肖像在雨天里被随便扔到人行道上，有两位游行本想将其抬起，后来又放到原地。在快要通过主席台时，半数的游行“散了”，而剩下的一半极不情愿地响应主席台上喊的口号。但是“内部”口号却有前所未有的效果。

### 3. 官方的宣传

我们影响大学生的主要宣传渠道是报刊、广播、电视。它们的影

响是不相同的。大学生都乐意读报刊，但是体育栏和事件报导最受欢迎。国际事件定期阅读，但轰动因素影响到对事件的选择。例如许多人都读了解放力量军队占领了克希萨的报导，但是以前在这一地区战斗的报导却没有人读。对于国内生活的报导却没有多少兴趣。关于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大量的千篇一律的广告毫无疑问影响到报刊受欢迎的程度。据述评作者的资料，青年中读者比较多和比较喜欢的报纸是《共青团真理报》；许多人认为，《消息报》随着阿朱别依的离去而变质，它对待新闻传播的拖拉疲塌使报纸极不得人心。

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导比我们及时，节目组织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有味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消息。苏联大学生从西方电台获得的信息量不能忽视。官方的态度（停止“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大学生交谈时常常会有这样的话：“现在《美国之音》在广播……”。住在宿舍里的学生生活有所改善，实际上每个房子都有收音机。《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是最受欢迎的电台，因为他们全天广播，随时都可以听到。听听“梵蒂冈之声”和“北京”只是为了几分钟的消遣。在敖德萨“布加勒斯特”电台很受欢迎，因为他几乎全天用长波播送爵士音乐。晶体管收音机的普及通过广播很容易收听到敌对势力的信息，因为大多数学生甚至在约会时都随身携带着“斯皮多拉”或者“子午线”收音机。由于想闹事，他们在公开场合都听西方广播。述评的作者甚至亲眼看到一群大学生怎样在“微风”冷饮咖啡馆逞能，说他们的收音机已调到“美国之音”的波段。

敖德萨的电视实际上对教育大学生没有什么影响。惟一受大学生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小机伶俱乐部”。但是球队的最后几场比赛清楚地表明，这种比赛的害处（回忆一下莫斯科建工学院的家庭作业）是很大的，除去空洞的娱乐外，没有给观众什么。总之，“电

视”已成了无聊的晚上使观众免于寂寞的演出的同义语。但当屏幕上出现某一思想节目的主持人时，电视机就调到另一个台。这在不少程度上是乌克兰语造成的，因为在敖德萨大学生中乌克兰语被认为是“农庄庄员的语言”，使用这种语言便会引起笑声和使人莫明其妙。莫斯科的电视节目看起来还很有趣，但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却使人困惑不解，因为只表现贫民区，游行示威，与警察的冲突等。这一点被认为偏见太大。敖德萨几乎没有为青年准备的节目（指的是具有明显的思想教育倾向的）。播送的方法本身也引起强烈的不满，演说人结结巴巴地宣读那似乎是临时准备的讲稿，没有大学生喜欢的播音员或者评论员，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关于电影、定期刊物和书籍对大学生的影响将在后面述评的各章中论述。

### 第三章 大学生对官方思想意识 机构和宗旨的态度

#### 1. 大学生和党

对大学生来说，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与党格格不入的状况却是共同的。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他们容忍这种党的存在，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现实却完全不同。他们所接触到的周围现实中的共产党员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往往在才智和学识方面还不如一般大学生，真正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很少遇到。从个人升迁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命运也并不令人羡慕，他们在年轻人眼中不是党所特有的形象。因此大学生像对待执政党那样对待共产党，所有的后果都是由此而来。

多数大学生对于为什么没有入党这样的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我想有自己个人的信念和个人的意见”。在他们心目中和他们见到

的党员对发生的事件一定会有两种意见：自己和官方的。因此大学生对于入党以后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良心作出让步这种思想已经习惯了。然而如果你想飞黄腾达，这就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在谈到未来时，一定会有这样的话：“我想过两年申请入党，这是应当的”。学生之间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做“红色的浮子”。显而易见，他们会违背自己的良心，成为毫无巩固的思想基础的党员，随大流的心理就是这种行为的基础。同时青年人也知道，党内也有“平民出身”的人，因此从一开始就应保证自己享有特权的地位。

但是这种思想和看法在高年级大学生身上才有，而多数学生群众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这有许多原因。年轻一代没有目击内战和卫国战争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付出的英雄般的努力。在他们成长的这段时期党的历史就是贬低斯大林，赫鲁晓夫专权，粉碎反党集团，“伟大的十年”，夸夸其谈和争权夺利。关于党的总路线的趣闻在大学生中流传很广，说它弯弯扭扭的，曲曲折折的。不是让自己老师解释和分析我们走过的复杂的道路，而是听从权威的声明和见解。这就引发了我们最关注的那部分大学生中坚定的、同党抵触的情绪。

这种情绪不是一下子出现的。青年人一开始相信对个人崇拜的揭露。然而当他们看到出现了新的崇拜——这次可没有个人，便把因此而造成的错误转移到党的身上。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或者只是当做耳旁风，这更糟。述评作者有机会参与的一切争论和谈话的话题都慢慢地变成国家大事和对党的态度。而一个思想总是占主导地位，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的”。

党内出现并公开存在社会精英统治现象对于党的消极态度的产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莫斯科，政府官员的生活不处在社会舆论的中心。敖德萨是个不很大的（主要部分）的城市，它不同于莫斯



科，那里官方人士的任何行为很快就让人知道了。因此“苏联资产阶级”的存在不可能无声无息地消失。大学生处处都能接触到“苏联资产阶级”——从挂着白色纱幔的小汽车从他身旁疾驰而过去看足球赛，到大学生为参加同学婚礼而来买礼品的商店，可以听到女售货员骄傲地宣布说：“今天西尼查<sup>①</sup>的女儿结婚，他把所有商店的花买光了。不用再去找了”。“州委”这个词在大学生的头脑中跟能买到紧俏商品等等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实只会使大学生对党的看法更加巩固。他们说保卫州委和第一书记的家是很荒唐的——“谁需要他呀？”，他们总是以不友好态度去听党的高级干部的工资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些事实逐渐使大学生有准备地理解西方关于“党蜕化变质”的宣传提纲。从这方面来看，大学生对列宁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

最初虔诚的态度变为极复杂的情结，和权威人士作斗争运动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还在几年以前关于列宁的趣闻还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描写列宁生活的文艺作品极为广泛，这类趣闻在大学生中也很流行，而且他们不仅嘲笑列宁、捷尔任斯基、克鲁普斯卡娅和其他革命活动家，而且嘲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虔敬态度。在大学生中非常流行并且在各种情况下重复的一句话可以作为例子：“不要动老爹，他可能见过列宁”。在《青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资料给大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从这些资料得出结论，列宁有病以后的确在1924年1月前很长时间被解除管理国家的职务。斯莫克图诺夫斯基在影片《在同一个星球上》创造的列宁形象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与述评作者有过接触并属于各种阶层的大学生们都一致说这个形象与官方所描绘的形象大不相同。这表

<sup>①</sup> 西尼查，M.C.（1913～ ），时任苏共敖德萨州委第一书记，1961～1971年为苏共中央委员。

现出了他们希望把列宁看做一个人，而不仅仅是领袖和组织者。有一些学生把列宁看做灵活的在需要时刻能自觉地向人群呼喊几句口号，而他自己则把这当做暂时的口号对待。里德那本多次再版的书<sup>①</sup>对作为革命领导人的列宁的态度的转变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认为列宁个人的魅力已完全消失也是不对的。列宁作为个人，作为行为的标准在青年中还很受欢迎。但在这里列宁的形象用来把公开瞻仰的列宁朴素的居室与大学生有机会见到人数不多的党的干部生活方式进行对比。青年人看到，共产党员既可能是个醉汉，又可能是个淫棍，也可能是个毫无原则的人。青年人固有的过分总结自己那本来很少的社会经验的特性，再结合敖德萨的特殊地位（缺乏像列宁格勒工人阶级的这种传统，犹太人的影响等）就使青年形成一个看法，即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中央委员会里领导成员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青年谈论当前党内的清洗，大家认为这是合理的和完全必要的。这个事实非常有趣，关于清党的谈话中每个大学生都举出许多例子，说明共产党员是一些不配这个崇高称号的人。共产党员这个词本身的名誉在青年中也受到损害，因此在谈话中常常代之以“党的成员”这个圆滑的说法。

最近一个时期与老布尔什维克频繁的会见思想效率是很不好的。老党员中只有不多的人能够与青年找到共同的语言并使他们感兴趣。他们号召青年人要珍惜十月革命的成果，但并没有人响应，因为大学生缺乏比较的标准。此外，发言人强调自己与列宁的亲密关系和参加革命的情况，这一点常常引起他们的怀疑。多数这种会

<sup>①</sup> 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新闻记者。1917年11月俄国彼得格勒爆发武装起义时，他正在彼得格勒。他根据目击，写了一本关于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的书：《震撼世界的10天》。此书曾被译成各种文字，并一再再版。

见都很滑稽，而会见的内容只能用“颓废”这个词来评价。

党的领导人对大学生的演说也无助于党的成功，对青年人来说怎样跟他们谈往往比给他们谈什么更加重要。敖德萨的大学生常接触的领导人中很少有演说才能，大学生们好奇地期待领导人开始演说，但照本宣科且读得结结巴巴使听众的兴趣一落千丈。这种会见只能产生反面的效果，加剧了对党的工作者的藐视。

## 2. 大学生和共青团

很遗憾，共青团并不能给大学生以应有的思想影响和在他们中间享有必要的威信。这有多种原因：不善于探寻新的工作方法，共青团组织的从属地位，它起着学校各组织配角的作用，从工会到系办公室。入学时就是共青团员的大学生，他们已习惯交纳一定数量的团费，在大家借口很忙都不愿参加的会上坐够规定的时间。认为共青团委员会什么事也不作是不对的。它组织旅游，协助业余活动，进行星期六义务劳动。但是它对学生群众思想不会产生影响。一些学校宣传的大量观摩和劳动，很遗憾，实际上原来是贬低许多重要任务的假象。

现代大学生对共青团的态度可用许多例子来加以说明。当述评的作者开始在学校定期佩带团徽时，没有一个人不惊奇地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学校流行的趣闻很好地说明了他们对马特洛索夫<sup>①</sup>和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sup>②</sup>英雄功勋态度的变化。“……薄冰！亚历山

---

① 马特洛索夫，阿·马·（1924～1943），苏联英雄。卫国战争期间，1943年2月23日，在普斯科夫州夺取切尔努什基的战斗中，以自己的身体堵住德军机枪火力点的枪眼，为战友开辟冲锋的道路。牺牲后追授苏联英雄。

② 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卓·阿·（1923～1941），苏联英雄。卫国战争爆发时，她是莫斯科201中学学生，自愿参加游击队，任侦察员，化名“丹娘”。在莫斯科州彼德里谢沃村执行任务时被捕，被德军绞死。牺牲后追授苏联英雄。

大·马特洛索夫说，然后就扑在（敌人的）炮眼上”。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的变化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个组织及其活动的存在与否一般说来知道得很少。

共青团试图恢复其在思想上对青年的影响的一个尝试就是组织大学生建筑队，今年是它成立的十周年。但是这个建筑队一开始所蕴藏的那股思想上的劲头如今已荡然无存。

共青团工作并不令人羡慕，它不像党的工作可以飞黄腾达。大学生在谈到从事共青团工作的人未来的命运时，认为他们很不幸，永远是个跑腿的。

只有当大学生想出国时，才求助于共青团。这种情况下他来到共青团委员会。“青年旅行社”的工作在大学生中被认为是收益很好的，因为聪明人在这里可以额外赚点钱并能开到出国许可证。

### 3. 敖德萨大学生和敖德萨的乌克兰化

即使非城市出身的大学生，在敖德萨住上五年，便会充满“敖德萨情调”。这促使大学生的基本群众对敖德萨乌克兰化持否定的态度。独特的口音，犹太人占优势，这个与乌克兰没有关系的城市辉煌的历史，在青年的眼中，试图让其乌克兰化是徒劳的和不必要的。在大学生的谈话中经常可以听到他们说把克里米亚和……敖德萨转交给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个错误。大学生对基辅这个城市和民族中心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它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盘踞着。有趣的是某些被同化了的乌克兰人也同意这种观点。教学要用乌克兰语的传闻在一些高校引起真正的混乱，而且一些教师也掺合进来。至今还有一些大学生试图开玩笑地用乌克兰语来表达欧姆定律。

青年对乌克兰语和乌克兰文化的这种态度在中学已经形成。讲俄语的敖德萨认为乌克兰语不需要，对说必须研究乌克兰文化的人

耸一耸肩作为回答：“文化？巴甫洛·格里戈利耶维奇·狄青纳<sup>①</sup> 一个人像一根柱子站在田野里！这就是所谓的全部文化”。

敖德萨大学生关于外喀尔巴阡山和利沃夫地区的意见从这个观点出发是很有代表性的。

“那里只有一些班杰拉<sup>②</sup> 分子！只能说乌克兰语，每个人怀里都有一支半截枪”。

与一些原则上只讲乌克兰语的人的接触引起一些大学生轻微的愤怒。

整体上他们认为敖德萨是一座国际化的、某种类似自由的城市，他们认为试图把它变成一个乌克兰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吃乌克兰面包和脂油”这种类型的论点引起他们特别激烈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文静的大学生也会粗暴地打断对方，说“要不是我们，您和您的乌克兰不知在哪里！”

#### 4. 对外国留学生的态度

跟外国留学生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和一起学习给大学生有趣的结论提供丰富的资料。过一段时间以后，外国留学生便说他在这里所受的教育并不像他们读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许多外国留学生，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认为我们的大学生不文明和知识不足，他们在谈话中甚至也不隐讳这一点。在敖德萨工学院学习期间述评作者有机会跟匈牙利学生进行过不少辩论，用事实证明

---

① 狄青纳，巴·格·（1891～1967），乌克兰诗人，诗作主要有：《党引导我们前进》（1934）、《共产主义远景在望》（1961）等歌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被选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在这里，敖德萨的青年以不屑的口吻讽喻乌克兰没有文化。

② 班杰拉，C.A.（1908～1959），乌克兰人。1943～1947年在苏联西乌克兰领导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该组织的成员被称为“班杰拉分子”。“每个人怀里都有一枝半截枪”在这里是隐喻该组织是半恐怖组织。

情况相反。

对各个民族的大学生要区别对待是毫无疑义的。对黑人和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最不好，藐视地称他们为“黑鬼”。在大学生中流传说他们残忍粗暴、邈里邈遑、性欲强烈。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什么地方如何毒打或者好好地教训了黑人。大学生对来我国学习的黑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加区分，他们以嘲讽的口气把他们叫做“被压迫者”。一些大学生对种族主义组织持赞赏态度这一点由此看得很清楚。“我会把这些黑母狗吊死”——这个愿望流传很广。在公共场所一出现黑人就会引起不良的反应。当梅毒在敖德萨传染期间，这种社会情绪表现得特别明显，大家一致认为、梅毒是黑人带来的。对常常与黑人相会的姑娘的态度比对最低级的妓女还坏。

对越南人的态度不错。他们以勤劳和顽强而受到尊敬。对东德人的态度也很好。对匈牙利人不大喜欢。对保加利亚人的态度最为亲切。虽然如此，大学生总能感到外国留学生的前途与自己前途的差别，这更加使他们相信西方在这方面的宣传是正确的。

## 第四章 大学生和当代一些问题

### 1. 大学生和西方

在向全世界船只和旅游者开放的敖德萨，每天都在对两个世界纯粹的外在东西进行比较。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还不很习惯分析的大学生可以不断亲眼看到“来自彼岸”的人并得出仓促的结论。他们接受西方生活的纯粹表面的东西，对许多大学生来说“斯泰茨型”是一流的标准。敖德萨人一般说来喜欢物品，尽量穿得一身簇新，因此许多大学生闲时常去逛“旧货市场”、交易所等。西方对绝大多数人的影响是直接的，通过物品、汽车和商标纸。外汇商店和酒

吧在不小程度上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跟西方比较是“二流的”，但绝大多数人是不许进入这些地方。

资本主义原则在敖德萨也有一定的土壤。一些投机商人、善于钻营的生意人的投机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除掉幸灾乐祸，常使青年产生一种思想，这种人的业务上的素质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稍微一遇上我们某些部门或单位的工作不明确，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见：“主人是不会允许这样做的”。许多人每遇到劣质产品都满怀希望地谈到竞争原则。在专门讨论向新的计划体制过渡问题的九月全会前夕夸张渲染地传播在轻工业和服务行业中要恢复私人企业家的活动的谣言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即将发生的变化到处都能得到赞许的反应。

虽然青年喜欢资本主义国家的言论“自由”，但纯思想范畴的东西还是接受得较差。有时可以听到一些简直恬不知耻的人的声明：“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人民，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我们介绍真实情况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用五百万失业人数的论据只能引人发笑：“他们的失业人员比我们的工程师的生活还好”。而且一般青年对失业问题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许多人认为，我们需要失业者，以便工作者能时刻感到自己在受到威胁。这种“理论家”认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有工作的人。

大学生中任何人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它渐渐明显地深入到大学生的思想中去。这一点在许多方面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对时尚的改变（也许是跳舞，也许是音乐，也许是穿衣）的典型反应——先是激烈的批评，长时间的了解并习惯，最后甚至超过榜样的盲目模仿。但是采用时髦的风气正赶上批判时期，因此内心想争取什么的青年便为了……发型、胡子、裤子和流行的舞蹈而斗争。并且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要保卫来自大洋彼岸的某些东西，因此它对他们显得非常珍贵。

西方理想深入青年意识中的第二条途径就是对英雄的崇拜。现代的男女青年都需要英雄，而我们的电影艺术给他们展现的或者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人物，或者是一些灰溜溜的和闷闷不乐的人物，他们不能作为模仿的榜样。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影片中的主人公，他们孔武有力，漂亮潇洒，解决一切疑难问题靠拳头。有一半男生在看了《七杰》之后走起路来便学着克里斯的步态。青少年喜欢孔武有力，因此来自西方并在我国一开始受到批判的健美操取得了空前的规模。由于崇拜力量，某些人对法西斯主义的观点非常感兴趣。不仅同意法西斯的罪过（消灭犹太人），而且赞赏他们的外表，列队操练、军人步伐、身材魁梧的雅利安人。述评的作者在一些场合有机会听到许多人的愿望：唉，“什玛谢尔”能到这里来多好！

在西方所有艺术作品中最有积极意义的是文学。青年们认为，西方作家写的东西比我们更好、更有趣。而且他们的作品选题广泛。现在最驰名的作家当属布雷德伯里<sup>①</sup>，而且一般说来科幻作品很受欢迎。我国报刊人为地煽起的对卡夫卡的兴趣消沉了。读过他的作品的大多数读者对他反应冷淡。对他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兴趣却方兴未艾，其中某些引文和成语很久以前就不时在我国报刊出现。

西方的歌手和爵士音乐家也很受欢迎。至今一些摇滚乐团的声望还有增无减，并达到最大程度。来自官方的某些“压制”更加强了新的协会出现的趋势。

## 2. 大学生和捷克事件

对捷克发生的事件有两种态度，一方面，对“养活了这么多年”的“兄弟”的忘恩负义表示愤怒。这一部分学生中有的人参加

---

<sup>①</sup> 布雷德伯里，雷·（1920～），美国当代科幻小说作家。



过匈牙利事件，他们要求采取坚决措施，诉诸武力，但是这部人为数不多。

其余的大学生，一般说来喜欢一切不愉快的事和唱反调，以善意的好奇心观看捷克发生的事件。他们甚至还意识不到这一切会引起什么后果。已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的捷克大学生使他们敬仰。某些人甚至分析（实际，这只是假设）捷克的经验在我国重演的可能性。一位三年级大学生在跟述评作者谈话时说：“有意思，我们这里也可能发生这种事件吧？我自己也会参加的”。

建立反对党的问题引起了特别大的兴趣。大学生很喜欢“反对派”这个词，而且对于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来说建立反对党是解决他们得出的奇谈怪论的办法：“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因此他们以好奇的心理观察捷克事件。苏维埃报刊所引用的资料他们认为对于担心什么并无恶意，而官方的评论过分激烈。

大学生担心中国事态的发展。大学生认为以毛为首的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迟早都会发动战争。在一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在中国没有造出氢弹以前，应先给它扔一个。

在青年谈论的各种政治话题中对中国的惊慌和担心占主导地位。

波兰事件由于时间很短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有时还流传波兰反犹太主义清党的谣言，俄罗斯大学生和乌克兰学生对此表示欢迎。

对古巴的态度极为恶劣。他们跟我们的海员接触中，听到海员给他们讲古巴人对他们如何蛮横无理，这一点引起青年的愤怒。顺便说说，援助不发达国家的政策青年人并不拥护。大家认为应当养活的是本国人民，而不是“忘恩负义的兄弟”。

### 3. 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

这个问题对敖德萨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合法的”的犹太人

占很大的百分比，伪装起来但仍然信仰本民族的基本原则的犹太人的数量更大，他们对敖德萨每个大学生的意识都打上了烙印。犹太民族的基本特征（唯物主义、不惜任何代价出人头地、无孔不入、在紧急关头互相帮助）对年轻的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不小的影响。

与犹太人每日每时的接触，一方面激起大学生对这个厚颜无耻和毫无原则的民族的强烈的恶感，但另一方面却是许多大学生接受犹太人的人生哲学。正是由此产生述评前几章中所引用的恬不知耻的关于党和入党必要性的言论。大学生不知不觉地开始从物质价值观点出发来理解周围世界的一切现象，而这一点使大学生无法免受西方宣传中一些道理的影响。

犹太人很喜欢支持苏联那残酷的反犹太主义的传奇故事。因为利用这些故事投机对他们有利。许多游手好闲、无能之辈，在跟作者的谈话中认为自己的失败是由于反犹太主义，但是对于大学生只能谈防御性的反犹太主义，因为在学生班里可以感到非常强烈的犹太人的淫威。有竞争能力、有钻研精神的犹太人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排挤掉，从而在他们那里形成明显的反犹太主义情绪。有时矛盾激化，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自己小圈子里说：“希特勒还有些事没来得及做完”。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还不得不克制自己的情绪和忍受“犹太人的权势”。

与此有关的对1967年6月6日在敖德萨流传的关于在郊区蹂躏犹太人的暴行的谣言的反应是很有趣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由于犹太人节日感到败兴而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并表示赞成这种行动。以色列的侵略大大提高了大学生中的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更加重了民族摩擦。大量亲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趣闻和犹太人的欢欣鼓舞引起一股反犹太主义情绪。

青年缺乏渊博的知识，也不善于总结以适当的回答来回敬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说的在伟人中犹太人占很大的百分比。犹太复国主义

者在这种辩论中的主要论据就是马克思。正是犹太复国主义周围的人很快就接受列宁出身犹太人的传闻。纯粹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不为大学生的基本群众所接受。但犹太人很聪明，他们偷偷地把“犹太人”的标签换为“敖德萨”的标签。这种偷换就促使犹太人的东西广泛地深入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每到一个城市游览，便跳“敖德萨”舞“7~40”，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会怀疑这是犹太人的“福乐列霍斯”舞。别尼亚·克里克<sup>①</sup>成为敖德萨的英雄，伊里亚·法因季别尔格和伊萨克·巴别尔<sup>②</sup>成了它的化身。伊万·米基坚科<sup>③</sup>和弗拉基米尔·索秀拉<sup>④</sup>也是从敖德萨起步，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已没有人提起。像“小机伶俱乐部”这样受人欢迎的节目也成了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源泉——最欢乐和机伶的是利夫希茨，哈伊特，普利赞特。

然而在犹太人之间，犹太复国主义情绪是一种暂时现象。犹太人一谈起官方残酷的方针犹如谈到自己的未来一样，胆战心惊。这个方针促使在很多方面消除犹太人的影响。这几乎是非犹太人大学生一致的意见。

## 第五章 当代大学生的特点

### 1. 非政治倾向

上述一些因素和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即大学生一个最具代表性

---

① 别尼亚·克里克，传说中的敖德萨英雄。

② 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敖德萨出生的作家。

③ 伊凡·米基坚科（1897~1937），乌克兰作家。

④ 索季拉，弗·尼·（1898~1965），乌克兰诗人，以创作乌克兰社会主义生活和保卫和平为题材的长诗著称，曾于1948年获苏联国家奖。

的社会特点就是非政治倾向。这种倾向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个是与述评作者谈话的人形成的：“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第二个是加里奇<sup>①</sup>的歌曲，以及一些非官方出版的作品等。

大学生世界观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非阶级性。在一切与敌对思想接触中可以采用任何标准——善与恶的标准，好与坏的标准——除掉阶级标准。在罢工中他看到的只是经济因素，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因司空见惯而视而不见。他们在自己的理论阐述中只从地理、种族、民族的差别出发，就是没有阶级的差别。因而科尔热文的诗在大学生中流传很广。许多人能够步其后尘：

我可以胡诌几行打油诗，但谁也不会叫我们去到参议院广场。

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里的诉讼案<sup>②</sup>有关的社会情绪的激荡只是斗争的表面现象。所有发言人和辩护人都很清楚，无论什么组织和坚决的抗议都不能谈。因此在大学生中——指的是思想上对自己有所认识的那一部分——生不逢时的思想情绪更加坚定。和述评作者谈话的许多人都谈到不能充分献身于工作和家庭，谈到社会交往的必要性。但他们又不愿在官方定的框框中活动，而别的道路又看不到。由此只能有两个出路——寄希望于党的演进，聪明的领

① 加里奇，A.A. (1918~1977)，原姓金斯堡，剧作家、诗人。60年代以非官方的艺术家出现，演唱拥有广泛的群众。

② 西尼亚夫斯基，A.Д. (1925~ )，1973年移居国外。达尼埃里 Ю.М (1925~1988)。他们都是作家，曾为创作自由和出国自由而呼喊。1966年受到审讯，是自赫鲁晓夫“解冻”以后第一次受审讯的作家。

领导人掌权等，或者像科尔热文的流行歌曲中所唱的结局：

在我们这艰难的时代，  
在我们这悲哀的时代，  
在我们这糟糕的时代  
一个人需要妻子  
需要房子，需要园子，  
也需要朋友那不说话的眼神，  
也许到那时候他能等到  
完全不同的时代。

青年中专心致志搞科学的思想很风行，因为科学不管政治危机，可以把他们的生活填得满满的。然而能经得住这条道路的人是很少的，通常过一段时间他们在色情和酗酒这两种麻醉剂的考验中排除了已产生的矛盾。

## 2. 大学生和性欲

性欲是构成大学生社会情绪的一个基本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与官方意见相左，官方认为此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生活方式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像在淫欲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宴席上的谈话中不时提到西方妇女，西方的爱情自由等等。西方妇女跟“我们肥胖而拙笨的女人”相反，很注意修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大学生的处境很窘迫——外地人没有住所，社团组织不断地到宿舍来搜寻一对对恋人，敖德萨人不断受到父母的监督——这就使人产生必须要有妓院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是以空前顽强的精神形成的。

青年并不把家庭看成社会的一个网眼，只是认为它是为满足性

要求的人的联合体，这一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家庭关系中国家也遭到激烈的批评，因为家庭生活的一切问题都要得到物质保障，而这对于年轻人家庭不断增长的需要显然是不够的。对生孩子极为冷淡，尽可能地晚育。在避孕手段这个问题上国家的态度也遭到激烈的批评。

多数人对待性欲这个问题的态度简单，在任何环境下都进行交媾，美学的标准完全没有了。常常有集体聚会，这时在一个房间里就有好几对。因此“交换”女人或把女人从一个男人手中“转手交给”另一个男人的情况很普遍。性生活反常的百分比急剧增长，这证明私生活过度和缺乏精神方面的东西，严重的花柳病并不很流行，但许多大学生都患淋病。在这种情况下就医都是非正式的。

### 3. 大学生和酗酒

酗酒已成为敖德萨大学生真正的灾祸。不管是朋友，还是素不相识的人，见面谈话之后，大学生都要数一数自己口袋里的零钱，跟他一起上小酒馆。这种小店在我们城市里到处都是，这就是用不长时间花少量的钱可以畅饮的先决条件。

大学生实际上每天都饮酒。课前、课后，甚至在课间休息时饮酒，都成了良好风度的标志。这里包括从不推辞的“连环套”——今天你请我喝酒，明天我请你喝酒等等。宿舍里每天都能找到理由饮酒。大多数外地大学生都有农村自制的葡萄酒，因此宿舍总有酒和家酿酒。酗酒成了一种普遍的消遣。因为除掉听课和做实验，大学生便无事可作。到剧院、音乐厅等地方去，在敖德萨需要穿很好的衣服，电影片都是经过审查了的，因此只能玩朴烈费兰斯纸牌游戏（也就是说在玩时和玩后喝酒）或者干脆去喝酒。两杯酒下肚便拿起吉他（在每层楼和每一伙人中都有流浪歌手），

一个维索茨基<sup>①</sup>和加里奇的歌曲的音乐会开始了，有时也唱“自制品”。然后谈话慢慢转入政治话题。重复了上百次的事实和论据成了酗酒的那伙人精神生活的表面现象。但是有时喝醉以后，用床单把自己裹起来，像披着外衣一样，来到十月革命广场宣传尼采哲学。另一伙大学生爬上国家银行的楼顶，高喊“光荣属于苏联！”的口号。事态一般限于酒后斗殴、互相亲吻和打碎电灯。

有趣的是大学生在喝醉的情况下很容易与素不相干的人意见一致，以醉态的狂热接受他们的思想纲领，并愿意帮助任何人实现其行动计划——“要知道他是这样好的小伙子！”为了饮酒，大学生去干一些难以忍受的事——为了“伦敦酒店”的晚会他可以卖血或者去长跑等等。酗酒现象越来越普遍。述评作者考上大学时，饮酒的基本上是三年级以上的大学生，现在从学习的第一学期就开始饮酒了。

---

<sup>①</sup> 维索茨基，B.C.（1938～1980），电影和戏剧演员，以流行歌曲通俗演唱者在青年中走红。

№03362

## 科兹洛夫斯基就创办音乐学校问题

### 致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信

(1969 年 5 月 28 日)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在从事歌剧创作活动的许多年来，我到过我国许多新建筑工地——克拉玛托尔斯克、第聂伯水电站、新西伯利亚、斯大林格勒、明斯克、乌拉尔，以及许许多多别的地方。

我国经常举行为各种慈善事业募捐的活动，我总是极其热情真诚地参加。例如，根据我国驻锡兰大使馆的请求，我演出的捐款转给了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以及民族剧院工地；佛罗伦萨遭受水灾以后，我曾为意大利演唱；也曾为遭受自然灾害的各个国家演出；我也多次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失去父母的我们苏联儿童演出；以及为各个学校募捐——总之，过去和现在一直参加了许多此类义演活动。

在确认参加义演活动的许多证明信中，也包括一封约·维·斯大林的信，其中说明我们募集的 160 万卢布转入前方军人子女救济基金。

由我主持的募捐演出所获款额总数在 300 万卢布以上。

我已经演唱了 50 年。但我一直感到欠着人们的情，因此为自己至今仍能劳动而深感幸福。

但是，我最大的歉疚则是我欠下我同村乡亲父老的情，他们拥有许多具有音乐天赋的孩子。



这是基辅州瓦西里科夫斯克区马里扬诺夫卡村。我希望在这个村子里创办一所音乐寄宿学校，附近许多其他村庄有才能的孩子也可以来这所学校学习。

由于把这件事看做自己一生的理想，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向苏联文化部、苏联财政部及其他部门请求准许把我此类演出的捐款用于建设一所音乐学校和我出生村庄的福利。

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过几个月我就要满 70 岁了。

由于这些年来我既没有获准实现我的请求，也没有得悉拒绝的答复，我决定向您提出请求，盼望能够解决这个对我十分重要的问题。

伊·科兹洛夫斯基

1969 年 5 月 28 日

№03363

## 库哈尔斯基就不支持科兹洛夫斯基的 请求事呈苏共中央文化部的报告

(1969 年 8、9 月)

苏共中央文化部：

关于苏联人民演员伊·科兹洛夫斯基写信要求在他的故乡基辅州格列别科夫斯克区马里扬诺夫卡村创办音乐学校之事，苏联文化部通报如下：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和乌克兰党中央文化部的意见，在近 2~3 年内创办这样的学校是不适宜的。

马里扬诺夫卡村距区中心 21 公里，有居民 728 户。这个村的普通中学一至七年级共有学生 208 人。

在格列比翁卡村的区儿童音乐学校学习的只有 63 名学生。

考虑到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恳切请求，基辅州文化局在 1966~1968 年期间曾试图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开办格列别科夫斯克音乐学校的分校，但未能成功，因为只送来 4~5 份入学申请。因此，目前为了使居住在马里扬诺夫卡村的儿童能接触音乐，决定在俱乐部组织一些学习演奏钢琴、弦乐器和民间乐器的艺术小组。

苏联文化部同意共和国有关部门的建议。

苏联文化部副部长 库哈尔斯基

№03364

## 里亚博夫就不支持科兹洛夫斯基的 请求事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10月16日）

苏共中央：

苏联财政部再次研究了苏联人民演员伊·谢·科兹洛夫斯基提出的在他的故乡基辅州格列别科夫斯克区马里扬诺夫卡村创办音乐学校的问题，现将情况通报如下。

根据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文化部提供的材料，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只有少量住户，近几年内不会有足够的学生在这样一所学校学习。

此外，还应考虑到，伊·谢·科兹洛夫斯基关于将他在音乐会上获得的捐款转拨去用于维持上述学校的做法是与国家音乐会组织现行的分配制度相矛盾的，同时也会给其他音乐和戏剧活动家造成先例，对此苏联财政部不能同意。

苏联财政部副部长 里亚博夫

1969年10月16日

№03365

## 库哈尔斯基就不能接受科兹洛夫斯基的 请求事呈苏共中央文化部的报告

(1969年10月20日)

苏共中央文化部：

关于苏联人民演员伊·谢·科兹洛夫斯基写信要求在他故乡基辅州马里扬诺夫卡村开办音乐寄宿学校一事，苏联文化部通报如下。

伊·谢·科兹洛夫斯基一些年来请求允许举行所谓慈善义演节目和音乐会演出，并把所募得的捐款用于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建立音乐寄宿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

苏联文化部认为不可能支持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建议。

这个建议指的是，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建立文化设施不仅使用原先演出的音乐会和节目中应分配给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酬金，而且还要把众所周知应进入国家财政预算的所得也全部使用进去。这样，伊·谢·科兹洛夫斯基以慈善事业为名实际上建议使用国家的相当钱财而不是他私人钱财在他的家乡修建文化设施。

接受伊·谢·科兹洛夫斯基这一项目前并无先例的做法，会使他在其他一些对我国艺术事业建立有同样功绩也有权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苏联文化活动家中处于特殊地位。必须指出，一些著名的艺术家中谁也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近几年来，集体农庄的物质状况得到很大改善。由于文化基金年复一年地增长，各地集体农庄都在大量进行文化建设。在此种条件下，并无必要再向个别人进行慈善性募捐。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文化部和共和国文化部也反对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创办专门的音乐寄宿学校，它们认为这个建议并不是现实可行的。考虑到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恳切要求，基辅州文化局在1966~1968年期间曾试验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开办格列别科夫斯克区音乐学校分部，但因生源不足而未能成功。为了让居住在马里扬诺夫卡村的儿童能逐渐接触音乐，决定在集体农庄俱乐部组织学习演奏钢琴、弦乐器和民族乐器的艺术小组。

苏联文化部副部长 库哈尔斯基

№03366

## 绍罗就科兹洛夫斯基的 信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12月30日)

苏共中央：

关于伊·谢·科兹洛夫斯基同志的信

苏共中央文化部研究了苏联人民演员伊·谢·科兹洛夫斯基关于请求协助在他家乡基辅州格列别科夫斯克区马里扬诺夫卡村建造儿童音乐学校的信。

苏联文化部（库哈尔斯基同志）和苏联财政部（里亚博夫同志）通报说，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建议与现行的国家音乐会组织的收入分配制度相抵触，因为实际上指的转用于这所学校建设的款项不仅是他私人的酬金，而且也将包括众所周知应进入国家预算的音乐会募捐收入的其余部分。

接受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建议会给对我国艺术事业建立了同样重大功绩的其他的苏联文化活动家开创一个先例。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文化部和共和国文化部也不同意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建立音乐学校。基辅州文化局考虑到伊·谢·科兹洛夫斯基的恳切要求，曾几次试图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安排建立区音乐学校分部的工作，但由于生源不足均未获成功。据此，目前决定在乡村俱乐部开办儿童音乐小组（钢琴、弦乐器、民族乐器）。

苏共中央文化部认为，似应同意苏联文化部、苏联财政部的意

见，目前不考虑在马里扬诺夫卡村建造儿童音乐学校的问题。

请准许将此告知伊·谢·科兹洛夫斯基同志。

苏联文化部（库哈尔斯基同志）和苏联财政部（里亚博夫同志）的答复意见附后。<sup>①</sup>

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 绍罗

1969年12月30日

---

① 参见本卷№03363、№03365文件。

№03156

##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斯大林诞生 90 周年 报刊如何发表文章问题的会议记录

(1969 年 12 月 17 日)

绝密

仅一份工作记录

今年 12 月 17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休会期间，讨论了约·维·斯大林诞辰 90 周年报刊发表文章的问题。

参加讨论的有：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佩尔谢、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格里申、库纳耶夫、马谢罗夫、拉希多夫、乌斯季诺夫、谢尔比茨基、卡图谢夫、库拉科夫、波诺马廖夫、索洛缅采夫等同志。

勃列日涅夫：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大家知道，文章的第一稿<sup>①</sup>已经分发了。肯定大家都已经看到，也许都已经阅读了。我们要在原则上达成一致，我们发表不发表文章，其次，对这篇文章的内容也要商量好。有什么意见？

苏斯洛夫：我认为，全国一般说都在期待着这样一篇文章，更

---

<sup>①</sup> 1969 年 12 月 1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斯大林诞生 90 周年起草了一篇文章，打印分发给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经讨论后，压缩了一大半，最终刊于《真理报》，作为苏共中央的官方口径。



不用说格鲁吉亚特别迫不及待了。看来，我们不应当大规模地庆祝90周年，而且除了发表文章以外也不必安排其他活动。不过发表文章还是需要的，何况，大家记得，在80周年时或者之后不久（我不记得了），《真理报》刊发了一篇社论，于是，大家都安静了下来，一切都各就各位了。

我以为，现在完全沉默是不行的。人们将会形成不正确的看法，说中央怕公开说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按照我的观点，目前分发的稿子总的说来是合适的。其中讲到斯大林所做的有益的工作，也讲了他的错误。提法与苏共中央的相关决议是一致的。如果有些地方需要根据这个决议再加点什么，还要再想一想。我想，所有人，其中也包括刚才有同志提到的知识分子，都会正确理解我们。索尔仁尼琴之流可能会得出不正确的认识，而知识分子中健康的那部分人（即大部分人）会正确理解的。我们不必为斯大林洗刷。现在没有任何必要这样做。但是，客观据实地，根据已为众所周知的中央决议来讲一讲，还是需要的。

波德戈尔内：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或者至少大部分人，参加了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这两次代表大会上发了言，谈论并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关于这一点，正如我们所记得的，苏斯洛夫同志在他的发言中也讲到了。我不认为，应当怎样地庆祝斯大林诞辰90周年。如果要在报纸发表文章的话，那就要写有什么人和多少人死于他之手。照我看来，不应当这样做，但不这样做又不对。现在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谁也没有提出这个请求。大部分知识分子不会理解我们。因此，我以为，除了危害，这篇文章不会带来任何东西。而如果要写的话，那就一定要严格地和原先通过和公布的决议相一致。

谢列斯特：我可能要说出一点同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相反的

观点，而且我要直截了当地说。

我以为，文章是需要的，理由有这样一些。第一，这是我们的内部问题。我们要决定：发表不发表文章。很久以来就有人在各种会议上提出问题，也有写便函来的：90周年是否准备庆祝，是否将要在报纸上发表什么。因此，我以为应当发表一篇不长的，正确的文章，既讲优点，又讲缺点。而我们的大部分人，也包括知识分子，是会正确理解我们的；特别是因为近几年来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在回忆录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写到斯大林，其中有些地方是与原先通过的中央的决议不相一致的。我以为，我们应当以主要方面，原则方面作为基点。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应当是历史的真实，而不是让历史适应于什么事或什么人。斯大林有过错误，就讲错误。有过正确的方面，看来谁也不反对这一点，那就讲历史上事实是怎样的。不应当粉饰历史，也不应当歪曲历史。

波德戈尔内：既然讲历史，那就应当写他消灭了多少人。

谢列斯特：问题不在于要点出数字，但应当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说他有过错误。至于战争？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我想，应当发表文章。至于对稿子还需要进一步加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马祖罗夫：90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依我看应当发表文章。我们的出发点应当是，看怎样做对我们更有利。我以为，发表文章比对这一事实避而不谈要更为有利。文章不要很长，但要正确有据。我们的责任确实在于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当然，也可能会有些麻烦，但看来这主要涉及国外的活动家，而不涉及我们内部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人。我们的人都会正确理解的。如果我们不写明历史事实，怎么又能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呢？

我以为，不仅如此，还要考虑在斯大林墓上立一座胸像<sup>①</sup>。我告诉你们，当我和胡萨克同志拜谒陵墓期间走近斯大林墓时，他对这一事实作何反应。他问，为什么没有胸像？我对他说，我们起先没有安放，后来也就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说，在我看来这样做不正确。应当安放一座胸像。这就是无疑曾经被斯大林伤害过的胡萨克同志的观点。而且，依我看，任何一个健康的人都会这样考虑的。

基里连科：现在谈的不是要为斯大林平反或维护他免受别人的攻击。人们没有任何理由为斯大林洗刷和废除原先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特别是，不能废除我们在1956年中央决议中写的内容，不应当现在就改变这个决议。所以，我以为没有必要发表文章。但是，情绪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很难讲，哪一个人“赞成”，多少人“赞成”和多少人“反对”。但是，有来信，我们还有格鲁吉亚，不能把它抛开不管。因此，也许应当发表一篇短文，但应严格与1956年苏共中央的决议相符合。否则，这篇文章会被我们的敌人利用，会给他们提供诽谤我们的材料。

总之，我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党会为这样的文章鼓掌。我们应当想一想。

佩尔谢：我认为，我们从更广泛的层面上认真地谈论斯大林的时间确实还没有到来。事实上，他是给我们带来许多危害，而且这种痛苦现在仍然能够感觉到。这一代人在我国仍然活着。90周年，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什么新的事情。也许，不必发表大块文章。也许，只要发表一篇短评即可。

格里申：莫斯科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没有人向我们提出这个

---

<sup>①</sup> 斯大林的半身像由雕塑家托姆斯基完成，1970年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墙下的斯大林墓上。

问题，也没有人关心该如何庆祝斯大林诞辰90周年，等等。但在同党组织领导人私下谈话时，人们问起，也甚至提出过建议说，发表一篇不长的文章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使问题得到平衡。确实，近几年来写出的许多回忆录与中央原先通过的决议不相符合。不久前，布琼尼<sup>①</sup>、扎哈罗夫<sup>②</sup>和其他人写了回忆文章。因此，如果有这样一篇文章，它可以使这些事实得到平衡。当然，文章要同苏共中央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相一致，不过发表这样一篇文章，依我看是有必要的。

谢列平：我赞成发表这样的文章。这样做可以表示我们态度明朗，前后一致。而且，大家记得，当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庆祝战胜法西斯德国20周年的报告中提到斯大林时获得了什么样的欢迎。因此，我以为这样做在人民中会受到很好的反应。我赞成发表文章。可以让同志们再加加工，但应当在报纸上发表。

柯西金：不仅应当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要从总体上解决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当然，我们所有人的目的只有一个——要使我们的决定或我们将要公布的材料符合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十分有利的形势之下。我们不受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事物的约束，但不能歪曲历史。确实必须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来阐述它。当然，即使我们不发表文章，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我认为，我们如果发表文章，好处会更多些。何况，正如同志们刚才正确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关于斯大林写得太多了——如朱可夫和其他人等。这样，人们看了，拿来同中央的决议相比较，而我们什么正式的材料也不在报刊上发表。于是，会产生各

① 布琼尼，谢·米·（1883～1973），苏联第一批授衔的元帅（1935）之一，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② 扎哈罗夫，马·瓦·（1898～1972），1959年授苏联元帅军衔，时任苏军总参谋长。

种不同的想法，进行各种不同的议论，作出各种不同的结论。而这样的文章可以立即使一切各就其位。确实，应当按照中央决议的精神发表这篇文章，要再进行加工，指出他的优点和不足之处。应当表明，党过去和现在都谴责他的错误，但也指出他的长处。我想，这样做我们会更为有利。

乌斯季诺夫：我赞成发表文章。在我看来，散发的文章初稿很好。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正确的基础。当然，如果我们不发表文章，也不会发生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如果发表文章，对我们更加有利。

波诺马廖夫：发表任何一种关于斯大林的言论，特别是这篇文章，都要从党的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的观点来考虑。大家记得，在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对此有过许多议论，也有过种种骚乱。是哪一种情况要更好呢，是我们现在重新掀起这类骚乱，还是让形势像现在这样，即安安静静？要知道在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我们关于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而当时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击溃希特勒德国20周年时讲了一句话，而现在建议发表文章。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如果要写，那应当把正反两方面都加以阐明。但是否一定要写文章，我不知道。例如，哥穆尔卡、卡达尔两位同志会怎么说？总之，会产生种种问题。历史上的斯大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对待他必须谨慎从事。

安德罗波夫：我赞同发表文章。毫无疑问，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发表文章，绝不会造成任何危害。当然，如果我们不发表，也不会有什么。但是，同志们，这个问题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因而我们应当作出决定，而不必看国外怎么样。我们有中央的决议，它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就应当根据中央的这个决议来发表文章。至于国外的看法，我可以告诉大家，譬如，卡达尔在和我谈话时说：为什么你们不把伏尔加格勒改回为斯大林格勒？这毕竟是历

史上的名称。这就是卡达尔的观点。我认为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

沃罗诺夫：我赞成发表文章。如果我们不发表文章，会有很大的损失。

索洛缅采夫：应当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但必须符合1956年的苏共中央决议。应当考虑到，现在新一代年轻人已经长成，而他们对斯大林除了个人崇拜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还是应当给他们提供一种客观的评价。而我们的书刊把这个问题搞乱了。因此，对于教育青年需要有这样的文章。

我认为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否则会出现不利于我们的议论，人们会说，他们害怕从原则上谈论这件事。

卡皮托诺夫：前来参加例会和中央全会的许多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们到我那里去，他们没有直接提到文章的事，但许多人用不同方式多少都接触到这个问题。其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据我感到，都倾向于在斯大林诞辰90周年时能提供些什么材料。事实确实如此，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看来对待历史确实要小心谨慎和仔细认真。当然，文章必须要按照1956年的中央决议的精神和今天我们交换意见的精神来撰写。

马谢罗夫：我完全毫不含糊和绝无犹豫地认为，毫无疑问必须按照刚才同志们所讲的精神来写这篇文章。人民会很好地加以接受。不发表文章会引发许多各种各样莫明其妙的问题。

库纳耶夫：我们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提出：我们是否要庆祝90周年，以及如何庆祝。我在莫斯科听说，不久前召开的意识形态工作者会议的非正式场合有过这类议论。据我看，如果我们能发表一篇正确的，很好的文章，还是有益处的。

谢尔比茨基：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是不行的。就举教科书为例吧。在中小学里就这个问题是怎样讲授的呢？是怎样向青年们解释的呢？除了个人崇拜以外，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

我以为，应当发表一篇很好的、客观的文章。如果我们不发表这一篇文章，我们就完全无法让人了解：而苏共中央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早已被人们忘却，不再提及。

拉希多夫：我也认为，不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因此应当发表文章。确实，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存在各式各样的说法。因此文章必须是正确有据的，语气平静的，并按照中央决议评价斯大林的精神说话。

库拉科夫：我同意发表文章。如果 90 周年时不发表文章，会生出许多流言蜚语。

勃列日涅夫：我感到所有同志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大家认为我们确实有党中央的决议，有坚定不移的路线，有对这个问题的坚定、明确的观点，我们今天也并不修正它。昨天我们也没有修正过，看来最近的将来我们也不准备加以修正。这涉及的是原则上的评价。

关于发表文章的事，我坦率地告诉大家，一开始我是持反对立场的。我曾认为我们不必发表文章。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考虑到我们现在一切平安无事，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并没有一度曾使人们十分激动并一再提出的那些问题，我们是否值得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可是，当我同许多党的州委书记谈了话，重新进行思考，今天又听取了大家的发言以后，我想，如果我们发表一篇文章，好处毕竟还是更大一些。因为并没有人否认，也从来没有人否认过他的革命功绩。我们之中过去和现在也从没有人怀疑过他的严重错误，特别是他后期的严重错误。当然，这不是说列举死了多少人的数字等等。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以平静的语气发表一篇文章，并且是按照苏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水平和按照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相应决议的精神发表这篇文章。那样，就不会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或几种意见，像近年来某些回忆录和其他一些书籍所造成

的后果那样。也许，会出现某些麻烦，但这看来也是无法避免的。我想，如果不发表这篇文章，麻烦也许还要多些。如果发表了这篇文章，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我们并不怕直截了当和明白无误地说出斯大林问题的真相，指出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让人们不要以为，个别元帅、将军在回忆录中对这个问题的说明会改变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路线。这篇文章中就应当说明这一路线。

我想，应当委托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卡图谢夫、波诺马廖夫等同志，考虑到今天交换意见的情况，以及根据散发的文本，进行相应的修改，对文章的初稿进行加工，分发给大家进行表决。



No04441

托尔斯塔娅关于拉恰达的剧本  
《祖国和异国》给苏共中央书记杰米契夫的信

（1974年10月11日）

最尊敬的彼得·尼洛维奇：

我请您相信这是保护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人格和人们对他的悼念免受不负责任态度侵犯的惟一方法。

杂志《虹》（1974年第6期，乌克兰作家出版社，基辅市）上刊载了伊万·拉恰达的剧本《祖国和异国》。

剧中主要登场人物是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事情发生时间——十月革命，移居国外年代，返回祖国以后。除了托尔斯泰以外，剧中的登场人物还有费·埃·捷尔任斯基、С. 叶赛宁<sup>①</sup>、П. 别德内、布宁、艾谢多拉、邓肯<sup>②</sup>，白色移民的领导人，克伦斯基、邓尼金、弗兰格尔、尤登尼奇等等。

作者的意图可能是善意的，但作品客观上却歪曲和庸俗了阿·托尔斯泰的形象，歪曲和庸俗了需要慎重对待的复杂而深刻的题材。

由于对阿·尼·托尔斯泰这样一个苏联伟大作家、社会活动家和

① 叶赛宁，谢·亚·（1895～1925），苏联诗人。

② 别德内，捷·（1883～1945），苏联作家，原名普里德沃罗夫，叶菲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宁，伊·阿·（1870～1953），苏联作家；邓肯·伊·（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

爱国者的充满矛盾的最重要的生活时期进行了简单化的解释，因此造成了歪曲。

使用文献资料的重点严重失误。剧本中的一些人物对白可能给读者造成阿·托尔斯泰积极从事过反革命活动的印象，而实际完全没有这回事。剧本中类似的歪曲的例子还可以找出许多。

在此之前托尔斯泰的传记作者所不知道的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费·埃·捷尔任斯基同阿·托尔斯泰的一次谈话也被塞进了剧本。剧本有很多庸俗的侦探小说性质的情节，似乎一个白匪军官使用出鞘的马刀伤害托尔斯泰，而此人竟是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又或者白俄侨民组织暗杀托尔斯泰的活动。如此放肆难道可以允许吗？如果这些情节是建立在取自某些档案文件的事实的基础之上（如同作者在私人谈话中所说），那为什么迄今为止谁都不知道作家生活中的这些有趣和重要的细节？为什么广大读者第一次知道的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出处？

大概是为了适合于舞台表演吧，剧本“装点”了吉卜赛小孩、夏里亚宾、韦尔京斯基的唱歌，叶赛宁的诗歌，艾谢多拉、邓肯的舞蹈和白匪将军装腔作势的争吵。

在И.拉恰达的剧本中，阿·托尔斯泰使用的语言是托尔斯泰的语言（取自他的各种作品、文章和信件）和剧本作者语言的大杂烩，这极大地损害了托尔斯泰的形象。托尔斯泰的语言生动、形象、准确，他甚至以此而驰名。

我觉得对费·埃·捷尔任斯基和叶赛宁形象的简单庸俗化程度一点也不比托尔斯泰轻。其他人物的塑造也处于低级作品形象的水平。真对不起，占用了您的时间。热切请求您委托专家认证我的不安和正义性，并给予帮助，使И.拉恰达的这一作品不在出版物或者舞台上继续扩散。

此致  
敬礼

Л.И. 托尔斯塔娅<sup>①</sup>  
1974年10月11日  
于莫斯科 Г-69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大街

---

<sup>①</sup> Л. И. 托尔斯塔娅，是作家阿·尼·托尔斯泰的遗孀。

№04442

## 谢尔比纳关于剧本《祖国和异国》 给苏共中央文化部的报告

(1974年11月10日)

可以认为，这部作品是一个被有趣的历史材料、光辉的生平和性格所吸引的人出自良好的动机写成的。是的，剧中主要登场人物的命运阿·尼·托尔斯泰、И. 布宁、С. 叶赛宁虽说各不相同，但都极其富有特色和有教育意义。在他们身上极其明显地表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的震撼力，以及对同人民联系的、热爱祖国的文艺创作的强大的召唤力。

但是，尽管剧本的构思具有爱国主义的意义，但对于 И. 拉恰达来讲，要完成这一构思却是难以胜任的任务。显然，剧本的作者研究了阿·托尔斯泰和 И. 布宁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的某些生平材料，努力表现他们从异国回到自己的国家、找到新的革命的祖国（当然，无论如何不能等同看待剧中登场人物在这方面的立场）。遗憾的是，他无论在理解典型人物和事件的内在实质，还是在形象刻画的技术方面都不是以通过文学来实现这一目的。

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毫无文学才气的、甚至是文学品位不好的、配不上在共和国一级杂志上发表的戏剧作品。

由于剧本《祖国和异国》的创作手法简单粗糙，致使阿·尼·托尔斯泰及其他一些主要登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经历令人难以置信。众所周知，阿·尼·托尔斯泰回到苏维埃祖国及其参与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复杂的内心思考、感受和决心的结果。在 И. 拉恰达的剧本

里，这一复杂的经历被简单化到可笑的地步，而且还同契卡的秘密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地使白俄侨民诽谤托尔斯泰被招募、“卖身投靠布尔什维克”的说法得到了证实。而实际上，是革命真理、对祖国的热爱对作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阿·尼·托尔斯泰内心这一坚定的信念可以在他写给柴可夫斯基的那封信中及他的一些其他文章中找到反映。И. 拉恰达把这封信的一些片断写进了阿·尼·托尔斯泰的谈话中，没有进行必要的创作加工，使其丧失应有的感染力，显得粗糙和矫揉造作。

不仅剧中主人公的语言，而且作者给主人公所设置的环境都十分简单粗糙。剧本的结构是建立在不现实的、抽象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之上。例如第一幕：托尔斯泰、布宁、叶赛宁和东正教的主教叶夫洛吉在红场上会面和谈话，表达他们各自对革命的态度。这时，杰米扬·别德内率领一队红军战士向他们迎面走去。红军战士高唱“想必在红军中能找到刺刀，没有你布尔什维克照样能行”的歌词，作为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争论的回敬。

在紧随其后的一幕中，剧本的作者无视历史事实，让阿·托尔斯泰、布宁在巴黎同邓尼金、李沃夫、柴可夫斯基、马克拉柯夫、克伦斯基<sup>①</sup>、邓肯坐在一张桌子旁。

在这一次谈话中，所有人物都以雷同的政治语言表达他们的不同立场。毫无疑问，作者有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虚构，但是，这种虚构不应该破坏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的真实。至于托尔斯泰的立

---

① 邓尼金，安·伊·（1872~1947），俄国中将，1919年1月任反苏维埃政权的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逃亡国外；李沃夫，格·叶·（1861~1925），俄国公爵，1917年3~7月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后逃亡国外；柴可夫斯基，彼·伊·（1840~1893），俄国音乐家；马克拉科夫，瓦·阿·（1869~1957），俄国立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1917年驻法国大使，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克伦斯基，阿·费·（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之一，1917年7月起任临时政府总理，后又兼任俄军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

场和个性，剧中的那种“情景”则是不可能的，也是反常的。

我们还看到，正是在侨民的几次会面中，有一个名叫乌斯特沃尔日卡娅的肃反委员会神秘间谍出现，而托尔斯泰同她取得了相互理解。И. 拉恰达试图使用庸俗的侦探小说的惯用手法来揭示托尔斯泰深刻的公民和创作的内在变化，这看来很不成功，把“外行话”带进了作品。

И. 拉恰达的剧本所使用的语言，尤其剧中主人公、著名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的语言缺乏个性，老一套。

剧本作者的滑稽的构思本身就极不成功，不符合现代读者和观众的口味。И. 拉恰达的剧本《祖国和异国》的发表是《虹》杂志编辑部的明显错误。

B. 谢尔比纳<sup>①</sup>

1974年11月10日

---

<sup>①</sup> 谢尔比纳，弗·罗·（1908～ ），苏联文艺评论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04443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祖国和异国》  
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74年11月15日）

苏共中央：

阿·尼·托尔斯泰的遗孀 Л.И. 托尔斯塔娅在她的一封信中对发表在《虹》杂志（1974年第6期）上的 И. 拉恰达的剧本《祖国和异国》提出了批评意见。写信人认为，剧本歪曲了阿·尼·托尔斯泰的形象，并请求采取措施防止该剧本在出版物或舞台上继续传播。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В.Р. 谢尔比纳同志）认为，И. 拉恰达的剧本有重大的缺点（附上评论<sup>①</sup>）。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文化部文学处副处长斯科马罗夫斯基同志）已阅读了托尔斯塔娅的信，已委托处理这一问题。

已将这一情况告诉写信人。

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3. 图马诺夫

1974年11月15日

<sup>①</sup> 参见本卷№04443文件。

№02482

## 苏共中央书记处就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青年学生情绪的报告的决议

(1976年12月28日)

绝蜜  
特件

第37章14条

尤·弗·安德罗波夫1976年12月12日报告

(安)字2796号

(苏斯洛夫、基里连科、佩尔谢、波诺廖夫、卡皮托诺夫、多尔基赫、卡图谢夫、齐米亚宁、梁鲍夫同志)

责成苏共中央和列宁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科学教育部、组织部和文化部对尤·弗·安德罗波夫报告中所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议并上报苏共中央。(附报告)

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的表决结果

1976年12月28日

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同志——同意  
基里连科同志——同意  
波诺马廖夫同志——同意  
卡皮托诺夫同志——同意  
多尔基赫同志——同意  
卡图谢夫同志——同意



齐米亚宁同志——同意

梁鲍夫同志——同意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给苏共中央的简要报告

（1976年12月12日）

（安）字 2789 号

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

阅后归还苏共中央

1976年12月12日

绝密

特件

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情报呈上关于大中中学生中消极表现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性资料。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使青年免受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国外反苏中心和其他敌对分子阴谋的一些机关的工作中已注意到分析的结论。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主席 尤·安德罗波夫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大中中学生中  
不良表现的性质和原因

苏联青年被敌人看做是思想上进行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对

象。之所以引起他们如此关注是由于青年的社会积极性，他们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责任心的增长。

参与针对苏联青年的破坏活动的有敌人进行思想瓦解的全部机构。敌人的特工机关在组织这种活动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侦察机关中专门建立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青年的分部。伪装为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所谓研究所和科研中心也有特工机关活动。

例如，仅仅在美国，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任务，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包括青年进行思想影响的就有大约 80 个研究中心和研究室。为了这一目的美国的侦察机关充分利用其盟国和附庸国的破坏中心。与它们有联系的设在伯尔尼的所谓瑞士东方研究所就组织了 1970 年对莫斯科大学研究生米歇耶夫的挑拨性行动，唆使他试图背叛祖国，逃往国外。

法国的特工机关在外交部编制中建立了名为“合作处”的专门局，在它的掩护下向苏联学校派遣间谍和侦探。

实际上在进行破坏活动中，反苏的、民族主义的、教权主义的以及其他的中心和组织居很重要的地位，对进行敌对活动表现积极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也寄予很大的希望。采用“唤起犹太青年的自我意识”和移民情绪的宣传提纲作为复国主义者吸收青年参与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种形式。大家知道，他们在耶路撒冷创办了一所培养宣传员的两年制学校，在美国和西欧的犹太青年中招收了许多学生到该校学习。根据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图，学校的毕业生应当通过各种渠道被派往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族主义的煽动和唆使犹太人迁往以色列。

乌克兰的，亚美尼亚的，爱沙尼亚的，立陶宛的，拉脱维亚的和其他一些民族主义分子都把自己政纲和宗旨跟加强针对苏联青年的破坏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些代表大会，各种代表会议的决

议中，他们经常强调必须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青年建立接触并吸收他们参加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积极斗争这一任务的特殊重要性。

在国家秘书处工作人员瓦季康纳所制定的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宗教政策计划”中对青年的破坏行动居显著地位。

“自由之声”广播委员会的一位领导人用下面的话表示了特工机关对苏联青年进行思想瓦解的宗旨：“对于广大苏联青年完全不必提出具体的正面的口号。只要引起他们对周围现实的气愤就足够了”。他宣称，这时“必然会发现一些为了这个根本变化准备什么都干的人”。在“自由之声”广播委员会粗制滥造的文件“苏联民主运动纲领”和“苏联民主运动战略基础”中，这个宗旨不仅有号召广大青年参加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形式，而且有所有中心通过各种渠道开展破坏活动的具体纲领。

在对苏联青年进行思想瓦解时敌人积极地利用了国际交往的各种渠道。他们赋予广播宣传以特殊的意义。

现在从资本主义本土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有41个无线电台，一昼夜播音253小时，其中的12个固定栏目中有7个是针对青年听众的。

近年来帝国主义的情报机关更加注意到苏联访问的外国人的破坏活动。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目的，以私人团体的名义成立“民间交流团”，任命哥伦比亚大学俄罗斯研究所教授格兰特·宾几尔为团长，根据现有的情报，他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正式工作人员。

在敌人对苏联青年界进行破坏性渗透的计划中，科学交流和大学生交流渠道居重要的地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机构发现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苏的进修生、研究生和大学生中有敌人情报机关和警察机关的许多间谍分子，还有极左的，毛主义集团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些人企图在青年中散布思想上有害的文学作品，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理论，与苏联青年中的代表人物建立联系，以及

对他们在思想上进行诱导，唆使其进行敌对活动。

敌人尽可能广泛地利用苏联青年的代表人物出国的机会。一些宣传中心经过专门训练的工作人员，移民组织的积极分子，各种从事接待苏联人民的“非政府”机关的人员，为了对这些代表进行诱导而参加出国旅游的青年团体。例如，在美国就吸收“国际教育和交流委员会”，“青年基督教联合会”“Айрекс”参加这些行动。几乎苏联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有“自由之声广播委员会”在进行反对他们的积极活动。

为了追求思想上瓦解的目的，敌人积极暗中与青年进行私人通信。有一位苏联问题专家说：“私人信件，虽然是少数人的财产，但就其思想影响而言，比官方的宣传品还要有力。”

除了对苏联青年思想上进行瓦解之外，敌人的特工机关还直接通过专门设立的机构分部和在西方起作用的反苏中心，对有进行破坏活动意向的人，对一些苏联国内民族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思想反动的神职人员和其他敌对分子寄予很大的希望。敌人的这种方针受到敌对分子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并与敌对分子在青年中建立扩大破坏活动的依靠对象的意图不谋而合。

有一个活跃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前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联合会地下活动的领导人舒赫维奇，唆使其同伙加强在青年中的破坏活动时，开导他们说：“青年是我们的希望。他们应当建立群众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据地。”

从修正主义立场出发的反苏分子把青年看做补充自己队伍的后备军。在宣传修正主义观点和唆使青年代表人物站到自己一边他们遵循的口号是“给青年群众提供非官方文学作品和国外的书。”

具有敌对思想的神职人员和宗教主义者企图把青年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便组织了一些秘密小组，给男女青年讲授宗教信条，阻挠他们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如果不服从，便以“上帝的惩罚”来吓

唬他们。例如分裂教派洗礼派教徒在他们的秘密出版物《救世通报》和《简报》中都为儿童开辟专栏，出版小册子《儿童之友》。

敌对的特工机关，国外的反苏中心和国内的敌对分子在制定自己对青年的破坏计划时，都利用他们缺乏社会经验和青年人固有的心理特点，如对老一辈的经验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过于敏感、好奇、求知、极端主义，急于模仿和自我肯定。这些计划的终极目的就是给青年一代的世界观，价值取向体系输入某种可改变他们社会面貌，使他们丧失苏联社会成员固有品质的东西。因此帝国主义以青年听众为目标的破坏性宣传的一个基本方向，近年来逐渐变为采取各种办法培养那些目光短浅的人的个人主义天性——利己主义、升官发财、因循苟且和漠不关心——指望苏联青年通过“道德转向”达到“政治转向”的目的；他们在“克服老一辈的守旧思想”的幌子下，加强宣传色情和必须制定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美学规范，其原因概出于此。一些参加制定和安排思想瓦解行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甚至认真考虑在我国发动一场与众不同的“性革命”行动计划。例如，著名的反共分子布热津斯基就是从“七十年代末性革命将波及苏联一些中心城市……并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发的。比较犯罪学的国际中心总书记帕里卓就拥护这种观点，他倾向于认为某些青年人的酗酒和纵欲是苏联政治上反对派的消极表现形式，而吸毒则是“青年反叛的象征”。

### 被调查的那类青年中的现象的实质

苏联青年受过良好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劳动中英勇精神的正面榜样的教育，积极参加共产主义建设和贯彻党的决议，表现出思想上高度的坚强信念和忠于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党经常关心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和防止敌人阴谋对他们的侵

害。但是有些青年人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时，在许多情况下，不能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消极影响，表现在政治上进行蛊惑宣传，品头论足，悲观主义情绪，并容忍思想上有害的和危害社会的表现。在青年学生中三年之内发生了 324 次不良表现，参加的有 4406 人。<sup>①</sup> 其中：

| 有不良行为的人     | 有不良行为者占学生总数的 % | 有不良行为者人数 |
|-------------|----------------|----------|
| 中学生         | 22.4% (988 人)  | 670      |
| 职业技术学校中技校学生 | 15.5% (683 人)  | 500      |
| 大学生         | 60.3% (2657 人) | 2076     |
|             | 1.8% (78 人)    | 78       |

从上表可以看出，差不多 2/3 参与不良行为者为大学生，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为高年级大学生（3~4 年级，1447 人）。

文科学校的学生参与不良行为的要比技术学校的学生多。文科学校的学生占 34%，技术学校的占 28%。

3174 人（72%）有不良行为，他们是单独行动。其余 1232 人一组成了 384 个团伙。中学生中所形成的团伙跟大学生团伙不同，多数带有局限性，同伙成员通常遵循的是自我肯定，浪漫主义和神秘莫测的情绪。具有政治上有害倾向的只是少数班级。

不良表现的性质及其形式与参与人员的相互关系可以表述如下表：

发表诽谤性的、蛊惑性的、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作为不良表现的一种形式，在数量上和参与者的人数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sup>①</sup> 统计表中的“有不良行为者人数”前项的人数略有出入，原文如此。

## 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二）

像起草和散发诽谤性材料、传单、标语和宣传画这样一些不良表现形式在最近一个时期有减少的趋向，取缔秘密起草和散发各种非法“杂志”、“新闻”和其他政治上有害材料等敌对分子活动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了不良表现的蔓延。

| 不良表现的形式                    | 不良表现的数量     | 有不良表现的学生人数  |
|----------------------------|-------------|-------------|
| 发表诽谤性、蛊惑性、修正主义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见  | 1509(45.4%) | 1598(36.3%) |
| 参与破坏社会秩序的团伙行动              | 99(3.0%)    | 495(11.2%)  |
| 模仿“嬉皮士”参与危害社会的行动           | 182(5.5%)   | 382(8.7%)   |
| 书写和散发诽谤性和思想上有害的文件(传单除外)    | 252(7.6%)   | 323(7.3%)   |
| 起草和散发诽谤性的和思想内容有害的传单、口号、宣传画 | 167(5.0%)   | 277(6.3%)   |
| 侮辱国徽、国旗、纪念碑、肖像             | 90(2.7%)    | 115(2.6%)   |
| 口头或书面威胁苏维埃和党的积极分子          | 50(1.6%)    | 53(1.2%)    |
| 向国外传递(或企图传递)诽谤性的和思想上有害的材料  | 26(0.8%)    | 33(0.8%)    |
| 起草和散发诽谤性和思想内容有害的匿名信        | 33(1.0%)    | 32(0.7%)    |
| 企图与国外的反苏中心建立联系             | 16(0.4%)    | 17(0.9%)    |
| 制定和悬挂民族主义的旗帜               | 6(0.2%)     | 15(0.3%)    |
| 其他不良表现(包括吸毒和阅读淫秽作品)        | 894(26.8%)  | 1056(24.2%) |

同时，传播通过收听外台而得到的政治上有害的情报这种形式的不良表现有所增加，特别是向外台表示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思想”的通信的数量增加就说明这一点。

从敌视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出发的不良表现占总数（3324）的32.4%，有1269人（29%）犯有这样的错误。

与社会主义思想敌对的各种思想对有不良表现的人的影响是不同的。

绝大部分参与不良行为的人都是从民族主义思想（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一事实在许多方面是由于近年来敌人加强

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宣传和在此基础上促进了破坏活动。

受到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青年比其他人更多地表现出有组织的活动意向（他们组织了87个团伙）。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建立团伙中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

| 敌对思想的种类                 | 在该思想影响之下的不良表现的数量 | 在该思想影响之下有不良表现的人数 |
|-------------------------|------------------|------------------|
|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除犹太复国主义之外) | 33.7% (364)      | 43% (674人)       |
| —犹太复国主义和亲以色列思想          | 15.7% (188)      | 15% (242人)       |
| —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            | 35% (377)        | 28% (445人)       |
| —宗教思想                   | 8.2% (88)        | 8% (128人)        |
| —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思想(观点)      | 5.6% (60)        | 6% (80人)         |

民族主义团伙的参加者在多数情况下提出反对“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的口号。他们中某些人，特别是大学生中一些代表人物试图吸收中学生和青年工人参加政治上有害的活动，并为此目的而深入到青年文学俱乐部、音乐学校和某种独立行动联合会中去。

某些团伙有组织得相当好的机构，制定了纲领性文件，提出了具体的政治目的，严格保密。

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和亲以色列情绪的影响之下，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文学的内容，煽动危害社会的行动，激起反苏和移民情绪，与国外一些中心的密使建立联系。犹太族青年在所谓的“乌尔潘”语言学院中占相当一部分，在那里借口学习现代希伯来语而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和亲以色列的思想情绪。

在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之下，1/3以上的人（373）有不良倾向。在文科大学的学生中不良表现最为普遍，而且其中140次（34%）是高年级学生所为。

在受到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揭露



出 43 个团伙。其中一类小组的参加者是各种青年俱乐部、小组、创作联合会的成员。他们一般没有组织形式，团伙特征在参加者的行动中表现并不明显。这些行动主要是发表政治上有害、诽谤性和蛊惑性言论。只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团伙的个别成员，基本上是文科学校的大学生，才有起草和散发思想上有害的诋毁文章和“作文”这样一些不良表现。

另一类团伙是在筹备非法出版物和出版思想颓废的“作品”和资料的成员的基础上成立的，这种分类也是文科学校的大学生所特有的。这类团伙的特点是其参加者具有一定的团结性。

克格勃的一些机关制止了几个团伙在政治上有害的活动，其成员在自己的圈子里扬言必需成立“新的”“强人”联合会，建立“超人专政”（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 45 “纳粹青年党”，别尔哥罗德市的“骑士十字会”，伏尔加格勒市的“第四帝国”等）。此种不良表现外表上看似乎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思想（观点）影响下进行的，有不良表现者尽量让自己的团伙及其行动跟法西斯标志物相联系（小组的名称、用词、誓词等）。然而实际上不良现象带有封闭性，不表现出法西斯思想的实质，犯有此等错误主要出于流氓和其他危害社会的动机。28 种（45.4%）这种不良表现是中學生、职业技术学校 and 中等专科学校学生所为。年龄稍大一点的年青人的不良表现形式不同。例如，尼古拉耶夫造船学院二年级大学生巴雷金企图劝诱自己圈子里的人，开导说“法西斯主义思想与摒弃诸如良心、羞耻、道德等概念的当代青年有相似之处。”

在宗教思想影响下所犯的 88 次不良表现中，有 36 次（41%）是中學生所为，21 次（24%）是职业技术学校 and 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所为，17 次（18%）为文科高校大学生所为，14 次（16%）是工科高校大学生所为。对不良行为影响最大的因素来自分裂派洗礼派宗教、50 年代人和其他教派的信徒。

在政治上没有明显有害的思想倾向，但危害社会的不良表现（破坏社会秩序、模仿“嬉皮士”、参与危害社会的行动、吸毒、迷恋淫秽书籍等）的指数如下：2247次，参与的有3137人（21%）。

就不良表现的次数和参与的人数，大学生表现比较活跃：1380次不良表现是1770个大学生所为。中学生和职业技术学校学生的指数分别为838人和1328人。

从个别犯罪和团伙犯罪倾向性的观点对指数进行分析可以判明，文科高校大学生的不道德表现多为个别犯罪：896人犯了759次罪。工程高校的大学生倾向于团伙犯罪：分别为874和621。此种现象也表现在中学生中（816和428）。从年龄而言，这些指数的大部分是高年级大学生。

参与政治上没有明显有害倾向的不良表现的人建立了201个团伙，这些团伙的特点是缺乏组织基础，按照寻求不道德生活方式的同伙的原则进行编组。这些团伙的名称“二流子”、坏蛋和“无耻之徒俱乐部”等等足以评定这种团伙的性质。然而上述情况并不能说明这些团伙的活动完全不带政治上有害的内容。参与者危害社会和不道德的行为本身决定了它们反社会利益的实质。大家也知道，某些这种团伙的参与者除有过不道德的不良表现，还在自己的那帮人中讨论国外的反苏广播和思想不轨的“作品”，有时他们自己也写这样的东西，发表诽谤性和思想上有害的言论，宣传“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等等。

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维尔纽斯、塔林、（顿河畔）罗斯托夫、敖德萨等许多城市揭露出来的所谓模仿西方“嬉皮士”的团伙参与者变成对社会主义集体宿舍的道德、伦理准则进行修改，对过去的革命传统和“思想保守的”父辈的“精神遗产”表示怀疑，号召克服“消极无为”和在“嬉皮士”思想基础上“为自由和社会的民主而斗争。”

关于预防和追究这些团伙的刑事责任的材料对青年学生中的不良表现及其倾向性做了一定的评述。1970~1974年，由于克格勃的一些机关作了准备和防范，制止了40.3%的25岁以下青年政治上危害社会的不良现象发生。在1971~1974年因犯有特别危险的国事罪而判处224个29岁以下的青年（苏联司法部资料）。

1971~1973年因制造和销售麻醉品判处的公民中29岁以下的占一半多。

在因酗酒和在公共场所发酒疯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人中29岁以下的人占相当的数量。例如，1973年这种人为2533443，1974年为2616708。

### 影响形成思想上有害观点和决定 政治上敌对等不良表现的因素

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大部分具有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表现的人直接受到来自国外的思想影响。像收听国外广播，阅读走私到苏联的资产阶级报纸、书籍和其他出版物，与有敌对思想的外国人私下接触和通信，这样一些因素影响到47%（2012）的人。

所有因素中主要的是国外广播宣传的影响，这表现在有1/3以上（1445人）的人形成思想上敌对的观点，他们都有不良的表现。对材料的分析，说明在青年中对国外广播有广泛的兴趣。比方，根据苏联科学院戏剧艺术研究所在应用社会研究部所进行的“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研究资料，有80%的大学生和大约90%的中学、职业技术学校 and 中等技术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定期或不定期收听外台。这些人的大部分收听外台已成为一种习惯（32%的大学生和59.2%的中学生收听外台每周不少于1~2次）。

对“鄂木斯克市大学生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形成”的研究表

明，在所调查的大学生中有 39.7% 的人定期收听外台广播。在研究芬兰电视节目对爱沙尼亚共和国的影响时也暴露出类似的情况。

绝大部分具有政治上有害表现的青年对国外广播和电视节目有浓厚兴趣，但不总是有目的地和自觉地寻觅关于苏联实际情况的带偏见的和诽谤性的情报和希望巩固已有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政治信仰。收听外台主要是对西方爵士乐团的流行音乐很感兴趣。（根据“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社会学调查资料，迷恋音乐节目的听众 2/3 为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自由欧洲”电台一个分台的领导人在工作人员制定节目的指导性会议上确定了这样一种方案，以后要使听众的兴趣和情绪的演化在很多方面都符合这个方案：“我们的通讯员 16 岁。他现在对唱片感兴趣，但过上 5~10 年，他熟悉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就会收听我们的全部节目。”

另一个促使收听外台的动机是现代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出现的信息需求。外台似乎以其在提供新闻方面效率好及其报导的客观性而吸引了许多年轻人。例如，“西方电台的莫斯科听众”的研究表明，在询问过的人中有 24.2% 的大学生、21.6% 的高年级中学生，8% 的青年工人，10% 的青年知识分子相信“美国之音”的广播。

西方电台在形成听众的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和从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有利方面来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带有相当的思想倾向。由于收听西方电台的广播，一些中学生和大学生开始用西方广播的观念思考。其中某些人对我国现实的某些方面形成一个否定的综合性评价，不用阶级观点来理解自由、言论、出版、创作这样一些概念，资产阶级宣传工具积极宣传的多党制得到支持，对苏联大量的信息手段持否定的态度。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在这些人的行为中得到反映。

像与外国人私下接触和通信这种带有敌对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文科大学的高年级学生中，这是由于他们之中相当多掌握

外语，因而具有与外国人广泛接触的可能。对中学生的影响（在这方面的指数较低）主要通过通信，而不是私下的接触。

最近通过通信对德意志族和犹太族青年的消极影响明显地有所增强，这首先与积极鼓吹移民情绪有关。

秘密散发一些在苏联国内外拟定的诽谤苏联和政治上有害的材料是影响青年的重要因素。在大学生、主要是文科大学的大学生身上有接受这些材料最大的倾向性。他们中间受这一因素影响的人的百分比最高。这种现象根源在许多方面与作为文科领域未来专家的大学生的职业训练的特点有关。他们比其他青年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论述资产阶级思想的出版物，在此基础上与可以利用这种出版物，或者可能弄到这种出版物的人建立联系，特别是随身带有敌方书刊的外国人。他们也利用外台作为获得这种书刊情报的源泉。许多被防范的大学生在消除误会的谈话中指出，他们把思想上有害作品的广播进行录音，然后便以录音机或者打字文本形式传播。特别是通过这种渠道得到许多关于索尔仁尼琴的反苏声明和诋毁文章，萨哈罗夫的论文《关于和平、进步和智力自由》，各种《科学著作》、《呼吁书》和其他诽谤性谎言，诋毁苏联现实的文件。

秘密散发的诽谤苏联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材料对中学生和职业技校的学生的影响比较小，因为他们获得这些材料的机会比较少。他们熟悉在苏联秘密流传的敌视苏联的材料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收听外台。

在国内抄写的秘密材料（包括根据收听外台的）就其影响程度而言居主要地位。此外受在苏联抄写的材料的影响而敌视苏联的有420人，而受到国外官方出版的资产阶级书籍影响的只有170人。

周围亲近的人（亲戚、朋友）中有敌对思想的人对青年思想上有害的影响的指数是很大的。受这种影响作用的有600个大学生和研究生，274个中学生。这两个指数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

反苏思想的人首先竭力对大学生和从事科学工作的青年施加消极的影响，并且在改变某些青年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点时，把他们看成补充知识界中有对立情绪的人的后备军。

如果说大学生与有敌对思想的人一般没有亲属关系的话，那末中学生和职业技校的学生与他们不同，受到最深刻的消极影响来自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亲属。

上述因素影响某些青年在思想上形成有害观点，在某些情况下有所加强。有的青年人，由于个人生活安排不妥，对物质条件和居住条件不满，遇到某些公职人员活动中的舞弊行为，往往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些现象。缺乏必要的生活经验和思想锻炼，再加上青年人固有的年龄心理特点，对个人所受的委曲非常敏感和容易冲动，这就导致他们中有些人不能正确地评价周围的社会现实和错误地选择了达到生活目的的方法和手段。反苏倾向诸因素的作用常常加深了错误的结论，这在某些情况下又促使他们实施危害社会和政治上敌对的不良表现。

受到这些因素影响最大的是职业技术学校 and 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们比其他青年更早地参加独立劳动，因此在儿时便遇上了个性形成道路上出现的困难。

上述消极因素影响青年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看得很直观。

根据对莫斯科和基辅一些高校共青团积极分子的询问资料，总的来说大学生对学习社会科学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有相当一部分（18~20%）人表现漠不关心，消极对待。在一些理科高校和系科的大学生那里，这些指数还更高，几乎达30%。在调查过程中，征询过意见的一些文科院校的学生，表明自己对学习社会科学课程的消极态度，公然说似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已经过时，而材料的内容落后于思想斗争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方法。”

某些工科院校的大学生认为，既然学习专业课是主要的，那么深入研究社会经济科学对他们就不是那么必要了。

一部分大学生消极地参与集体的社会政治活动，其根源就是对社会科学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调查询问过程中，一些共青团积极分子指出，有的大学生把从事社会工作与“升官发财”联系在一起，因而由于蔑视向上爬的人而拒绝担任社会工作，他们认为，这种追求名利的人在地方的社会活动家和公职人员中都有。而其他大学生解释说自己对社会活动不感兴趣是由于个性在发展中，并且仿佛只有在个人自我表现的基础上才能最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创造才能。他们认为，现在一些社会工作的形式的毛病是过分的遵守传统、不够完善、简单粗糙，不具有充分展现个性的必要条件。

克格勃一些机关把同煽动苏联青年的破坏意向作斗争，揭露并取缔企图对青年施加敌对思想影响，看成是使苏联社会免受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国外反苏中心和其他敌对分子阴谋危害这个任务的组成部分。预防犯罪；预防政治上有害的不良表现和过程，这个主要原则是这一部门组织工作的基础。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管理局局长 博布科夫

№03351

##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发现西方宗教 神秘主义教派信徒呈苏共中央报告

(1980年)

苏共中央：

关于在苏联发现西方宗教神秘主义教派的信徒

简要内容。近来，从西方传来的宗教神秘主义教派在苏联得到一定的传播，它们引导自己的信徒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而倒向神秘主义。

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信息表明，自70年代末起，存在于西方的，把神秘主义教派信徒汇集在一起的国际组织“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和“白人兄弟会”，试图把自己的主张传播到苏联境内，并首先以知识分子和青年为吸收对象。

这些组织的代表先是设法同苏联公民建立通信关系。对于那些对“教义”表现有兴趣的人，会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密使从国外通过旅游途径奉派前来找他，给他带来影片、幻灯片、专门的书刊、做仪式时用的衣服，并给予在苏联进行传教活动的指示。

这类组织之中，最为反动的一个是“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其创始人和主要的思想家是印度人毗湿奴斯瓦明·普洛布休帕达，他是从美国开始传布自己的“教义”的。其教义是一种集佛教、印度教和基督教于一身的大杂烩，宣称最终目的是达成“涅槃”境界（灵魂摆脱物质桎梏的状态）。斯瓦明·普洛布休帕达宣传建立一种类似古印度的种姓制社会。“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试图通过否定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并同它们作斗争，引导自己的追随者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劳动，倒向神秘主义。

目前，这个组织的信徒已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一些城市，以规模不大的教友小组形式出现。为了共同研读书刊，举行“教义”规定的仪式，这些小组的参加者在私人住宅进行聚会。在这类人中间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同国外的中心和国内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的信徒小组是按照狂热服从导师并将其神化的原则建立的。来自国外的密使拥有特别的威信。

这个教派中有狂热情绪的信徒，企图利用青年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古代东方宗教和哲学的兴趣，吸引他们信奉自己的教派。为了实现这种图谋，他们试图通过放映从国外带进来的影片、幻灯片，以及组织讲课来对广大的听众施加影响，于是用欺骗手段借用社会团体的场地安排此类活动。此种做法已在莫斯科、基辅、维尔纽斯、里加发现。参加此类活动的人数每次约有 100 人。

促使“毗湿奴意识国际协会”的信徒在苏联出现的因素之一，是近年来各城市中对心灵学、瑜珈功、内功的讲座盛行一时。

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开展工作，以求瓦解古代东方宗教—哲学流派和制止他们在国内的传教活动。

作为情况通报如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尤·安德罗波夫

No 03348

## 阿克肖诺夫致勃列日涅夫信

(1980年4月8日)

致苏共中央总书记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列·伊·勃列日涅夫

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是在我一生中的困难时期向您写信的。我作为散文作家、剧作家和电影剧作家在苏联文学界积极工作了20多年。我的书，虽然曾引起过争议，但得以出版（《同行》、《去星球的票》、《来自摩洛哥的橙子》、《时候到了，我的朋友》、《滞销积压的包装箱》、《对电的热爱》、《寻找风格》等等），歌剧上演了，影片搬上了银幕。

但是，在10~12年以前，开始了一种对我所创作的文学成果加以分解的过程：只有我的一部分作品得以勉强地出版，而另一部分作品则长年束之高阁。在我和作家协会之间越来越经常发生冲突的局面。去年，由于《大都会》丛书<sup>①</sup>（我是编纂人之一）的事，冲突达到顶点。结果，我不得不退出作家协会。随之，文学基金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开除了我。

---

<sup>①</sup> 《大都会》是1979年初苏联非官方出版的文集，文集包括有阿克肖诺夫、阿赫马杜林娜、沃兹涅辛斯基以及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为《大都会》撰文的一些青年作家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阿克肖诺夫为表示对被开除出作协的青年作家的支持，宣布退出苏联作家协会。

回眸往昔，对于发生的事我不能责怪任何人。所有这一切并非瞬间发生的，而是由于我的文学的美学探索与哲学探索同作家协会的基本路线发生了分歧。现在，唉，我看不到除了出国以外还有别的摆脱冲突的办法。

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我是痛苦的，首先因为我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认为自己是一名俄罗斯作家和苏联公民。在我国文学的历史上不乏作家的不同寻常的遭遇。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预见自己的命运，作家则常常更难以预见自己将会经历什么样的世界观方面的风暴。我不愿设想，同祖国文化和土地的联系就此永远中断。以上想法促使我请求政府发给我和我的妻子，玛雅·阿法纳西耶夫娜·奥夫钦尼科娃，苏联出国护照。

期待您固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明智决断。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阿克肖诺夫

1980年4月8日

**№03349**

**苏共中央文化部就处理阿克肖诺夫申请  
出国定居的意见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80年5月8日)

苏共中央：

文学家阿克肖诺夫（莫斯科市）致函苏共中央，请允许他和妻子保留苏联国籍前去国外。

通过苏联作家协会（韦尔琴科同志）向信函作者解释了关于苏联公民出国的规定，并建议他通过苏联外交部签证登记司按规定手续解决提出的问题。

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 别利亚耶夫

1980年5月8日

№03387

## 苏共中央文化部就日瓦涅茨基创作晚会的情况呈苏共中央报告

（1982年6月18日）

秘密

苏共中央：

关于在亚布洛奇基娜<sup>①</sup>中央演员之家举行的讽刺作家日瓦涅茨基创作晚会。

1982年4月1日，在莫斯科市亚布洛奇基娜中央演员之家举行讽刺作家日瓦涅茨基的创作晚会。作者朗诵的许多小型剧目包含有对我国生活的某些方面片面，甚至恶意的批评。

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韦尔钦科同志曾经看了在亚布洛奇基娜中央演员之家举行的创作晚会上讽刺作家日瓦涅茨基的演出稿本。

据韦尔钦科同志告知，日瓦涅茨基被请到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就创作晚会的内容对他说明了原则性的意见，并告知他这种不负责任的批评是不能容许的。

日瓦涅茨基承认意见是公正的，并声称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作为情况通报，报告如上。

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绍罗）

<sup>①</sup> 亚布洛奇基娜，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夫娜（1866～1964），苏联女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曾获苏联国家奖。

№03320

## 莫斯科市法院刑事审判庭 对伊万诺夫的判决书

(1982年6月28日)

1982年6月24日，莫斯科市法院刑事审判团在鲍格达诺夫主持下在公开审判庭上裁决如下：

伊万诺夫，阿纳托利·米哈依洛维奇，莫斯科人，科研工作者，承认自己的以下罪行：

由于对苏联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怀有敌对情绪，自1971～1981年期间以破坏苏维埃政权为目的，通过复制和在大量人员中散发包含有对苏维埃社会政治制度污蔑性谣言的文章，系统地蓄意进行反苏宣传鼓动。

阿·米·伊万诺夫承认自己书写和散发《市民大会》杂志，以及个人的作品《形象模糊的骑士》、《噩梦的逻辑》，是有罪的。

预审和庭审材料确认，与阿·米·伊万诺夫保持经常联系的人之一是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会员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谢马诺夫，他对阿·米·伊万诺夫的作品、文章，参加《市民大会》的活动和这份杂志都感到兴趣。阿·米·伊万诺夫自1971至1974年每期（共10期）都转给谢·尼·谢马诺夫该杂志若干份，而谢马诺夫每份付给伊万诺夫10～15个卢布。

1977至1978年间，伊万诺夫把自己写的反苏文章《形象模糊的骑士》和《噩梦的逻辑》交给谢马诺夫。

从刑事案卷的材料可以知道，《噩梦的逻辑》一文是伊万诺夫

在谢马诺夫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而谢马诺夫是在同伊万诺夫交谈和谈话时把这类思想表达给伊万诺夫的。

在法庭上查明，由于谢马诺夫因自己的威信对于伊万诺夫有所影响，他在谈话时实际上挑动伊万诺夫撰写和散发对作家协会个别成员的诽谤性材料。这些材料之一便是伊万诺夫草拟的以“瓦西里·梁赞诺夫”署名的《关于库尼亚耶夫的一封信》的文稿。这份文稿复制了许多份，并按照谢马诺夫开列的名单分发给了作家协会会员（按照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一部第70条之规定，此信并未列入伊万诺夫的罪责）。

伊万诺夫在审讯中和在法庭上供认，当谢马诺夫知道他有去以色列定居的邀请函后，就坚持建议他接受邀请，出国后在那里出版《市民大会》一类的刊物。

开庭时，谢马诺夫作为证人受到传讯，但他推托有病未曾到庭。根据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刑法典第286条，当庭宣读了谢马诺夫在预审中的供词。1982年3月24日，当和伊万诺夫对质时，谢马诺夫承认，他知道伊万诺夫参与出版非法打印刊物《市民大会》，以及杂志上刊载了伊万诺夫以“斯库拉托夫”的笔名发表的文章，也承认他从伊万诺夫那里获得该杂志的所有各期，并每份付给10~15卢布。

谢马诺夫还供认，每期看完以后，他都将杂志烧掉。这一供认说明，他对于该杂志的反苏方针是清楚的。其他情况，谢马诺夫则予以否认。

预审和庭审的材料并不能为陪审团提供根据说明伊万诺夫蓄意说服谢马诺夫，而且伊万诺夫的供词所说的事实，无论就具体情况和具体人员而言，在法庭都得到确认。伊万诺夫也好，谢马诺夫也好，都承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相互信任的，双方之间并没有不快和敌意。

审判团认定由预审和庭审材料所证实的上述谢马诺夫的实际行为。

以上情况证明，谢马诺夫的行动与历史学副博士、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和苏共党员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他不仅对与之长期保持密切接触的伊万诺夫的反苏维埃活动不采取批判态度，而且以自己的谈话和建议实际上鼓励了伊万诺夫的违法活动。

审判团认为，谢马诺夫上述恶劣行为的事实应当成为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及其党组织讨论的题目。

本裁决书抄送莫斯科作协组织第一书记库兹涅佐夫、党组织书记科切特科夫，以便对裁决书中指出的谢·尼·谢马诺夫的问题加以讨论，并采取措施。

莫斯科市法院代理院长 米罗诺夫

1982年6月28日



№ 03321

## 关于谢马诺夫被捕的情况

（1982年10月15日）

第 PC164/82 号

逮捕谢尔盖·谢马诺夫

维什涅夫斯卡娅

据未经证实的消息，1982年8月初，在莫斯科市，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谢马诺夫被捕，他是历史学家、新闻记者、编辑、文学评论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他是一名上级任命的工作人员，而又是因受到政治指控而被捕的，目前关押在克格勃的列福尔托监狱。

谢马诺夫的正式经历如下：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谢马诺夫，1934年1月13日生于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自1956年起，在苏联各种出版物上发表作品。曾长期在科研机关工作。撰写的书籍有：《马卡罗夫》、《纪念碑“俄罗斯一千年”》、《祖国的心脏》（文学评论文集）、《〈静静的顿河〉：文学和历史》、《1921年3月18日》、《布鲁西洛夫》、《1921年粉碎喀琅施塔得反苏暴乱之役》。发表过关于俄国历史和1918~1920年俄国国内战争史方面的科研成果。历史学博士。自1969年起，为共青团中央“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系列丛书《杰出人物生平》编辑部主任。1976年11月，被批准为苏联司法部科普杂志《人和法》主编，苏联司法部部务委员，苏共党员。

自1981年6月（第6期）起，谢马诺夫不再领导《人与法》

杂志编辑部，而且，据知，并非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尽管在他担任主编期间该杂志除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的文章以外，也经常刊载各种“揭露”西方生活方式的文章，而且从另一方面说也不刊登批评某种苏联现实生活现象的材料。在被逮捕时，谢马诺夫领导着“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一个部。

从非官方渠道得悉，谢马诺夫是所谓“标准右派”（这里使用的是这一问题的侨民研究者亚历山大·亚诺夫的用语）的中坚人物之一，也是“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实质上是把革命前俄国极右学说的传统同斯大林主义首先又是以其悲惨的著名的“同世界主义和对西方卑躬屈膝思想作斗争”时期的后期斯大林主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著名理论家之一。谢马诺夫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他赢得了这样的荣誉。当时，在谢马诺夫的《关于相对价值和永恒价值》一文中，知识分子首先看到的是企图为斯大林的“大恐怖”进行辩解。例如，在这篇文章中说道：

“如今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同破坏者和虚无主义者的斗争中，转折发生在30年代中期……。我以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时期发生的巨大变化的全部重要意义。这些变化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最良好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谢马诺夫宣称，1917年的十月布尔什维克政变（顺便说起，这场政变在“异教右派”中被认为是外国人和异族人，匈牙利人、犹太人、拉脱维亚人、中国人活动的结果）是“无价的民族后果”，是“在祖国和全世界的命运中开辟新时代的伟大俄罗斯革命”。

谢马诺夫的这篇文章在非官方出版界中引起一场大风暴，而当时，1970年，异议人士中还没有分成“右派”、“左派”，以及“西方派”、“民族派”。而且当时，所有异议人士都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伊·梅德维杰夫还把很大一部分《政治日记》第75号

投给《青年近卫军》杂志和谢马诺夫，并刊登在该杂志 1970 年十二月号上。据罗伊·梅德维杰夫的消息，给一系列其他苏联杂志写文章批评《青年近卫军》杂志的还有：费利克斯·库兹涅佐夫（现莫斯科作家组织的第一书记）和赖萨·列尔特（是非官方出版的自由派杂志《探索》编委会成员中目前惟一一名未被逮捕的人）。但是，《新世界》没有刊登库兹涅佐夫的文章，《文学问题》也没有刊登列尔特的文章，也没有其他任何一家苏联杂志刊登涉及这个题目的任何文章。列尔特的文章于两年以后在伦敦出版的《新警钟》文集中问世。而库兹涅佐夫，虽然晚了许多时间，却终于等到了好时机：正是从他的文章起，在《文学问题》和《文学报》中开始了对苏联历史学和文学史中“新斯拉夫派”和“民族共产主义者”的正式的征讨。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谢马诺夫绝非像《关于鞭子的魅力的论文》的作者所想象的那样，始终一贯都是“俄罗斯大国思想”的斗士。

例如，还在 1957 年，谢马诺夫因涉及所谓“共产主义者联盟”案件被送到列宁格勒克格勃。他坚决拒绝提供侦讯机关所需要的任何供词，而是借口喝醉了酒而一再声称“不知道”、“不记得”。而审判后不久，谢马诺夫即写信到劳改营给因这一案件被判刑的人之一鲍里斯·普斯胜采夫（顺便说说，这是其中惟一的非共产党人，他是自由主义者）。

1966 年 12 月，谢马诺夫和另一名历史科学硕士斯塔尔采夫共同在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世界》上发表了对阿采尔金的《老共青团员》一书的“有自由思想倾向”的评论，并为此受到《共青团真理报》的斥责。

谢马诺夫世界观的转变同他从列宁格勒迁入莫斯科并受命担任共青团中央出版社的负责职务令人惊奇地相重合。正是从这时起，

谢马诺夫开始经常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作品，并成为苏联历史科学中“保皇派”的领袖之一，而且继续官运亨通。

尽管如此，由于以上原因而离开了自己的老朋友们，谢马诺夫各方面都又同另一个派别“异议人士”接近起来。

1981年8月11日，俄罗斯民族运动中极右的一翼，即排斥宗教的和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一翼的代表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伊万诺夫（在非官方出版物中以含意深远的笔名斯库拉托夫而闻名，这是为了纪念雷帝伊万四世的战友马柳塔·斯库拉托夫）在莫斯科被捕。

同年12月得到消息说，因涉及伊万诺夫案件受到克格勃传唤审问的，或者在审问过程中提到了的有这时已经担任《人与法》杂志主编二年的谢·尼·谢马诺夫和这份杂志编辑部的2名工作人员、不久前荣获苏联最高称号“苏联人民艺术家”的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私人肖像画家伊里亚·格拉祖诺夫，苏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和克格勃的2名工作人员。1982年4月中旬得悉，伊万诺夫交待了“坦诚的”口供。5月13日，伊万诺夫（斯库拉托夫）案件中的第一名“证人”——原政治犯列昂尼德·博罗金被捕。

目前还无法搞清，谢马诺夫为什么被捕：是由于伊万诺夫过分的“揭发”，还是由于——这就更加可怕——他同费利克斯·库兹涅佐夫的争论以别种手段在继续进行。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原苏联司法部部务委员像这样突然被捕都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事态这样发展不可能不引起那些既不赞同谢马诺夫的“民族共产主义”观点，也不同意正统共产党人库兹涅佐夫立场的人们的警觉。

因为归根结蒂，不管有关伊万诺夫——博罗金——谢马诺夫案件的各种传闻有多么离奇，没有一个传闻最后就因这个案件而被捕的人是因为说出了非正统的信念而被关进监牢。

№03384

## 莫斯科市安全委员会就高尔基模范艺术 剧院发生流氓行为事呈苏共中央报告

（1982年11月15日）

第 2219, φ 号

苏共中央：

关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sup>①</sup>上演话剧《我们一定取得胜利!》时在观众席上的扰乱社会表现。

据国家安全委员会获知的消息，1982年11月9日在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上演话剧《我们一定取得胜利!》即将结束时，正厅中一名观众喊了几句口号：“打倒中国和柬埔寨的共产法西斯主义！把索尔仁尼琴和安德列·萨哈罗夫还给我们！”，随后逃匿。这件事对于剧目演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也没有在观众席上引发不良反应。

经采取措施已查明，此人系莫斯科市居民 X.Л. 古米罗夫，1937年生，是“前进”工厂工艺师。这一事件将作为流氓滋事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情况通报报告如上。

委员会主席 费多尔丘克

<sup>①</sup> 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于1898年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丹钦柯共同创建，是苏联为数几家最大的剧院之一，1919年由当时的苏俄政府命名为模范剧院。

## 【专题说明】

# 关于库兹涅佐夫事件

(1957年11月至1988年7月)

本专题是关于库兹涅佐夫事件的9件档案。

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1902～1974），苏联海军元帅，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苏联副海军人民委员、海军人民委员、海军部长、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等职。1947年1月被解除海军总司令职务，军衔降为海军中将。斯大林死后，他重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恢复海军元帅军衔。1956年2月，他再次被解除职务，军衔又降为海军中将，并强令退役。库兹涅佐夫至死都在为自己申诉；他的遗孀、同僚、下属也不断上诉，要求为库兹涅佐夫恢复名誉，却均无结果。直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才为其恢复苏联海军元帅军衔。此时，库兹涅佐夫已死去14年了。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王希礼翻译)

No03184

## 库兹涅佐夫要求恢复名誉致赫鲁晓夫信

(1957年11月8日)

请相信，我不是出于个人的动机，而是由于希望陈述真相和为了有益于事业而向国防部长罗·雅·马利诺夫斯基<sup>①</sup>同志汇报一些问题，才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这封信，请阅读并给予指示。

尼·格·库兹涅佐夫

绝密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今年7月8日，我曾写信给原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同志，请求接见我。虽然我在信中清楚地指出，谈话将不涉及某种我个人的事情或请求，而将涉及一些确定的文件（这些文件我一加以列举），可是我并没有受到接见。由于在这封信之前我已多次请求接见我和听取我的意见，所以决定不再向任何人申诉。但是现在，在当前形势下，我认为有责任陈述我原来想向原国防部长说的一些问题。

尽管根据朱可夫同志声称，我回军队是不可能的，而我也不应就什么问题申诉（没有益处），但我仍然认为在做出给我降级和强

---

<sup>①</sup> 马利诺夫斯基，罗·雅·（1898～1967），苏联元帅，时任苏联国防部长。

令退役的决定以前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我和从没听取我申诉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我坚信苏共中央主席团不了解这种情况。即使在我被撤销职务以前，我也没有受到接见，尽管我曾向格·康·朱可夫同志、谢·格·戈尔什科夫<sup>①</sup>同志，以及伊·赫·巴格拉米扬<sup>②</sup>同志（由他接替朱可夫同志）提出过这个要求。瓦·丹·索科洛夫斯基<sup>③</sup>同志曾邀请我参加中央主席团会议，并声称：“如果能来就来，虽然这个问题已经决定了。”我甚至没有看到文件，而在会议上也同样首先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决定，我发言不会有任何意义。这是1955年的事。

1956年2月15日，我受到国防部长格·康·朱可夫同志的召唤，在5~7分钟的时间内，他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向我宣布降低军衔和强令退役永不恢复的决定。之后，不但谁也没有召唤过我正式办理清退手续，而且是由干部部的一名代表把退职的文件送来留在我的住所（我当时甚至并不在场）。迄今为止，国防部仍然以这种态度，骄横恣肆地对待我，例如，与所有退休人员不同，我一次也没有收到过苏军建军节的请柬，等等。由于完全不知道自己之所以受到剥夺军衔和清退处罚的原因，我请求朱可夫同志即使把涉及我的文件寄给我看一下也好，何况通过这些文件的时候，我还是中央委员，但他也并没有这样做，而我至今未能，哪怕通过签字借阅，看看这些文件。

由于对于指控我的错误和作为其根据的材料无法有更详尽的了解，我只能根据国防部长告诉我的指控内容，陈述自己的观点，并用文件和事实来证实基本的论点。我按照国防部长对我历数指责的

① 戈尔什科夫，谢·格·（1910~ ），苏联海军元帅，时任海军总司令。

② 巴格拉米扬，伊·赫·（1897~1982），苏联元帅，时任苏军总后勤部部长。

③ 索科洛夫斯基，瓦·丹·（1897~1968），苏联元帅，50年代曾任苏军总参谋长，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顺序汇报如下：

1. 似乎我为超期服役人员“随意增加”了许多工资额度。

对此我报告如下：最后一次研究超期服役人员的工资额度是1946年（凭记忆）根据中央的委托在安·亚·日丹诺夫<sup>①</sup>同志那里进行讨论的。那一次我被说成是对超期服役人员不够关心而痛遭斥责，通过了决议，我也再没有提什么建议。他所引证的勘察加超期服役人员工资过高问题与我毫无牵涉，因为这一决定是我不在场时作出的。而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是：与其提高这些工资额度（这时我在远东），不如在如此艰苦的地点提高伙食和增加好的服装，而不增加工资，因为工资往往会带来害处。

2. 海军纪律很差。

是的，我也对于海军的纪律状况不满意，但是，从我对各种过失的数字的了解来看，海军的纪律状况与各军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事例俯拾皆是）。

另外，当动用如此严厉的惩罚时，总不能不考虑事情的法律方面，即我究竟应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我从来不曾有过我对纪律状况可以不承担责任的念头，但是在两个部合并之后，舰队甚至并不正式隶属于我，而我是作为副部长指挥舰队的；按照命令规定舰队直接隶属于部长。查阅文件弄清这一点并不困难。

3. “总之，首长对您也不满意。您在舰队中没有丝毫的威信。”

因为对这个问题没有更多的解释和说明，我无法作进一步的理解，现在也说不出什么。

4. 最后一项指责，这是在已经道别（“您可以走了”）之后告诉我的，是说我在舰艇制造上有重大缺点。

这首先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对于武装力量体系中未来的海

---

<sup>①</sup> 日丹诺夫，安·亚·（1896~1948），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军具有重大意义。正是这个问题迫使我写信给国防部长请他查看一系列文件，并且以事实和文件为依据陈述自己的观点。我曾希望向国防部长解释，我想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个人动机，现在我遵从的也并非是个人的动机。

我现在汇报整个战后时期的舰艇建造问题：

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我曾经呈送过一个舰艇设计和建造的十年计划。在这项计划中，对作战舰只的基本舰种规定如下：（1）航空母舰（分大型和小型）；（2）装备9英寸炮的巡洋舰（以便轰击敌人的所有巡洋舰）；（3）潜艇；（4）舰队驱击舰，等等。

讨论过程中发生的争论涉及航空母舰，我虽一再坚持建造但未能通过。关于巡洋舰没有引起大的争辩。关于舰队驱击舰发生了很热烈的争论，因为我坚决反对按第30号设计方案大量建造旧式的舰队驱击舰（他们没有通用型火炮），而只同意进行少量生产，以便尽快使舰艇建造业的生产恢复起来和汇集干部。关于潜艇，对现在我们都已知道的新型潜艇有过许多议论。关于装备12英寸炮的重型巡洋舰的问题，甚至在我在职期间一直不曾提到过，虽然装备部，据我所知，还不止一次建议采用12英寸火炮。

当我被撤销职务时，关于新的计划纲要的争论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是在我离开之后才进行最后讨论。这一切查阅文件很容易得到证实。我个人至今认为，战后舰艇建造中最大的错误是：建造重型巡洋舰，按第30号设计方案建造大量舰队驱击舰，按第15号设计方案继续建造旧的潜艇，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有大量函件可供查阅，特别是关于按第30号设计方案建造的舰队驱击舰的缺陷，因为当1951年我回莫斯科工作之后又提出了这些问题。

从我一方面说，从1951年任命我去莫斯科工作以后，我采取了一切措施尽快转向新的舰队驱击舰的生产，坚决反对继续按第

30号方案建造舰队驱逐舰。我几次打报告提到必需建造登陆艇和航空母舰。

在1951年9月1日（即我刚一接受海军部长职务之后）的第2222号报告中，我写了我们拥有的舰艇多么陈旧，请求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

可见，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实质上看，就1946年至1951年期间建造的舰艇指责我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项计划纲要是当我不在职时通过的，而且正好与我的建议背道而驰，而具体建造也是当我不在时进行的。

我并不是说，当时我站在最最正确的立场上，而且善于预见最新的事物，但我敢说：如果我的建议能被采纳，那么到1952～1953年前我们就会拥有航空母舰、潜艇、登陆舰、有强大对空武器的重巡洋舰，而现在把它们改装为导弹舰就不会很困难，而且我们会拥有最先进的舰队驱逐舰，等等。

战后舰艇建造计划纲要是当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而且违背我的意见而通过的，这些舰艇的建造基本上也是当我离开时的1946～1951年间实施的。战后第一个舰艇建造计划纲要的情况实际上就是如此。

1951年第二次任命我去莫斯科工作后，经过熟悉情况我在各部、处的帮助下细致而艰苦地进行工作（这一点许多人可以证实），随即对存在的所有缺点向部长会议主席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我是不得已写这个报告的，而且认为这是我作为党员的责任，因为按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改变现状，而除了写书面报告我没有其他机会亲自向斯大林同志陈述，因为我没有可能当面去向他汇报。

不是客观地分析这个十分重要的报告并采取应有的措施（而这份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当时就揭露出一些至今仍应予以纠正的重大缺点），而是对我进行了一连串侮辱性的攻击，说我徒劳无益地对

最先进的舰艇横加指责，结果那些重大缺点竟未获任何解决。

我恳切地请求您阅读一下维·亚·马雷舍夫<sup>①</sup>同志对我的报告所做的摘要呈报，其中我几乎被指责为从事危害国家的活动，似乎我不正确地指出我国舰艇的缺点，而这些舰艇则是最先进的。呈报上的一笔批示就结束了这一件事。

我援引这一点是为了通过文件来证明：我在当时就不是，如同后来朱可夫到处断言的那样，一个看不见缺点的落后的人。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可以报告说（而这一点可以查对），即还在1951年时是我第一个提出了关于火箭武器的问题。当1954年我经力争而获得在里海的一艘巡洋舰上进行首次试安装（火箭武器）时，尽管谢·格·戈尔什科夫同志反对（他建议安装在一艘待修的巡洋舰上），我还是下令为此派出最好和最新的“纳希莫夫”号巡洋舰，以便尽量不失时机和尽快地进行试验。这一点谢·格·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完全可以作证。

当在斯大林同志那里讨论由飞机发射导弹的问题时，我竭尽全力坚持，而且终于获准尽快地为海军安装一枚岸防用的试验性的样品。

“纳希莫夫”号巡洋舰和海军的海岸防御部队还在1954~1955年我在职时就完成了这种新武器试验性样品的安装，而海岸防御部队的岸防导弹发射装置（《箭》）已经进行了实弹射击试验。

在斯大林同志去世后，考虑到在他晚年我实际上不可能直接见他解决一些问题，我设想情况发生了变化，便在1953年8月6日写了一份报告给国防部长，在其中陈述了自己对海军任务的观点，由于并不自以为完全正确，我请求责成总参谋部进行研究并准备供

---

<sup>①</sup> 马雷舍夫，维·亚·（1902~1957），苏联工程技术勤务上将，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造船工业部部长。

讨论的问题。我请求责成总参谋部进行研究，是因为我始终坚信，在决定应建设什么样的海军问题之前，应当首先清楚确定海军在武装力量体系中的地位和一旦发生战争时海军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一条，那么甚至都无法提出应如何建设海军的建议。我的建议未被采纳，而是建议我提供一份舰艇建造计划。这样就产生了新的舰艇建造计划，这份计划后来终于被送回给总参谋部研究，但时间丧失了。由于看来对新的舰艇建造计划指出的错误而对我进行的指责，更胜于旧计划的问题，所以我想依据事实更详细地作些说明。

在1954年3月31日的报告中，我呈交了舰艇建造计划。由于发生的各种情况和我个人的仔细研究，我不否认它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如提出的舰艇数量过多，对新舰艇和新技术器材的严格要求不足，不过我想说明，它是怎样最后呈送给政府的。

当我接到呈交计划的命令时，还得到一个指示，即要求，那怕是按最粗略的近似值也好，同船舶制造工业部进行磋商。虽然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船舶制造工业部建议的期限，但认为必需尽量符合实际状况。因此，在这份计划中（请根据文件加以证实）列入了所有最先进的舰艇，但是看来它们显然不够，而且把期限推得较后。我敢断言，这些期限看来就是现在也未必能够得到遵守，而它们真是这样倒也好。

但是，我可以十分坦率地承认，在这份计划中列入了许多原则上陈旧的舰只，而我也没有足够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它们。对我的这一指责是完全正确的。其原因在于害怕在某一个时期内万一发生战争而我们却没有舰艇。

形式上这份由国防部长布尔加宁<sup>①</sup>同志、总参谋长索科洛夫

---

<sup>①</sup> 布尔加宁，尼·阿·（1895～1975），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苏联国防部长。

斯基同志和我签署的文件的草拟过程是这样的：

当计划初稿完成而人们建议我把它带到南方呈交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同志时，我专门请他责成留下来代理他工作的华西列夫斯基<sup>①</sup>同志和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同志一起，而且一定要吸收朱可夫同志参加，再一次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那里讨论一次，而在看法完全一致之后再送交给部长。

这次会议得以召开，我同意了他们提出的所有修改意见。朱可夫同志要求对航空母舰和登陆艇作很大的缩减。这使我感到特别奇怪，但我也还是接受了这一点。

这样，准备好提交给政府的文件经过协商取得完全一致，而且，我很清楚地记得，部长本人甚至反对我想在最后定稿时增加航空母舰数量的愿望。

文件形成的经过就是如此。我愿意为这份文件承担责任，而不想把责任推诿给签署和批准这份计划的其他人。我之所以汇报这些情况，是为了希望就这个问题形成一个正确的、真实的景象。

由于知道舰艇建造正在按照旧的计划进行，因而必须就新的计划，特别是其设计部分（这甚至比建造本身更加重要，因为在设计时已经为优良的舰艇奠定了基础，或者造成了错误，而设计总是需要先一步开始）立即做出决定，我竭尽全力争取尽快地审视这个计划，而首先又是设计计划。由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和我签署的（再重复一次）计划送交苏共中央，以便在那里进行一次初步的研究。在第一次审查时作了不大的修改，并在几天之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略加扩大的会议上进行了审查。

我草拟了一个决议草案，其中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由它在

---

<sup>①</sup> 华西列夫斯基，阿·米·（1895～1977），苏联元帅，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时任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2~3个月的期限内更加细致地讨论这个计划，同工业部门进行磋商，并最后确定：应当建造哪些舰艇，以及何时建造完成（这份决议保存了下来）。我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决议是不能仓促作出的，因而也没有提出过别的决议案。

当上述会议又一次把审定计划，甚至把成立委员会也搁置下来，我竟无法控制自己，大喊大叫地一再坚持不能再拖延而不作出决定，因为反正在最后决定之前还要经过多次研究，同时我也怕又要整整花费一年时间。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完全是下意识的，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病态的现象，而且在那次之前和之后都不曾重复发生过。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也没有对任何人有过大喊大叫或任何粗暴的态度，这一点海军的同志们可以证明。这是我的过错，而且我一直为发生此事感到羞愧。

后来这个问题得到讨论，而我也得以加速了新的舰艇的建造，我高兴地这样做了。

根据我的建议，通过了设计新的技术器材的决定。

以上就是我想汇报的事实，我无意缩小自己的过错，而为此我已受到了严厉的惩处，我的关于新计划的建议幸好没有造成物质上的损失，及时得到了纠正。

除了以上我作出答复的对我的正式指责以外，我还想提到我受到责难的其他一些问题。

1. 关于部一级机构的组建问题，有人指责我似乎观点保守，似乎我坚持成立单独的海军部。

列举事实如下：1946年1月12日，也即卫国战争刚刚结束之后，我经过仔细研究向人民委员会主席提出报告，说明，战争经验表明必须把所有武装力量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之下。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观点，而且1953年又一次呈送了这一报告的复制件。不过，联合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而我对于部一级机构组建的个别问题

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的分歧可归纳如下：在现代战争中全国都参加作战，而国防部是纯军事问题上的执行机关，战时（这时几乎人人都是军人）国防部长不可能像新的国防部工作条例说的那样，成为全部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全国人民应当知道，在战争期间领导一切的是最最高级的机关和国内威望最高的人物。如果让国防部处于这样的地位，会造成很坏的后果，即国防部长会力求把过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鉴于必须统一安排各种作战计划和几乎所有战役均由各军种共同实施，因此应当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我认为，如果各军种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取消了它们各自成效卓著的作战机关、后方机构、侦察部门，那会是危险的事。仅仅由一名部长和仅仅靠总参谋部是无法指导战争的。一系列的战役应当责成各军种总司令去付诸实施。

也许我的看法未必正确，但我以为如此。而我所写的统一组织的体系是和现行的体系不同的。主要的是，说我主张某种有害的独立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2. 关于战争初期问题，我只想用现有的文件来批驳朱可夫同志关于不能在几天之内让部队作好防御准备的论断。谁也没有妨碍他这样做，而相反，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

通过查阅文件即可加以核对的事实如下：各舰队在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时间内逐渐转入相应的作战准备，所有海军基地实行了灯火管制。战争前夕（约晚上9时左右），我被召唤去见铁木辛哥<sup>①</sup>同志，接受了做好迎击可能攻击的准备的指示。这时，我和参谋长需

<sup>①</sup> 铁木辛哥，谢·米·（1895～1970），苏联元帅，两次获苏联英雄称号，卫国战争爆发前夕，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要做的只是从铁木辛哥同志办公室打一个电话到指挥所，把规定的信号转发到各个舰队。一接到信号人人都知道该做什么。

结果，当夜12时（1941年6月22时0时）我已经收到各舰队关于实际作好战斗准备的报告，而且后来得知敌人旨在消灭我舰艇而实施的对我主要海军基地的袭击均无战果。这一点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海军在战争初期如果受到损失在战争期间已经无法恢复。当时的各舰队司令员和文件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上次战争初期的问题，以及今后不再重复当时的教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应当在最高级别上对它进行十分详尽的讨论。

依据此次汇报，请求责成国防部长查阅我在今年7月8日信函中指出的文件，并接见我以便当面加以说明。我想要陈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可能会带来好处。

关于我个人问题，由于在朱可夫同志公开怂恿的情况下在我离开以后对我提出了许多不恰当的和明显诬陷性的指责，我也想向国防部长就此作简要汇报。

共产党员 （尼·库兹涅佐夫）

1957年11月8日

№03185

## 库兹涅佐夫要求恢复名誉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

(1969年3月31日)

查阅了涉及我的文件（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和苏共中央决议）以后，我，作为一名苏共党员，认为自己有责任陈述意见，以便澄清客观事实。

我不认为抱怨这两个决议过于严厉是正确的，但是不能认为没有我参加、不向我提出具体的指责，又不让我陈述事实的真相而通过这两个决议，竟会是正确的。

关于两项决议的实质。写进苏共中央决议的对我的重要指责之一，也是据以对我从党的系统进行处分的原因，是我对于海军发展所持的“不正确观点”。在决议中并未引用这方面的任何证据。我断言，海军对伟大卫国战争的准备情况，以及它的作战行动（当我担任海军人民委员兼海军总司令期间）提供的是相反的证明。战后时期我曾不止一次去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或去国防人民委员那里汇报自己的观点，而我从不曾因自己观点的错误而遭到斥责。

如果向我出示了通过决议所用作为根据的那些文件，我肯定会陈述自己的观点，并用实际材料加以证实。

如果苏共中央认为不可能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我不会坚持己见，但只请求通知我这一点。

尼·库兹涅佐夫

№03186

##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 恢复名誉致勃列日涅夫信

(1981年4月9日)

敬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您知道我的丈夫——尼·格·库兹涅佐夫。您在演讲时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名字。1965年您在一次报告中把他的名字列入伟大卫国战争军事首长之内。

1956年对库兹涅佐夫作出了严厉的决定——他的军衔从苏联海军元帅降为海军中将。

从那时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也许，如此久远的时间，在海军长期服役（从17岁开始），担任海军领导工作14年（自1939～1955年），苏共党员和80岁的高龄（1982年7月）会受到人们的关注，而您，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会认为有可能下达指示研究需要的文件，并帮助重新审查原先的决定。当时对尼·格·库兹涅佐夫的严厉处分是他不在场、也不向他出示指责内容的情况下作出的。他写的信，请求召唤他去作些解释的信，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从那时至今，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许多文件已为人所知。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1977年版，第4卷，第511页）中，尼·格·库兹涅佐夫被称为苏联军事活动家，那里对他的活动作了良好的评价。

在巴索夫所著《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海军》一书（科学出版社，1980年，莫斯科版）中，通过文献对他的工作作了介绍。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高度评价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功勋：1945年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他荣膺11枚勋章。

退休后，尼·格·库兹涅佐夫写了4本书和许多文章。他的所有著作都充满了对祖国和海军无限热爱和无比忠诚的精神。

时间在流逝，知道尼·格·库兹涅佐夫的人们不断离去，而处分却保留着。这一处分不仅由他承担着，而且由海军的历史和由我们全家承担着。我难以相信，他将永久把这一处分背负下去。

恢复原军衔的做法已有先例。例如，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1977年版，第4卷，第517页）中，记载了格·伊·库利克<sup>①</sup>死后恢复苏联元帅军衔的事实。

我恳切地请求您，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帮助恢复尼·格·库兹涅佐夫的良好名声，他最热爱海军，认为在海军的队伍中服役是光荣和幸福，并且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为祖国服务的事业。

写这封信对我并不轻松，我向您说出了自己的全部精神上的痛苦。请您帮助我实现我的请求，并原谅占去了您的时间。

祝您，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健康长寿，在为苏联人民和我们祖国的福利而进行的巨大事业中取得重大成功。

致以深深的敬意。

薇·库兹涅佐娃

苏共中央：

薇·尼·库兹涅佐娃关于死后恢复海军中将尼·格·库兹涅佐夫苏

<sup>①</sup> 库利克，Г. И.（1890～1950），苏联元帅。1947年1月被指控犯有反苏维埃的敌对行动而下狱（库兹涅佐夫也因牵涉此案而被撤职）。1950年1月24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957年平反昭雪，并恢复苏联元帅军衔。

联海军元帅军衔的请求，由国防部（谢·格·戈尔什科夫同志、伊·尼·什卡多夫<sup>①</sup>同志）接受委托进行审查研究，但未予支持。

尼·格·库兹涅佐夫同志生于1902年7月11日，自1919年10月至1956年2月在海军服役。

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副海军人民委员、海军人民委员、海军部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1956年2月退役。1974年去世。

在服役期间，两次被降低军衔和职务。后一次系由1955年12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因对海军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而撤销海军总司令职务。1956年2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将其军衔由苏联海军元帅降为海军中将。各个舰队曾发现纪律状况和工作组织状况极差，并发生重大事故、毁损和灾祸，其中包括“诺沃罗西斯克”号战列舰的沉没。

认为可以同意国防部的意见。

已经对薇·尼·库兹涅佐娃同志作了相应的解释。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管理部副部长 萨温金

1981年6月9日

---

<sup>①</sup> 什卡多夫，伊·尼·（1913~1991），苏联大将，时任苏联国防部总干部部部长。

№03187

##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 恢复名誉致安德罗波夫信

(1983年8月5日)

最尊敬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请原谅我，不顾您本人如此极度繁忙，竟贸然直接向您写信，请求您帮助恢复我丈夫的真实面目。

这封信是我今年5月9日写的，但一直不敢寄出。在我们祖国庆祝辉煌战绩的日子里，听到和读到有关人们怀念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消息，我痛苦地想着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命运。

1956年他受到处分——军衔从苏联海军元帅降到海军中将，撤销现任职务，并无权在海军工作。

库兹涅佐夫向各级高层领导多次写信，请求给他机会谈谈他的看法，但没有得到过一次回信。没有任何人召唤过他和同他谈话。而党内的处分他是直到1969年才知道的。

在整理丈夫文件的时候，我找到他的申诉信底稿，其中注明他请求在研究他的案件时应予以核查的，足以证明他无罪的文件的编号。

当时对他的指责是：对潜艇认识不足（在《海军文集》1980年第10期上载有海军元帅谢尔盖耶夫的文章，批驳了这种指责）、对海军火箭武器认识不足、技术落后和在海军中没有威信。

还在1981年读到所有这一切以后，我写信请求查阅库兹涅佐

夫指出的文件，并请求复查他的案件。当时我收到苏共中央所属海军工作部帕宁同志的电话答复：“我们了解所有情况，但一切仍然照旧。”听到这样的答复令人痛苦。要知道，在这样的回答后面，站着一个人正直诚实的人，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生命都贡献给了海军。

我知道，这个勇敢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到了多少不公正待遇和侮辱性的对待，而又极其尊严地活过了一生中最后的18个年头。不应有的责难并没有将他摧垮。所有这些年份，他在家里（档案材料不对他开放）撰写关于海军的回忆录。直到生命终止，他一直相信并等待真理必将取胜——因为不可能不是这样！

许多同志写信为他申辩。他们写信给库兹涅佐夫，告诉了他。这些信件保存在我这里。现附上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一封此类信函的复制件。

我至今不断收到许多信。海军的老兵们写道：“我们都知道，在服役最后阶段库兹涅佐夫被降了职。既然他的那些政府奖励和1945年获得的苏联英雄金星奖章都不能减轻对他的处分，那他一定是犯了某种极大的失算和错误，是吗？”这就引起了不必要的议论。对此我能回答什么呢？青年人也越来越多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想知道真相。库兹涅佐夫也曾经想知道真相。这是我在他的札记中找到的话：“请求复查我的案件的同志们从海军各级领导机关得到的答复是：不必重翻旧账。而我就正是要请求重翻我的旧案，想知道我是无辜受处分的，还是应当加重处分？”在札记中我发现他对“诺沃罗西斯克”号惨剧的论述，为这件事库兹涅佐夫也受到处分。为此受处分的还有舰队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舰队司令员，但他们的处分早已撤销。现在惟一的罪魁祸首只剩下库兹涅佐夫一个，尽管事故发生时，库兹涅佐夫已经半年没有工作了。

海军老兵们相信，正如同库兹涅佐夫本人也相信的那样，时间

一到，他会被证明无罪。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保存着库兹涅佐夫的书，当作最需要的书，他们是如何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无比痛心，“……人民的良知，牺牲了的和幸存的胜利者的良知，不会容忍也永远不会容忍这样的事，无论现在和将来发生什么情况……一代又一代水兵将会记得和尊敬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水兵，还有一条战舰，即使库兹涅佐夫的战友离开人世，对他的记忆仍将存在，并将一代一代流传下去，永世长存，海军将尊敬和以极其尊敬的心情怀念尼·格·库兹涅佐夫。”

我简要摘引给我的信件中的段落，是为了证明指责库兹涅佐夫在海军中没有威信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时间在流逝。和时间一起，了解库兹涅佐夫的人们也相继离去，对他的不公正的处分却保留着。这个处分不仅涉及他本人自己，而且留在海军的历史上，留给了我们全家和我们的子孙。怎样向他们解释所有这一切呢？

因此，我才写信给您，请您为尼·格·库兹涅佐夫的荣誉主持公道。

恳切地请求您找人核查库兹涅佐夫指出的所有文件，查阅其中表示“支持”和“反对”库兹涅佐夫的信函，也许这样才能够提出修改1956年的决定的问题，以便撤销对他作出的对军人的最重的处分——降低军衔，而这军衔是他因参加伟大卫国战争而获得的。恢复库兹涅佐夫的军衔对于教育我们青年的工作还能起长久的作用，而且我坚信，目前在海军中也会受到欢迎。

这样做在道义上也是对那样一些人的惩罚，他们知道存在库兹涅佐夫指出的文件，但并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为他辩白，而是为谎言作证；这样做可以制止各种不应有的议论，正如1951年库兹涅佐夫回到莫斯科海军部上任并恢复原先军衔以后各种议论随即停止流传一样。那样真相将被澄清，而现在谁也不记得1947年的事



件。

这样的修改是有先例可援的。例如，《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9卷第517页上载明：格·伊·库利克于死后恢复元帅军衔。

我写这封信并不轻松。我十分清楚，本不应由我来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找不到这样的人。

我衷心希望我的请求能够得到您的关注。如果有需要用到库兹涅佐夫的信稿，我认为有义务把它们提供出来。

致以敬意

薇·库兹涅佐娃

附 件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信函

致苏共中央书记处

由于意识到在斯大林生前时期造成的，而1956年又因尼·谢·赫鲁晓夫和格·康·朱可夫的倡议而再次重复的对原苏联海军元帅——现退休海军中将——尼·格·库兹涅佐夫的明显不公正待遇，我不得不请求苏共中央书记处派人据以造成这种不公正对待的材料进行复查，以便尔后通过相应的决定予以撤销。

在战前时期和特别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以及在战后年代，我因为所担任工作的性质而得以亲眼目睹尼·格·库兹涅佐夫同志对于党和政府委托给他的责任重大的工作领域所进行的始终卓越不凡的，高超干练的领导工作。

我确信，恢复尼·格·库兹涅佐夫同志无辜被剥夺的军衔并将他列入国防部所属总监察员组无疑是公正的，并能受到武装力量，特别是海军熟悉他的全体人员的欢迎，因为过去和现在他都拥有崇高

的完全当之无愧的威望。

苏联元帅 亚·华西列夫斯基

1966年4月9日

苏共中央：

根据指示，对原海军总司令遗孀薇·尼·库兹涅佐娃关于死后恢复海军中将尼·格·库兹涅佐夫苏联海军元帅军衔的请求进行了研究。

尼·格·库兹涅佐夫同志，1902年生，俄罗斯族人，自1919年至1956年在海军服役，1925年参加苏共。为苏联英雄（1945年9月14日）。曾参加在西班牙的作战。自1939至1946年为海军人民委员，自1946至1947及自1953至1955年为海军总司令。1955年3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授予苏联海军元帅军衔。1956年2月退休，1974年去世。

1947年1月17日由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被解除海军总司令职务，并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请求经苏联人民委员会于1948年2月10日通过决议降两级军衔为海军中将。1953年5月，他被恢复为原军衔及海军总司令职务。

1955年12月8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因他对海军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而再次被撤销海军总司令职务。1956年2月13日苏共中央《关于海军中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决议中指出：在各舰队战斗准备和军人纪律方面，以及在领导干部的教育方面存在重大的缺点。

由于黑海舰队军官和将军的疏忽大意和军事技术知识不足，以及勤务组织状况和纪律低下，发生了“诺沃罗西斯克”号战列舰沉没并造成大量人员牺牲的事故。由于军人纪律状况不佳及人员的海

军技能训练很差，在太平洋舰队和北海舰队也多次发生各种事故。

海军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是原海军总司令尼·格·库兹涅佐夫同志不正确和不干练的领导造成的结果，为此对他给予记过处分。他对海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作了错误的估计，在海军今后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上的观点和设想也犯有错误，领导干部的训练遭到忽视。

1956年2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因尼·格·库兹涅佐夫的业务素质不符合苏联海军元帅的要求，将其军衔降为海军中将，并予以退休处理。

鉴于海军中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苏共中央认为有必要于1956年2月13日向苏军和苏联海军的军官、政工人员和党组织发出秘密信件，要求在陆海军的党组织中进行广泛讨论，受到一致拥护。

1969年6月2日，苏共中央又根据国防部和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的申报撤销了对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党内“记过”处分。

1981年6月，对薇·尼·库兹涅佐娃关于通过死后追认的方法恢复她丈夫苏联海军元帅军衔的请求进行了研究，但在苏共中央和国防部（谢·格·戈尔什科夫同志和伊·尼·什卡多夫同志）未得到支持。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修改原先关于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决定是不适宜的。

苏联国防部（德·费·乌斯季诺夫同志）同意这个意见。我们已对薇·尼·库兹尼佐娃同志作了相应的解释。

苏共中央行政管理部部长 萨温金

1983年9月21日

№03188

## 一批海军将领要求为库兹涅佐夫 恢复名誉致契尔年科信

(1984 年 10 月 24 日)

致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

亲爱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

联系到筹备庆祝苏联人民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 40 周年，我们向您提出申请：完全恢复伟大卫国战争杰出海军统帅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良好声誉。

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和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都很清楚尼·格·库兹涅佐夫在我国生活中，在海军的建设和战斗活动中的作用。

在共产党培养出来的一大批极大地丰富了祖国海军的传统，并且表现了高超的军事学术的海军将领的璀璨群星中，尼·格·库兹涅佐夫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 1984 年 9 月 25 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的周年纪念全体会议上的演说《确认生活的真理、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中，您绝对公正地说道：“既不应简单抄写历史，也不应修改剪辑历史……而为了不违背真实，艺术家必须、只能站在事实的土壤之上……”

1945 年 9 月 1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称：“为了表彰模范地执行最高统帅关于指挥各舰队，包括太平洋舰队作战行动的任务，以及在这些作战行动中获得的战果，授予海军元帅尼

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苏联英雄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一年以前，即1983年5月9日，《真理报》刊载德·费·乌斯季诺夫《不朽的功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和其他杰出的军事首长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巴格拉米扬一起，也提到尼·格·库兹涅佐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主编委员会由德·费·乌斯季诺夫领导）的第12卷中指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也有海军上将尼·格·库兹涅佐夫，负责执行重要的任务。

以上对海军将领库兹涅佐夫的高度评价，公正地反映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对他的海军统帅活动的认识。尼·格·库兹涅佐夫出身于西北沿海地区劳动者家庭，是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也积极参加过西班牙人民的解放战争。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37岁时，尼·格·库兹涅佐夫被提升到苏联海军人民委员的岗位上。这是在伟大卫国战争爆发的两年之前。在很短的时间内，由于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努力，各舰队和区舰队的战斗准备程度大大提高。在战争爆发的前3天，尼·格·库兹涅佐夫下令各舰队转入加强性作战准备，而在法西斯军队入侵苏联的几个小时以前他又宣布各舰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各舰队和区舰队是在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战争爆发的。在伟大卫国战争时期，海军统帅尼·格·库兹涅佐夫的组织才能得到最明显的反映。

在战争第一时期的1941～1942年，苏德战场上进行着艰苦的浴血奋战。在从雷巴契半岛到伊兹梅尔的战线的战略侧翼，苏联海军的舰艇和部队进行了奋不顾身的作战。在顽强的战斗中，他们迟滞了敌军的进攻，并破坏了企图合围我军的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苏军部队的展开和准备在主要战略方向上转入反攻。这一时期海军人民委员和总司令部在组织和指挥舰队和区舰队方面的重要作用是难以估计的。

他组建起 10 个新的区舰队及 25 个海军步兵旅，在大本营领导下参加滨海各英雄城市防御的组织。以上所述远不是海军人民委员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庞大组织工作的全部内容。

在这一时期，我们这些战争的老兵，在波罗的海、北海、黑海、太平洋，以及在各个区舰队，都感觉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坚强领导。他每一次来到舰队，都引起全体人员热情高涨。水兵和军官都热爱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

1944 年来临了。拥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在苏联武装力量实施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的时期中，顺利有效地指挥了各舰队和区舰队的作战行动。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 年》一书的同一卷中，援引了有价值的资料。在祖国海军历史上，我军舰队和区舰队在 1943~1945 年期间第一次积极地参加了 5 次合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苏联海军官兵的这一功勋，以光辉的金色字母写入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而且作为在十分复杂的条件下陆海军密切协同动作的辉煌范例成为苏联武装力量的骄傲。也是在这一时期，尼·格·库兹涅佐夫作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和海军总司令，顺利有效地指挥了所有舰队和区舰队在联合作战中和海军独立作战中的行动。

1945 年 8 月，满洲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与此相联系，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写道：“大本营把直接领导远东海军的责任委托给海军总司令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尼·格·库兹涅佐夫是著名的海军军事家之一。他曾任巡洋舰舰长，我国驻西班牙共和国的海军武官，太平洋舰队司令等职，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任海军人民委员。”（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政治书籍出版社，1976 年莫斯科版，第 563 页。）

这次大规模战略性进攻战役，尼·格·库兹涅佐夫在协调太平洋舰队和各个区舰队的作战行动方面的作用，是广为人知的。

战争结束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奠定建设现代化海洋火箭核海军基础的措施是与海军将领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战后领导我国武装力量新时期建设的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清楚地知道，在我国海军发展的这个时期尼·格·库兹涅佐夫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亲爱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我们深信，公正地解决尼·格·库兹涅佐夫的问题不仅会受到战争老兵，十分了解他的指战员和政工人员的普遍赞许，而且还会受到年轻军官（还不僅僅是海军军官）的普遍赞许。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名字，无论在我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恳切地请您发出指示研究我们的以下建议：

——按照对库利克元帅做出的决定那样，死后恢复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军衔——苏联海军元帅；

——以海军上将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命名一艘作战舰艇；

——在莫斯科高尔基街上，尼·格·库兹涅佐夫晚年居住的那所房子墙上安置纪念碑；

——出版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选集；

——以尼古拉·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他的家乡各命名一条街道；

——以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命名一所海军学校；

——把海军学院优秀学员的奖学金称作尼·格·库兹涅佐夫奖学金。

我们认为，像尼·格·库兹涅佐夫这样的人是我们苏维埃祖国的财富，应能牢固地写进祖国的光荣历史。

预先向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为关注我们的申请表示感谢。我们相信，它反映了广大海军官兵的意见。

致以深深的敬意

苏共党员，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  
1932年苏共党员、海军上将 А. Т. 恰巴年科  
1918年苏共党员、海军中将 М. З. 莫斯卡连科  
1924年苏共党员、海军中将 М. А. 沃龙佐夫  
1932年苏共党员、海军中将 Б. В. 苏佳金  
1938年苏共党员、海军中将 В. С. 切罗科夫  
1939年苏共党员、苏联英雄、海军中将 Г. И. 谢德林  
1940年苏共党员、苏联英雄、空军中将 П. И. 霍赫洛夫  
1940年苏共党员、海军中将 Г. Г. 托尔斯托鲁茨基  
苏联国家奖获得者、1941年苏共党员、中将  
В. П. 库德里亚夫采夫  
1943年苏共党员、海军中将 Ю. В. 伊凡诺夫  
1931年苏共党员、海军少将 Б. Н. 博布科夫  
1939年苏共党员、海军少将 А. З. 希林  
1939年苏共党员、海军少将 П. В. 加尔金  
1941年苏共党员、海军少将 Д. А. 维尔希宁  
1941年苏共党员、海军少将 В. М. 普罗科菲耶夫  
1927年苏共党员、上校 Н. С. 弗鲁姆金  
1939年苏共党员、海军上校 В. П. 萨哈罗夫  
1942年苏共党员、海军上校 С. В. 法布里奇诺夫

苏共中央：

一批海军老兵（А. Т. 恰巴年科同志、М. З. 莫斯卡连科同志、Г. Г. 托尔斯托鲁茨基同志等）联名写信建议恢复原海军总司令尼·格·库兹涅佐夫同志的苏联海军元帅军衔，并规定一些措施



对他表示永远的纪念。这个问题原先在苏共中央曾多次进行过讨论，但均未作出正面的决定。

Г. Г. 托尔斯托鲁茨基同志被邀请到行政机关管理部，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解释。

请求将此信与 1983 年薇·尼·库兹涅佐娃（莫斯科市）的信一并归档。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管理部副部长 К. 索什尼科夫

1984 年 12 月 20 日

№03189

##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

### 恢复名誉致契尔年科信

(1985年2月6日)

最尊敬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

尽管您极其繁忙，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我还是决定给您写信，请求您帮助我解决我这个非常复杂困难的求助事件。

我力求写得简短一些。

我的丈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于1956年受到处分，军衔从苏联海军元帅降为海军中将，并被清退出军队而无权再在军队工作。通过决定时他本人并不在场。而党内处分他又是在13年之后才知道的。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曾向各级领导写信投诉。他在信中列出一些文件号码，请求核查这些文件，并召唤他去进行解释。没有人给他答复。

在他的文件中我发现了这些信的底稿，于是我先后两次写信给苏共中央（1981年）和苏联最高苏维埃（1983年）。得到的电话答复是：“我们了解所有情况，但时间还没有到，”和“我们了解所有情况，但指控仍然存在，”说他被指责为维持纪律问题，受指控的不只是他一个。

这个回答使我回想起，1957年11月8日库兹涅佐夫曾写信给苏共中央主席团。这封信我反复读过几遍，所以清楚记得信的内容。在这封信中，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详尽地并以文件为根据讲

明了自己的错误所在，以及对哪些指责他不同意和为什么。他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一次搁置讨论舰艇建造计划的会议上表现完全是下意识的，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病态的现象。“即使在战争期间，我也没有对任何人有过粗暴的态度，这一点海军的同志们可以作证。这是我的过错，而且一直为发生的事感到羞愧。我所陈述的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可能会带来好处。”

我恳切地请求您指示人在档案中找到这封信，并且看一看。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对自己的遭遇十分难过，但他从没有抱怨过对他处分过严。他只是可惜，当时谁也没有召唤他去谈一谈。但使他最为痛心的是，对他的处分却无意地也落到了海军身上。

现在人们是这样写到他的，说他作为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对于战胜敌人作出了巨大的个人贡献，说他坚定果断地指挥了海军的作战行动并且巧妙地实现了海军同陆军的协同动作，说他在苏联海军军人中拥有极高的威信，并受到同盟大国专家们的尊敬。（《知识》杂志 1983 年第 11 期）

许多人写信为库兹涅佐夫申辩。写信给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就有苏联元帅亚·米·华西列夫斯基。

至今为止，对他的处分一直造成许多人的误解，引起各种臆测。越来越多的来自库兹涅佐夫家乡的年轻人、大学生乃至中学生（库兹涅佐夫最小的孙子就在那个学校里读书）问起我原因何在。而他现在的军衔则又会造成报刊上不提及他曾参加过的事件和事业的重要性，甚至加以捏造。

以下是几个例子：

1. 报刊上出现过几张照片，但库兹涅佐夫从中被剪去了。
2. 人们拒绝印制带有库兹涅佐夫照片的邮票和信封（科特拉斯市党委为了庆祝胜利 40 周年曾提出此项请求），理由是不知道该

按什么军衔印制库兹涅佐夫的肖像，而无论采用什么军衔，都会引来大量信函询问而不知该如何回答。

3. 拒绝再版库兹涅佐夫《把握航向，驶向胜利》一书，而出版社为庆祝胜利40周年已作好再版准备。（附上出版社的来函）

不断发生着许许多多其他类似的玷污对库兹涅佐夫的怀念和令人为他而感到痛心和羞辱的事件。

我是在胜利40周年给您写信的，这时正值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以特别感激的心情怀念为把我们祖国和全人类从法西斯恐怖下解救出来的事业做出贡献的人们。他们的名字、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和他们在同法西斯艰苦奋战中赢得的军衔，是人民的骄傲。由党提拔到这些岗位上并经党在艰苦战争岁月中予以考查的一些陆海军统帅，为赢得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某些军事首长辜负了党的信任，未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例如，苏联元帅格·伊·库利克就被降为少将）。但是，党和政府从尊重过去的功劳和缅怀纪念出发，予以平反并恢复了他们的军衔。

1956年和库兹涅佐夫一起受到处分的几个人，早已恢复了军衔。

我请求您，最尊敬的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找人复查尼·格·库兹涅佐夫的案件，并帮助予以平反——恢复尼·格·库兹涅佐夫因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功绩而获得的苏联海军元帅的军衔，规定纪念他的名字、他对胜利的贡献和在战前年代和整个战争过程中在海军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尼·格·库兹涅佐夫在他被降级和从海军退役后所撰写的书和文章。

海军官兵、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同时代人、战争老兵，都以崇敬的怀念心情把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看做为苏联海军元帅，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还在尼·格·库兹涅佐夫生前，他的书就在这些国家出版问世），人们也记得他拥有这个军衔。来自这些国家的信函仍

然以海军元帅的军衔称呼他。

他的生平和事业仍能在很长时间内作为教育年轻军人的榜样。在我们祖国的重大节日期间，来莫斯科参加检阅的海军学校的学员一直向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墓献上水兵无沿帽的飘带。

请原谅我给您写信和占用了您的时间。

我为我所深知的人说出了自己的痛苦和感情。

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

薇·尼·库兹涅佐娃

附 件

### 经济出版社来函

1984年10月18日

103009，莫斯科

高尔基大街9号56室

致薇·尼·库兹涅佐娃同志

敬爱的薇拉·尼古拉耶夫娜！

我们深感惋惜，但不得不通知您，目前由经济出版社再版尼·格·库兹涅佐夫的《把握航向，驶向胜利》一书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给了出版社一系列出版发行有关经济实验问题书籍的紧急任务。出版社有限的规定限额无法同时实现这两种出版物的印行。据此，关于出版《把握航向，驶向胜利》一书的合同予以废除。

谨向您表示最深切的歉意。

致以敬意

И. Д. 特罗岑科

苏共中央：

原海军总司令的遗孀薇·尼·库兹涅佐娃在最近一封信中继续请求死后恢复海军中将尼·格·库兹涅佐夫的苏联海军元帅军衔。

这个问题原先在苏共中央曾多次进行过讨论，但并未得到积极的解决。

我们已通过电话向写信人作了必要的解释。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管理部副部长 А. 索什尼科夫

1985年3月27日

№03190

## 海军上校巴加耶夫要求为库兹涅佐夫 恢复名誉致苏共中央政治局信

(1985年3月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

苏联人民获得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40周年的日子正在到来。在严酷考验的年代中，共产党把前线和后方的努力联合到一起，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战斗营垒，鼓舞人民奋起斗争和争取胜利。

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战争年代，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才干卓越的统帅和军事首长表现了卓越不凡的组织能力，其中就有海军人民委员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他自1941年6月23日起至战争结束一直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在他的领导下，所有舰队都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迎击敌人的入侵，而在战斗过程中海军圆满地履行了对祖国的责任。

为了表彰他对海军的睿智领导，他于1945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和最高的军衔苏联海军元帅军衔。然而，1956年，在战争结束11年之后，他却失去了这一军衔。这种主观的、不公正的决定不仅仅伤害了他的名声，而且给成千上万的海军官兵造成误会和痛苦。这种痛苦至今未见消失。

考虑到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并未进行反党活动，没有犯过国事罪行和军人行为罪，请求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胜利40

周年前客观地审查和积极地解决以死后追认的方式恢复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苏联海军元帅的军衔。这是海军历史的需要。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退休海军上校 M. A. 巴加耶夫

苏共中央：

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退休海军上校巴加耶夫同志请求以死后追认的方式恢复原海军总司令、海军中将尼·格·库兹涅佐夫苏联海军元帅军衔。

这个问题原先在苏共中央曾不止一次进行讨论，但并未获得积极的解决。

我们已通过电话对写信人进行了必要的解释。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管理部副部长 B. 韦列夏金

督导员 A. 谢利瓦诺夫

1985年3月29日



№03191

## 库兹涅佐娃要求为库兹涅佐夫 恢复名誉致戈尔巴乔夫信

(1986年1月1日)

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前夕，正当国内进行十分巨大的、重要而又必不可少的变革，而人们又在大量谈论秩序、纪律和遵守法制之时，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向您写信，希望我的信（或其内容）能直接报告给您。

我贸然请求您帮助纠正由于尼·谢·赫鲁晓夫的示意而造成的对我丈夫尼·格·库兹涅佐夫的不公正的做法。

事情的实质在于：1956年尼·格·库兹涅佐夫受到严厉的处罚——撤销海军部长职务并无权在海军工作，军衔从因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功绩而授予的苏联海军元帅降为海军中将。这些处分是违反法制和党内准则而做出的（而党内处分，他则是在13年之后的1969年才知道的）。

尼·格·库兹涅佐夫认为不应当抱怨通过的决定过于严厉，但他却十分惋惜他未能把不同年代写给政府的报告的内容通报给领导人。正是因此他才不得不在1957年写信给苏共中央主席团——请求接见他、看一看据以作出此类决定的文件，并让他得以陈述看法。

他没有受到接见，也没有收到回信。后来尼·格·库兹涅佐夫写给各级高层领导的信也没有得到答复。

尼·格·库兹涅佐夫死后，我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论述他所遭遇的事情的札记，以及一些信稿，其中列出了他不同年份写给政府的报告的文件编号。

读过以后，我决定写信给苏共中央，建议看一看尼·格·库兹涅佐夫的材料。我设想这些材料可以有助于恢复公正。

我收到电话通知说：“我们一切都知道，但一切如旧。”

现在我也无法相信：尼·格·库兹涅佐夫札记的内容已为人所知，尼·格·库兹涅佐夫1957年写的信已有人研究过。

正因为如此，我才贸然给您写信，并恳求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找人了解一下·尼·格·库兹涅佐夫本人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始终相信，客观地审查他的案件便能为他的名字平反，而军人的荣誉也将重归于他（和尼·格·库兹涅佐夫一起被降低军衔的同志们早已恢复了原先的军衔）。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对他曾说过多少不公平的话。这个英勇无畏而又讲求原则的人经受了多少痛苦。他竟能经受住种种挫折而依然坚信无悔。在退休后的年份中，他一直在继续工作。

恳切地请求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帮助恢复尼·格·库兹涅佐夫的军衔，并让他没有瑕疵地在历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我很难相信，对我丈夫的处分会一直存在下去，并继续引发误解和各种议论。

向您致以深深的敬意。

薇·尼·库兹涅佐娃

苏共中央：

原海军总司令的遗孀薇·米·库兹涅佐娃在最近来信中并未提出新的问题，仍请求死后追认恢复海军中将尼·格·库兹涅佐夫苏联海

军元帅军衔。

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曾多次讨论，均未获积极解决。

我们已通过电话向写信人作了必要的解释。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管理部副处长 A. 谢利瓦诺夫

督导员 B. 卡姆恰特内

1986年5月13日

№03192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  
库兹涅佐夫原苏联海军  
元帅军衔的命令

(1988年7月26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

恢复海军中将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原苏联海军元  
帅军衔。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安·葛罗米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 Т. 緬捷沙什维利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88年7月26日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布拉格之春”

(1968年3~12月)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涌起了改革的热潮，试图根据本国国情，建设捷克斯洛伐克型社会主义，被称作“布拉格之春”。苏联在采取种种手段干预无效的情况下，召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民主德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军队，以华沙条约联合武装部队的名义，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迫使捷克斯洛伐克中止改革，继而改组了该国的党、政领导。本专题档案包括苏联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分析、对策研究、苏捷两党领导人在历次会谈中针锋相对的争论、苏联的决断等方面，反映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全过程。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王英杰翻译)

№01082

## 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

(1968年3月23日)

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越来越引起党的工作者、共产党员和苏联大众的重视。

因此认为有必要向党的机关发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简要通报。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地进行社会经济改造，在许多生活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之一。

苏共和捷共之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兄弟关系；经济的、文化的和党的联系发展顺利，相互之间在执行各自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团结一致。

但是，最近发生了引起某种忧虑的事件。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打着反政府反苏标语的大学生示威游行；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出现了反对捷共政策的反对派，提出了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和使社会生活“自由化”的要求。捷共党内党外开始发生尖锐争论，争论过程中，对党的经济、科学和文化政策的某些方面提出了疑问。

1967年10月，捷共中央召开了特别全会，审议了广泛的内政问题并赞同捷共中央“关于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的提纲。

在这次全会上，中央党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特别是

诺沃提尼<sup>①</sup>同志的工作，受到很多捷共中央委员的尖锐批评。对诺沃提尼提出了有关行政命令作风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意见。会上谈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一系列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相互关系的问题。

1967年12月，应捷共领导的邀请，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了布拉格。通过这次访问，我们才知道，在捷共中央主席团里存在着严重分歧，这不仅涉及诺沃提尼同志个人和在十月全会上提出的那些问题，而且关系到对捷共政策的更为广泛的分歧意见。诺沃提尼同志没有看到捷共中央已形成的真实的情况，也未能作出正确判断。

在这种条件下与捷共中央领导干部的接触，是为了强调捷共领导保持团结的重要性，不允许破坏团结和修改捷共总路线的事发生。在捷共中央十二月全会和一月全会上，又重新提出了党的领导以及现状的问题。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在其通过的决定中强调指出，党的当前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团结全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确保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经过对捷共中央主席团现状的激烈讨论，一月全会通过了把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位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分开的决定，满足了诺沃提尼同志关于解除他的第一书记职务的请求，选举了杜布切克同志担任这一职务。捷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了成员，新加入主席团的有皮列尔、什帕切克、里戈和博鲁夫卡同志。

在关于全会结果的报导中讲到，中央委员会的措施是旨在加强党和共和国。全会委托捷共中央主席团制定当前时期的《捷共行动纲领》。

---

<sup>①</sup> 诺沃提尼，安·（1904～1975），1953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7年起兼任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直至1968年。

在讨论捷共中央全会的决定的过程中，各党组织就社会生活和党的现状的最尖锐的问题展开了十分广泛的争论，争论主要锋芒是对各方面工作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

在同杜布切克同志会晤时（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同志在杜布切克访问莫斯科时同他的会晤，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索非亚参加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时同他的会晤），就捷共中央一月全会的事态的发展方向问题同他进行了详尽的交谈。同时，再次强调了捷共队伍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团结的重大决议，也强调了在当前复杂的条件下积极实现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性。

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派了高级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二月事件20周年<sup>①</sup>的庆典活动。在各代表团逗留期间，曾同捷共领导人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进行会谈，对很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表现表示担心，也谈到了必须给反党言行以回击，确保捷共领导层的统一和团结。杜布切克同志在所有场合都坚定地保证说，捷共中央新领导能控制住局势，不会让局势向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可是，最近事态正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要求成立“正式反对派”，“容忍”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的不负责任分子的言论日益增加。他们错误地阐述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关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对立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的建议，并强调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他们号召成立私人企业，放弃计划体制，扩大同西方的联系。不仅如此，一些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还不断宣传关于“党与政府完全分开”，让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回到马萨利

---

<sup>①</sup> 指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政府于1948年2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上台执政20周年。



克<sup>①</sup>和贝奈斯<sup>②</sup>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开放性社会”等呼吁。

捷国内，对相当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共和国总统、政府主席、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等）是否合适，正在进行毫不负责而且越来越激烈的讨论。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同志被迫辞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帕斯蒂日克同志，斯洛伐克民族议会议长胡迪克同志，共和国最高检察长巴尔图什卡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也被解除了职务。

必须指出，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在“充分自由”表达意见的口号下发表和播放不负责任的文章和言论，给群众以错误的导向，使他们脱离正确的道路，可是没有受到捷共领导人的回击。

与此同时，在不少地区和州的党代表会议上和企业的党组织会议上，人们对当前形势表示严重忧虑和不同意那些最近规模越来越大的错误事态与消极现象。他们提出必须制止这些带有反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负责任的言行。

帝国主义集团力图利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来败坏捷共政策的声誉，诋毁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社会主义成就，动摇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和其他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

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领导集团实际上并不隐瞒，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分裂，使党和人民、捷

---

① 马萨利克，托马斯·加利格（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任总统。1900年创立捷克人民党，1905年改称捷克进步党，为捷克的复国运动而努力。1918年10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正式成立，马萨利克当选为总统。以后连续当选，直到1935年因病辞职。

② 贝奈斯，安·（1884～1948），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1940年起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总统。1945年4月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总统。1948年二月事件后，6月7日宣布辞职，9月病逝。

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工人和知识分子、老年人和年轻人、政治活动家与专家对立。根据现有信息判断，西方寄希望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摆脱捷共的控制，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将遭破坏，帝国主义宣传机构企图对那些以国家社会生活“自由化”为借口提出实质上是反社会主义要求的活动家的任何不负责任的发言抓住不放，大做文章。

帝国主义集团不只限于进行宣传，而且企图积极影响事件的进程，使它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们首先致力于：

——鼓励对现实不满意的人和思想不坚定的人，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散布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困难是捷共经济政策失败造成的；

——使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身败名裂；

——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输送”到别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久前某些捷共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声明。捷共中央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科尔德同志在布拉格的一个区的党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不允许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成为发表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矛盾的观点的讲坛”。

杜布切克同志在布尔诺市党代表会议上宣称：“中央委员会将过问这件事，并进行领导……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但是，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采取具体行动。

由此可见，目前捷共内部发生的事情是复杂的，有的常常是互相矛盾的。

今年3月28日，捷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会议，讨论新的《捷共行动纲领》。

苏共中央委员会密切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同捷共

领导人以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兄弟党领导人保持着经常的接触。

苏共中央委员会信守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认识到自己对加强社会主义力量和团结社会主义阵营负有高度责任，因此曾采取过而现在仍在采取它应当采取的所有措施，以支持处于这种复杂局势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

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日内将举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同捷共中央领导人的新的会晤。

№01093

苏共中央联络部关于东欧四国对捷克斯洛伐克  
事态反应的报告<sup>①</sup>（摘录）

（1968年4月26日）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极大关注，所有这些国家都以某种形式表明自己对事件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作一番比较，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情况的了解。本报告列举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材料。

民主德国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其中包括乌布利希、昂纳克、斯多夫同志在内，在同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sup>②</sup>的谈话中都对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状况再三表示严重的忧虑，指出捷共领导缺乏明确的方针，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捷居民的影响在明显增长。朋友们提出了兄弟党必须给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提供集体帮助的意见，并认为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还应采取“极端措施”以确保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

① 本报告由苏联中央联络部部长鲁萨科夫报送苏共中央，由部长助理达鲁先科夫签署。报告中除了摘录所提到的国家立场外，还反映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朝鲜、越南、蒙古、和古巴的观点。

② 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大使为彼·阿勃拉西莫夫。

在口头宣传和报刊宣传中，德国朋友表现出沉着和耐心，没有发表任何可能被利用来损害民主德国及其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公开评论。但是，由于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一些捷克斯洛伐克活动家对西德报刊发表被直接用来反对民主德国，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政策及其领导人的声明，德国朋友认为有必要就敌人这些公开的敌意攻击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朋友们所强调指出的，在敌人充分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某些官方代表不负责任的声明对他们大肆进行宣传攻击的情况下，他们再也无法沉默不语和无所作为了。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哈格同志3月26日在柏林举行的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作总结发言时说：“西德的宣传中心在其掀起的反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运动中，总是援引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们不遗余力地引证林业部长斯姆尔科夫斯基的讲话；他们详细地报道记者和作家们对党的领导作用、对中央委员会及其工作机关以及对政府领导人的攻击。他们公开表示自己对这些言论和事件的好感……斯姆尔科夫斯基及其他人的发言，使他们产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将掉进施普林格新闻社所说的‘演变漩涡’的奢望。”接着哈格同志阐述了德累斯顿会议<sup>①</sup>的实质并声明说，德国统一社会党忠实于同捷共的传统的战斗联盟，支持坚持走社会主义建设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相信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中的健康力量。

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蓄意歪曲哈格同志的声明，并利用被歪曲

<sup>①</sup> 德累斯顿会晤是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议于1968年3月23日举行的。除苏共中央代表外，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最高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会晤。

的声明文本对民主德国进行攻击。

在民主德国报刊上发表的哈格同志的言论，被捷克斯洛伐克认定为对捷内政的干涉，并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些社会人士和国家新领导人<sup>①</sup>的极其强烈的抗议。在这个事件过程中，德国朋友通过外交渠道提请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注意捷通讯社歪曲哈格同志声明的事实，并要求相应地公开纠正错误。由于捷方没有满足这些要求，而且坚持要德国朋友宣布不同意哈格同志的声明，这事件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乌布利希同志在4月初同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谈话时说，“布拉格反革命分子”仍在继续发表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挑衅言论。在对新宪法进行全民投票之前，朋友们对此没有作出反应，但准备在全民投票之后对这些攻击进行相应驳斥。

根据斯多夫同志同苏联大使私下谈话时谈到的看法，杜布切克同志关于“新政策”的提法引起了疑惑。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被免职，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捷共新领导对事态的发展越来越失去控制，而杜布切克同志在党内没有足够的威望，并处于右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斯多夫同志认为切尔尼克是个虚伪的人，是个“大演员”，会“把捷克斯洛伐克引向极端错误的方向”。

4月8日，《新德意志报》刊登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米塔格同志在哈雷市召开的青年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包含了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的言论的间接论战。米塔格指出，有人试图建议民主德国经济自由化的道路，放

<sup>①</sup> 捷共中央1968年一月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举杜布切克担任第一书记。3月，斯沃博达被选为捷总统。1968年4月4日捷共中央全会选举了捷共中央新的主席团和书记处。4月8日，切尔尼克成为捷政府总理。

弃经过考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放手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和采取面向美元的方针。因此他强调指出，民主德国不想“陷入泥潭”，所以它以苏联为榜样，采取面向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苏联卢布的方针；同时，民主德国的经济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健全的计划经济的牢固的基础之上的。

### 波兰人民共和国

正如我们在哥穆尔卡同志于1968年3月26日在华沙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第一书记秘密会议上的发言中所注意到的，波兰朋友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关于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德累斯顿六党代表会晤时的发言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作的评价的原则立场。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表示极大的忧虑，担心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会导致发生各种不测事件。哥穆尔卡同志在今年4月的同苏联大使（阿里斯托夫）谈话时说，我们不能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将是个巨大危险。如果我们失去捷克斯洛伐克，也就不能排除在失去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我们也可能失去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和民主德国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甚至应当进行武装干涉。我以前就有过这种想法，现在看来除了派遣包括波兰军队在内的华沙条约国的部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别无他途。或许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征求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意见。这件事最好现在就做，晚了我们会付出更多的代价。

其他波兰领导人在同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私下谈话中也曾谈到类似想法。例如，波兰内务部长莫查尔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极端复杂，政府机关和军队已经人心涣散，所有新闻宣传手段都集中在修正主义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手里，出现了很多来自西方

的犹太人，没有把握说健康力量在控制局面，也很难指望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德累斯顿会晤的结果被利用来煽起反苏情绪。”

波兰朋友以尖锐的批评态度来评价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尤其是布拉格电台关于波兰大学生骚动的报道，并将播发虚假材料的捷通社驻华沙记者驱逐出境。

波兰报刊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新闻界的报道不加任何自己的评论，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经常提供大量客观信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突出报道杜布切克同志和捷共其他领导成员发言中所提及的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变革所追求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的内容。

###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起了保加利亚领导人的极大忧虑。对于捷共中央全会结果的报道和杜布切克同志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消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例如这表现在保共中央曾下发指示：不要在报刊上刊登来自捷通社的杜布切克同志的照片和履历；保加利亚的报刊只刊登了捷通社播发的关于捷共中央一月全会的新闻稿和由保加利亚通讯社撰写的有关杜布切克同志的简历。给杜布切克同志发去的祝贺他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贺电，在保加利亚报刊上刊登时也非同寻常：在电报下面没有日夫科夫同志的签名。

当今年三月上半个月捷克斯洛伐克报刊和电台越来越强烈地要求诺沃提尼下台的时候，日夫科夫同志曾说，杜布切克同志未能控制住国内局势，那里的局势紧张，社会主义各国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防止事态向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危险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他认为杜布切克同志是位意志软弱的领导人，未必能顶住潮流。

保加利亚朋友非常满意地接受苏共领导关于进行德累斯顿会晤的倡议。今年3月29日召开了保共中央全会，赞同举行兄弟党领导人德累斯顿会晤，并坚决赞成采取在事态发展过程中为反击反动派可能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包括必要时采取军事措施。

保共中央全会后，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和党员大会，向党员通报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继续成为保加利亚朋友的注意中心。关于这一点，1968年4月14日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塔诺·佐洛夫同苏联大使（普扎诺夫）的谈话可作证明，在谈话时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忧心忡忡。按照他的说法，根据捷克斯洛伐克事态发展情况，可以认为捷领导人没有从德累斯顿会晤中得出任何结果。他强调指出，如果情况像这样进一步发展下去，而我们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那末捷克斯洛伐克现领导人也都很有可能统统被从管理国家的岗位上撤下来。

至于保加利亚的报刊，它在刊登有关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资料时，总是突出报道有关加强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中的作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华沙条约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等内容。

现在所有的中央报纸都刊登以日夫科夫同志为首的保加利亚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的材料。访问期间将签署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新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官方观点，已在匈牙利领导人的一系列公开声明和内部发言（匈牙利社

会主义工人党中央二月全会和德累斯顿会晤)中表达出来。在今年3月26日匈牙利电台和电视台转播的采访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莫钦说,在对捷克斯洛伐克目前形势的评价上,揭露妨碍执行捷共十三大通过的决议的捷共领导机关的观点(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和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决议)对匈牙利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决议的目的是消除党和社会生活中多年来积累的困难和缺点:肃清个人崇拜的残余和清算违法乱纪行为;在党和社会生活中实行并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决经济问题;更顺利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内确保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的共存及其发展。

科莫钦同志强调说,“我们赞同捷克斯洛伐克兄弟党的基本意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福克同志今年3月30日在巴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同样声明说,和其他匈牙利领导人一样,他赞同捷克斯洛伐克党、政府和人民给自己规定的那些目标,并相信他们将依照这些目标不断前进。

与此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的某些特征引起匈牙利同志的严重忧虑和不安。卡达尔同志今年3月23日在德累斯顿会晤时讲了忧虑和不安的原因,科莫钦同志今年3月26日在答记者问时公开谈了这些原因。按照匈牙利同志的看法,事件基本上反映了正确的意向,但是也有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势力加入了这个事件。这就造成了事件有转向反革命的危险。卡达尔同志在德累斯顿会晤时指出,“这事件完全像大约在1956年2月到10月底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初期的情况”。科莫钦同志也说,“在我看来,根据匈牙利1956年的经验,为了实现既定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力量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既要反对保守势力又要反对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化的民族主义的右派势力。”

匈牙利同志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发展中最危险的因素是:捷共中

央主席团及捷共中央委员会本身缺乏一致意见；大批领导干部下台；没有充分依靠工人阶级；对宣传机构的工作没有必要的监督；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动摇不定。

按照匈牙利朋友的想法，可以预料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内对外政策将会发生重要变化，而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在这方面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任命希克当捷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副主席可能导致在经济合作中加强捷克斯洛伐克面向西方。把齐萨日和加卢什卡同志提拔到领导岗位，不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和文化政策上实行坚定的党的路线。

匈牙利同志对捷克斯洛伐克能够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和改变其对联邦德国的政策非常重视，这会使匈牙利领导处于困难境地，如果考虑到在匈牙利也有主张同西德关系正常化的势力。捷克斯洛伐克扩大同联邦德国的官方联系，特别是在中层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中，情况就更严重。

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各阶层居民中，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被平静地接受了，没有引起任何政治风潮。捷克斯洛伐克当前亟须解决的那些问题，在匈牙利人看来，有的在1956年以后就已经解决，有的还处在解决的阶段。部分匈牙利知识分子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持同情态度，并且在大部分场合表示支持主张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力量，赞成捷克斯洛伐克事态的发展不要变成对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的批评。

匈牙利报刊广泛报道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个国家的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一件稍微重要一点的事件，匈牙利报纸都进行报道。对杜布切克同志的发言以及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发言的内容都作详细介绍，对捷共中央全会的工作情况也进行了报道。如果说在第一阶段匈牙利的宣传部长只是通报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那末近来在大量增加这种报道的同时，匈牙利报刊开始更多地刊登本国人写的关于

反映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态度的文章。

决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态度，一方面是出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心，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保持两国间早已形成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了与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建立联系，卡达尔同志曾两次（一次是在今年1月下旬，另一次是在今年2月初）非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会见了杜布切克同志。

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分子对匈牙利的攻击，引起匈牙利朋友的某些忧虑。他们硬说在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少数民族遭强迫同化。在这种形势下令人欣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新领导，尤其是斯洛伐克的领导人表示不同意这些攻击。匈牙利方面为了不使关系紧张化，表现出了克制精神。与此同时，卡达尔同志今年3月19日同捷驻匈大使谈话时，在提到捷克斯洛伐克报纸就这些报道发表的言论后曾说，“匈牙利境内的斯洛伐克族的情况，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的是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每一个国家领导人在同意将这个问题在报纸上公之于众的时候，应当考虑到这种做法可能带来的后果。”

№01083

## 卢科韦茨就苏驻捷使馆对局势的估计 给齐米亚宁的公务报告<sup>①</sup>

(1968年5月20日)

送《真理报》总编辑齐米亚宁同志：

1968年5月17~19日，我受编辑部的委托前往布拉格，就涉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文章征求使馆的意见。我会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以及乌达利佐夫、普拉索洛夫等参赞。会见时，引人注目的是，在判断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和事实时常常有完全对立的观点。

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和判断，须要客观地对待，在目前形成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加强同捷共中央现领导人的联系，不要把党的领导路线同个别人士的言论，尤其是党外人士的言论混淆起来，千方百计促进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发展苏捷关系。

公使衔参赞乌达利佐夫认为，对捷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直到捷共中央领导的路线，都必须进行最尖锐的批评。在大使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对文章进行初步讨论时，他插话说：“我们无法把杜布切克提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水平。”

据悉，5月18日布拉格发生了传统的大学生五月游行集会活

---

① 本文件曾附下列公函转报苏共中央：“送苏共中央杰米契夫同志，现送上卢科韦茨同志的公务报告，内容为他关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情况的一些意见。《真理报》总编辑米·齐米亚宁”。

动，约有3万名大学生参加。打出的标语口号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除了国内问题外，这些标语和口号也涉及到苏联和柯西金同志访捷。在为柯西金同志准备的介绍情况的报告中（大使没有参加该报告的起草），没有把游行集会的积极部分考虑进去。不仅如此，在这份报告里甚至没有第二天即5月19日《红色权利报》曾批评反苏标语，指责大学生不成熟、不知分寸和不懂礼貌，说他们的行动“没有反映现实情况”等内容。

乌达利佐夫同志当着大使的面坚持要将这个游行集会的消息发回去。他这样做是对大使的一种挑衅行为，而且是在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这样做的。他还说：“这是在中央的领导下组织的<sup>①</sup>”，“必须立即宣布坚决抗议”，等等。

驻布拉格的苏联记者告诉我，乌达利佐夫对捷共中央现领导根本上持的是否定态度，总是凭自己的主观看法去判断事态，他只同原先接近诺沃提尼的人接触，这些已引起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注意。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斯特卡同志在同我交谈时也曾提到此事。

由于在布拉格呆的时间太短，不能做出某种肯定性的结论，但我认为必须将这个情报报告您。

《真理报》编委会委员、《真理报》社会主义国家部编辑  
卢科韦茨

---

<sup>①</sup> 指大学生游行集会。

№ 01084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 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

(1968年6月11日)

苏共中央决定

勃列日涅夫同志就进行秘密会晤问题致杜布切克同志的口头信函

批准就这个问题给苏驻捷大使的指示稿（见附件）。

附件：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您拜会杜布切克同志并对他说，您受令向他口头转达勃列日涅夫同志下述个人信函：

“尊敬的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

我们通过契尔沃年科同志收到了关于捷共中央召开了全会以及你们国内和党内情况的通报，对此对您表示感谢。我们以高兴的心情接受您关于采取旨在活跃党内生活和提高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的措施的通报。与此同时，对于您因反社会主义势力对党的攻击而产生的惊恐和忧虑，我们完全理解。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同样非常关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分担您的忧虑和像兄弟般地支持您和您的同志为保卫和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成果、为加强捷共及其领导作用进行的斗争。现在，已明显地看出，你们

为达到这些目的的斗争是在反社会主义势力越来越露骨和加强的反抗条件下展开的。

现在，在捷共中央五月全会以后，你们已进入了特别重要的时期，即筹备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时期。我们非常清楚，当前的代表大会对你们党和国家的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将在这种条件下进行，即你们的敌人将对共产党内及其领导层中的健康力量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并为此不惜利用讹诈、造谣和挑拨离间，借口同‘保守派’作斗争来杀害忠于事业的正直的共产党人。你们所宣布的忠于马列主义、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主义义务、忠于国际共运的路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与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冲突，遇到了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的公开抵抗。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你们大多数大众宣传机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仍然在从右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有时还公然从反革命立场发表意见，根本不顾捷共中央五月全会通过的决议。

引起我们特别不安，同样也引起您和您的同志们特别不安的是，在捷共内部存在一个“第二中央”<sup>①</sup>，这无疑使党内和国内的情况大大复杂化了。

我们相信，您在这种条件下一定会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证顺利地筹备这个特别重要的代表大会。

但是，您无疑明白，我们是真诚地、兄弟般地感受您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愿意给您全部可能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我们认为再次和您，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以及您的最

---

<sup>①</sup> 勃列日涅夫所称的捷共中央“第二中央”是指以党的名义指导大众媒介工作的组织。这个中央是在捷共中央主席团之外形成的，是背着主席团的行动的。它在党的机关里，以及在内务部、外交部和其他一些部委里掌握有不少重要职位，它安排各反对派组织和俱乐部之间的联系并协调它们的行动。



亲近的志同道合者进行非正式的双边友好会晤是适宜的。我们这方面，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卡图谢夫等同志可能参加这次会晤。

这次会晤可在苏捷边界上的任何对你们方便的地点，可以在塔特拉山也可以在乌日哥罗德。

我们认为，鉴于当前的形势，会晤最好秘密进行，为此可利用您从匈牙利回来后的今年6月15日星期六的下半天和6月16日星期天。

友好地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将有助于更好的相互理解，有助于协调我们为争取进一步加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与苏捷友好所作的努力。

您转告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向杜布切克同志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接着，您可以代表自己说，当勃列日涅夫同志说到同您及您的志同道合的人会晤是适宜的时候，他曾解释说，他是指您在6月5日的谈话中所提到的切尔尼克、比拉克、英德拉、列纳尔特和科尔德等同志。

如果杜布切克同志谈到捷共中央曾作出决定，在代表大会前不会见其他兄弟党的代表，那么您就强调说，莫斯科也考虑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仍旧认为有必要向杜布切克同志提出进行双方秘密会晤的建议。

执行情况请电告。

№01094

勃列日涅夫与斯姆尔科夫斯基  
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  
代表团成员的座谈记录

(1968年6月14日)

苏方参加座谈的有：卡图谢夫、帕列茨基斯、格奥尔加泽、维索京等同志<sup>①</sup>。捷方有：捷国民议会议长、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姆尔科夫斯基，国民议会副议长、捷人民党布尔诺州委书记泽德尼克，国民议会副议长、捷社会党党员多格纳尔，国民会议员、斯洛伐克复兴党主席米亚尔坦，以及克拉托赫维洛娃、拉齐纳、利特瓦约娃、莫茨科夫恰克、斯沃博达、昆特拉塔等议员。<sup>②</sup>

勃列日涅夫欢迎捷克斯洛伐克客人并问了客人对苏联的印象。<sup>③</sup>

斯姆尔科夫斯基以代表团全体成员的名义对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所受到的亲切热情的接待表示感谢，对访问的结果感到十分满意。他补充说，他不想代替代表团的全部成员来谈这个题目，他认为他们自己会来讲他们所得到的印象的。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人，全体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对捷克斯

---

① 卡图谢夫为苏共中央书记；帕列茨基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主席；格奥尔加泽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维索京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国际联络局局长。

② 据苏联报纸报道捷驻苏大使考茨基也参加了会晤。

③ 捷国民议会代表团曾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和伏尔加格勒。

洛伐克人民一贯怀有特殊的兄弟感情，这种感情是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共同用鲜血凝成的。勃列日涅夫说，这种感情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和亲切，因为在二战期间我曾经随同苏军和斯沃博达将军指挥的捷克斯洛伐克军穿行过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在以后的年代里，我也有机会不止一次地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和参加捷共的代表大会。即使在苏联因歉收而粮食不足的最困难的年头，苏方也总是准确无误地履行自己向捷克斯洛伐克供应谷物的义务。例如 1963 年由于严重歉收，我们不得不用黄金向加拿大购买 600 万吨谷物，并从中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我们所允诺的 140 万吨谷物。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兄弟般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尽管我们在向自己的人民供应食品方面有相当的困难，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到一句谴责的话。我深信，如果有必要，每个苏联人都会献出自己的 200 克面包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这就是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我要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苏联人没有理由讲捷克斯洛伐克的任何坏话，但是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登和播送反苏文章，用攻击和诽谤性语言企图丑化苏捷关系，苏联人开始感到委屈和纳闷。工人们不理解，为什么人们咒骂苏联。因此苏联人也就有些戒备起来了。

利特瓦约娃指出，在苏联旅行期间，代表团成员们都亲自证实了苏联的普通工人对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怀有的那种热爱感情，无论到哪里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勃列日涅夫：毫无疑问，如果你们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如西伯利亚、远东、中亚、高加索，苏联人都会同样热情好客地欢迎你们。

斯姆尔科夫斯基：我们是这种情况的见证人，对此我们思考了良久，你们的接待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们回国之后，要把

这一切讲给我国人民听。这是件光荣任务。在苏联逗留期间，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向苏联人介绍捷克斯洛伐克，介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回国后，我们将竭尽全力争取做到让那些引起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忧虑的全部言论不再出现。

勃列日涅夫：这不仅引起忧虑而且引起焦急不安和惊恐。应当以现实态度看待问题。要知道，你们有些人想要让社会公众相信苏联曾把自己的某种方式和经验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干涉内政。好几个月以来，我在思考，在分析事实，而每一次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给你们强加了什么？这绝对是捏造。自然，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晤时，我们想了解国民经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情况。如在同哥穆尔卡同志交谈时，我询问了波兰集体化的进展情况。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交谈中从来不涉及有关国民经济的管理方式方法和纯属内部事务的问题，从来没有建议要做什么样的改变。例如，众所周知，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统一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老实说，无论是我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任何一个委员都不知道这个章程的内容。

捷克斯洛伐克曾多次对政府各部进行了改组。对我们来说，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事。这纯粹是内政。所以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建议。而有人总想把什么干涉内政之类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指责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领域里犯了错误。难道能对我们提出这样的意见吗？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明显的挑衅目的。

历史学家是找不到任何一份能证明像在捷克斯洛伐克广为流传的关于苏联将自己的经验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的说法的文件的，贵国人民自己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作为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发展道路的国家体制。所以没有任何理由来谴责苏联。

应当老实说，我曾错过了两次“干涉内政”的机会，如果能这样称谓的话。一次是我问诺沃提尼同志，为什么布拉迪斯拉发不是

斯洛伐克的首都，这对我来说不可理解，因为布拉迪斯拉发同斯洛伐克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毫无疑问，它有一切理由称为斯洛伐克的首都<sup>①</sup>，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任何问题。另一次是我责备诺沃提尼没有让杜布切克同志参加赴莫斯科庆祝苏联成立 50 周年的党政代表团。

不存在其他任何“干涉内政”的例子。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会晤和谈判涉及的主要是经济问题，换货问题。每次同捷共和捷政府领导人会晤，差不多都是同商讨有关在提供食糖和原料等方面满足贵国要求开始的。可是贵国报刊却无中生有，编造各种指责我们的谎言。就拿鼓噪一时的无中生有地说什么苏联顾问与马萨利克<sup>②</sup>自杀有关的宣传运动来说吧。当捷克斯洛伐克报纸上开始这种喧嚷时，翻阅了全部必要的档案，但是在档案中没有发现有能证实这种捏造的任何文件。我们扪心无愧，我们愿意上任何国际法庭以证明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显然丑化苏联人对某些人有利，因此也就围绕这件事掀起了叫嚣。这是谁干的？是朋友干的？我看未必。我相信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不是这样想的，可是电台、电视台和报刊在加紧散布这种谎言。

朋友之间有种惯例，如果在双方关系上发生了什么误会，或对对方有什么意见，他们就通过双边会晤和交谈来解决这些问题。

鉴于类似的事实，对于贵国报刊和某些不负责任的人的行动使

---

① 捷国民议会于 1968 年 10 月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制法，根据该法，从 1969 年 1 月起，斯洛伐克取得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内的共和国地位，而布拉迪斯拉发成为它的首都。此前，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的“主要城市”。

② 马萨利克为哥特瓦尔德政府中的外交部长，无党派人士。1948 年 3 月 10 日死于布拉格。捷新闻宣传媒介就曾有一份所谓“马萨利克政治遗嘱”作了报道，似乎他在死前曾将这份遗嘱交给斯大林。捷在 1948 年、1968 年和 1991 年先后进行了三次议会调查，均未证实存在马萨利克致斯大林的信的事。

我国人民和工人焦急不安，也就不足为奇了。你们代表团在里加时我国一个工人曾公开讲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的忧虑，这不是偶然的。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我们不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沉默不语，我们将此事向参加全会的人作了简要通报。同时，也表示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变得正常和稳定。

我还想谈谈现今捷克斯洛伐克广为宣传的民主和民主化的理解问题。在民主的概念里首先须要加进阶级实质，因为存在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不可能有抽象的民主。众所周知，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一定的界限。资产阶级民主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通过美国的实例看得特别清楚，在美国有杀人的充分自由。

我要再一次强调，我国在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它的基础是友好、互助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这是我国的总路线，在这方面今后需要加强友好联系，而不是搞关系尖锐化，搞敌对。吵架，破坏关系，这并不需要费多大劲，这不是我们应做的事。正如集市经常发生的那样，女人们为了一点儿事会吵架、骂街、互相诽谤，结果造成尖锐的敌对。我请你们原谅，我在这里讲得有点激动，可这是我早就想说的心里话。

利特瓦约娃：您的激动心情我们完全理解。我们的工人也是用这种激情讲话的，他们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报纸停止敌意宣传，要求组织同记者进行辩论。

勃列日涅夫：必须注意到，在当前条件下国家应当关心的是通过相应的机构和部门来遵守现行法律，不然的话有产生混乱的危险。你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存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应当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鉴于西德复仇势力的活动和美国侵略政策的日益加强，很难说会后我们还会遇到什

么样的考验。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而有谁能保证，经过一段时间后苏联士兵就再也不需要起来保卫我们已取得的成果和我们的独立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紧密合作和加强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国防能力，乃是应付这种突发事件可靠保证。

我完全不是想要教训什么人，可是像通常所说的，旁观者清。捷克斯洛伐克某些不健康的趋势使我们感到不安。这些趋势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强，有损于社会主义，有损于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担心的是，对苏联对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泼了很多脏水，已经提出了很多凭空捏造的指责。尽管如此，我们仍保持镇静，尊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尊重捷共，但是不尊重下流作家和诽谤者。

斯姆尔科夫斯基：我非常高兴我们大家能够参加这种坦率的座谈。我想请我们代表团中属于非共产主义政党的成员谈谈自己的看法。

多格纳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党）：感谢苏共中央为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代表团安排的接见。完全同意斯姆尔科夫斯基同志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必须捍卫民族阵线的团结，捍卫社会主义原则和同苏联人民的友谊。多格纳尔说，我们不允许破坏这些原则，我们将同共产党一道坚决反对旨在破坏这些原则的一切图谋。

泽德尼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说，今天同苏共中央的座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我们进行了真诚而亲切的交谈。我们将牢记他的每一句话。我只想提一下不久前发生的、使我非常不安的一件事，这就是我党的机关报《人民民主报》报载美国《纽约时报》上的一条关于捏造苏联将军插手谢伊纳<sup>①</sup>

<sup>①</sup> 谢伊纳是一位逃往美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将军。1968年6月初，《纽约时报》和《人民民主报》报道说，似乎某位苏联将军赞成给谢伊纳发外交护照。苏外交部和捷国防部驳斥了这个报道。

由捷逃亡国外的消息。这条消息是个误会，我立即给《人民民主报》编辑部去了电话，并要求对发表这条消息表示道歉。回布拉格后我将查清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听到这种不愉快的事实，对我来说特别痛心，因为我已经是在捷苏友好协会的会员，而且还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了苏捷人民热情友好的会见。所以每次对苏联的不负责任的攻击都使我痛心疾首。我要向你们保证，回布拉格后一定采取措施整顿《人民民主报》编辑部。与此同时，我将向我们党通报我们代表团这次苏联之行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介绍了自己和自己的经历，介绍了党的工作。我长时间来作为共产党员和普通人，同捷克斯洛伐克联系在一起。对战争时期的活动我记忆犹新。所以我在谈到捷克斯洛伐克，谈到我们合作的意义时，总是这样的激动。我们两国的团结，我们联系的牢固，这是个巨大的国际问题。谁忘记这一点，谁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请允许我简要地介绍一下苏联的情况。我们国家正蒸蒸日上。我们的前景明亮。我们拥有不可计量的石油、天然气和矿物的蕴藏量，还须要进行开发。苏联共产党很注意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福利。苏共中央下一次全会将专门讨论农业问题，其中包括土壤改良问题。如果不再在国防上和加强华约上耗费大量资金，那末我们人民会生活得更好一些。用于这些目的的正式开支占苏联年度预算的23%，此外，还有追加的非正式的拨款。这里还要考虑到苏联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起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那末帝国主义国家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肯定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米亚尔坦（斯洛伐克复兴党）回忆起自己多次对苏联的访问。所有回忆都有同苏联人热烈而亲切地会见的场面。米亚尔坦说，我已经68岁了，这种年龄使我们完全有权来比较清醒地评价能证明



我们两个国家和两国人民的历史联系的事实与事件。我们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19世纪，在捷克知识分子、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就保持着生气勃勃的卓有成效的联系。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祖国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们带回来了社会主义思想。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在斯洛伐克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们深刻认识到这个事实，即要是没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永远也不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苏联在使我们共和国摆脱法西斯压迫的事业上所作的重大贡献。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就是在苏联同志的参与和协助下组织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虔诚地追念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而阵亡的几万名俄罗斯战士。在我们的土地上有很多俄罗斯士兵的坟墓，这些坟墓受到了当地居民精心照料。

接着，想起一桩感人至深的事，一个俄罗斯小女孩请他带一束鲜花到捷克斯洛伐克去，把它放在她父亲的墓上，她父亲在战争快要结束时阵亡的，被埋葬在布拉迪斯拉发。他说，我们的青年人应当更好地知道这些事实，了解我们两国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

最后米亚尔坦强调说，他作为非共产主义政党的代表将竭尽全力不让任何人蓄意侵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他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极端分子的言论宣布说，“我们一定想方设法不让这股祸水泛滥”。

勃列日涅夫：您关于我们两国人民用在反法西斯战斗中牺牲的战士的鲜血凝结起来的友谊讲得很好。永远不要忘记，苏联人民，首先是他的军队，曾到过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1900万人。关于这些牺牲我们不大肆宣扬，我们从不说是我们自己战胜法西斯德国的。这不是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但是我们不能容忍有些人总想否定这些事实，歪曲历史，践踏伟大的神圣事业。这就是热爱你们人民的根源，是任何进行蛊惑宣传的人都无法抹煞的真实情况。

拉齐纳（无党派议员的代表）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参加这样高级别座谈的机会，他保证将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把在座谈时听到的一切告诉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他说，这种坦率的座谈对他来说是一个愉快的意外收获，他对此表示感激。接下来他指出，过去在捷克斯洛伐克关于苏联的宣传搞的不太好、不太妥当。那种宣传过于片面，把苏联的一切都加以颂扬，把它当作典范，当作伟大的榜样。但是，在这方面是我们自己犯了错误。人民很难理解对苏联的这种颂扬。这是最近出现对你们进行不愉快的攻击的原因之一。

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请相信我们，我们会像捷克谚语所说的那样“自家的房子自己来扫”。

斯姆尔科夫斯基：我们今天在苏共中央的会晤和座谈是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访苏的十分圆满的结束。代表团的每个成员应当对访问期间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以及我们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认真进行思考。我完全同意代表团成员在这里所讲的意见。拉齐纳议员准确地表达了我们须要首先整顿好自己家的想法。

勃列日涅夫：我们在这种场合的说法是：“若要干净，须拿起扫帚将垃圾扫出屋子”。

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苏联期间，我们每天向布拉格通报我们的活动。捷克斯洛伐克赋予我们这次访苏以很大意义，我国社会各界也十分关注这次访问。回布拉格后，我们将立即上交一份关于我们访苏结果的报告。

我国在对内政策上的立场是清楚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即国内的所有健康力量应当团结在捷共领导的民族阵线的框架之内，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有其他的纲领。我们应当把我们的事情整顿好。至于说到捷克斯洛伐克对社会主义大家庭，对苏联的态度，则它也是完全清楚的。您自己根据代表团成员在座谈时的发言会确信这一点。在这里发表的意见不只是10位议员个人的意见，

它反映了我国全体人民、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情绪和看法。在我国出现的、使你们不安也使我不安的消极现象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我们将消除这种现象。

我对我的第10次访苏的评价是，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也和勃列日涅夫同志一样，始终是真诚地为自己的党服务，我将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終了。

我对你们和全体苏联人民在这10天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表示深切感谢。通过这次在苏联的短暂逗留，我们看到了我们两国关系的过去，而且不仅是过去，也看到了未来。

勃列日涅夫：我们希望你们大家带着关于这次苏联之行以及同苏联人会见的最美好的印象回国。我们将竭尽全力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友谊和兄弟般的联系。我国人民，如果需要的话，随时准备重新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为了贵国的独立而并肩作战。

座谈由古西科夫和马斯洛夫<sup>①</sup>记录。

本文件由苏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布拉托夫签署。

---

<sup>①</sup> 古西科夫为苏共中央联络部专员；马斯洛夫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

№01095

## 鲁萨科夫就邀请杜布切克等来苏 休养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年6月26日)

苏共中央：

遵嘱现提出关于邀请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比拉克同志来苏联休养的建議。

杜布切克同志6月12日在同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就苏共和捷共领导人会晤问题进行交谈时曾谈了想法。他认为这次会晤可以于7月的上半月在克里米亚进行，因为他（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其他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可能带家属在那里进行短期休养。

捷共中央书记英德拉同志告诉苏联大使说，7月6日以前，杜布切克同志将要参加各种重大的政治活动和党的代表会议。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最好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邀请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比拉克和其他同志（具体由杜布切克同志定）带家属于7月中旬到克里米亚来休养，以便在克里米亚进行预定的会谈。

附上苏共中央决定草案和给苏联驻捷大使的电报草案。<sup>①</sup>

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 康·鲁萨科夫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苏共中央《关于邀请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比拉克同志访苏的决定》是6月27日通过的。经政治局批准的给苏联大使的电报于1968年7月1日转交给杜布切克。依照文件所附的联络部根据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的电报编写的报告所说，杜布切克对邀请他去休养表示感谢，并接着说，“在各州党代表会议开完以前他很难前往。在党代会开完后他再通知，他今年是否能进行哪怕是短时间的休假都很难说，或许情况要求他不能离开捷克斯洛伐克”。

No01085

**苏共中央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  
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会谈和社会主义  
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向  
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

(1968年8月8日)

关于蒂萨河畔切尔纳会晤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通报

苏共中央经常向党内通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我们对此所采取的政策。在最近召开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向党员传达了中央委员会七月全会的工作结果。

众所周知，七月全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党代表在5个兄弟党华沙会晤上的活动，并责成政治局继续尽一切必要努力来巩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阵地，反击反革命分子，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现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执行七月全会的决议的同时，正集中力量首先争取从政治上解决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产生的问题。

根据我党的倡议，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举行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之间的会谈，然后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会议。

准备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会晤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一方面，5个兄弟党华沙会晤后发出的信被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共产党员和劳动者正面接受，它推动了团结所有站在马列主义和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的人的进程。但是，另一方面，这封信也被右派势力用来在国内煽起民族主义情绪，首先是反苏情绪。捷共领导对此没有给予反击。相反，正如针对5个兄弟党的信公布的《捷共中央主席团的观点》所表明的，捷共领导实际上是鼓励这种情绪的，指望利用民族主义浪潮来支持和加强自己的阵地。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政治生活中又出现了急剧向右转的实际威胁。所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加快进行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会谈的问题。

我方曾提出建议，建议这次会晤应当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会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这种人员组成的会谈。我们知道，捷共中央领导层内部不一致，相当一部分领导人的立场在捷共官方文件里没有得到反映。建议进行这种人员组成的会晤，我们是要创造条件，让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有可能了解苏共领导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真正看法，并发表自己对事件的判断和提出自己关于使国内局势正常化的必要措施的建议。

我们也考虑到，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参加以前会谈的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远没有充分地而且也不总是正确地向自己的主席团阐述苏共的立场，常常错误地解释我们的看法，总想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苏共中央赞成回到一月份以前的局面，反对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等等。如果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会谈就可以排除这种情况发生。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起初是建议在苏联境内进行会谈，但是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的再三请求，为了尽量保证会谈时最良好的气氛，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可以满足捷共领导的请求，在蒂萨河畔切尔纳城进行会谈。

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准备同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团进行会谈时给自己规定了下述目的：

——再次提请捷共领导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成的局势的特

别严重性和立即采取反对反革命分子的有效措施的必要性；

——对那些对右派反社会主义势力持妥协立场的捷共领导成员进行必要的说服工作；

——支持捷共领导层中的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的同志，鼓励他们为争取党内和国内局势正常化进行斗争；

——再次利用苏共的影响，不让捷共及其领导背离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共同的国际主义立场，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友好联系。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蒂萨河畔切尔纳会晤时的发言中，依据确凿的事实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已到了危急关头。他对捷克斯洛伐克同志直率地说，现在的问题是：要么捷共领导找到勇气重新审查自己的看法，引导党和工人阶级起来坚决行动，粉碎反动派和保住社会主义阵地；要么共产党员将遭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杀害，到那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就将完全由另一种势力来决定。

勃列日涅夫同志根据苏共中央七月全会决议和5个兄弟党华沙会晤的集体结论的精神，阐述了苏共中央立场的原则性实质。他特别强调，苏共中央对捷共中央就纠正缺点错误、改进党对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所作出的决议是理解的。接着，他说，顺利实施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保证，只能是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保持党对事态的发展的完全控制。如果削弱党的领导，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右派和公开的反革命势力猖狂活动。他坚定而清楚地宣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社会主义成果的命运，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同我国和其他兄弟国家有联盟义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这不仅是捷共的内部事务，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事业。

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以最尖锐和直率的形式提出问题适宜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较明确地看出捷共中央主席团

内部的各种立场，才能给站在彻底的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同志以支持。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发言中，以及在会谈期间同捷共中央主席团个别成员的交谈中，始终贯彻了这条路线。

在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的最初发言中，一般地承认在国内和党内有消极现象，谈到必须同右派势力作斗争，并强调捷共领导希望保持和发展与苏共的兄弟关系。但是，在这些发言中，也和以前一样否认存在反革命的直接危险，对自己的行动不作批评，总想把事情描绘得似乎国内的局势日趋正常。他们把5个兄弟党的集体信件解释成是使他们的工作复杂化的因素，表示不同意信中所说的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局势的评价。

但是，我方根据原则坚定地提出问题以及苏共立场的深刻论据是有成效的。它首先在捷共中央主席团某些成员的发言中得到反响，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作了正确的党的判断。在他们的发言中，明确表达了要对捷共自己内部的右派分子和国内的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势力采取坚决行动并对事态的发展造成转折的愿望。这些发言（科尔德、里戈、皮列尔、巴尔比雷克等同志的发言）同样表明，相当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对来自苏共的友好建议和告诫是理解的。

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杜布切克同志的多次会见以及小花园的会谈（苏方参加者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同志，捷方参加者为杜布切克、斯沃博达、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等同志），对会谈的后来进程和结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结果，捷共中央主席团同意必须实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的具体措施。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宣称，近期内将对大众媒介工具进行监督，停止发表反社会主义和反苏的材料，禁止反革命组织、“俱乐部”和集团以及重建社会民主党筹备委员会的活动。他们通报了他



们为了使局势有所改善准备加强一些党和国家工作部门的领导的打算。

蒂萨河畔切尔纳的会谈为在华沙信函上签字的兄弟党的代表同捷共代表的重新会晤提供了可能性。苏共中央政治局曾提出过这种建议。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使包括捷共在内的所有参加会议的党都证实自己忠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证实自己准备发展、加强和保卫社会主义成果以及同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的意向。捷共代表团的参加会议以及同其他兄弟党一起签署共同文件，这实际上就是在公众面前巩固了在蒂萨河畔切尔纳双边会晤时达成的结果。

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借口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即将来访，企图推迟所建议的会议的召开，并提出反建议：邀请罗共和南共联盟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显然，他们指望这两个曾反对华沙信函的党会支持捷共领导的错误立场。经过相当激烈的交换意见之后，捷共代表团才推迟了铁托同志和齐奥塞斯库同志的访问，同意立即召开布拉迪斯拉发会议。

在同捷方商定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向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兄弟党建议举行会议。上述各党都表示同意。

苏共中央政治局指出，已进行的双边会晤是及时的，对进一步发展并加强我们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在由苏共代表团起草的方案的基础上制定了共同宣言，其中就社会主义发展和国际形势的最重要的迫切问题确定了统一立场。这个宣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因为它把前些时候曾在5党华沙信函中有所反映的那些原则性的共同立场固定了下来。这首先指这些立场：如对社会主义国家已走过来的道路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的规律性，首先是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的确认；关于必须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反击反社会主义

势力的原则（在宣言中把这说成是所有兄弟党的国际主义义务）；今后要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进行协调和协商的相互责任。

我们深信，在宣言中把所有这些原则固定下来的事实本身，对支持捷共现领导和党内国内的健康力量，反击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当前帝国主义猖狂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宣言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图谋的一个打击。

苏共中央相信，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符合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它将成为使所有反帝力量进一步团结起来去为争取达到共同的伟大目标而斗争的有效因素。

在总结已做的工作时，应当说苏共的原则性的马列主义政策已取得新的重大成功，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使捷共领导和党内国内的健康力量能够对右派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发起进攻，并积极行动起来使国家摆脱目前所处的困境。

同样，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在会议过程中对蒂萨河畔切尔纳会晤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捷共中央主席团中那些承认目前局势危急的同志直截了当地对我们代表团说，会谈的结果加强了他们同一切败坏捷共名誉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基础的企图进行斗争的决心。

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得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全世界进步力量的高度评价。他们把布拉迪斯拉发宣言看做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胜利，再一次证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决心共同保卫社会主义成果，集体反击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阴谋。

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结果，得到苏联人民的深刻理解和一致支持。苏联人民表示希望布拉迪斯拉发宣言的

原则和思想将在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彻底的贯彻。忠于马列主义的苏共将尽一切必要的努力来贯彻宣言的原则，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顺利地建设共产主义。

在指出蒂萨河畔切尔纳会谈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的正面结果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非常坦率地说，克服危险倾向，巩固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阵地，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合作，主要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能否按照在蒂萨河畔切尔纳达成的协议和在布拉迪斯拉发通过的宣言行事。

在蒂萨河畔和布拉迪斯拉发会晤后，无论是捷共中央主席团的立场还是对事态发展的观察，暂时都没有使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说，在6个兄弟党的联合宣言中所规定的原则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双边会晤时所作的保证将会得到切实执行。

苏共中央政治局今后仍将密切注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情况，并根据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捷共党员捍卫本国的社会主义成果。

№01086

## 苏共莫斯科市委关于莫斯科市民对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的通报

(1968年8月21日)

秘密

报苏共中央

关于莫斯科劳动人民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反应的通报

8月21日，莫斯科市党组织向劳动人民进行塔斯社声明的解释工作。在工厂和工地，在机关，人数众多的党的积极分子根据《真理报》的材料及电台和电视台的报道进行了座谈。

为了向广大劳动群众介绍塔斯社的声明，昨天去各工业企业和机关，按车间、班组、工段、处室召开了9000多次会议，出席的人数约88.5万人，有3万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发了言。会上的发言者表示完全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实际行动，对全面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的必要性表示了坚定的决心和深信不疑。同时，所有发言的人都热烈支持塔斯社关于永远不允许任何人从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夺走任何一个成员的声明。在各处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参加者都表示赞成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就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捷共所实施的坚决措施。

“红色无产者”工厂的旋工雷巴科夫同志在会上声明说：“苏联人民密切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里的反动势力气焰嚣张，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已面临威胁。华沙条约成员国政府作出了正确决定，派兵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制止反革命叛乱。红色无产者

工厂的工人们热烈支持我国党和政府的政策，将竭尽全力来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以使捷克斯洛伐克永远是工人和农民的共和国。”

十月铁路局莫斯科机车库的钳工戈尔什科夫同志说：“我们不会让捷克斯洛伐克被帝国主义分子吃掉，我国人民将竭尽全力不让这种事情发生。”

“尼古拉耶夫”车厢库的钳工舒斯基科夫同志宣称：“让我们党和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好了。我们坚定地支持他们的政策。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出得及时。这样我们无疑就能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兄弟般的援助。”

“沙特恩”机器制造厂的冲压工沙托欣同志说了这样的意见：“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果对我来说特别珍贵。因为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我的兄弟是在解放这个国家时牺牲的。另一个兄弟在解放后曾去那里帮助建立人民政权。我们无权让反社会主义势力在捷克斯洛伐克恣意妄为。像所有苏联人一样，我无限地支持和赞成党和政府关于援助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决定。”

除了劳动人民在会上发言以外，本市的党的机关还收到集体的和个人的关于支持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坚定而一贯的政策的书。例如全苏列宁动力学院的一批学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季莫费耶夫同志、技术科学博士阿尔汉格尔斯基同志、技术科学副博士扎贝里娜和阿斯塔欣同志等（总共20人），向学院党委交了一份如下的声明：“我们是学院的教员，在读了塔斯社1968年8月21日的声明后，热烈地赞同苏联政府和盟国（保、匈、民德、波）政府关于以武装力量立即援助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消除内外反革命势力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的决定。

我们清楚地懂得，不能让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进一步尖锐化，因为它涉及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

我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依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支持，定能在最短时间内从自己的生活中将全部曾妨碍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发展的反革命败类一个不剩地清除掉，定能在遵循不朽的马列主义学说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确保进一步提高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福利水平。

苏联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的牢不可破友谊万岁！

劳动人民的光辉未来——共产主义万岁！

本市许多其他党组织也收到类似的声明书。

在劳动群众的座谈会上和车间及生产工段集体读报时，莫斯科人发表了很多爱国意见，从中可以看到苏联人的团结，看到他们对巩固党的队伍，加强苏共和人民的团结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兄弟友谊的向往。同样，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前发生的事件表示忧虑和不安。

同时，在个别科研单位也有人发言反对苏联政府和兄弟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例如在自动装置研究所，技术科学博士、主任研究员非党人士安德罗诺夫就说，他不明白，在捷克斯洛伐克是谁和用谁的名义请求苏联和其他国家援助的。他建议待弄清情况之后再对全所科研人员大会的决议进行表决。

他的发言遭到与会人员的谴责。

个别人在私下交谈中有不健康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言论。

如中央电视台的导演非党人士托尔斯坚先说：“我们的行动同原先的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的保证连不到一块。”

莫斯科第一国立外语师范学院的教师科罗利科夫认为，“我国政府没有任何正式理由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卡扎果茨宣称：“苏联政府干得

不对。靠我们军队的刺刀是建不成国家政权的，我反对暴力。”

全苏国家农业生产综合工程定型设计和试验科学研究设计院工程师彼得罗夫，第16医院外科医生西多罗娃，电子管玻璃科研院所焙烧工阿法纳西耶夫（都是非党人士）在交谈中也有这类言论。

党委和支委对发表错误看法的人都分别做了工作。

苏共莫斯科市委也收到有关停留在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对塔斯社声明的反应和举止的报告。

8月21日白天有3批捷克斯洛伐克旅游者曾到过电视机厂、“巴黎公社”厂和第15面包厂。他们到达这些厂的时候情绪沮丧，举止拘谨，都带有戒备的眼光。去参观车间和会见对他们热情友好接待的工人和领导人以后，他们的举止有了改变。对这3个厂的参观都是在为捷苏友谊举杯祝贺声、歌声和捷克斯洛伐克业余文艺演出中结束的。

一批住在“旅游者”宾馆的捷克斯洛伐克旅游者得知苏联军队进入他们国家后，故意引人注目地表示困惑不解，企图打着《我们抗议！》的标语上街组织游行示威。经过苏共捷尔任斯基区党委工作人员同该旅游团领导人谈话后，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道歉。

临时在莫斯科电视科研所工作的捷台斯拉电气公司的专家们，在听到塔斯社声明后宣称：“这是匈牙利事件的重演。你们的《真理报》不讲真话。你们的报纸也和中国的一样，只会泼脏水。你们的报刊对所有发生的事件都作了歪曲的报道。苏联军队不是在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在占领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谁的坦克多谁就正确。”

来我们研究所进行技术交流的捷克斯洛伐克专家弗尔切克、普里班和勃科夫尔：“我们被塔斯社的声明弄得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派波兰军队和德国军队？他们也算是来解救我们的！”

这些捷克斯洛伐克专家采取措施立即回捷克斯洛伐克。

昨夜市里没有发生非常事件。工厂的夜班工人工作正常，秩序井然地开始了新的工作日。市内客运交通畅通，火车站和机场运营正常。商店里看不到抢购商品的现象。

市委在继续向劳动群众做解释塔斯社声明的工作。在工厂的车间里，在建筑工地上，在市政建设的企事业单位里，开始宣读《真理报》的编辑部文章《保卫社会主义是最高国际主义义务》和部分捷共中央委员、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及国民议会的呼吁书。

在同劳动群众座谈塔斯社声明的过程中，曾提出以下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居民是怎样迎接华沙成员国的军队的？

捷共领导机关和捷政府的人员组成是否有变动？

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否合法？

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正常生活是否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兵而遭到破坏？

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否影响到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关于诺沃提尼有什么消息以及他对发生的事件持什么态度？

关于预定在11~12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将推迟的传闻是否确实？

党的市委和各区委，生产部门的党委以及市内的各级党组织正在研究劳动群众的意见和问题，并给予必要的解释。

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 维·格里申



No01096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  
沃罗诺夫同杜布切克会谈速记记录摘录

(1968年8月23日)

勃列日涅夫：切尔尼克同志觉得身体怎样？

杜布切克：像大家一样，觉得不好。

波德戈尔内：是健康不好还是情绪不好？

杜布切克：很沉重。

勃列日涅夫：咱们不再谈过去的事，咱们根据当前的形势来心平气和地谈话，以便找到有利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解决办法，使捷共能正常地、独立自主地按照布拉迪斯拉发宣言所规定的原则行事。让捷共独立自主地去行事好了。我们过去没有，今后也不想进行干预。让政府根据捷共中央一月全会和五月全会的原则进行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自己的文件里讲过，并准备再一次证实要这样做。当然，我们不会说你们心情愉快。但是，问题不在于情绪，应当在寻找解决办法方面理智地清醒地进行交谈。本来可以说得简单一些，这就是由于没有履行明文规定的义务，引起了5国采取了必须采取的极端措施。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右派势力（我们谨慎地称他们为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背着你（我们绝对不是说是以你为首）准备了党的代表大会<sup>①</sup>和一切行动。现在揭露出来了又是地下电台又是武器仓库。所有这些现在都暴露出来了。我们不

<sup>①</sup> 指根据捷共布拉格市委的倡议于1968年8月22日早晨在布拉格维索昌工厂区召开的捷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想对你本人提出意见，说你有过错。你也可能不知道这些事件，可右派势力却曾非常广泛地去组织这一切。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最容易接受的解决办法，以便有利于你们国家的稳定，有利于你们党和国家不受右派的影响进行正常工作。

不用讳言，就是我们找到了好的解决方法，要实现正常化也需要时间。谁都不应当抱有似乎一切事情都会一下子变得美好起来的幻想。但是，如果我们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那末经过一定时间，就会每天都给我们带来成功，将开始进行业务上的谈判和接触，感情冲动的状况将减轻，宣传和意识形态部门也将开始正常工作。工人阶级将懂得，是右派分子背着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在进行使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准备工作。现在这一切都清楚了。将开始进行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谈判，根据某种切实可行的原则开始撤军等等。我们没有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打算占领它，而是希望它成为自由的国家，希望它实行社会主义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布拉迪斯拉发已达成协议。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同你们谈谈，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和切尔尼克同志一起谈。如果我们不吭声，那末我们无法使局势好转，就不能使捷克人民、斯洛伐克人民和俄罗斯人民摆脱紧张局面。而右派则将日甚一日地煽起反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反对苏联的沙文主义情绪。在这种条件下当然不能撤军，总之这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就是想在这个立足点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话。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怎样做会更好些？我们没有任何想强加于你们的想法，让我们来共同寻找某种方案。

如果你能敞开思想提出各种方案，能心平气和地而不是冲动地找到合适的方案，那我们将非常感谢你。我们认为你是正直的信奉

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你在切尔纳的表现不妥当，做得过头了<sup>①</sup>。让我们把过去的一切抛在一边。如果我们开始讲，我们之间谁是正确的，那末这不会带来什么结果，还是让我们从现有的基础来谈，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也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应当怎样行动。

杜布切克：您作了这样一个开场白。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也想讲几句，尽管我现在的心情很沉重。我已经三天没有在国内了。我也想说，正确的态度是仍旧需要向前看。这是真的，存在着某种现实情况。

波德戈尔内：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交谈，需要向前看。

杜布切克：现在已经造成了某种情况。可是我，勃列日涅夫同志，早在乔普市就听到了需要向前看的说法。

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之后，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情况还是共产党内的情况，在各方面却开始有起色，甚至包括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和有关宣传工作的意图问题（筹备代表大会和干部问题）也是如此。这都写进了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里。当然，我当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将如何结束，我相信，你们将主要是注意会后的发展。可是实际情况是没有发生这种预期的事……所以我和同志们都不理解，为什么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我要特别强调，还在党中央全会之前，在代表大会之前，就采取了这个五国军事措施。我说在党的中央全会“之前”，那时我们无法按别的办法处理，因为我们刚刚在星期二赞同了联邦的提纲，还需要就某项内容召开全会，……以便解决有关筹备代表大会的某些现实问题。我们已注意到这一

<sup>①</sup> 1968年7月28日到8月1日在蒂萨河畔切尔纳市举行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一级的谈判。由于在一次会议上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评价分歧尖锐而造成互相指责，杜布切克带领代表团退出了会场。

点。国内和党内的情况已有改善……没有通知捷共中央主席团，没有通知我本人，没有通知总统、政府总理、国民会议，就采取了极端步骤，采取了极端措施。照我的看法，这些措施不仅使我党和贵党，而且也使国际共运面临共产主义运动过去未曾遇到过的最复杂的问题。

在刚经受这种沉重的心情之后，我很难马上就为解决当前形成的现实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提出自己的意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沃罗诺夫同志，我不了解国内情况。在苏军进驻的第一天，我和其余同志就被隔离起来，就来到了这里，所以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因此，我无法知道，捷克人民和斯洛伐克人民是怎样看待这个举动的，这个举动对党内生活和在国际上有什么影响，这对于采取正确措施来解决这个复杂局势非常重要。我只能够推测可能发生什么。最初时刻，在我秘书处的主席团委员是被带到党中央的大楼交苏联机构监督。我们从窗口看到有好几百人集结在大楼周围，通过窗口听到他们在喊：“我们要见斯沃博达！”“我们要见总统！”“我们要见杜布切克！”我听不到其他一些口号。在这之后听到了枪声。这是我看到最后的情景。从那时候起，我就再也知道任何情况，也无法想象国内和党内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讲的是我所认为的，这一点很重要，勃列日涅夫同志，这个举动不是通过政府、通过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准备的，因此这个举动在党内很难被理解，我担心这会使党和党员反对这个举动。当然，我只是推测。我希望共产党员能理解由此造成的局势是势在必行，可是我怕他们不会理解，因为我自己也不理解。我认为这种武装入侵为时过早，尤其是还没有动用国内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强力机关。

例如，最重要的是，所发生的第一件可以称之为反党行动表现的事，大约发生在两天以前，当时有180多人在傍晚时集结在党中央大楼周围，其中有几个人高呼着反党口号，而正如我们的保安人

员和警察所描述的，在这些人中间有两个人向大楼扔石块，但是一块玻璃也没有打碎。这是发生的惟一一件事。当时有一位政工人员走入广场，同这些人进行了交谈，他们也就散去了。国内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公开骚动。可是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

我无法知道，工人阶级是怎样看待这个举动的。同志们，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阶级会把它看做是坏事。所以需要非常切合实际不带任何幻想地面对现实，必须看到实在的情况。

作为对事态进一步发展有重大责任的共产党人，我深信，这个举动不仅在捷克斯洛伐克，而且在欧洲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将导致我们遭受惨重失败——将造成外国的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队伍的瓦解和严重破坏。

在此之前，我也总是向你们作公开通报，尽管我知道，这可能不总能使人感到愉快。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无论在地区工作还是在中央工作时，总是开诚布公地直率地说自己的意见，当然也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但是，谁也逃不出真理，所以我也总是给你们讲我自己的符合实际的想法，因为我了解党了解人民。这些，看来这不是对你们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和你们政府关于这方面的政策起决定性的东西。但是，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想现在又像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以前那样了。需要正视当前情况，考虑如何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复杂的难题。勃列日涅夫同志，虽然我同意你谈的，这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这将是——我党和贵党、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共运所面临的问题中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尽管如此，还是必须向前看，因为我认为这对我党和我国人民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捷克斯洛伐克历史上，从几百年前的亲俄罗斯时代开始，我国人民对俄罗斯的态度一直是良好的，在这方面没有阴暗面。现今，在我看来，发生了我国人民和我党不理解的某种东西，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国内已形成进行公开反革命活动的局面因而需要采取这

样的措施。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必须加以重视的复杂情况。

我只能进行推测，因为我同国内的人没有接触，我不知道国内正在发生些什么，可是不管怎样我了解人民了解党，我深信我所讲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达某些多少是不愉快的东西，我讲这些只是为了正视现实状况，因为如果你们对局势的判断不符合实际的话，那末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动也将不正确，结果将不可能是你们所期待的。在判断现实状况时需要有一个出发点，这是为了取得肯定的结果而确定策略和今后打算所需要的。你们的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尽管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将不会有争论。而不争论，我认为正确的，因为总的来说，我们的意见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新的局面已经形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但愿我能进行一些帮助，可是连我自己也无法想象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事业，使我在党和人民面前不丢共产党员的脸，因为人民和党都知道我是一个从来不掩盖真相的人。我是由基层党组织上升到现在的岗位，可现在遇上了这种复杂的悲剧性的局面，需要想一想今后怎么办。

同志们，我提不出任何建议，因为我是从我们办公室窗口看到最后的情景的，可是后来你们手持自动枪的人们冲进了我的办公室，夺下了电话，其他也就没有再可说的了。从那时起，没有与任何人接触，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同切尔尼克同志见面时，他说他也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也和我一样都是由上述那种方式被捕的。在审查之前，他和其他人一直被关在地下室。我们就这样来到你们这里的。我们不了解国内正在发生什么，由谁去指挥，生活情况怎么样。非常希望同你们一道找到解决办法。我同意你们讲的，需要认真地思考如何进行帮助的问题，因为这是一场可怕的悲剧。

勃列日涅夫：我们完全理解，亚历山大·斯捷潘诺维奇，现在我们不来议论你通报的情况，这无济于事。现在重要的是要找到真

正的出路，找到恢复局势的解决办法，当然不是在今天或是明天，而是在未来。所以我们把你最后讲的几句话理解为，你希望和我们，和其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道找到一种既能使我们克服某种困难又能使我们友好相处的解决办法。我们要的也是这种解决办法。我们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杜布切克：是这样。

勃列日涅夫：现在我应当客观地讲一讲发生了什么事。军队进驻时未放一枪，军队履行自己的天职。你们的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号召你们的武装力量不要进行抵抗，所以没有人员伤亡。

杜布切克：我认为捷共中央主席团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幸亏电话线没有被切断），向我们军队和国家保安部门、向工人民警下达了指示并发布了告人民书，命令人们在任何情况和任何地方都不要进行反击，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号召。

勃列日涅夫：这是我们对你讲，在军队进驻所有城市时没有伤亡，工人和工人民警直到今天都一直没有向我们进行抵抗，也没有有组织的反对活动。但是，在军队进驻时自然也有令人不愉快的印象，这就是部分居民对此表示不满。这很自然，没有什么奇怪。

我们军队想占领和控制宣传工具，如电视台、电台和《红色权利报》。我们没有动其他报纸。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武装抵抗。可是在我们军队进驻时，大批群众组织了起来，和我们军队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这时有一个电台活跃起来，辱骂苏军当局。我们军队曾收到过不准开枪不准打人的命令。就这样对峙了整整一昼夜。而那个电台没有闲着，右派分子在那里坐镇，大肆进行反对苏联的右派宣传。后来，我们军队拿下了《红色权利报》社，但同样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我们曾得到什维斯特卡<sup>①</sup>被捕的消息。我们军队释放了什维

<sup>①</sup> 什维斯特卡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斯特卡。应当说，他当时处于休克状态。他休克近两个小时，在医生的救护下才清醒过来，现在他好多了。

不久开始了各种示威游行，可是没有工人阶级，没有青年工人参加，参加的主要是游手好闲的年轻小伙子。有的地方人聚集得多一些，有的地方少一些，不过都没有发生枪击事件。只有我们的一个哨兵晚上被打死了。他出来巡逻，被人暗杀的。在布拉迪斯拉发，这帮坏小子把一辆乘着我们两个人的小汽车推入了多瑙河。好像是一个得救了，一个淹死了。在攻占电台时双方进行对射，我们有13个人被打伤。这就是全部流血冲突事件。

波德戈尔内：在布拉格，他们从窗口打枪。

勃列日涅夫：在布拉格，在布拉迪斯拉发，从阁楼打枪的和从窗口打枪的都有。我们军队封锁了这些楼房，可是没有人从里面走出来。

布拉格闹腾得最厉害。

你应当知道，我们无法隐瞒。昨天，他们用一天时间召开了大会。这里应当提出的是，他们是怎样组织这个代表大会的。说是在汽车厂里开的会。不知是不是这样，可是官方是这样广播的。

波德戈尔内：是在电器仪表厂开的。

勃列日涅夫：代表大会是在工厂俱乐部里开的。他们代表的代表人数也各不相同，有的说是800名，有的说是900名，也有说是1000名的。据我们所知，代表大会没有斯洛伐克人出席。也有说只有5个斯洛伐克人参加……

波德戈尔内：没有一位主席团委员参加。

勃列日涅夫：据报道，他们采用公开表决的方法进行了选举。不知道选出了什么样的全会，但是他们选出这样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委员会（读名单）



№01087

## 叶皮谢夫关于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 采取紧急措施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年9月4日)

秘密

苏共中央：

我们的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后粉碎了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国际反动派的图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捷一切健康的爱国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来解决稳定国内政治局势，使地方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捷人民军的指挥员和政治机关的工作正常，看来是适宜的。

根据苏捷会谈公报发表后捷克斯洛伐克所形成的具体情况，我们认为，为克服由于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居民和军队指战员长期施加影响造成的积垢，恢复并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军人同居民的友好同志关系，揭露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活动，可以采取以下首要措施：

1. 鉴于捷共中央八月全会通过决议赞同苏捷会谈公报以及捷共领导、捷政府和人民军指挥员采取使局势正常化的措施，苏军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应当继续更坚定地执行国防部长和总政治部以前下达的关于稳定捷国内政治局势，消除已产生的积垢，恢复并加强同捷克斯洛伐克军民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指示。必须在所有层次上更加积极地同地方党政机关、捷人民军指战员和政治机关、社会团体、工业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学校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和政治联

系。

2. 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实际上还处于开始阶段。苏军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完成这方面的任务将有一定困难，需要时间。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而在自己工作时必须沉着和有分寸，必须坚定地做到积极地参与捷地方党政机关以及捷人民军指挥员和政治机关的工作，以达到既定目的并以现有的手段给它们以帮助。与此同时，必须坚决杜绝反苏窜扰和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在贯彻所有这些措施时，力图尽可能深入地研究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发生的内在转变，必须对捷共方面在履行其承担的义务方面是否彻底和真诚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此外，苏军部队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应当在征得捷地方党政机关以及捷人民军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的同意后，继续积极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军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散发《真理报》、《红星报》和关于苏联及苏联武装力量，特别是关于共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印刷品。

——组织苏联将校军官、报告员和宣传员向当地居民和捷人民军军人作报告。

——派一批党的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战斗训练和政治训练的优秀者、伟大卫国战争的参加者、特别是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参加者去工厂、学校和部队。

——安排苏军将军和军官同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二战时期的同事以及战后同事和同学私人会见。

——组织苏军和捷人民军的兵团、部队和分队军人小组的互相拜访，以及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官士兵的会见。应特别重视组织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之间的会见，以便就克服军人的消极情绪，加强我们两国军队之间的友谊和战斗联盟，用高度的政治觉悟、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阶级仇恨的精神教育捷人民军

官兵等问题进行讨论并采取共同措施。

——举行有捷克斯洛伐克军民参加的友谊与战斗情谊晚会。邀请当地军民参加苏军部队进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

——在苏联军人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群众和军人会见时，在工厂、农业生产合作社、捷人民军的部队和各团，组织苏军军区或驻军歌舞团、军乐队和战士业余演出队的演出。

——在城市和农村的广场上放映描写苏联武装力量的解放使命，苏捷军队在上次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共同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战斗情谊，以及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影片。

——组织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和军队干部在苏联军事报刊及我们的将军和军官在捷报刊、电台和电视台上，就宣传苏捷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和战斗情谊问题发表讲话。

——制作放置在苏军驻地的显著地方的讲述苏捷两国人民友谊和两军战斗情谊的照片展览橱窗并发往苏军驻捷部队。

——同捷人民军政治机关和当地政权机关共同组织苏捷军人对二战期间的战斗地点和革命历史纪念地的参观旅游。

——举行有盟国军队官兵和当地公众代表参加的纪念兄弟军队建军节（保加利亚人民军为9月23日，匈牙利人民军为9月29日，捷人民军为10月6日，波兰人民军为10月12日）的必要活动。

在进行联合举办群众性政治活动时，可利用部队现有的宣传技术手段（流动俱乐部、电影流动放映队、播音站、无线电广播中心站）。

3. 组织苏军运动员同捷人民军军人以及先进的青年工人农民进行各种体育比赛（排球、田径、举重、越野赛跑、游泳、象棋）。与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交换队旗、小徽章及其他纪念品。

4. 根据捷方的请求，用人员和技术器材帮助收割庄稼，修理

机器设备，完成能促进个别工业企业正常生产的作业。

5. 通过当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对为加强苏军与捷军民友好关系所采取的措施，对居民进行帮助的事实，以及我们军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高尚行为来进行宣传。

6. 继续通过“伏尔加”电台转播莫斯科电台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广播节目，利用在捷境内的设在列车上广播电台播第一套全苏俄语节目（包括专门为苏联军人播放的节目）。

7. 为今后执行与捷方原先商定的关于互派政工人员代表团、军事院校干部代表团、战斗和政治训练优秀者代表团以及军队歌舞团的措施创造良好条件（根据双方商定的计划，1968年下半年将向捷克斯洛伐克派遣20个苏联军事代表团，苏联将接待19个捷方代表团）。

积极做好向捷克斯洛伐克派遣参加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著名老战士团、苏联国防部模范乐队和海军模范乐队以及格列科夫画室艺术家画展的准备工作。

国防部和总政治部以及驻捷苏军司令部和政治机关计划再采取广泛的措施，提高军事和政工干部以及士兵的思想政治素养，以便他们顺利完成在捷克斯洛伐克居民和军人中做政治工作的任务。

阿·叶皮谢夫<sup>①</sup>

---

<sup>①</sup> 叶皮谢夫，阿·阿·（1890— ），1962年起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

№01088

## 马梅多夫和雅科夫列夫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 实施首要措施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年9月6日)

秘密

苏共中央：

8月21日至30日期间，宣传小组在完成苏共中央的委托过程中做了下列工作：起草了20多份传单，共印发了250多万张；出版了3期报纸（《红色权利报》1期，《消息报》2期）；组织了昼夜电台广播和两套电视节目的转播。

对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形势的一些观察和对我们在其居民中进行宣传工作效果的研究说明，有必要进一步改进意识形态的信息工作，并对这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施加相应的政治影响。

我们认为实施下列首要措施是适宜的：

1. 改变并加强从苏联境内进行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无线电广播，不再进行昼夜广播，而是把最大量的广播首先用中波集中在最佳收听时间段（早晨和晚上，总共每昼夜达12小时，其中包括从乌日戈罗德的广播）。在广播中要特别注意对莫斯科公报的解释，注意苏联劳动群众主要是工人对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呼吁。应增加专门对捷克斯洛伐克青年的广播（每昼夜约一小时）。这种广播应当具有进攻性和充满激烈辩论的风格，并使其导演手法和音乐配音能吸引捷克斯洛伐克的年轻听众。

通过共青团中央和青年组织委员会邀请最有经验的共青团宣传

员，首先是那些曾到过捷克斯洛伐克并善于在广播中具体地同他所熟悉的捷克斯洛伐克少男少女就最热门的政治问题进行交谈的宣传员到这种广播中发表谈话。

增加每天专门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播放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节目，为此再吸引苏联的先进生产者以及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群众非常熟悉的，与捷有友好关系的企业和城市的代表，参加这种广播节目。

增加专门的反宣传栏目，以便立即对当天捷克斯洛伐克报纸和电台中喋喋不休的直接或间接的反苏和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反击，让最反动的社会活动家，首先是那些领导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思想破坏活动的报纸和电台的评论员和记者身败名裂。

2. 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好是民主德国或者波兰）的党的机关和政府商量，组织一个半合法性质的电台，它以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斯洛伐克思想战线的工作者的名义发言，进行宣传 and 针对捷境内反动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反宣传。这种电台可以用来广播那些在目前条件下由于政治原因官方的莫斯科电台不便广播的材料。这个电台在揭露和搞臭捷国内的反苏活动家和反苏团体方面能比官方电台做得更多、更好。这个电台将以捷进步公众的名义进行广播，就增加了这种宣传的说服力。

该电台的领导可由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担任。

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邮电部，应当会同在其境内设置该电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电台必要的技术装备，如有需要还应派出移动电台。

不能排除这个电台的活动可能招致捷共和捷政府的抗议。但是，只要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报纸和电台没有完全停止直接的或隐蔽的反社会主义宣传，只要西方电台用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进行的

反苏宣传还在继续而且没有受到捷方宣传机关的任何抵制，那末这种电台的活动（我们对他的言论不负正式责任）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

3. 用停靠在捷境内米洛维策附近的列车台电的技术手段开始向驻捷苏联军人转播第一套全苏俄语节目。

为了准备定向广播材料，其中包括我国社会公众代表、亲属、战友给苏联士兵和军官的致贺辞，增加每昼夜约 1 小时的俄语定向广播，以后逐步增加到每昼夜 3 小时。同时要指出的是，鉴于相当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居民都懂俄语，根据经验，这种广播也会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中间找到最多的听众。

转播俄语广播的法律方面的问题不会引起疑问，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为盟国军队军人服务的新闻活动是完全合理的。

一旦必要，在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时，列车电台可以改为转播我们的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广播节目，而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列车电台用来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进行直接广播（像出兵的最初日子那样）。

4. 鉴于捷居民对苏联的期刊，首先是对《真理报》很感兴趣，逐步将我部队在捷居民中无偿发送的《真理报》份数增加 50 万份，同时也应当送去其他定期出版物。

用于这些目的的经费由苏联国防部负担。

5. 陆海军总政治部负责的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人学习的按苏共中央决定发行的《白皮书》摘录本。

6. 中央报刊应发表对《白皮书》的详细评论和《白皮书》的摘录，以及准备相应的电台广播和电视播送。

7. 继续出版捷克语的新闻社每周画报并组织用斯洛伐克语出版该画报（暂时仍在德累斯顿印刷，该地出版），并附上小报。画报的篇幅、技术问题及编制问题由宣传处按一般问题解决。

8. 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准备，并在国外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地下势力同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同美国和西德情报机关联系的文章。

9. 增招一批共青团员到苏军服役，期限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动员共青团积极分子（共青团州委、市委和工委书记，总数约1500人），派他们去留驻捷境内的苏军部队从事对捷居民首先是青年的口头宣传工作。尽管我们留驻捷境内的部队的政工人员工作很积极，苏联战士的思想水准也很高，但是采取这个措施是必要的。现在，几乎每一辆停留在捷居民点的坦克或装甲运输车都变成了进行热烈争论的地方，捷居民中参加争论的人与日俱增。同时捷方的这些人总是对我们的士兵，而不是对军官进行最积极的宣传工作。因此，给我们部署在捷克斯洛伐克大居民点和农村的部队派一些共青团组织中的训练有素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会有很大帮助，能有效地影响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情绪。

这个措施同样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们士兵的政治思想状况。

10. 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派挖空心思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大肆渲染对那些持枪反对我们部队时被打死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追悼活动，把这些人几乎捧为民族英雄和殉教圣徒（他们散发印刷的带照片的传单，在死者照片四周装饰着鲜花并有烧烬的蜡烛，在照片两旁站着昼夜的守灵人，并降旗致哀，在有些城市还修建了纪念碑，等等）。

因此有必要以应有的方式对在同反革命势力斗争中献出自己生命的我们的军人和记者举行追悼仪式。对牺牲的将士死后给予奖赏，按照军队礼节进行隆重的安葬（包括把他们的骨灰送回故乡安葬），我军指挥部邀请一位牺牲将士的母亲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在《红星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带照片的文章等措施，具



有巨大的道义和思想意义。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克制，可能使捷克斯洛伐克居民作出错误的解释，会把这看成是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事业献出生命的人的悼念活动不够重视。此外，我们的这种行动迫使捷当局在赞扬那些曾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军人的死者进行悼念方面有所收敛。

11. 必须对我们开赴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人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和高尚的精神世界加强宣传运动。

应当更多更详细地介绍一些我们的士兵和军官，介绍他们的品格和生活。共青团中央应当立即组织男女青年团员给留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部队的青年战士和军官写信。应当做到不仅是在捷境内的我军战士，而且是全体苏联青年应为苏军的年轻军人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在困难复杂的条件下展示苏联人的优秀品质，表明了自己是值得曾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父辈们想念的。

近来开展宣传运动就能在国内从思想上把那些怨天尤人和吹毛求疵的人，把那些人数虽然不多但仍能经常遇到的崇拜“西方生活方式”的人孤立起来。过一些时候，可以从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人中邀请一批年轻士兵和军官回苏联，到大工厂和农村向共青团积极分子和职工大会做报告。

\* \* \*

除了上述各项措施外，我们认为，加紧做捷共和捷政府领导成员的政治工作，在当前条件下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目前，由于一些客观情况，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的中层外交官很难主动地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政活动家进行接触。

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肯定斯沃博达的威信并使其得到进一步巩固，以便推进已显露出来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中的某种分化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得到中央的准许后，我们驻捷克斯洛伐克

的代表才可拜会斯沃博达。

重要的是，要使我们各项重大的建设性举措，其中包括经济援助措施，让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看来都是同斯沃博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个别情况下利用他本人写信的形式，组织我国同斯沃博达有私人友谊的军人和公民进行短期的、非官方的访问，也是有好处的。

在目前阶段，应当继续做到在同捷方接触时把党之间的接触同政府之间的接触区分开，其中包括把作为政府首脑的切尔尼克同杜布切克“分开”。同时应当更积极地开始同新任命的政府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为此目的，应当派苏联的部长或副部长们到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几天（如果没有捷方的邀请，可以作为大使的客人前往），以便进行接触，建立私人联系和适当从思想上劝导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干部。

这种接触和联系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看清楚我们不太了解的个别人的政治面目，而且可以扩大我们的联系范围，从而可以剥夺一小群捷克斯洛伐克活动家，首先是杜布切克在向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干部通报关于我们对现阶段苏捷关系中的具体问题的立场方面的垄断权。

雅科夫列夫

马梅多夫<sup>①</sup>

---

<sup>①</sup> 马列梅夫，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广播电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01089

## 莫罗戈夫就苏联出兵事 给谢列平的信

(1968年9月15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同志收

最近两年来，我曾好几次写信给苏共中央国际部，阐述我对对外政策问题的看法并提出了建议，可是我不知道是否研究了 my 建议。现将这些信件中的一封重新打字的副本寄您。

同时给您寄上我对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事件的意见。从我国政府最近就这个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到对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学说的粗暴歪曲以及对我国党所制定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的违背。

我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可能导致破坏预定在今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或降低它的意义，以及大大地降低我们祖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我希望我的材料您能亲自收到并对其进行查阅。

我斗胆向您直率地提出，为了纠正已犯的 error，可能需要撤换党和政府的个别领导人。

这封信只是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确信我不是我党持这种看法的惟一党员。

本信是由我亲自起草和打字的，谁也不知道这封信。

莫罗戈夫<sup>①</sup> 上

---

<sup>①</sup> 莫罗戈夫系1940年入党的苏共党员，曾当过摩尔达维亚一个工人村的邮电分局主任。

附 上

### 对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事件的意见

我国党和政府关于出兵（苏军和盟国军队）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会给我们祖国的威望带来难以补救的损失。下面我列举其理由：

1. 这个措施将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认为是外国军队占领他们的国家，并将会由此产生一切后果。

2. 会给国际共运带来无法挽救的危害。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将陷入困境。

3. 会给我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造成困难。

4. 会给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反苏宣传提供有根据的材料。

在这件事上，最主要的是我们祖国将陷入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

过去我说过，实施对外政策明智之举在于争取多一些强有力的朋友和少一些敌人。可现在却相反，我们会失去朋友和招来敌人。我们的后代将会把这看做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最近就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出的决定的错误是有目共睹的。我个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将会找到新的领导人，他们将采取措施纠正现领导所犯的错误。

莫罗戈夫

№01097

## 多勃雷宁关于美国对捷克斯洛伐克 事件宣传的主要方向的政治信函

(1968年10月3日)

### 美国宣传的主要方向（政治信函）

美国就我们几个盟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进行的反苏反共宣传，一开始就想要达到一系列从意识形态上和对外政策上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十分明确的目的，同时这种宣传也是反动势力用以影响美国内政和美国公众舆论的一个手段。

无论在事件之初还是在后来，美国方面没有提出给捷克斯洛伐克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尽管美国政府在宣传上采取的是不承认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的态度，可实质上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最初反应及随后所采取的行动，都是根据实际上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属于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利益范围出发的。

但是，近几年来，美国在国外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大大削弱了（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和美洲的种族冲突及社会冲突的日益尖锐）。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政府及其对外政策和宣传部门，以及各种反动团体竭力煽起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宣传运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对美国官方人士公开发表的，以及美国同我们、同驻华盛顿的

其他外交代表交谈时所谈到的言论的分析，包括这些日子里我们对美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活动的观察都表明，美国宣传机构通过围绕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掀起的诽谤运动是想达到下列目的：

——千方百计鼓励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给它们以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援，“动员”美国的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动派进行这种支援，以影响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进程；

——给苏联和其他华约成员国采取使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正常化的措施造成困难；

——支持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以及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成员国国内的各种思想不成熟、不坚定分子，鼓励他们大肆活动；

——在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进步社会阶层面前，污蔑苏联这个世界上反帝力量的主要支柱，以削弱苏联在这些国家里的影响及其整个对外政策阵地；

——转移人们对美国的侵越战争及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注意力。

必须指出，旨在达到这些目的的反苏宣传与约翰逊政府对外政策方针的下述目的是相矛盾的。这就是准备就美苏两国政府都关心的问题两国间的谈判；鉴于美国的政策和资源受到越战的束缚，以美国外交在当前不想超越的一些框架来限制波恩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意图。白宫和国务院在其实际路线上采取了某些考虑到这些对外政策因素的措施（他们本身在对捷事件的公开反应上，特别是在头几天也表现出了某种谨慎态度）。但是，就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对美国的宣传工作没有起到实实在在的遏制影响，而美国领导人本身也总想像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所讲的“在舆论上狠狠地揍苏联一下，打得它鼻青脸肿”。

##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宣传运动的组织情况

这次宣传运动在组织上的特点是，它主要靠数量空前的一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国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供稿，尤其是在事件爆发的头几天，这批人在华沙条约盟国军队进驻前以及在后来都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

这些记者提供了大量的文字、照片和电视资料，这些资料在事件头几天充斥了几乎全部报纸的头版头条，成了电台和电视台的日常和专题播放的最新消息。可以说，正是由这些耸人听闻的“惨绝人寰”报道在美国煽起了反苏歇斯底里。关于“大屠杀”的谣言，关于“恐怖活动”的捏造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美国广为流传，尽管这些谣传后来有时也遭到驳斥，但是它们还是对美国普通老百姓有一定的影响。

在这个基础上，利用自诩为“布拉格的目击者”的美国记者的蛊惑人心的报道，对居民进行思想灌输，策划各种“示威游行”，在报纸上发表各种“抗议”。同时，美国宣传机构向其他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帝国主义的和亲帝国主义的宣传机构提供材料（同时也是定调子）。至于欧洲，众所周知，那里的英国、西德和法国的宣传机构本来就很卖力，因此在这方面有着最为密切的“合作”。例如，在美国广泛转载佐尔扎<sup>①</sup>的“分析性”文章，而欧洲资产阶级报刊则利用美国通讯社、报纸和电台的诽谤性材料。

### 美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宣传的内容和基本论点

目前，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轰动性已经消失，甚至帝国主义宣传机器也无法掩盖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已逐渐正常的事实，

<sup>①</sup> 佐尔扎为英国《卫报》的评论员。

因此美国的宣传机构就转向有计划地炮制各种论点和“论据”，总的来看，他们是想长期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里利用这些论点和“论据”，以便在联合国等官方的国际讲坛上和社会团体的国际讲坛上混淆视听。

如果归纳一下今天所出现的这些宣传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强调的重点，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宣传机构力图把苏军和盟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说成是苏联和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害怕社会主义阵营被“侵蚀”的证明。而这种“侵蚀”好像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发生，但是从今年1月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发展得特别迅速和彻底。

与此同时，他们企图通过捷克斯洛伐克这个例子来“证明”，民主制度和民主自由存在的本身似乎与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是水火不相容的，似乎只有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才能确保真正的言论自由、创造性的批评自由，等等。为此，美国的宣传机构一开始就把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特别是他们的领导人描绘成“人道社会主义”的斗士，好像他们是天真地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牺牲品。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硬说，这些“自由派人士”是进步的“真正”代表，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都有这种人，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他们看清，只有通过“仿效”西方，尽可能紧密地靠拢西方，才能使本国的制度真正“民主化”。例如，正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爆发的日子里，美国报刊又一次开始围绕索尔仁尼琴（他的小说《第一圈》现在已经在美国出版发售）、沃兹涅先斯基、叶甫图申科、李特维诺夫、达尼埃尔的妻子等人人大吹大擂兴风作浪，这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对在苏联居民中的不坚定分子进行思想灌输工作十分重视，这从美国政府企图正式“抗议”苏联采取措施干扰“美国之音”用苏联各民族语言进行放肆的反苏宣传一事中看得非常清楚。



同样，在美国新闻署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问题》杂志上，大量刊登被美国宣传机构称为“苏联社会的代表”的叛逃分子的各种“抗议”和“声明”，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在报道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消息时，美国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总是千方百计地强调，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而且他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似乎都完全站在“自由派”领导人的一边。以此悄悄地塞进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稳固，它得不到各界人士和广大居民支持的结论。似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只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种“当前发生的广泛危机的催化剂”。

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引发的反共宣传的另一个方向是，总想诋毁作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基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他们把苏联的对外政策描绘成旨在夺取和巩固势力范围和剥削范围的沙俄政策的直接继续，而把东欧国家“具有爱国思想的人”和“自由派分子”的政策说成是渴望抵抗“俄罗斯侵略”和发展同“自由世界”的关系。

美国宣传机构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讲话中和报纸的文章中任何表露出来的右倾改良主义的摇摆不定、看法和评价都非常重视，并总是立即抓住不放，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分子”的活动倍加夸耀。目前，他们致力于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舆论界掀起要求撤出“占领”军的运动，煽动捷克斯洛伐克居民“消极抵抗”盟国。

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美国新闻界号召更积极地利用心理战的方式方法，其中包括加强利用在西方建立的以“捷克斯洛伐克地下组织”名义进行广播的电台进行无线电战争。他们的宣传手段之一是，为了影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的个人感情，散布关于“莫斯科坚持要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人辞职”的谣言。

利用卑鄙的手法指责苏联、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反犹

太人主义政策（例如他们的报刊就肯定地说，捷克斯洛伐克领导成员的最新变动似乎首先涉及到犹太人出身的人士），也起着明显的作用。正如已观察到的情况所表明的，类似的“论据”也影响了美国的犹太人，促使他们滋长反苏情绪。

当前美国报刊上关于同苏联合作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好处”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向西德靠拢已呈现出“美好”前景等议论，带有特别厚颜无耻的性质。他们千方百计地渲染和夸大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摩尔达维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特兰西瓦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马其顿）、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之间（斯洛伐克和斯洛伐克的匈牙利的少数民族）的领土要求“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

所有这一切被再三重复评述和变换着说法提出，目的是要在东欧各国煽起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情绪，使他们的目光短浅。

最后，为了直接达到激起反苏情绪的目的，美国帝国主义宣传机构不放弃任何机会，就似乎是由苏军和盟国军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给居民已带来的和继续带来的所谓“牺牲”和物质损失大作文章。为此，首先利用摄影和电视播放送葬的照片以及对死者亲属的采访，等等。现在美国中央报纸关于盟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头几天的捏造的暴行已很少提及，甚至承认苏军官兵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但是在美国边远偏僻地区，正如出差去那里的苏联工作人员所看到的，在普通居民的脑子里还留着那些关于“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的荒谬的捏造报道。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宣传机构、最反动的组织和政客，利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一些问题上为自己赢得好处。

看来，在这方面主要攻击是就主权和不干涉问题对着我们来的。可是，美国宣传机构对在捷克斯洛伐克有反革命威胁的问题避

而不谈，与此同时却顽固地想要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例子把苏联关于主权的概念说成是无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对西方国家都隐藏着威胁。

美国人力图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以及围绕捷克斯洛伐克所产生的问题说成是“苏联好战的证明”。证明美国必须“从实力地位”同苏建立关系，尽管也不拒绝就共同关心的较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行对话（这证明以往在“冷战”时期的那些口号在美国被普遍认为是现实的，而实际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也没有在这方面引起过去的那种好战情绪的复发）。

美国相应的宣传机构利用这个问题使美国的政策“更加强硬”和加紧进行军备竞赛，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在美国已达到非常庞大的规模。美国的宣传机构指出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效率高行动准确，同时强调美国在此之前对“俄国的军事实力估计不足”，因而抛出一个想法，就是苏军也可能像这样突然开进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或联邦德国。他们散布苏军在这个或那个与苏联相邻的国家边境上“集结”的各种谣言。

为此，他们宣传要“加强北约”，要在地中海地区“采取防御措施”，等等。

至于“苏联威胁自由世界”的论点的实际运用，那末除了宣传加强北约的主张外，鉴于“欧洲的军事力量平衡遭到破坏”，“存在苏联进攻西德的威胁”等等，美国外交，而追随它的还有报刊，都十分明显地企图把重点放在加强欧洲国家同美国的合作上。途径是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对“共同防御”增加军事和外交“投入”，而美国自己则不出多少股金。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缘故，所谓在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搭桥政策”，在美国的宣传喊得特别响。在政界和报刊上展开关于美国是否应当与这些国家打交道的辩论过程中暴露出，美

国是把“搭桥”看做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离间这些国家，使他们（特别是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那里的反社会主义势力非常活跃的那些国家）摆脱苏联，把他们拖入西方势力范围的政策。现在在美国的宣传中完全是直言不讳地大写大讲必须继续实施并进一步加强“搭桥政策”，以作为反对向其运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

在对内政策方面，美国宣传机构围绕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掀起反苏叫嚷，在美国国内被用来反对自由派运动和自由派人士，方法是败坏他们的名誉，说他们应当对“苏联的侵略负道义上的责任”。瓦解思想不坚定的分子（这种人在这场运动中相当多），搅乱他们的思想，唆使他们去反苏联，等等。相当一部分美国的“自由派人士”，如贵格会教徒和某些拥护和平运动的参加者等等，急急忙忙地把苏军和盟国军队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同美国的侵略战争“同等看待”。显然，他们是担心被怀疑成“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因此常常在自己的反苏态度上甚至超过毫无顾忌的反动派。

在美国大选前的复杂而紧张的情势下，这些现象导致了反战力量和自由派运动在思想上进一步疏远隔绝。美国围绕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进行的宣传在这方面起了一定的破坏作用，看来今后须要做大量工作才能克服美国自由派人士，尤其是创作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和大学生头脑里的错误认识和糊涂观念。

### 有关反宣传措施的建议

不用说，使馆会利用现有的一切条件，在美国社会公众中间和外交使团里进行相应的反宣传工作。我们打算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拟定在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也用于这个目的。

与此同时，使馆想就反宣传措施的问题也提出一些补充建议：

——继续发表专门供国外舆论界阅读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情况的文章、小册子和文件，重视对上面指出的美国宣传的具体论点的揭露，制定并提出我们的相应的论据，公布例如能说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阴谋活动和破坏活动的实际资料，等等；

——重视让我们的人更积极地利用照片、电视片和电影报道短片，通过西方国家的报刊和电视渠道进行传播和放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对这种资料也特别感到有需要，因为敌视我们的照片和电视曾经在这里吸引过人们的极大注意。我们理解，在当前时刻准备这样的资料是有困难的，但是考虑到当前美国宣传运动的特点，我们认为必须寻找并利用这方面的一切可能性；

——重视宣传（以简明易懂的实用手册、小册子等形式）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历史上和今天所取得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成就；

——当前最好也考虑一下关于在苏联报纸发布有关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消息的形式问题。美国宣传机构常常把我们就这个问题公布的塔斯社消息，说成是“占领当局的官方通报”。为了不再给类似的诽谤性狡诈做法提供任何借口，可能的话，最好像《真理报》和《消息报》那样，在发表所有材料时署上记者的姓名。

苏联驻美大使 阿·多勃雷宁

№06173

## 苏联军方对苏军进驻 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经验总结

(不晚于 1968 年 10 月 16 日)

口头报告

绝密

关于准备 1968 年 8 月 21 日军事政治行动问题的几点意见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关于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是英明的、勇敢的和及时的。随后发生的所有事件均证明，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在该国复辟。

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世界反动派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中把主要赌注押在从内部“和平”破坏这些国家。因此，苏联武装力量为了履行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不得不三次采取武力镇压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反革命分子（1953 年——在民主德国，1956 年——在匈牙利，1968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如果认为帝国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失败之后不会像在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施展阴谋诡计，企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的事态转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随着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加强，这种企图必将日益经常出现，而且无疑将越来越带有居心险恶的性质。资本主义不经战斗不会交出自己的阵地。

由此得出结论，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应该吸取对未来所必需的教训。这些教训是什么呢？

军事政治行动的宣传保障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在宣传方面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在我军进驻该国的头一周，实际上并未采取积极措施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疯狂、训练有术的宣传进行广泛的反宣传。在进行像 1968 年 8 月 21 日行动那样的军事政治行动时，原则上说，宣传机关的工作应该淹没坦克履带的轰鸣声。在八月事件中苏联坦克完全是在一片宣传沉默中前进的。当时的那种宣传真空大大帮了反革命势力的忙。

本来应该提前准备数十万份捷克文传单，向居民解释所采取行动的实质。这些传单必须与我军前进同时散发。但是这件事未办到。第一张传单仅仅在我军进驻该国的第五、六天才准备好。毫无疑问，如果苏联报纸（《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红星报》及其他报纸）在这些天用捷克文发行并在该国广泛散发，那是很理想的。当时很有必要立即控制捷克的主要报纸的编辑部，并且从第一天起就组织他们在我们的监督下发行。但是这件事未办到。所有捷克报纸的编辑部均转入地下，成为反苏势力的忠实武器。

无线电广播宣传工具也是如此。当时完全有可能组织所有捷克广播电台工作，但是为此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并未准备。未准备广播节目。“波尔塔瓦”广播电台是唯一用捷克语广播的电台，该电台捷语讲得不好、不熟练，并且被功率较大的西方电台所吞没。电视中心未被用于宣传目的，完全瘫痪。与此同时右派势力能够通过地下电视台组织电视转播。所有城市的无线电转播站均处在右派手中，被最广泛地用于反革命宣传。当时占领无线电转播站并非难事。因此，在形势发展的紧急关头只有右派势力进行争夺捷克人心的战争，而且他们获益不少。就是在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思想中发生了急剧的转向过程。如果说在我军刚来时我们可指望大约 50~60% 居民的支持和理解，那么到

头一周的周末由于我们宣传工作的无所作为，该比例变得明显不利于我们，已经有75~90%受反革命宣传恐吓而精神沮丧的居民开始把苏联出兵看作占领行动。由于缺乏积极的宣传工作，结果使健康力量开始变得信心不足，不愿意同我们进行合作。

在进行特殊的军事政治行动时，在研究事态的军事方面的同时，必须研制极为详尽的宣传计划，要有一个考虑周密的军事努力的宣传保障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预先组织一些可以广泛用于宣传目的行动。事实上预先什么也未做。

对作战的外交保障当时必须采取措施，以便排除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问题的可能性。这就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做到：假如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哈耶克给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以相应的指示。因而必须预先尽快占领外交部，并且不仅给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代表，还要给捷克斯洛伐克驻外国的所有大使馆强制发出指示。如果驻外大使馆从一开始就正确地向有关政府通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情况，那就可以防止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客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所进行的反苏演说和声明。

当时不能容许让外交部长哈耶克在我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之前呆在国外。倒完全可能这样做：让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全体成员在此之前呆在布拉格。这就能消除反革命分子建立流亡政府的可能性。

军队行动中的缺点我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在军事方面是无可指摘的。军队表现出高度的作战训练水平和出色的职业技能。但是未必有理由说是“散挂在布拉格、布尔诺、布拉迪斯拉发及其他城市街道上的装甲坦克的项链”<sup>①</sup>。实际上这些城市的街道和广场都塞

<sup>①</sup> 1968年8月21日及随后的几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中城市的主要街道上，排满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连成一条条“坦克和装甲车线”，被讽喻为“挂在城市上的项链”。



满了坦克、装甲运输车和大炮。这在各方面都是无益的：第一，这打破了正常的生活节律；第二，显示武力从反面对公民的爱国主义感情产生影响（居民从早到晚看到军队是一回事，而只是听到则是另一回事）；第三，进驻街道的战斗装备容易受到破坏。如果事态发展到公开武装反抗时，我们的军队这样布署在武器装备上很容易遭到巨大损失。军队应该布署在国家的 key 地点，但不一定在各城市和街道上。

军事政治行动保障的特殊措施我们的特工机关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大量的、受到很高评价的工作。毫无疑问，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但是不能不指出如下问题。

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相应的作战阵地的工作开展较迟。这无疑减少了我们不少有利的机会。反革命在3月份就做出了有组织转入地下的决定<sup>①</sup>，但是对于这种提前转入地下的行动，我们却无所作为。结果我们在该国碰上了高度有组织的地下抵抗系统，如果事态发展到武装斗争时，我们的军队和特工机关势必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预先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安排全国范围的地下工作是史无前例的事情。这是极其危险的。只有当我们的特工机关渗入到内部时，上述危险才能得以克服。当然，只有当地方组织开始组建时，而不是已转秘密活动时，这一工作才容易做成。必须坦率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无一反间谍机关不使地下抵抗运动活动瘫

<sup>①</sup> 原文如此。文件中的“反革命”究竟是指齐萨日、希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捷共领导层中的改革激进派，还是指文化艺术界的激进分子，并不明确。从行文中也看不出明确的所指。1968年3月22日，诺沃提尼向国民议会正式提出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30日，斯沃博达被国民议会在288票的总选票中，以283票赞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4月4日，斯姆尔科夫斯基被任命为国民议会主席。4月6日，列纳尔特总理代表政府向总统提出辞职。4月8日，改革派的代表之一切尔尼克出任政府总理。因此，这里所说的“反革命在3月份就做出了有组织地转入地下的决定”，可能是苏联故意把局势说得严重的一种猜测。

疾。然而，二战期间各国抵抗运动均带有临时安排性质，而如果说是国家机关安排的，那是在战争开始的条件下做的并留有匆匆忙忙的痕迹。无疑这是不算数的。

特工机关的第二项重要任务是，进行全面作战以虚伪报道蒙蔽敌人并使其队伍军心涣散。这项任务只有通过特殊手段，并且只有当这些手段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大胆地并在高度职业化水平上使用，才能完成。应该在反革命队伍中制造分裂，引起他们之间相互不信任，把国内反革命的努力引向歧途，最终为采取必要的政治解决办法准备良好的条件。令人遗憾的是，这项任务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

理应借助特殊手段解决的第三项任务就是使国民议会代表和中央委员中的健康力量积极行动起来。不应该盲目地认为健康分子会自然占上风。毫无疑问，必须给予他们以必要的援助。而这只能通过同上述人物中的每个人个别做工作，并利用全部人所共知的手段，才能办到。

第四项任务就是控制外交部机关，不解决该任务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不可能稳定。无论政治调解如何，必须从一开始就以最坚决的、最激烈的方式干预这个非常重要机关的活动，并控制它的一切阵地。但是这件事未能办到。外交部机关处于右翼领袖之一的帕维尔控制之下。

\* \* \*

自从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政治行动一开始就必须有一个与军事管制一起保证镇压国内反革命派的宣传、特殊、行政及其他措施的综合计划。这一计划却没有，显然这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在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调解过程被拖延。该过程无疑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必须现在立即着手详细研制使国内局势进一步稳定的计划。该计划应该在国家最高层制定。

最普遍的看法，该计划应该从如下基本状况出发：

1. 在调解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必须从建立军事管制本身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一点出发。必须用政治和行政监督来补充军事管制。这里的谈话涉及到最坚决的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对各方面，直至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实行镇压。目前的不干涉路线不仅是幼稚的，因为出兵就是最直接干涉国家事务的行动，而且也是错误的，因为右派分子利用这种不干涉政策和我们犹豫不决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和涣散健康力量的人心。

2. 自从右派分子掌握大众传媒工具（报刊、无线电广播、电视、电影）以后对群众的反革命影响便开始在捷克斯洛伐克传播。在捷克斯洛伐克复兴社会主义也只有当所有大众传媒工具在我们无条件和强有力控制之下时才有可能。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无大众传媒工具的情况下整顿右翼势力。在报刊、广播、电视这些强大的舆论工具控制在右派分子手中之前，不可能为在政治领导中做出重大政变奠定基础。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就是为争夺捷克人心而战。捷克斯洛伐克公众舆论意识形态变形的过程正在继续。不掌握大众传媒工具想阻止该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我们的军队驻扎多少时间，使局势健康化也是不可能的。

右派分子在大众传媒机关保留了自己的全部阵地。而且他们日益巩固这些阵地。他们控制着重新建立的信息和新闻管理局。因此这里谈话将涉及对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的正式控制。指望报刊和广播会同反革命进行积极的斗争是毫无根据，也是不可能的。出路只有一个：要求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任命一些准备同我们合作并在实际中证明有这种准备的人到大众传媒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3. 第二项重要任务就是应该对外交部机关实行有效的控制。解除帕维尔的职务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右派分子在外交部的阵地。这一至为重要的国家机关迄今仍是反革命的最重要的策源地。

如果外交部只是保持中立，（我们的）目的是不会达到的。必须迫使这些机关在巩固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工作，不仅要同外国间谍的阴谋，而且要同国内的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进行根本的清洗就不可能使国内局势稳定，但是这种清洗我们应该通过捷克人的手，即外交部机关的手进行。现在这些机关不仅不能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且积极反对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成为对健康力量实行镇压的工具。

在外交部机关里理应进行根本的清洗，这项工作刻不容缓。

4. 列宁不只一次指出，政策就是人。如果我们想实行新的政策，我们就应该寻找新的人。显而易见，捷克斯洛伐克前任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能力实行新的政策。过去的错误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背叛，已成为过于沉重的负担。前任领导人指望将来出现好的转机，将千方百计暗中破坏莫斯科协议。如果指望依靠前任领导人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的稳定，我们必然陷于死胡同。在此情况下，局势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复杂化，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政治和军事危机。

然而，在上述条件下替换政治和国家领导人只有通过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通过国民议会和捷共中央全会才能实现。因此，应该对这些机关给予高度重视。应该改正从前所犯的重大错误，那时候把中央委员和国民议会议员置于一旁，不理不睬。

应当制定一个广泛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它的实施可以保证我们在国民议会和中央委员会中聚集所必需的力量。这里说的是要对每位议员和每位中央委员做具体的工作。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思想说服、败坏名誉、分化瓦解、经济杠杆等等。

当右翼势力在这些重要的党和国家机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很难说能做出什么可以接受的政治决定。

在亟待解决的一系列任务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杜布切克、切

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及其他领导人的威信。现在他们的威信很高。这种威信是在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是在“自由化”的浪潮中被吹捧起来的。无论如何，这种情况不可忽视。

现在杜布切克在国内受到极右势力的有力批评。应当坦率承认，这种来自右的批评是对杜布切克威信在国内最现实的威胁。因此，必须全力支持这一批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极端分子是我们的同路人。应当借助右派的手诋毁杜布切克的名誉，让他和他的政治威信一同完蛋。

5. 干部问题是现阶段最重要的问题。毋庸置疑，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右派分子在人民心目中彻底地损害了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健康力量的名誉。现在他们没有政治威信。同时，他们自己的表现也不够称得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危机时刻他们未能控制局势。因此，从干部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应该把目标仅仅定在新人身上，定在不太出名但无疑在实业界，在文艺界有威望的人的身上。应当准备把这些人推上领导岗位。在这方面，第一步自然便是寻找这些人。第二步就是将他们固定下来。在将这些干部推上领导岗位的过程中，重要的是解决他们应该以什么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的问题。也许他们应该发表讲话，从左的方面批评杜布切克的立场；也许他们应该表示自己是杜布切克的拥护者；也许他们应该比他更右。

在目前的形势下，最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我们最初打算依靠的健康力量站出来，对杜布切克的立场表示赞同，但要对他的政策提出一些新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这种政治上的伪装对于新干部巩固自己的地位是完全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正面进攻是不会成功的。

6. 当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是相当复杂的，应该采取措施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为此必须制定一个采取特殊措施进行虚伪

报道的广泛计划。必须扩大对右派领导人的不信任，进行败坏其名声的行动，同右派分子进行最广泛的接触，以便让广大群众有可能谴责这些右翼领导人的 Колообразционизм。

现在虚伪报道的手段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我们的敌人也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种手段，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果我们不使用这种手段，那就要犯下不可原谅的错误。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在同敌人的战斗中不使用敌人采用的一切斗争手段的领导者的行为是犯罪。反革命为了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阵地广泛使用虚伪报道。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兴风作浪。

7. 现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尚无具有凝聚力的中心。无论党还是政府机关都不支持他们。必须采取措施使这样的中心建立起来。解决办法就是，为了取代诸如“235俱乐部”<sup>①</sup>、“无党派民主人士俱乐部”之类的反革命俱乐部，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复兴社会主义俱乐部、爱国者俱乐部，这些俱乐部应具有有凝聚力的纲领，精明能干和足够威信的领导，必要的财政资金和新闻机关。

现在应当避免捷共的分裂，因为分裂无疑会使局势的稳定复杂化。因此建立一些与党对立的社会团体是不适宜的。俱乐部系统不含有类似的危险性。与此同时它可能成为影响公众舆论和协调左派力量的好形式。

8. 整顿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状况在稳定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局势中占重要位置。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是靠右翼的努力而瓦解的。作为华沙条约的工具，这支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具有现实威胁的

---

① 原文如此；应当是“231俱乐部”。“231俱乐部”于1968年3月31日，经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批准成立，属一般群众性社团组织。该俱乐部的基本成员是大清洗中无辜受迫害而幸存下来的人。其宗旨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法制社会，主张按照捷克斯洛伐克刑法第231条，对那些专搞迫害的人判以“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予以惩处。该团体也因此取名为“231俱乐部”。

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有可能站在右翼方面，并将在一定的条件下被他们利用来对苏联军队的武装进攻。

使军内局势健康化只有在必须尽快、果断地彻底清洗之后才能实现。

9. 广泛渗透到民族主义的地下工作中去是一项刻不容缓的特殊任务。现在在地下势力中的秘密活动削弱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警惕性。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牢固的地下阵地的存在在危机时刻将有可能迅速、轻而易举地使之瘫痪。

10. 不排除右翼势力企图使国内局势发展到饥饿和经济瘫痪地步，以便归罪于苏联，从而加强自己的阵地。如果以物质匮乏更进一步损害爱国者的感情，那么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者对这场危机极感兴趣，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将不遗余力引起这场危机。

注意到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首先是擦亮健康分子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这种危险性。

11. 必须利用我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驻军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秘密阵地。仅仅从大使馆的合法间谍机构阵地出发进行特殊工作是不够的。必须在国内关键地点建立 10~12 个强大的秘密间谍机构，并从这里出发进行广泛的活跃健康分子活动，分化瓦解和孤立反革命活跃分子，并败坏其名誉的工作。

12. 尽量扩大同党、政府及其他战线的官方接触已摆上议事日程。这种接触应该是反复的、不断扩大的。必须利用个人关系、个人影响为局势健康化服务。扩大接触不应该是自发的，而应该从属于具体目标，具有具体性。

13. 现在反革命势力正在采取某些步骤把一部分名誉扫地的人士转移到西方。这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必须在这些人士周围加强工作，利用所获资料从总体上损害反革命的名誉。令人遗憾的是迄今我们没有足够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从事

揭露反革命地下组织的工作，说明他们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说明外国帝国主义间谍中心参预反革命活动，尽管这种参预是显而易见的。必须积极开展获取此类资料的工作。

14. 犹太复国主义是捷克斯洛伐克右翼势力的主导成分。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犹太复国主义的具体工作尚未进行。破坏他们阵地的计划没有。他们的思想未被揭露，他们破坏性实质未被揭穿。必须研制非常具体的破坏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犹太复国主义阵地的计划。

15. 如果出现由5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的一个文件，对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诸过程给予深刻的政治评价，那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这类文件会对业已发生的事件做出合乎道德的解释，并会阐述进一步稳定国内局势的广泛纲领。如果该文件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同世界上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化联系起来，不仅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而且对现在领导的错误给以尖锐的批评，揭露他们在政治经济立场上的托洛茨基主义和修正主义实质，那就太好了。在该文件中应当毫不含糊地宣布，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社会主义国家将采用武力和一切其他手段保卫社会主义成果。



№01090

## 扎哈罗夫就联邦德国对苏捷 会谈的反应呈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8年12月17日)

绝密

苏共中央：

德国朋友私下向我国驻民德代表转述了联邦德国外交部评价今年10月3~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捷会谈的文件。

下面是联邦德国外交部上述评价的陈述。

1968年10月3~4日莫斯科会谈公报是由苏联代表团一手炮制的，捷方几乎没有参加公报的起草工作。因此可以说公报阐述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观点并确定了苏方对布拉格的要求。

捷方代表团被迫承认捷存在来自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威胁。公报中讲，捷克斯洛伐克将作出最大努力来“提高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加强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

捷大众媒介必须全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种措词反映了苏联领导对捷当局未能充分控制捷新闻界的不满。从这种措词中还可以看到苏联要求对捷大众媒介机构进一步进行清洗。

根据公报的内容判断，建议布拉格对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进一步的清洗，并更重视忠于苏联的官员。

莫斯科显然想要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扩大同苏联在经济、政治和

文化领域的合作。必须指出，要想说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尤其是在涉及越南、德国、近东等问题上，建议布拉格向苏联方针政策靠拢。与1968年8月26日莫斯科协议不同的是，在这个文件里直接称呼西德。可以认为这是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对联邦德国所采取的消极立场以及捷国民议会就慕尼黑协定30周年通过的妥协性决议的批评。

在8月26日莫斯科协议里讲到盟国军队将逐步从捷克斯洛伐克撤走。10月4日的公报里则说这仅涉及一部分在捷的盟国军队，另一部分盟国军队应当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这是第一次正式确认双方同意延长苏军无限期留驻捷克斯洛伐克。

看来，会谈的下述方面对捷方有利。

俄国人同意再次同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进行谈判，而这两个人曾被俄国人称为反革命分子。由此可见，布拉格的改革派还没有成为莫斯科希望进行的清洗的牺牲品。

苏联暂时还避免采取直接的恐怖活动，莫斯科和布拉格都在争取赢得时间。

至于谈到关于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部署问题，那末这可以认为是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某种让步。至少在理论上，这些谈判使得捷方有可能确定占领军的地位，指出关于占领军留驻的时间问题。但是，不能把占领军的部分撤军看成是让步，这是由于营房不足而必须这样做造成的。

在文件的最后部分，联邦德国外交部对1968年10月4日的公报作了如下的总评价。

捷克斯洛伐克输得多赢得少。苏联所作的让步无论如何也补偿不了捷方所作的一系列重要让步。不能把苏联答应在捷局势正常化过程中给予援助的许诺，理解成苏联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以物质援助

的真诚愿望。确切地说，应当把这种许诺看做是宣布对捷内政的积极的大规模的干涉。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再次答应苏联按苏联所希望的那样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局势。此外，捷克斯洛伐克承认在捷国内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结果，苏联发动进攻的出发阵地得到了改善。同时应当承认，今后每一方都将对已达成的协议作对自己有利的解释。由此可见，捷克斯洛伐克危机远没有消除。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尼·扎哈罗夫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 80 年代的波兰局势（一）

（1980 年 8 月至 1981 年 12 月）

1980 年 8 月，波兰改革走入困境。政府宣布提高肉类销售价格 40~60%，激起全国性的工人大罢工。在大罢工中，非官方的独立自主团结工会应运而生，并被波兰政府承认为合法组织。1943 年出生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电工莱赫·瓦文萨，作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走上了波兰的政治舞台。大罢工引发了政府危机，先是波兰部长会议主席易人；9 月，盖莱克被解除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等职务，卡尼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即使如此，危机也并未消退。

1981 年 2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八中全会，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取代任职不到一年的平科夫斯基，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仍继续兼任国防部长。团结工会越发壮大起来，并于 9 月在格但斯克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瓦文萨正式当选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团结工会不仅成为与波兰统一工人党分庭抗礼的政治组织，并且表示不再信任政府。局势表明，全国性的危机在加深。

在此情况下，1981 年 10 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九届四中全会，雅鲁泽尔斯基取代卡尼亚，任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从而集党、政、军最高职权于一身。12 月 13 日，波兰国务委员会宣布，成

## 苏联与 80 年代的波兰局势（一）

---

立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全国进入战时状态，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同盟者仍可自由活动外，中止其他任何组织的活动。据此，军警在全国围捕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活动。波兰局势更加复杂化和微妙化了。

苏共和苏联政府极端关注波兰局势。本组文件包括苏共中央对波兰局势的估计、对策研究、苏波关系等各方面问题。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张沛翻译）

№01547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的会议记录

(1980年8月25日)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送：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苏斯洛夫、吉洪诺夫、乌斯季诺夫、齐米亚宁、鲁萨科夫、阿尔希波夫、科尔尼延科、扎米亚京、拉赫曼宁同志

摘自1980年8月25日第210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

### 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局势问题

1. 同意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出现的局面的通报。

2. 成立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其成员为：

米·安·苏斯洛夫（召集人）、安·安·葛罗米柯、尤·弗·安德罗波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米·瓦·齐米亚宁、伊·瓦·阿尔希波夫、列·米·扎米亚京、奥·鲍·拉赫曼宁同志。

3. 委托委员会注意观察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内出现的情况，并系统地向政治局通报波兰国内发生的事情以及我方可能采取的措施。必要时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议。

苏共中央政治局

№01549

## 苏共中央关于同波兰领导人谈话的提纲

（1980 年 9 月 3 日）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送：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拉赫曼宁同志

摘自 1980 年 9 月 3 日第 213 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

同意与波兰领导的代表们的谈话提纲（附后）。

中央书记

### 关于同波兰领导的代表们谈话的提纲

1. 要准确估计形势和对同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的所谓的“罢工联合委员会”<sup>①</sup> 签订的协议采取明确的立场。

经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同意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议，是为了达到“解决问题”而付出的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当然我们知道，你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作出这个沉重决定的。就实质

---

① 1980 年 8 月，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城市，750 家工厂的 70 余万工人，反对政府宣布的提高肉类销售价格，要求增加工资而发生的全国性大罢工。罢工工人自发建立罢工委员会，作为领导罢工、和政府谈判的统一机构。罢工委员会也成为自治团结工会的前身。

说，协议意味着使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合法化。产生了一个组织，它企图把自己的政治影响扩大到整个国家。同它作斗争的复杂性特别在于，反对派分子伪装成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保卫者。

协议没有消除危机事件的根本原因，不但如此，现在要解决波兰经济和社会的迫切问题更困难了。

既然反对派有意要为自己的目的而继续斗争，而党和社会的健康力量不能同意波兰社会倒退，达成的妥协将多半是暂时的。还必须考虑到，反对派不是没有根据地指望着外来的帮助。

2. 在能令工人阶级的颇大阶层得到错误认识的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得不转入防御。当前的任务是准备反攻和夺回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失去的阵地。

反攻中，在表现政治灵活性的同时，要利用执政党、它的坚定健康的核心、国家政权、群众性社会组织的一切条件，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先进阶层，必要时利用斟酌过的行政手段。

党应对八月事件<sup>①</sup>作出原则性的政治评价，同时加速提出包括改善劳动人民生活问题在内的自己的行动纲领。

3. 对加强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必须赋予最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政治危机急剧削弱了党在工人阶级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就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团结以及恢复它的影响和威信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在一些具体的建议中可以提出以下几点：

---

<sup>①</sup> 即1980年8月发生的全国性大罢工，导致全国性政治危机。1980年8月2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届四中全会，迫使部长会议主席巴比乌赫、党中央书记乌卡谢维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什德拉克等退出中央政治局。接着巴比乌赫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什德拉克辞职。8月3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和罢工委员会签订了21条协议，几乎接受了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条件。9月1日，码头工人和造船工人恢复上班，8月事件结束。



——考虑到政治危机的教训，赶紧实行旨在提高一切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措施。根据目前存在于国内的特殊情况，坚决清除党内明显的异己分子。

——在最近期内举行中央全会，根据政治总方针提出明确的实事求是的纲领。纲领应当最大限度地削弱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罢工委员会的要求在工人眼里的意义。根据中央全会的资料，召开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市和乡党委会的扩大的全体会议，企业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和党员大会。

——考虑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的可能性，在会上提出详细的党的行动纲领，确立五年计划的新指标，并对领导机关作必要的变动。

——为提高党在农村地区的战斗力，应适当地从组织上加强在 1975 年的行政改革后履行着区委会任务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乡委会。

——研究把波兰军队中有经验的政治工作人员派往党的机关担任领导工作的问题。

4. 为恢复被破坏了的党和工人阶级的联系，对工会的活动实行根本的改革。尽力做到使现有的工会（工会中央理事会）和它们的组织不散或不自行解散。在最近期内举行波兰工会第九次例行代表大会，把使工会最大限度地接近工人、争取工人的充分信任作为首要任务。

——保护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工会运动的基本原则。利用同罢工联合委员会的协议中的某些可以接受的条款，同时采取一切措施以限制、制止协议中最危险的条款的实现。提出一些社会性的重大倡议，以提高工会的威信。

——用先进的有威信的工人加强工会组织的干部。先于所谓的“自治”工会进行工会积极分子的选举。

——努力限制所谓的“自治”工会在群众中的活动和影响，实现这个任务多半要靠相应地动员社会舆论。主动把忠于党的人士派

到所谓的“自治”工会中去。

5. 考虑到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造成的危险，从国家系统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

——加强对军队的注意，要特别注意官兵的军事政治训练。利用可能性吸收军队的指挥干部参加党务和经济工作。

——采取必要的措施揭露反对派头目的政治面目和计谋。

6. 在群众性报道和宣传的手段方面，集中力量进一步加强党对它们活动的领导和监督。当实际上已提出“限制检查”以及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教会竭力想掌握群众性报道手段的问题时，此点尤为必须。

——在这些情况下，应当明确规定可容许的范围，并公开宣布，任何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出版法所不许可的。

——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反共产主义的定期出版物、电影和电视作品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内接连不断的流传，保证对从波兰发出的报道的来源，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的记者的活动进行严格监督。

加强党对中央和地方报刊、各编辑部门（首先是电视和广播）领导人的工作的监督。

通过群众性报道工具指出，在波兰发生的事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而是由错误和失算以及某些客观原因（天灾等等）引起的。报道机关要主动、广泛地抵制敌对宣传的反波、反苏的攻讦。

客观地阐明同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广泛合作给予波兰的经济利益。反驳散布的诽谤，说什么目前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居民食品供应困难的原因之一似乎是由于把食品供给了社会主义国家。

\* \* \*

在对波兰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危急形势说出一系列看法时，想再

次把波兰同志的注意力转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1979 年，特别是 1980 年 7 月 31 日在克里姆林宫同爱·盖莱克<sup>①</sup> 的谈话，以及他在今年 8 月 21 日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的那些劝告和期望。

在目前情况下，特别重要的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今年 7 月 31 日的劝告：

以广大的阵势进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教育的工作，坚决制止利用民族主义灌输反社会主义、反苏情绪，歪曲苏波关系的历史和苏联同波兰人民共和国合作的性质的一切企图。

开展不妥协的反宣传来反对在“全世界的波兰人都是兄弟”的口号下抹煞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阶级内容以及把波兰革命前的过去理想化的意图。

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政治斗争中，不是致力于防卫，而是要进行反对他们的连续不断的进攻。

1980 年 9 月 3 日

---

<sup>①</sup> 盖莱克，爱·（1913～ ），出身于矿工家庭，早年侨居法国。1931 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48 年回国，在波兰工人党中央机关工作。1956 年当选为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 年 12 月 20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五届七中全会，选举盖莱克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取代哥穆尔卡。

№01550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发展与 对策的会议记录

(1981年4月23日)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送：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波诺马廖夫、齐米亚宁、卡皮托诺夫、鲁萨科夫、阿尔希波夫、扎米亚京、拉赫曼宁同志——全文；维·阿法纳西耶夫、拉宾、洛谢夫、帕斯图霍夫、希巴耶夫、佩戈夫、佳热利尼科夫、绍罗同志——第2部分。

摘自1981年4月23日第7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记录

1. 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波兰问题委员会在简要报告中阐述的看法（附后）。

2. 批准帮助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在组织和思想方面加强党的措施的计划（附后）。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关于波兰局势的发展和我方的一些步骤

波兰国内政治危机具有缓慢、持久的性质。波兰统一工人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中发生的过程的控制，同时“团结工会”变成了有组织的政治势力，它能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瘫痪，并实际上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反对派暂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那么首先是因为担心苏联军队的进入和希望通过反革命渐进的道路不流血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今年 4 月 10 日举行的议会会议上，波兰领导人未敢冒险提出反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坚决行动的问题，显然它不能而实际上是不想放弃他们的借助政治手段克服危机的方针。

是的，在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议会报告中，包含了一系列以建议的方式提出的论点，这些论点是对方对波兰同志时常谈到过的论点。但是它们不是以必须执行而是作为号召和愿望提出来的，报告的妥协性也首先说明了这个事实，即报告是平静地通过的，没有引起朋友们的顾虑和对抗。

把议会的结果视为自己不大的，但是是初步的胜利，卡尼亚<sup>①</sup>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现在对自己巩固党的威信的行动有些积极起来了，他们在许多大型工业企业中发表演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同工人和农民会见，决定在 4 月 25 日举行中央委员会的例行全会，着手准备应在今年 7 月 20 日前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

---

<sup>①</sup> 1980 年“八月事件”过去后，9 月 5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盖莱克被解除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选举斯·卡尼亚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政府系统采取某些旨在整顿经济状况的措施。

同时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议会会议后出现的平静是暂时的。反对派这样做是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正在继续积聚力量以给予党新的打击。

整个“团结工会”<sup>①</sup>和它的部分环节通过提出多半具有政治性的各种各样的要求，准备对当局再次进行讹诈。在这个工会联合组织的领导层中出现分化的迹象，暂时还没有提供认为在它采取的总方针中有本质的改变的根据，甚至即使事情发展到瓦文萨和保卫工人委员会—社会抵抗委员会的极端分子分裂，瓦文萨本人和在他背后的天主教的牧师们决不会打算减轻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压力，也不能排除极端分子会取得对“团结工会”的控制。

在最近一段时候，新的策略方针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围绕这个方针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实际上已联合起来。清楚认识到波兰的地理政治地位使他们不能妨害国家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和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原则，这些势力公然决定从内部瓦解波兰统一工人党，开始干起使共产党变质的勾当，这样一来，就可在“合法的基础上”夺取政权。

正如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中央全会所指出的，现在机会主义分子已经成功地控制着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部分地方党组织，并借助于他们开始逼迫党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将继续这种破坏

---

<sup>①</sup> “团结工会”全称独立自主团结工会，是波兰工人独立于官方的工会以外的组织，由1980年8月波兰全国性罢工中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成立的“三联轴厂际罢工委员会”发展而来。1980年11月，华沙省法院批准团结工会依法登记注册，成为合法组织。团结工会的全国性决策机构是全国协调委员会，主席瓦文萨。

工作，企图把即将到来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变成为政权而厮杀的主要场地。

在这些情况下，有必要再次考虑我们对波兰领导的政策的态度，明确断定可以依靠的是哪些力量，这归根到底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成果。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右翼中，修正主义派别的人物有：费希巴赫、维尔布兰、拉科夫斯基、雅布翁斯基，等等。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同“团结工会”的某些领导人近似，赞成把波兰的社会经济结构大致改建成南斯拉夫的方式。在政治方面，他们赞成各种政治力量的“伙伴关系”，同多元论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相一致。

这些人物依靠处在“团结工会”影响下的那部分党组织的支持。不能排除，在当前情况下他们能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上哄弄许多自己的追随者，并对党的领导机构的组成施加非常重要的影响，显然，他们企图在最近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做到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中有相当的变动。

在左翼方面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如格拉勃斯基、热宾斯基、奥尔绍夫斯基、科切列克，等等。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同志的言论非常接近我们的立场。他们反映了那么一部分党员的心情，这部分党员始终不渝地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同苏联的友谊，反对修正主义的曲解，要求采取反对“团结工会”的坚决行动。赞成他们的基本上是经历了人民波兰形成的最初阶段的战争和阶级斗争考验的老党员。

遗憾的是，这一派的代表绝对没有构成大多数。造成一种印象：他们认为给“团结工会”迎头痛击即可摆脱危机而不考虑现在的力量对比，同时他们认为没有苏联军队的介入就不可能改善局势。这种立场客观上导致他们在党内和国内日益孤立。为使他们能

在代表大会上当选并进入领导机关，需要作不小的努力（如果一般地说这是可能的话）。

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实际上持中派立场。在去年8月以后的复杂情况下，他们成了党内和国内想通过同“团结工会”对话和协商以解决发生的尖锐问题的占优势情绪的表达者。过去的时期表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宣称必须捍卫社会主义在波兰的成果，但执行这个方针是消极的，犹豫不决，常常作出有利于“团结工会”的让步。在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他们表现出不够坚定和缺乏锻炼。在他们的观点中，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同还在盖莱克时代就广为传播的民族主义思想交织在一起，他们说，“波兰人同波兰人总是能够好商量”。由此，不仅对“团结工会”的要求作不适当的让步，而且在同它的对抗面前吓得丧魂落魄，害怕苏联军队的介入。

同时，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坚持同苏联友好的立场，忠于波兰对华沙条约所承担的义务。他们俩人，尤其是雅鲁泽尔斯基，在国内享有威信。在当前时刻，实际上没有其他人物能够实现党和国家的领导。

考虑到以上所说的一切，在最近时期适当地把以下所列作为出发点：

继续给予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政治上的支持，他们虽然有一些动摇，但仍捍卫社会主义。同时以保住作为同苏联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波兰为基础，力求他们做到采取有利于克服危机的更为持续的、坚决的行动。

不懈地劝告朋友们首先要力求达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团结和稳定，保护那些已成为反对派、社会主义的敌人打击的主要对象的同志（格拉勃斯基、热宾斯基、奥尔绍夫斯基、科切列克，等等）。同样地要帮助这些同志认清支持卡尼亚和雅鲁



泽尔斯基同志的必要性，态度更灵活些，不要公开同“社会主义的更新”的口号对立。重要的是让他们打击社会主义的敌人，不要把整个“团结工会”同该组织中怀有敌对情绪的势力混淆在一起。

把波兰领导人的注意力转向必须好好地准备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为了力求做到争取健康力量在代表大会上的代表资格，他们在这方面要同大企业的党组织一起开展积极的工作。

建议波兰同志尽量把“团结工会”牵制在解决生产的事务方面，应该限制它的政治积极性。为此应加速通过关于经济改革和工会的法律。

积极利用“团结工会”首脑之间已形成的分化，揭露保卫工人委员会—社会抵抗委员会及其首脑的反社会主义、反民族的活动，力求孤立这些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措施反对在国内掀起反苏浪潮的企图。

促使波兰的领导经常关心军队和内务部机关的状况，关心他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稳定性和履行保卫社会主义的职责的准备程度。必须支持内务部的领导，米列夫斯基个人，不要对民警部队实行的维持法制的举动表示不同意。

尽量利用抑制反革命的因素，它同由于苏联可能把自己的军队开进波兰而引起内部反动派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顾虑有连带关系。对外声明中，强调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表示的不会让波兰处于灾难中，不会让它受到欺侮的决心。

考虑到波兰人民共和国非常困难的经济情况，继续给予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就这个问题极力进行积极的宣传，使每一个波兰人知道，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的帮助和支持。

与这些总则同时，要按照委托的事项（1981年3月12日 П I / V III），提出帮助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在组织和思想上加强党的措施提纲。

康·契尔年科、 尤·安德罗波夫、  
安·葛罗米柯、 德·乌斯季诺夫、  
康·鲁萨科夫、 伊·阿尔希波夫、  
列·扎米亚京

1981年4月16日

附 件

绝密

### 帮助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在 组织和思想上加强党的措施提纲

1981年5~6月派出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工作小组到波兰人民共和国商量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准备问题。

责成苏共中央总务部、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宣传部、对外政策宣传部分析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草案、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章和其他文件，以及大会组织准备的进程并对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相应的建议。

1981年4~5月接待由1981年党际联系计划预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部代表团。

预定邀请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各部领导工作人员的工作小组到

苏联来，为的是商讨波兰同志对他们工作中关心的问题。

根据波兰领导的要求，1981 年 5~6 月向波兰派遣地方党机关系统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预定首先派去列宁格勒、伊万诺夫、斯摩棱斯克、顿涅茨、扎波罗热、利沃夫、哈尔科夫、切尔卡瑟、格罗德诺和莫吉廖夫等州党委的代表团。

一旦批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的相应请求，另行研究接收中、低层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作人员（约 500 人）参加苏共中央社会科学学院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明斯克的高级党校的短期专修班问题。

责成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苏共中央总务部在 1981 年 5~6 月就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地方党机关联系的迫切问题举行有关的苏联共产党州、市委员会的代表会议。

根据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达成的协议，1981 年 4~5 月派出由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率领的各专业工会中央理事会负责工作人员小组去波兰，了解波兰工会运动的情况，就地研究专业工会政治支持和使苏联工会同它们的合作积极起来的可能性。

委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在 1981 年 5 月 5 日以前提出加强我们对波兰青年运动的影响的措施计划。

责成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联合会、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和苏联妇女委员会继续实行与波兰的同类组织达成协议的计划措施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鉴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创作协会的复杂情况，责成苏联作家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作曲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和电影工作者协会按党组织系统同他们进行交流。

1981 年 5 月派遣苏联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小组（领导人是委员会主席拉宾同志）前往波兰人民共和国商量苏联对波兰人民共

和国广播的选题和进一步明确 1981 年的合作计划。

1981 年 4~5 月《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各编辑部派往波兰为期 10 天的政论家小组（每报 1 人）去准备材料，其中包括揭露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性质，它们的活动。

**No01548**

## 勃列日涅夫与雅鲁泽尔斯基的电话谈话记录

（1981 年 8 月 19 日）

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送去今年 8 月 19 日同沃·雅鲁泽尔斯基<sup>①</sup> 同志电话谈话的记录。

列·勃列日涅夫

1981 年 8 月 19 日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同

沃·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电话谈话的记录

（1981 年 8 月 19 日，克里姆林宫）

列·伊·勃列日涅夫：沃伊切赫，你好！

沃·雅鲁泽尔斯基：极敬重的、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好！

列·伊·勃列日涅夫：亲爱的沃伊切赫，我们已经给你发去正式的贺电，但我仍要直接祝贺你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

---

① 雅鲁泽尔斯基，沃·（1923～ ），波兰人民共和国大将。1965 年任波兰人民军总参谋长，1968 年任波兰国防部长。1981 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部长会议主席。

一书记。

你同意了 this 决定，做得很对。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现在没有一个享有如同你一样的威望的活动家。中央全会上投票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明白，你面临着非常不轻松的任务。但我们相信，你将战胜它们，为克服伤害你们国家的严重病痛去做一切。

据我看来，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忠诚、坚强的共产党员中为自己挑选可靠的助手，使他们团结起来，使全党行动起来，激发党的战斗精神。这才是成功的关键。

当然，在转到你们制定的反对反革命的坚决行动时，不要浪费时间也是重要的。我们希望，现在所有的人——在波兰和在国外——都能感觉到，国内的事情正以另一个样子进行着。

祝你健康和成功！

沃·雅鲁泽尔斯基：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非常感谢您的祝贺，而首先是您给予我的信任。我要直言不讳地告诉您，我同意担任这个职位是作了很大的内心斗争的，只因我知道您支持我以及您赞成这个决定。如果不是这样，我是决不会答应的。在国内复杂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非常沉重、非常困难的任务。我现在处在既是国家总理又是国防部长的位置上。但我懂得，这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您个人这样认为。

列·伊·勃列日涅夫：沃伊切赫，我们早已这样认为了。我们早就同朋友们谈过这点。

沃·雅鲁泽尔斯基：所以我同意了。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战士，我将全力以赴，使情况好转，使国内和党内的局面得到转变。我懂得并且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现在决定性关键之一是在党内和政府内挑选领导干部。因此我专门把解决干部的问题单分出来，放在下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这次全会过几天召开，为的是能好好思考、商量，使之能综合地解决干部问题而不是简单

地去个别解决。

列·伊·勃列日涅夫：不仅在中央而且在地方上，干部都是非常重要的。

沃·雅鲁泽尔斯基：地方上也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应同加强党的积极斗争精神同时进行。在适当的情况下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做到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胜利的信心。

我现在正要去参加国防部武装力量军事委员会会议。我也要在该会上提出相应的任务。我们将让军队广泛参与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

昨天，在全会之后，我会见了省委会的第一书记们，要他们对我们将从武装力量调人去参加实施某些过程、将扩大军方人员同工人阶级的会见以便直接影响工人，把他们同“团结工会”的影响隔开的做法不要抱怨。当然，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总方针：争取看错并加入了“团结工会”的人民的健康力量，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同时我们要打击反对派，当然，这种打击应有成效。

今天我会见了你们的大使。我力求更详细地同他讨论一些问题，并将就他定会向您报告的那些问题听听您的意见。

在向您通报我们作出的全部决定时，我们同时还将告知在作出这个或那个决定时我们的根据是什么。

现在我们这里最复杂的是市场的状况。因此这里有很多罢工、抗议，其中有些是“团结工会”组织的，也有纯粹是自发的。这就使得实现那些将要采取的措施非常复杂，使我们的工作复杂化，因为社会上的情绪不大好。不过我们将尽可能地去，使情况得到改善。

这就是我想最先向您报告、通报的。

再次非常感谢您的祝愿。

列·伊·勃列日涅夫：沃伊切赫，我再次祝你健康和成功。

沃·雅鲁泽尔斯基：谢谢。再见！

№01551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波兰局势 发展的会议记录

(1981年11月21日)

绝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送：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阿尔希波夫、巴伊巴科夫、扎米亚京、斯米尔丘科夫同志

摘自1981年11月21日第37号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 关于在苏联接待波兰人民共和国党和 国家代表团以及勃列日涅夫同志 给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口述信

1. 批准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口述信的文本，委托苏联驻波兰人民共和国大使把它转交给沃·雅鲁泽尔斯基同志（附后）。

2. 认为1981年12月14~15日在苏联接待以沃·雅鲁泽尔斯基同志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代表团是适宜的。

批准同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谈判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列·伊·勃列日涅夫（团长）、米·安·苏斯洛夫、尤·弗·安德罗波夫、安·安·葛罗米柯、尼·亚·吉洪诺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康·维·鲁萨科夫同志。



3. 苏共中央总务部、苏联外交部、国防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委在 1981 年 12 月 1 日以前准备好同波兰党和国家代表团谈判用的必需的材料，包括报刊报道的方案。

苏共中央总务部和苏联外交部提出同接待波兰访苏代表团有关的组织措施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 件

华沙

苏联大使

去拜访沃·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说受委托，把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如下的口述信转交给他：

“尊敬的雅鲁泽尔斯基同志！

我们仔细研究了您率领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联合党派领导人在内的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的建议，并表示同意。至于日期，访问可以在 12 月 14~15 日进行，当然，如果这对您合适的话。

同时，由于在到会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我决定通过阿里斯托夫同志转达给您对波兰形势的迫切问题的看法，这种形势已成为我们严重不安的论题。

私下对您说，我们对您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曾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考虑到，以前在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中，由于党的领导缺乏政治解决的方法，曾抑制了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您。现在这种障碍已成过去。波兰统一工人党四中全会把第一书记的更换直接同必须挽救社会主义波兰的迫切措施联系在一起。

当我用电话祝贺您时，我曾高兴地听出，您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同意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责任重大的岗位，是您感到我们对您的信任起了明显的作用。我对自己的同志们说了这一点，从而增强了我们的希望，从您身上看到，在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非常尖锐的地区之一，如现在的波兰，我们将有一位志同道合者和同盟者。

还记得，在那次电话谈话中，我表达了一个希望，即现在在波兰和国外都能感觉到国内事情正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那时我们谈了转变形势的决定性前提。您也表示同意，即必须从忠诚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中挑选可靠的助手，在全党开展运动，在党内激发战斗精神，不失时机地采取反对反革命的积极行动。

显然，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争取群众。但是形成一种印象，即在这里转变还没有呈现出来。反社会主义势力不仅在许多大工业企业中主宰一切，并且继续对更为广泛的居民阶层扩散自己的影响。‘团结工会’的头目、反革命分子在各种集会上公开发表旨在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社会主义、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的挑拨性言论的日子尚未到来。这种敌对活动的直接后果是反苏情绪在波兰危险增长。

我们觉得，现在应该动员全党为争取人们的理智而斗争，带着摆脱危机的明确和清晰的纲领深入到人民中去，使每个人都相信它的正确性。换言之，重新去做争取劳动人民信任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共产党员们曾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年代做过。在这方面，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物和积极分子同特别是大企业中的劳动集体（不仅仅是在首都）经常会见具有很大意义。当然，如果现今党的领导没有群众性报道手段的保障，如果反对派依旧通行无阻地加强其敌对宣传，那么，争取群众的斗争也不会带来所需的结果。

还想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最近在波兰写了或谈了许多关于您同

格列姆普和瓦文萨会见的事。有一些称之为历史性的，把它看做是从混乱转向社会安定的开端。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局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会见的结果作了肯定的评价。

当然，我们明白，您在会见中把建立‘民族和谐阵线’作为关键问题提出，是为了追求一系列策略目的，首先是扩大社会支持当局的基础，分化‘团结工会’的上层。但是通过没有失去对局势控制威胁的协议又能前进多远？因为阶级敌人一定企图赋予‘民族和谐阵线’这样的政治内容，即稳定他们的宗旨，至少，做到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划分权力，紧接着是废除社会主义。同样不容怀疑，他们会利用自己目前对群众的影响，以保证在即将来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占优势并为在国内合法地夺取政权铺平道路。

由此，作为我的看法，确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民族和谐阵线’中的领导作用，它的参加者承认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波兰的社会主义和国际联盟具有原则性的意义。在阵线的章程和其他文件中能否做到这点而最主要的是在实践中能否保证这一点？考虑到党有失败的危险，您将打算如何对待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原则性问题。在多次谈话中我方经常强调这样一种思想：我们不反对协议，但协议不应该包含对社会主义反对者的让步。而主要的事情不应仅仅归结于协议，除了采取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种政治力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的措施外，必须有对反对人民制度的公开敌人的坚决行动。你们同意问题的这种提法，也讲了自己为争取劳动人民的打算，而且同时要打击阶级敌人。

但现在造成这样的印象，只把希望放在这种二位一体的公式的第一部分上。我们知道，在你们党的领导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继续执行卡尼亚的破产了的方针上。屈服

于他们的劝说将是危险的。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不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要在波兰挽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对抗还是不，而在于谁开始对抗，对抗将以什么样的手段进行，主动权为谁所有。

想强调一点：当我们讲对抗时，指的是打算把处在‘团结工会’影响下或者是采取消极立场，等待着看谁占上风的那些工人、劳动群众吸引到波兰统一工人党这边来。

我们同您，沃伊切赫·弗拉基斯拉沃维奇，都是从战争的道路走过来的，所以懂得，斗争的战略把时间问题提到首位。这完全适用于当前在波兰形成的尖锐局势。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首领们，早已一步一步地在某些地方公开准备着决定性的搏斗，只是想把它拖延到他们占压倒优势的那个时候而已。尤其是，他们正把大赌注下在受‘团结工会’影响的新兵进入到军队上。这是否意味着，正是现在如不采取反对反革命的坚决措施，你们将错过宝贵的时间？

此外，关键问题是孤立社会主义的公开敌人。只要还没有这样做，一切都照旧。不但如此，像‘波兰独立联盟’这样露骨的反革命组织正在招募新的追随者且实际上已公开采取行动。显然，其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党实际上丧失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审判莫丘利斯基和‘波兰独立联盟’其他头目的全部经过证明了这点。

还想把对另一个紧迫问题的想法告诉您。显然，保卫社会主义的任何行动要求首先是为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作坚决的斗争，提高党的战斗力。波兰统一工人党四中全会以后党组织内出现了生气勃勃的迹象。我们知道，政治局致波兰统一工人党基层组织的信也是为了促进这个。重要的是使这项工作活跃起来，不容许地方上的党员重新陷入消极、灰心丧气。要做到这点，首先应当使党员相信言行不再不一致，领导决心坚定地、始终不渝地实现通过的决议。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巩固取决于对它队伍内各种派别的明确路线。你们有些人断言，现在党内存在左、右、中三派，并提出建议：驱除左派和右派人物，给予他们同样力度的打击。这是危险的建议。说实在的，什么人可称之为‘左派’或‘顽固派’？是那些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决不否认需要纠正所犯的 errors 和曲解的共产党员。而谁是‘右派’？是那些鼓吹修正主义观点最终与‘团结工会’同流合污的人。很明显，反对坚定的共产党员的任何行动，对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如同对于共产党一样，都是自杀的行动。同样明显的是，在你们尚未清除包括党的领导中企图继续以前的投降路线的修正主义分子时，他们将是阻碍你们前进的沉重负担。

我认为，这些看法提供了解决业已成熟的干部问题的钥匙。相信，做属于‘左派’的同志们的工作，支持他们，你们将在正是这些人中找到克服危机斗争中的坚固支柱。

尊敬的沃伊切赫·弗拉基斯拉沃维奇！在对您提出了一些我们关心的问题并谈了自己的看法时，自然，我把一些问题放在了一边，这些问题可以在亲自会见时再讨论。

列·勃列日涅夫”

执行情况请电告。

№01552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 波兰局势分析的会议记录

(1981年12月10日)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主持会议

与会者有：尤·弗·安德罗波夫、维·瓦·格里申、安·安·葛罗米柯、安·帕·基里连科，阿·亚·佩尔谢、米·安·苏斯洛夫、德·费·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彼·尼·杰米契夫、鲍·尼·波诺马廖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弗·伊·多尔吉赫、康·维·鲁萨科夫

### 1. 关于波兰局势问题

勃列日涅夫：在我们的议程上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想，政治局会议应从这个问题开始，因为我们已专门派遣巴伊巴科夫和库利科夫同志前往波兰同波兰的同志讨论一些紧急的已成熟的问题。12月8日库利科夫同志通报了他在华沙进行的几次谈话，而昨天，12月9日，巴伊巴科夫同志从华沙报告，他已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谈过话。从这些以及随后的巴伊巴科夫同志的谈话中看到，波兰同志希望在明年第一季度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得到追加的约15亿美元的原材料。这里包括：铁矿石、有色金属、肥料、石油、轮胎、谷物，等等。

同时，正像你们看到的，波兰同志打算，1982年苏联提供给波兰的货物维持在1981年的水平。巴伊巴科夫同志告诉对话者，他们的一切要求将向莫斯科报告。

也许我们应该委托吉洪诺夫、基里连科、多尔吉赫、斯卡奇科夫、阿尔希波夫等同志现在就根据交换的意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而不必等待最后协商的结果。

现在请听巴伊巴科夫同志讲话。

巴伊巴科夫：遵照政治局的委托，我去了华沙。在那里就委托给我的那些问题同需要与之谈判的全体同志见了面。

首先我同部长会议副主席奥博多斯基谈了话。在这次谈话中波兰同志提出了经济援助问题。我已用密电向这里报告了波兰的请求。

需要说的是，他们作为我方援助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货物的名单共 350 类货物，总额为 14 亿卢布。其中包括这些货物，如：200 万吨谷物，2.5 万吨肉类，62.5 万吨铁矿石和许多其他货物。考虑到波兰同志提出的请求，我们在 1982 年给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总额将约 44 亿卢布。

目前波兰偿还西欧国家贷款的时间快到了。为此波兰至少需要 280 万外汇卢布。当我听了波兰同志说他们请求全部援助这个总数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应当在平衡的基础上处理经济的相互关系。而且当时我指出，波兰的工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没有完成计划。作为收入外汇的主要来源的煤炭工业，实际上已处于紊乱状态，也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罢工在继续。而现在，当没有罢工的时候，煤炭的开采量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再举例说，农民有产品，有谷物、肉食品、蔬菜等等。但他们什么都没有给国家，采取观望的态度。私人贸易市场相当活跃，但价格非常高。

我直截了当地对波兰同志讲，既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就应当采取更坚决的措施，或许采取有些类似余粮收集制那样的东西。

再举例讲讲谷物的储备。波兰在今年收获 200 多万吨，人民没

有挨饿。城市居民到市场、到农村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食品，而这些食品都是有的。

大家知道，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和波兰同志的请求，我们援助给他们3万吨肉类。从这3万吨中已有1.6万吨运往国外。应当说，这一次的肉类产品是用肮脏的、没有打扫干净的装过矿石的车厢装运的，外观非常难看。当这批货物运抵波兰车站时发生了真正的怠工事件。波兰人向苏联、苏联人说了下流无耻的话，拒绝打扫车厢，等等。所有这些大量对我们的侮辱，简直数不胜数。

意识到收支差额方面的这种处境，波兰人想延期偿还西方国家的欠款，如果他们宣布延期付款，那么正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水域或码头的所有波兰船只，以及在波兰有欠款的国家中的一切其他财产都将被扣押，所以现在波兰人已命令船长们离开码头开往中立的水域。

现在讲几句关于同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谈话。他证实了奥博多夫斯基所讲的关于提供货物的请求。当天晚上，同大使和库利科夫同志一起我们又到鲁雅泽尔斯基那里去。参加这次谈话的还有奥博多夫斯基和主管这些问题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情绪很不好。能感觉到，波兰天主教会首脑格列姆普大主教的信给了他很大影响，大家知道，这位大主教曾说过要向波兰当局宣布圣战。雅鲁泽尔斯基确乎在那时回答说，在“团结工会”发动进攻的情况下，他们将清除一切敌对分子。

至于党的组织，那么在地方上他们实际上已垮台，已不起作用。关于整体的党，雅鲁泽尔斯基说，实际上已不存在。国家正在瓦解，地方得不到任何增援，因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没有给予坚决而明确的指示。雅鲁泽尔斯基本人已成为一个心情极不稳定和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的人。

鲁萨科夫：巴伊巴科夫同志正确描述了波兰经济的状况。我们



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认为，必须把经济协议规定的那些货物提供给波兰，它的数量不应该超过我们在去年第一季度提供的货物的数量。

勃列日涅夫：现在我们能给吗？

巴伊巴科夫：列昂尼德·伊里奇，只能从国家储备中或依靠国内市场的供应来提供。

鲁萨科夫：前天他们开了一个省委书记会议。正如阿列斯托夫同志报告的，省委书记们完全不理解雅鲁泽尔斯基的没有提出清楚、明确路线的讲话。没有人知道，日内将是什么样的。谈话讲了“X”行动。开始时讲行动将在 11 日夜间，后又说 12 日夜间，而现在又说在 20 日左右。也就是说，国务委员会主席雅布翁斯基将在广播和电视中讲话并宣告实行战时状态。同时雅鲁泽尔斯基已声明过，战时状态法只有在议会会议上讨论后才能实施，而议会会议定在 12 月 15 日举行。这样一来，一切都复杂化了。议会会议的议程已经公布，其中没有列入实行战时状态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关于政府准备实行战时状态的事，“团结工会”知道得很清楚，它本身正采取一切必需的措施以对付实行战时状态。

雅鲁泽尔斯基自己说，他打算发表告波兰人民书。但他在告人民书中不谈党，而是着重于号召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雅鲁泽尔斯基讲宣布军事专政的必要性，如它在毕苏斯基时代<sup>①</sup>曾有过的那样，同时指出，波兰人民懂得这比任何其他的做法要好。

至于这样一些人，如奥尔绍夫斯基，那么在最近时期他表现得更为坚决。应当说，在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实行战时状态，关于采取

<sup>①</sup> 毕苏斯基，丁·（1867～1935），波兰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取得独立，毕苏斯基成为波兰共和国元首，1926 年开始又两度出任政府总理。毕苏斯基时代泛指 20、30 年代毕苏斯基当政时的波兰。苏联认为，毕苏斯基时代是波兰处于独裁统治的年代。

更坚决的措施来反对“团结工会”的极端分子的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没有任何人讲反对意见。同时雅鲁泽尔斯基打算就这个问题与盟国联系。他说，如果波兰的力量应付不了“团结工会”的抵抗，那么波兰同志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帮助，直至派武装力量进入波兰的国土。当时雅鲁泽尔斯基引用库利科夫同志的话，似乎说，苏联和其他盟国将以军事力量给波兰帮助。但是据我所知，库利科夫同志没有径直地说过，他只是复述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某时说过我们不会让波兰人民共和国处于灾难之中的这些话。

若是讲到各省的事，那么应该坦率地说，在那里党组织的力量已完全感觉不到，行政的权力还感觉到一点儿。实际上全部权力都在“团结工会”手里。雅鲁泽尔斯基说的那些，似乎是在哄骗我们，因为在他的话中感觉不到正确的分析。如果现在他们不很快地组织起来，不凝聚在一起，不起来反对“团结工会”的逼攻，那么在改进波兰状况方面将不会有任何成效。

安德罗波夫：从与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明显看出，他们目前还没有实行战时状态的坚定的决心，尽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已一致通过关于实行战时状态的决议，但目前我们尚未看到领导方面的具体措施。“团结工会”的极端分子掐着波兰人民共和国领导的脖子。近来天主教也表明了自己的明确立场，事实上他们已转向“团结工会”一边。

当然，在这些情况下波兰同志应当迅速准备“X”行动并实现这个行动。同时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我们将在“团结工会”逼迫我们时才实施“X”行动。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征兆。况且，最近一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在会上通过的实行战时状态的决议证明，政治局已更坚决地行动起来。政治局的全体成员表示赞成坚决行动。这个决议紧紧地逼迫着雅鲁泽尔斯基，现在他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解脱出来。昨天我同米列夫斯基交谈并问他，

将在什么时候制定什么样的措施。他回答我说，他不知道“X”行动及实行的具体日期。因此，得出的结论是，或者雅鲁泽尔斯基向自己的同志隐瞒了具体行动的计划，或者他实在是不再想实行这个办法。

现在我想指出，雅鲁泽尔斯基相当坚持地向我们提出经济上的要求，并且以我们的经济援助作为实行“X”行动的条件，而且我甚至要说，他提出了军事援助问题，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说的。

现在，如果看一看波兰同志请求的货物的名单，那么坦率地说，在提供这些物品的必要性方面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例如，提供化肥和其他一些货物对实施“X”行动的成功有什么关系？因此，我要说，在过去的政治局会议上形成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以前多次讲过的我们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放弃它。换句话说，我们站在国际主义援助的立场，我们为在波兰形成的局势担忧，但关于实施“X”行动，则完完全全应由波兰同志决定，他们怎样决定，就怎样做，我们对此不坚持，也不去劝阻。

至于经济援助，那么当然，对他们要求的数额我们很难做到。显然，应当给一些。但我要再讲一遍，把货物划出作为经济援助问题的提出具有耍无赖的性质，而这样做都是为了如果以后有些东西我们不给，那么他们就可以把责任推在我们身上。如果库利科夫真的讲过派军队，那么我认为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冒险。我们不打算派军队去波兰。这是正确的立场，我们必须把它奉行到底。我不知道波兰的事情将会怎样，但如果波兰甚至会落在“团结工会”的权力下，那这将是一种情况。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指责苏联，而它们已有各种各样经济和政治制裁的相应的协议，那么这对我们将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应当显示出对我们的国家，对加强苏联的关心。这是我们的总方针。

总之，我认为，我们对波兰局势的立场是由列昂尼德·伊里奇

在他的多次发言中，在正式决议中形成的，今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非常详细地交换了意见。这都应该是我们在与波兰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的政策的基础。

至于从苏联经过波兰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交通线，那么为了保护它们我们应该采取些必要措施。

葛罗米柯：今天我们对波兰局势问题讨论得很激烈，以前我们没有这样激烈地讨论过。这说明目前我们自己不知道在波兰人民共和国中发生的事件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波兰的领导自己感到，政权正从其手中滑掉。大家知道，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指望依靠保持中立的人。但事实上现在没有这种人。态度已相当明显地明朗化了：“团结工会”已宣布自己是觊觎政权并公开宣称要夺取政权的明显的反革命组织。波兰领导应该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他们交出阵地，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的话；或者采取坚决措施，实行战时状态，把极端分子从“团结工会”中孤立出去并整顿应有的秩序。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对波兰事件应持什么样的态度？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在这里的发言。我们可以告诉波兰人，我们是以理解的态度对待波兰事件的。这是个清楚的说法，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改变它。同时我们应尽力设法打消雅鲁泽尔斯基和其他波兰领导人关于派军队的想法。派军队进入波兰是不可能的。我想，我们可以委托我国的大使去拜访雅鲁泽尔斯基并把这点通知他。

尽管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相当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实行战时状态的决议，而雅鲁泽尔斯基现在又重新采取动摇的立场。起初有点振作，现在又软弱下来。曾经给他们讲过一切依然有效。如果他们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继续表现出动摇，那么社会主义的波兰将什么都剩不下了。当然，实行战时状态是向波兰的反革命暗示波兰领导的强硬决心。如果他们打算实行的措施得以实现，那么，我想

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现在关于雅鲁泽尔斯基曾说过的建立新党的问题，我想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雅鲁泽尔斯基，完全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新党，因为这意味着波兰领导的退却，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确实不是一个战斗的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犯了错误的组织，证明它的软弱和领导本身的软弱，从而有利于“团结工会”中的极端分子。随后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对领导力量怀有一定好感的波兰居民对它完全失望。

我认为，目前我们不要做任何逼迫他们采取这样或那样行动的强硬指示。我想，我们应在这方面采取正确的立场：整顿波兰的秩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它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事情。我们对波兰朋友讲过，而且以后还要讲：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绝对不能萎靡不振。

当然，如果波兰人打击“团结工会”，那么，想必西方不会再给他们贷款也不再给任何帮助。他们会忘记这一点的，显然，我们对此也要注意。所以列昂尼德·伊里奇关于委托几位同志来研究这个问题并考虑我们给波兰人民共和国某些经济援助的可能性的建议是正确的。

乌斯季诺夫：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局势无疑是非常的坏。局势一天一天地复杂化。在领导中，尤其在政治局中，不坚定，不一致，而这一切都对局势有影响。只是在最近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才一致通过了关于实行战时状态的决议。现在一切都压在雅鲁泽尔斯基身上，看他怎样去实现这个决议。但目前尚无人能直言不讳地谈论雅鲁泽尔斯基的行动。而我们也不知道。我曾同西维茨基交谈过。他坦率地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将军在想什么。因此，实际上目前在履行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职务的这个人不知道以后将会怎样，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关于似乎库利科夫同志讲过派军队去波兰一事，那么我可以完

全负责地说，库利科夫没有讲过。他只是重复我们和列昂尼德·伊里奇所说的，我们不会眼看着波兰受难而不管。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波兰人自己曾请求不要出兵波兰。

关于我们的驻波部队，我们则要加强它们。看来我也倾向于这样认为，波兰人不会走向对抗，可能只有在“团结工会”掐住他们脖子的时候才会出击。

糟糕的是，波兰领导人没有表现出决心。正如同志们在这里正确地说的，我们不应把自己的任何决定强加于他们，而是执行我们已经议定的那个政策。自己方面必须作好准备，但不采取任何我们未预先决定的行动。

苏斯洛夫：我认为，我们，正如从同志们的发言中可以看出的，对波兰的局势大家都有一致的观点。在波兰事件的全部时期内，我们表现出镇静、沉着。关于这一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全会上已讲过。我们向人民大声疾呼地说了这一点，而我们的人民支持共产党的这个政策。

我们为争取和平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世界舆论将不会理解我们。我们通过联合国对巩固和平采取了巨大的举动。从列·伊·勃列日涅夫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我们采取的许多其他的和平举动中我们取得了多么大的效果。它使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有可能了解，苏联坚定地始终不渝地捍卫和平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改变自波兰事件一开始我们就采取了我们的立场。让波兰的同志们自己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不应催促他们采取某些更坚决的行动，但我们仍将像以往一样对波兰人讲，我们对他们的行动表示理解。

我觉得，雅鲁泽尔斯基显得有些狡猾。他想用向苏联提出的请求为自己开脱。自然，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满足这些请求，而雅鲁泽尔斯基以后会说，瞧，我找了苏联请求援助，但这种援助我没有得

到。

同时波兰人将公开声明，他们反对派军队进入波兰。如果军队开进去了，那么这将意味着一场灾难。我想，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有一个一致的意见，即不能再说任何关于派军队的话。

说到援助波兰，那么我们已经给予它 10 亿多卢布。不久前我们通过了向波兰提供 3 万吨肉的决定，已经给了 1.6 万吨。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全部供应 3 万吨，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根据这个决定再提供一定吨数的肉作为援助。

说到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建立代替它的新党，那么我认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应该解散，在这里正确地议论了这件事，认为它将是一个完全应否定的举动。

格里申：波兰的情况正向继续恶化的方向发展。我们党对待波兰事件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关于雅鲁泽尔斯基解散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建立新党的建议，对它不能同意。派军队的话不能再说。经济问题需要再研究，看能给波兰人什么。

苏斯洛夫：我们应当在报刊上揭露“团结工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的阴谋。

契尔年科：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在这里所讲的话。在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一些发言中，在政治局的决议中表达出来的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对波兰事件的现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故不应改变它。

我认为，今天可以通过这样的决议：

1. 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同志的通报。

2. 在我们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今后将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此问题的明确的政治方针，以及 1981 年 12 月 8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和 1981 年 12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为根据。

3. 委托吉洪诺夫、基里连科、多尔吉赫、阿尔希波夫、巴伊巴科夫等同志参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交换的意见，继续研究对波兰的经济援助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

全体：契尔年科同志非常正确地表达了一切建议，应当采纳它们。

决议通过。



№01553

## 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局势给 兄弟国家领导的通报

（1981 年 12 月 13 日）

送：勃列日涅夫、吉洪诺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苏斯洛  
夫、乌斯季诺夫、波诺马廖夫、鲁萨科夫、扎米亚京同志

摘自 1981 年 12 月 1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40 号记录

### 关于波兰问题给兄弟国家领导的通报

批准给苏联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古巴共和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各大使的  
指示方案（附后）。

苏共中央书记

附 件

索非亚、布达佩斯、柏林、乌兰巴托、布拉格、哈瓦那、河内、万  
象

苏联大使

抄送：华沙——苏联大使

拜会日夫科夫同志（亚·卡达尔，埃·昂纳克，尤·泽登巴尔，古·胡萨克，菲·卡斯特罗，黎笋，凯山·丰威汉），援引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转达下面的内容：

朋友们已经知道，波兰领导已在国内实行战时状态，宣布成立救国军事委员会，并把最极端分子从‘团结工会’、‘波兰独立联盟’和其他反社会主义团体中孤立出来。

沃·雅鲁泽尔斯基的告人民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们认为，在告人民书中正确地对一些基本问题分别作了强调，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确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确认了波兰人民共和国对华沙条约同盟国义务的忠诚。

波兰同志把严格的保密看做是顺利实行举动的条件。只有在沃·雅鲁泽尔斯基周围小范围内的人知道这个举动。正由于此，朋友们成功地使反对派措手不及，目前行动进行得令人满意。

在执行预定计划的前夕，沃·雅鲁泽尔斯基把此事通知了莫斯科。我们转告他，苏联领导对波兰同志的这个决定表示理解。当时，我们所持的出发点是，波兰朋友将依靠内部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按照我们事先的估计，波兰朋友的行动是回击反革命的积极步骤，在这个意义上也符合兄弟国家的共同方针。

在这些情况下发生了从政治上和道义上支持波兰同志以及增补经济援助的问题。苏联领导将一如既往，就波兰问题同兄弟国家保持接触。”

请电报告知执行情况。

No01554

## 关于苏联援助波兰贷款的备查材料

(1981 年 12 月)

### 关于 1980~1981 年苏联援助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自由外汇

#### 一、提供贷款

|   | 百万美元   |
|---|--------|
| 1. 用于买糖                                 | 30     |
| 苏联部长会议 1980 年 8 月 1 日命令                 |        |
| 2. 用于还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欠款                       | 250    |
| 苏联部长会议 1980 年 6 月 23 日命令                |        |
| 3. 用于为帮助波兰人民共和国而建立银行财团                  | 70     |
| 苏共中央委员会 1980 年 6 月 6 日决议                |        |
| 4. 用于还清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欠款                       | 150    |
| 苏联部长会议 1980 年 11 月 11 日命令               |        |
| 5. 用于购买谷物和食品                            | 190    |
| 苏联部长会议第 1019/347 号命令 (1980 年 11 月 11 日) |        |
|   | 共计 690 |

#### 二、缓期付款

|               |     |
|---------------|-----|
| 1. 对苏联银行的缓期付款 | 219 |
|---------------|-----|

|                           |         |
|---------------------------|---------|
| 苏共中央委员会 1980 年 6 月 6 日决议  |         |
| 2. 对苏联银行的缓期付款             | 280     |
| 苏联部长会议 1980 年 9 月 11 日命令  |         |
| 3. 对苏联银行的缓期付款             | 280     |
| 苏联部长会议 1980 年 11 月 11 日命令 |         |
| 4. 以前提供的全部贷款的基本债务的缓期付款    | 1000    |
| 苏联部长会议 1981 年 8 月 16 日命令  |         |
|                           | 共计 1779 |

### 三、无偿援助

|  |         |
|--|---------|
| 1. 靠缩减对经互会国家供应石油来提供的苏联、匈牙利、<br>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同的无偿<br>援助 | 465     |
| 苏共中央委员会 1980 年 11 月 28 日决议                                   |         |
|  | 总计 2934 |

根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资料

## 【专题说明】

# 苏联与越南战争（二）

（1968年12月至1972年12月）

1954年7月，签订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法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退。美国取代法国的地位，在越南南方（北纬17度以南）扶植吴庭艳，建立亲美独裁的越南共和国。1959、1960年越南南方各地多次爆发反对吴庭艳政权的武装起义。1960年12月成立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实际上成为和吴庭艳相对抗的南方政府机关。1961年2月15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成立，作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统一武装力量。美国也不断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在越南开始了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1964年8月，美国约翰逊政府以“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军舰”的“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北纬17度以北）进行轰炸。美国国会为此授权总统扩大对越南的入侵。1965年3月，美国地面部队在岘港登陆，直接参加越南战争，并把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地区。至1969年，入侵越南的美军达54万余人。但是，美国无法打赢这场战争，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

自从中苏关系从同盟变为对峙后，苏联就竭力向印度支那渗透，便于形成对中国的包围态势。印度支那几乎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力图使美国摆脱在越南

的困境。尼克松深知，要解决越南问题，美国必须调整和中国，以及和苏联的关系。1971年7月，尼克松派遣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亲自访华，签订了中美两国上海公报，使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和苏联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和美苏相互关系准则等文件，缓解核军备竞赛。1973年1月27日，美越《关于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巴黎协定）签订，尼克松政府终于把50万侵越美军撤回回国。

本组文件正是70年代初印度支那局势转折的微妙关头，苏联对印度支那局势的分析，采取的方针对策等。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王宏达翻译）

№01842

## 季尔维科夫斯基与阮富帅的谈话记录

（1968年12月30日）

机密

摘自斯·伊·季尔维科夫斯基日记

根据商定本人于12月30日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处会见了阮富帅。按照中央的指示，本人代表列·依·勃列日涅夫同志对祝贺62周年纪念日的阮友寿博士转达谢意。他通报说，列·依·勃列日涅夫同志向阮友寿寄送了新年贺信。大使馆接到贺信全文，将立刻转交给代表处。

阮富帅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对阮友寿博士的感谢信以及关于新年的贺信的通知将按规定转达。

在谈话的进行中，阮富帅把注意力转向了报界的报道12月24日在西贡发生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的事件上，游行要求停止战争并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以求和平解决越南南方问题。他示意说，阵线对组织这次游行示威有直接的关系，并于近期打算组织新的行动。按照阮富帅的话说，12月24日的游行示威是在越南南方的许多城市中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政治行动的征兆，其目的是要推翻傀儡政府或者从政府中清除出许多像阮高其那样的活动家，以及改变其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谈判问题中的政策。这次游行示威是一种力量的侦察和试验，其目的是要弄清傀儡当局和美国人

的反映。现在西贡傀儡们感到惊慌失措并将面临着新的示威游行。拒绝在新年庆祝会期间宣布休战，这一点就是说明。民族解放阵线的武装力量新的大规模的进攻这件事是否会引起西贡方面的忧虑，阮富帅对此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现在进行的旨在推翻傀儡政府的活动仅仅是政治行动抑或政治与武装措施相结合，对这个问题阮富帅回答说，这里所说的是关于政治行动。他强调说，在新年庆祝会期间，阵线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并打算遵守休战状况，仅仅在对敌人发动直接的敌对行为时才作回击。

阮富帅强调说，拒绝在新年宣布休战的是西贡人，而不是美国人。在这方面他又谈起了关于美国和西贡傀儡之间的分歧。用他的话说，美国离开越南南方，把其傀儡留下执政的图谋结果又与现西贡领导人的私人利益发生矛盾，西贡领导人耽心美国军队从越南南方撤走后，而不考虑在这以后要巩固政权。

西贡决定在1月1日拒绝停火，阮富帅似乎把美国人在这一天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进行第二次会晤，讨论由阵线转交被释放的第三批美国战俘问题的决定与西贡的决定对立起来。按照阮富帅的话说，美国人感兴趣的是举行第二次会晤，因为阵线今后释放其他战俘的可能性使他们感到兴趣。阮富帅示意说，这些会晤从下述观点来看具有特殊意义，即这些会晤表明了美国人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实际上的承认。

阮富帅强调了关于美国人承认阵线问题的重要性。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白，拒绝对阵线的承认，应认为是实现美国政府在“光荣的条件”下从越南南方撤军愿望的主要障碍。

1月3日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处我再次会见了阮富帅。根据中央指示我转交给阮友寿一包东西（列·依·勃列日涅夫的新年贺信），是大使馆随同外交邮件于1月2日晚上收到的。阮富帅表示感谢，并答应立刻将这包东西转送收件人。



在进行的简短谈话中，阮富帅主要地谈了关于美国—西贡方面在新年的期限内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其中谈了关于美国“B—52”飞机继续轰炸西贡周围的情况。他强调说，阵线的武装力量这方面遵守了已宣布的停火，仅在三次他们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予以还击。

用阮富帅的话说，西贡在庆贺新年的日子里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政治事件。西贡政府对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立场暂时还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按阮富帅的意见说，最近阮文绍的新年谈话不像过去那样自信了。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斯·季维尔科夫斯基

№01843

## 切谢夫与波兰驻越大使馆一等秘书

### 弗巴杜拉谈话记录

(1969年1月23日)

机密

摘自 Г. Б. 切谢夫日记

本人应邀访问了巴杜拉。

从驻西贡大使多布罗沃利斯基那里得到的由其说明的消息是有关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北京与越南南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越南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问题。

一、据1月22日的消息说，“法新社”西贡分社副社长在与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谈话中说，1月21日阮文绍与在西贡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阿列克西斯·约翰逊进行了会晤，据说达成了有四项内容的美国—西贡计划，该项计划应在巴黎会议首先进行讨论。

1. 西贡当局释放战俘。
2. 对渗透地区进行监督。
3. 对不设防的地区恢复原状。
4. 停火。

据说，美国人在释放战俘问题上对西贡施加压力，而阮文绍在这个计划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宣传的数字与在越南南方实际存在的越共战俘有极大的出入。

美国新闻记者罗斯和贝姆证实了这个法国人的消息，他们强调说，在巴黎最先提出的将是关于不设防地区和停火问题。

根据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资料，约翰逊向新闻记者们证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说，他约翰逊不会建议尼克松去改变政策。

二、据 1 月 22 日消息说，多布罗沃利斯基从与一位不久前访问过柬埔寨的美国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侨民起着用中国武器和粮食供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的中间人作用。观察到居住在柬埔寨的中国人参加阵线武装力量队伍的情况。

驻金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层领导人员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柬埔寨购买大米并将它运送到阵线去，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的作用。

根据波兰大使的报道说，他也掌握中国大使馆与解放阵线部队联系消息的其他资料。

三、据 1 月 21 日报道，1 月 19 日迟到一星期的消息说，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全国民族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倡议者是越南南方天主教教会的主教黄琼（Хоанг Кунь）和从北方逃走的天主教的领导人。按照组织者的意图，这个大会应该在“和平”的口号下，在得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广泛的民族支持下，建立在和佛教徒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来进行。但是事件说明，越南南方绝大多数政治和宗教团体无论是对天主教最高层想达到和平的想法以及对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政策上都持否定的态度。“大会”遭到了惨败：预计有 1500 个参加的人中结果仅有 200 人；有战斗力的佛教徒团体、越南国民党、大越党、越南劳动会议都拒绝参加。

据观察家意见，“大会”的失败同时也是政府的失败，它打算把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为表面上给人看看的措施，这一措施似乎想证

明越南南方人民对现有制度的广泛支持。佛教徒们有自己在越南达到和平的计划，但是仅在政府的“和平计划”公布以后他们才打算公布自己的计划，当时西贡的领导人关于这项计划曾有过声明。

本人感谢巴杜拉同志的通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格·切谢夫

1969年1月31日

№01841

##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形势 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7月19日）

机密

### 形势调查简报

#### 中 国

目前在中国惟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铀-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

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峻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

#### 捷克斯洛伐克

1.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向驻国外各机构的党组织书记发出信函，信中建议更坚决地与党组织中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同时指示重新考虑1968年8月事件以后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与捷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1月全会和5月全会的决议相矛盾，尤其是在加强与苏联的友谊的问题上。

2. 目前解散军事政治大学的工作正在完成。大学校长门采尔

上校、他的助手捷采上校以及其他站在右派立场上的大学领导的军官将从军队中被解职。

3. 在以萨波托茨基命名的附属的军事大学内成立军事政治系，该系将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培养政治工作人员。系里将设有以下教研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教研室、党政工作教研室、哲学教研室、科学共产主义教研室、心理学教研室、教育学教研室，可能还有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教研室。

系主任普希克雷拉上校从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人员中挑选军事科学的教学的干部来充实教研室。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西德政府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最近常会的决议，详细地订出了对 1969～1973 年的联邦军的建设规划。据政府意见说，实现这个规划将会更加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作用和影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计划达到 47～48 万人，其中常规战斗限额为 46 万人。同时规定要加快培养联邦军和后备兵和军士的骨干。

在陆地上的部队中计划进一步加强兵团的火力。用 155 毫米自动榴弹炮来装备部队。为了提高部队的机动性，计划在美国补充购买直升飞机 135 架。和从前一样将继续执行原先拟定的用现代化的坦克“豹”来装备兵团，用比较精良的反坦克和对空射击设备来加强部队。

为了加强空军，规定在美国购买 88 架 RF—4E“幻影”型飞机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企业中制造 F-104G“星球战士”飞机。

海军将建造 12 艘潜水艇、4 艘现代化的护航舰和 30 艘带有火

箭武器设备的快艇以充实军力。

对这次规划的财政资金已经拨出到 1971 年。今后计划每年增加拨款 3%。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司令部对增加炮筒射击的射程十分重视。目前是用制造带有喷气发动机的炮弹（进攻火箭弹）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炮弹已开始弹道上操作。

在美国武装力量中已经制造并在越南南方使用 105 毫米进攻火箭弹。同时对制造这类炮弹炮径为 155，175 和 203.2 毫米的工作正在进行。

为了协同加工的 155 毫米拖拽的榴弹炮，在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中在制造强力火箭炮弹。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人认为，今后完善已经制造的强力火箭炮弹能使射击的射程增加 1.5~2 倍。

### 以色列、埃塞俄比亚

埃班不久前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向海尔·塞拉西通报说，在阿拉伯国家在红海区域采取行动反对以色列的情况下，以色列人要侵占属于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曼德海峡的丕林岛。得到埃塞俄比亚方面对这项计划的赞同后，埃班承诺对埃塞俄比亚进行经济上和财政上的援助，以及在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给予支持。此外，他向埃塞俄比亚现任领导人提供了一份由以色列军事专家仔细订出的与厄立特里亚起义者进行斗争的计划。

塞拉西根据现有资料考虑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急剧尖锐化的可能性，对以色列的建议没有作具体的答复。

##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近一个月来，在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总体上加强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国内形势仍然很复杂。右派势力、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在竭力不让新的领导得到巩固。在卫戍部队和居民点中散发的传单和传播挑拨性的谣言说，政府在“领导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在执行废除私有制和消灭伊斯兰宗教的政策。居民被号召进行武装抵抗。亲英情绪的人或者支持沙阿比（Щааби）的军官，在6月事件的转变关头，没有冒险去反对新政府对国家的领导，他们大规模地离开军队，回到自己的部族去进行教唆性的活动。目前已有150多名军官擅自离职。中国在亚丁的一些人士企图在一部分居民中组织“与中国友好团结”的游行示威活动，想给苏联—南也门的关系造成警惕心理。

亚丁外交界人士中认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在解决这些困难问题中，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新领导人最近就想向这些国家提出请求。

## 巴基斯坦、中国

从今年7月12日到17日，空军元帅努尔·汗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曾试图证明说，巴基斯坦参加旨在反对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区域性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合作都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他们承诺将很好地研究巴基斯坦人要求拨款在塔克西拉和达卡建设军事工业项目，以及供给预备部队和某些类型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根据拉瓦尔品第政治界人士的评价，巴基斯坦政府在派努尔·汗去访问北京后，国家对外方针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巴基斯坦人仍然打算执行“保持平衡”政策来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双边关系。



## 越 南

1. 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西贡行政当局内部的分歧明显地加剧了。民族议会下议院要求陈文香政府辞职。资本输出增加，侨居国外的大企业家和官僚们的人数也增多。从越南南方军队中逃跑的逃兵在增多。西贡的政界认为，阮文绍总统不能稳定国内形势。

西贡行政当局在采取紧急措施来巩固其阵地。对反对派加强镇压手段，进行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在西贡的美国人士耽心新的政府会发生危机，将会促使提高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威望。

2.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为供养美国战俘的开支的增长而感到忧虑。粮食和医疗保证的问题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据来自河内的资料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准备在最近与美国方面重新讨论关于交换战俘问题。

## 中国、日本

中国领导人继续支持与日本进行经济贸易的交流，这种交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商品总额中占第一位。1968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数量估计为3.26亿美元。这段时期内从日本供应的主要货物是：钢100万吨，铜4400吨，锌5000吨，铝约1000吨，矿物肥料1800万吨，以及机器和工业设备数额约3300万美元。中国供应的主要项目是：煤27万吨，铁矿6.9万吨，和生铁3.1万吨。根据贸易协议两国间的商品贸易额到1969年计划总数约为6亿美元，这超过了1968年水平的9%。

## 美 国

在美国军事工业集团人士中表现出焦急不安的情绪，因为即将

举行的苏美两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会导致废止许多大的军事合同。据这些集团的人士估计，在签订苏美协议的情况下，航空火箭和无线电子工业将要损失总数不少于160亿美元的定货，这些定货是近几年来由美国国防部规划的。也可以看出，在未来的10年中，取消对加工比较精良的战略武器类型的定货将会导致这些工业部门损失达1000亿美元。

### “阿波罗11号”起飞

在今年7月18日期限内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基本上按预定的计划继续飞向月球。计划中的第三次校正方向没有进行。在23时43分，规定时间前一小时，宇宙飞行员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从指挥舱出来走向月球座舱，在这里检查各种仪器装置和生活保证系统。

今年7月19日5时30分，“阿波罗11号”飞船停留在距离地球约34.3万公里的地方，运动速度每小时为3308公里。

普·伊万舒津<sup>①</sup>

1969年7月19日

---

<sup>①</sup> 伊万舒津，彼·伊·（1909～ ），苏联大将，时任苏军副总参谋长。

№01840

##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关于国际 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8月15日）

机密

### 形势调查简报

#### 中 国

今年8月14日期间，中国军队的战斗人员、部署和行动特点与苏联及蒙古毗连的地区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 捷克斯洛伐克

1. 党和国家机关基本上在执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7月24日关于纪念八月事件一周年的决定。但是拟定的措施几乎完全没有按照民族阵线和工会的路线去实现。军队、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决心在八月的日子里采取坚决措施来对付破坏秩序的人和挑拨者。但是所有这些机关都要求，希望他们的严厉行动都应是为党和政府领导完全明确核准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其原因是，在国内不顾提出警告，还是继续散发反党反苏的传单，也发生公开的挑衅，或是破坏行为。

最近几天，姆拉达·博利斯拉夫市汽车制造厂发生火灾时，市

内的供水也遭到破坏，而且对苏军司令部的提供帮助的建议，地方当局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清除阻塞期间，把苏联商品换装到提索河上的契梅尔纳的过程中，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两辆火车相撞的事件，铁路运输中断。

从8月8日夜到9日在布拉格地区，1945年牺牲的苏军战士墓上的石板被用200克梯恩梯的炸药块所炸毁。向载有苏联旅游者的公共汽车投掷螺母，玻璃被砸得粉碎。当在一家捷克人的企业里安装玻璃时，聚集起来耍流氓行为的一群人不让进行维修。

8月12日在布拉格的瓦次拉夫斯基广场上，在周围贴满传单的地方聚集了人群，其中有外国的采访记者。当某些捷克公民向站在旁边的安全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出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群人时，他回答说，他“没有接到处理这种事的有关指示”。在“阿列特玛”工厂到处散布反党反苏的传单（“可耻日”、“拥护克里格尔的发言”）。这些手段得到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部分青年和管理处的支持。在分子化学研究所的工会布告栏上贴着支持克里格尔的信件，表示不同意苏联军队驻扎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会的材料和文章。

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党支部反对捷共5月全会的决议。将近14%的共产党员退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很多党员不交纳党费。在固体材料物理研究所和其他某些科学研究所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2. 今年8月13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捷共党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报告。他比较具体地和明确地对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给予了定性，指出他们（右派）的行为给社会所带来的整个危害。

胡萨克强调了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出，去年8月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党没有把这

些力量动员起来。胡萨克说，面临的这些天是相应一次检查，检查中将查明，谁真正在从事与国家和人民为敌的活动，谁在迷失方向并成了骗局的牺牲品。

胡萨克声明说，党的耐心已到极限，她将进行最坚决的和无情的斗争来对付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

### 挪 威

在挪威的武装力量中，对高层范围内的军事行政机构进行着改组，计划于1970年底完成。改组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对武装力量有高度工作效率的行政的经济的领导及缩减行政机构的开支，以便增加购买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的拨款。

改组后的结果，在总司令部下将成立有高度管理效率的统一的机构，它是国防参谋部的基础，由秘书处、6个管理处和2个独立科组成，地面部队、空军、海军各参谋部和海姆维尔也是统一机构的基础。管理处从物质上和技术装备上保证供给陆地上的部队，计划从武装力量指挥种类的管辖范围内取消空军和海军并直接划归国防部领导。挪威的领土将分成2个有高度效率的指挥部的责任区：北挪威和南挪威武装力量区，在陆地上的部队中计划成立4个师指挥部来代替军区，而在海军中成立9个海军区来代替海军军区。

### 瑞 典

最近几天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北欧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诺尔杰克条约草案和关于扩大北欧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建议。对诺尔杰克问题的最后决议，计划在委员会常会上通过，这次常会预计在1970年2月在雷克雅未克召开。

主席团会议上也研究了关于允许法罗群岛（丹麦）和亚兰群岛（芬兰）的代表参加北欧理事会会议。

## 希 腊

尽管委员会采取了大规模的镇压和恐怖手段，在希腊反对现制度的反对派势力在加强。在雅典成立了民主国家职工秘密同盟会，其目的是对抗专制和恢复国内民主。同盟会警告与委员会合作的国家职工说，假如他们不放弃与国王的叛徒及军人誓言的破坏者合作的话，他们将受到无情的惩罚。民主国家职工同盟会号召各民主国家政府、一切国际民族组织，支持为希腊自由而斗争的力量。

##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领导人懂得，如果它执行旨在与中国相接近的政策，就不能从苏联方面得到那些数量的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而这些数量对装备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是必需的。因此，目前正在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西巴基斯坦省长向伊朗国王递交了叶海亚·汗的一份请求，希望国王在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过程中请求尼克松卖给巴基斯坦一定数量的航空和坦克装甲的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幻影”飞机和一些坦克。巴基斯坦省长向国王保证说，为了回报这种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准备在今后支持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政策。

## 越南民主共和国、泰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力图加强其对泰国共产党和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间举行了关于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发展泰国起义者运动中给予帮助的会谈。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同意向泰国派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以便就地研究形势并制定计划在泰国开展游击斗争。为了与泰国游击队的力量协同行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派送越南的军事专家和地面部队分队，总数量共约7000人。

同时将向泰国的爱国主义力量援助粮食、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双方达成协议到1969年底扩大爱国主义力量数量达2万~2.5万人，拟于1970年5月开始展开战斗行动。

### 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发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信函，信中中国人表示支持越南南方的革命，并坚持必须用战争的方法来取得胜利，可以看出，从越南劳动党方面没有一贯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因此，信中“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包括呼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团结一致，因此，建议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与越南劳动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一起举行会谈，目的是为召开国际会议作准备。信中呼吁越南劳动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方针，原因是在其执行中，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遇到了一些困难。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范文同和长征与林彪进行了会晤。在三次谈话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指责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说，他们在支持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越南代表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对越南的有效帮助未能成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对1969年的援助协议，半年里中国人仅完成31.4%。中国人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对越南南方爱国主义力量的援助变得复杂化了。

### 肯 尼 亚

因“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执政党领导人和该联盟反对党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剧，近来国内形势异常尖锐。

肯尼亚民族联盟领导人在进行强化两个部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和破坏现政府乔莫·肯雅塔的威信的工作。

按副总统莫伊的意见说，在蕴有军事叛乱危险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向驻肯尼亚英国大使提出请求，要求尽快向肯尼亚派遣英国部队。英国士兵预料将于今年8月17日到达肯尼亚。

普·伊万舒津

1969年8月15日



№01839

苏军总参谋部侦察总局  
关于国际形势调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9月1日）

机密

形势调查简报

中 国

1. 根据美国专家的估计，尽管毛泽东集团企图整顿国内秩序，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最近时期以来明显地尖锐化了。可以看出，在许多省各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武斗的性质。其中今年8月一些大规模的反毛主义的行动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发生了动用武器的事情。工人及军事人员更多地参加了反政府的行动，这一事实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不安。

2.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政府打算在西欧国家购买一些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的种类。这引起了意大利的垄断组织的浓厚兴趣，这些组织要求政府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国家银行“意大利信贷”同意意大利的向中国出口载重汽车和化工企业设备的很多的商行提供贷款。

3. 日本政界倡议于1969年底召开会议来讨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问题。计划中除日本外，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会议。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土耳其的领土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合武装力量在西欧南部作战地区有参谋指挥人员参加的大规模的有计划的训练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训练是在预先约定的“半丰——69”的名称下进行的，计划于今年9月中旬举行这次训练。

训练的主要目的是检查和演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负责的这一地区的作战计划。参加训练的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西欧南部作战区的联合武装力量的指挥部和参谋部及其所属的联合部队和兵团以及土耳其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代表。计划吸收部分部队来参加训练。与去年相比，美国驻西欧司令部打算增加陆地上参加“半丰——69”训练的部队数量，这些部队要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调运。

## 意大利

新的意大利政府决定签订关于延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有效期20年的协议。同时政府认为前任外交部长南尼正式宣布拒绝发表声明是不合适的，声明中强调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是有限制的性质的”。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

8月31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弗·勃兰特抵达罗马进行正式访问。在和意大利领导人会谈中，他打算对召开全欧安全会议问题说明意大利的立场的同时，还要讨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范围内巩固两国的军事合作与加强地中海集团武装力量部署的可能性。

## 北 爱 尔 兰

英国政府不排除在北爱尔兰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内务部长卡拉格纳在作了访问这个地区结果的报告后，英国政府指示英国国防部长委任北爱尔兰独立军区司令为北爱尔兰军事行动长官。

## 近 东

1. 今年8月31日早晨在苏伊士以南50公里地区5架以色列战术驱逐机侵犯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领空并对埃及的对空防御和防御设施系统进行了侦察。

2. 今年8月31日白天在大苦湖北部地区，埃及和以色列部队之间发生了短时间的相互炮击。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司令部的报道，埃及军队无伤亡。

3. 今年8月27日在阿拉伯外长会议上关于召开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的决定在美国政界被评价为阿拉伯世界温和力量的胜利。可以认为，纳赛尔总统得出结论说，能有3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最高级的伊斯兰会议的任何决定，比阿拉伯国家高层会议的决定，能对美国政府产生更大的影响。

美国的、加拿大的和墨西哥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广泛地利用大量情报手段企图使阿拉伯国家的一切声明和措施失去信用，他们积极地表示维护以色列并支持其从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法国购买新的大批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

## 以色列，黎巴嫩

以色列军事政治领导人单方面决定废止1949年关于与黎巴嫩停战的协议，其理由是，黎巴嫩当局似乎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

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武装行动从黎巴嫩领土上来反对以色列。因此，以色列军队北方司令认为自己有权采取任何行动来保证居住在与黎巴嫩相连的边境地区的以色列公民的安全。

## 也 门

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的内部政治形势继续复杂化。由于埃尼和贾依菲建立政府的企图遭到失败，首相的职位可能提议由共和国议会成员萨布拉担任或者由埃里亚尼自己来承担这个使命。

为了削弱军队在国内的影响，族长们决定，为了粉碎君主主义者，向萨阿德地区仅派遣了由阿赫马尔指挥的共和国的部族部队。只能在共和国空军的支持下，在正规军坦克和炮兵分队加强之后，部族部队才完成萨那、萨阿德及通向边界萨阿德以南 15 公里的清除道路的基本任务。目前君主主义者阿赫马尔停止了进攻并要求派新的增援部队。埃里亚尼和萨布拉支持阿赫马尔的要求。在已经形成的形势下，总参谋长不愿在萨那地区削弱部队的部署，回避派新的增援部队到萨阿德去。也门阿拉伯武装力量司令部密切注意着国内事态的发展，在反动集团企图建立对其有利的政府时，它决心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坚决措施。

## 印度、尼泊尔

今年 8 月 28 日尼泊尔政府代表团抵达德里。会谈过程中，代表团打算要求印度取消在加德满都的军事联络小组和在尼中边境观察中国向西藏调动部队的印度瞭望哨。

印度政府为尼泊尔人的这项决定而感到不安，并打算对其施加压力，威胁对尼泊尔减少经济援助，并限制通过印度领土过境运输尼泊尔商品。

##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问题占有中心地位的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尼日利亚政府想使战斗行动开展起来以对付分裂派分子，并在今年9月中旬在前线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发动一些进攻性战役。目前联邦部队司令部在奥尼沙和哈尔科特港地区进行打击的准备工作已开始。

## 越 南

1. 今年8月30和31日，美国空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与老挝毗邻的边境地区和南部的目标进行了空中侦察，两昼夜中进行了60架次以上的侦察。

在越南南方境内双方陆地上的部队大规模的战役没有进行。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小股部队同美国及西贡部队小分队之间的部分冲突主要发生在岬港以南50公里的中部沿岸一带，波来古以西地区（中部高原）以及在湄公河三角洲。

为了打击爱国主义力量的目标和决定其他的战斗任务，B—52战略轰炸机在过去的两昼夜中出动了100架次以上，战术的和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出动了800多架次。

2、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对提高南越军队的战斗力和用必要的武器装备它继续给予高度重视。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访问南越之后不久，今年8月20~28日美军的国防部长里索来到西贡。据他估计，把进行地面战役的重心转移给南越部队可视为满意的。但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成立参谋部，培养技术熟练的军官和军士骨干和建立有效率的系统从物质上和技术上保证对南越武装力量的供给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 宇航设施

按照 1965 年 7 月 30 日和今年 7 月 1 日规定发射的美国人造地球卫星“飞马三号”（考察卫星）和“发现者号”（侦察卫星）停止了飞行。因此，到今年 9 月 1 日围绕地球轨道外层的人造地球卫星有 303 个，其中 246 个是按军事计划发射的，57 个是为考察发射的。

在苏联领土上空用于军事目的的有 170 个外层人造地球卫星围绕轨道运行，其中 93 个带有自动装置（侦察的 10 个，领航的 15 个，通讯的 1 个，用于其他军事项目的 67 个）。

普·伊万舒津（签字）

1969 年 9 月

№01836

## 米赫也夫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 监督委员会问题的调查报告

（1969年9月25日）

机密

根据日内瓦协议，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并于1962年恢复工作。委员会由印度（主席）、加拿大和波兰的代表组成。

国际监督委员会是1962年日内瓦协议解决老挝问题的机构，它负有使命执行其重要的具体职权来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后果，并保障履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议定书的原则，众所周知，这些原则应该保证老挝的独立、和平、中立及领土的完整。

日内瓦议定书规定了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工作的重要特点，其特点表现在委员会进行工作时要与老挝政府紧密合作，并取得其同意。对委员会来说，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须取得老挝参加民族统一政府三方面政治团体的同意（爱国战线党、中立派梭发那·富马及右派力量）。

把这一原则列入协议书中是值得肯定的因素，因为这为民族解放力量提供了条件，以便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依靠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制止右派势力和美国的破坏活动。

国际监督委员会曾与代表老挝的政府机构—民族三方委员会联系过，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履行日内瓦协议于1962年底成立的，由

爱国战线党、中立派及右派势力的代表所组成。民族委员会各方一致同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境内进行两次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检查协议书中有关外国军事人员撤离条款的执行情况。1962年12月29~30日和1963年4月14~15日在爱国战线党地区及右派地区进行了检查，这在1963年1月31日和1963年7月20日两位主席的两份报告中都有反映。结果表明有蒋介石分子军事集团的存在，还间接地证明了在右派地区停留过美国军事人员的事实。同时在两份报告中都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国际监督委员会所视察的爱国战线党地区的两个点中有外国军事人员存在。

1963年3~4月间的事件影响到贡勒中立力量的分裂，促使丁上校为首的所谓“左派中立者”在老挝朋友协助下出现，导致各方对国际监督委员会态度的重大变化。梭发那·富马力图消除分裂并恢复原状，呼吁协助国际监督委员会，而右派和美国人支持富马，他们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谴责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行为的可能性。老挝朋友们反而对保存并巩固“左派中立者”控制的地区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理由是3~4月间的事件属中立者与爱国战线党的内部事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介入将招致对两个集团内部事务的干涉。内部政治形势的复杂化，由于部长们从越南离开爱国战线党，爱国战线党并拒绝与国际监督委员会合作都破坏了三方机构的基础，而三方机构是委员会全部工作的依据。从1963年5月开始，国际监督委员会已不能行使所赋予的职权，停止了工作。这里已显出了老挝同志们想使国际监督委员会不定期长时间处在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一点为扩大对老挝内部事务干涉的美国人所利用。

根据议定书第19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期限定为三年，在这期限内两主席应向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提交建议研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的报告，到1965年7月，三年期限已经过。



不容置疑，尽管委员会还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继续为捍卫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需要，美国已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协议。

考虑到老挝、越南、中国和波兰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苏联方面继续延长委员会的工作一年。英国人同意这样做。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致函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政府，信中通知说，他们认为，目前停止国际委员会对老挝的考察和监督工作是不适宜的，为了拟定进一步的建议，他们提出应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时间不应晚于1966年7月23日。两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其中包括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赞同。

但是1966年初（1966年1月10日）老挝爱国战线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8日）都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有关在老挝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下一步的命运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和老挝三方政治力量未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他们主张暂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

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获悉，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的建议无效。但委员会继续存在，因为关于停止它工作的意见不一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对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态度，1963年7月23日委员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越南和老挝的朋友们继续向国际监督委员会提出一些关于美国干涉老挝的抗议。

1965年以后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加拿大奉行美国和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路线，这条路线想达到的目的是使委员会调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1962年破坏日内瓦协议的事情并证明北越军队来到老挝境内并参与了军事行动。波兰代表团在与苏方磋商后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其出发点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委员会目前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工作。日内瓦会议规定，委员会应

该按照倡议或者取得老挝王国政府的同意时在合作中进行工作，波兰代表团指出此点时声明说，现在由于所指的联合政府不存在，只有在对立各方——参加联合的人同意下委员会的活动才是可能的。印度代表团采取中间的立场，有时支持波兰代表团的建议，有时支持加拿大代表团的建议，并竭力强调其态度的客观性。

委员会成员们及有关方面的矛盾立场决定了其近几年来的工作结果。委员会日程上的主要问题如下：关于委员们调查和走访武装冲突地区的问题；准备向两主席提出关于过去几年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问题；委员会的财政状况及裁员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尽管波兰代表团反对，印度和加拿大的委员们还是在1968年2月和1969年1月在老挝南方发生武装冲突地区进行了走访，但走访后没有作任何声明。

对根据加拿大倡议得到印度支持的第二个问题，委员会继续工作向两主席写报告，其中包括由印度人写的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报告。波兰代表团打算拖延使这个报告达不成一致意见。作了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加拿大人和印度人完全同意了修改意见。现在波兰代表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批准这份报告并不将它送达给两主席。

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复杂还因严重的财政困难。许多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履行议定书第18条款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66年9月欠款已达497~500英镑。委员会不止一次讨论过财政问题，1968年仍未得到实际解决，虽然具有了新的特点，因为苏联关于裁减委员会人员的建议实际上已在执行：军官联络小组的人数、警卫人员和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人员都大大减少。按波兰代表团的意见说，进一步裁减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看来已不可能。

目前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未定。爱国战线党的领导声明说，

不应再工作，只能存在，因为关于下一步的规约问题是由日内瓦协议全体参加者决定的。看来，他们懂得，委员会今后还是需要的。

苏联方面主张保存委员会，其出发点是，因为在美国扩大对老挝事务干涉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乌·尤·米赫也夫（签字）

1969年9月25日

№01838

## 苏驻越大使关于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 老挝地区形势调查报告

(1969年9月29日)

机密

根据老挝朋友们的资料说，在老挝爱国战线党控制和管理下及与其相毗邻的老挝地区的左派中立集团包括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人口近80万。

解放区是在老挝游击队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并于1945～1962年期间在与法国殖民者及美国人斗争过程中建立的。

目前在老挝16个省中的14个省都有解放区和爱国力量的游击队根据地。他们分散在全国，相互间没有联系，通常住在难以通行的深山密林地区，居民40～50%为少数民族，如苗族、卡族、傣族等，这些居民也有住在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机关集中在桑怒省的桑怒市，它是解放区行政和政治中心。老挝朋友们认为建立解放区是爱国力量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并多次强调说，他们把解放区看成是今后革命斗争的基地和将来在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老挝爱国战线党近年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执行一条全力巩固解放区的路线，首先是从军事观点上考虑，也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考虑。

保卫解放区是老挝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1968~1969年作战的主动性基本上掌握在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支持的爱国力量手中。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战役，从而解放了南白，孟水和老挝北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

但是政府军队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对朋友们的阵地，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查尔平原以及车邦地区（中老挝）进行了令人难受的打击。

美国空军对解放区的轰炸使我们的朋友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68年底开始，轰炸的强度增加了3~4倍，最近以来已达到每天400~500架次。据一些材料报道说，为了免遭轰炸，从解放区投到政府方面来的人已有数十万。一些居民点和道路被摧毁，大部分播种土地无法耕种。

描述国内军事政治形势时，苏发努冯在与苏联大使弗·伊·米宁同志谈话中强调说，人民军队对解放老挝所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卫解放区并使他们中过去被敌人抓获过的那些人回归。没有提出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苏发努冯同时说，爱国力量不想放弃手中的主动性，在万象行政当局控制的地区今后将发动部分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限制敌军的运动。

№01837

## 苏外交部东南亚司关于 老挝战争形势的简略报告

(1969 年 10 月 24 日)

机密

1969 年老挝的战争形势进一步尖锐化。对抗各方的武装力量——梭发那·富马右派、中立集团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在春夏季期间发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进攻行动。

美国人拨给万象政府大量经费并供给所需物资，力图在削弱老挝爱国战线党军事阵地的同时迫使其退出从越南民主共和国通向越南南方的供给线的地区（老挝中部）。

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支持的老挝民族爱国力量提出任务打击敌人比较重要的战略点并局部地扩大解放区的地盘。

在今年 4~5 月间万象集团的军队在北方采取进攻行动来对付老挝爱国战线党所控制的在战略方面比较重要的地区查尔平原。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他们获得一些成功，其中侵占了查尔平原的大的居民点川圻。

但是后来老挝爱国战线党的部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的支持下开展反攻并收复了失去的阵地。不但如此，在老挝右派力量重要据点地区孟水（王国首都朗勃拉邦孟水东南 80 公里）顺利地进行了一次战役，6 月底孟水的居民点以及与其相邻接的地区转到老挝爱国战线党的手中。

老挝爱国力量的这次胜利引起了万象政府控制区的大肆喧嚷。老挝右派活动家开展了宣传运动来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谴责它进行了“侵略”等等。可以认为，美国人趁此机会扩大了其在老挝右派各阶层中的影响。

梭发那·富马政府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旨在制止来自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的进一步的进攻行动，并防止今后孟水地区发生过的这类事的再次发生。无论是梭发那·富马的，还是西方的主要用意在于想说服苏联对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施加影响”。

同时老挝的右派势力在美国人和泰国人的积极支持下，在对老挝和越南朋友们来说比较薄弱的地点（查尔平原和中老挝9号公路地区）开展了进攻行动的准备工作。

根据我们在曼谷和万象使馆的报道，进攻行动计划是在美国军事指挥部的倡议下拟定的，其目的是要改善美国和西贡部队在越南南方的状况。

在今年8月底9月初由泰国部队加强的老挝的右派军队对查尔平原发动了攻击。突然的因素、在力量上占有很大优势（兵力已达14个营）以及由美国人谋划的强大的空军对陆地上的部队的支持保证了右派力量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几天的时间内他们占领了查尔平原的主要中心并迫使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国的部队撤离到查尔平原周围的山中。

在9号公路（中老挝）沿线同时开始了对老挝爱国战线党阵地的进攻。经过顽强的战斗，右派力量占领了车邦市地区的重要的战略据点，据西方各通讯社报道，从而切断了从北越通往南方的交通干线（称为“胡志明小道”）。

老挝和越南朋友们间接地承认，他们不得不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放弃许多阵地。但是，他们不认为这是军事上的失败。越南民主

共和国外交部长阮维桢在河内与苏联大使谈话中把老挝爱国战线党部队丢失的查尔平原描述是老挝爱国战线党战术上的失败。

从越南和老挝朋友们说出的意见中可以明白，他们现在正准备反击，这种反击不仅可以恢复原状，还可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其态势。根据朋友们的话说，老挝爱国战线党部队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一旦完成他们在查尔平原四周地区的兵力的重新部署，他们就会转入反攻。

同时也有消息说，美国和老挝的右派势力也采取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准备打退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可能进行的反击。因此，美国急剧地增加向老挝提供武器装备，这种装备是从美国在泰国的军事基地供给的“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在与老挝接壤的泰国边境地区可以看到泰国军队的集结。泰国在老挝的军事顾问的数量也明显地增加了。

（今年9月22日和23日）梭发那·富马同记者谈话时指出，王国部队最近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越南的武器弹药仓库，其目的是不让“敌人”像通常“旱季”开始那样的发动对政府地区的新的攻势。老挝总理否认了美国和泰国的武装力量参加这些战斗的事实，并再次强调说，他反对任何外国军队进驻老挝的领土。

从收到的报道及双方的声明的分析中可以作出结论，与去年相比，尽管军事行动更加频繁了，但国内的军事政治力量的配置情况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可以看出，梭发那·富马的任务不是坚守住所占领的解放区。老挝和越南的朋友们也断言，目前无论如何不打算用武力解放老挝的全部领土。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1969年10月24日



№01831

## 谢尔巴科夫与越副外长阮基石会谈纪要

（1970年1月3日）

秘密

摘自 И. С. 谢尔巴科夫的日记

与阮基石的会见是应他的邀请进行的。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副主任冯社泰也参加了会谈，他声明是受委托通报，越南方面研究了有关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即将进行的柬埔寨之行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选择海路是恰当的。苏联轮船应于1月20日准备起航，将沿距离越南海岸80~100海里，行驶约1200海里。冯社泰请求补充通知该船的行驶速度与名称。越南方面同时又请求派一架专机到河内。为了确保此行的秘密性，必须对飞机由河内至金边的飞行作妥当安排，使其与乘轿车由西哈努克港出发的范文同同时到达。一级上校补充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见将安排在金边机场。飞机由河内至金边的飞行路线由苏联方面择定。

许诺将把上述情况报告莫斯科。

随后，阮基石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名义，对在联合国以及在伊斯坦布尔国际红十字会会议上，就越方关于美国战俘问题的立场所给予的支持，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他提起我们曾要求阐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于是通报说，美帝国主义者对在越南的战争感到张皇失措。世界各国人民日益强烈地谴责美国黩武主义在越南南方，特别是在

松米农村地区所犯下的罪行，要求结束侵略战争并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仆从军队。美国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战俘问题误导世界舆论，可以肯定地说，它还将长时间围绕这个问题制造紧张。阮继而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加入1949年日内瓦公约时曾对第85条持保留态度，并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坚定不移地认为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不是战俘，而应作为战争罪犯受到惩罚，他们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但是，对于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坚持执行人道主义和宽大的政策：伤、病员得到治疗；被俘人员享有与越南人民军士兵同样的伙食；他们每月可给亲人寄一次明信片，每两个月可允许收一次邮包。虽然被俘飞行员名册并未公布，但是，阮指出，美国人知道，被俘人员是被允许通信的。

在回答我们早些时候提出的问题时，阮基石通报说，共有一百多张明信片以及5名死亡美俘的名字转交给了不久前前来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的美国妇女代表团。阮基石接着指出，越南方面赞成按照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一揽子解决越南南方问题”10点方案中的第9点解决关于美国俘虏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将加强揭露美帝国主义反对越南人民的罪行的斗争，对阐明美俘政策也将予以必要的注意。在这方面，阮说，我们请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与支持我们的立场。他继续说，由于当前在美国有人企图歪曲伊斯坦布尔国际红十字会议的决议，希望苏联红十字会在报刊表态的同时，还能发表一个相关的声明或者致函越南民主共和国红十字会，表示对越方致伊斯坦布尔会议备忘录的支持；另外也希望苏联能够对其他国家进行相应的工作。

阮基石接着通报称，美国百万富翁贝洛特曾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万象临时代办提出建议，以修复越南北方被轰炸毁坏的医院、学校和寺庙换取美国战俘的释放。据这位副部长说，越南方面在答复中对这项建议原则上未加拒绝，但同时指出必须按照“一揽子解

决”的第9点解决这一问题。贝洛特向越南儿童赠送礼品的建议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而被拒绝。

感谢所作说明，并表示将把朋友们的愿望转达莫斯科，苏联报刊将就这些问题继续表明态度。

说明受到委托，对伏罗希洛夫同志逝世所表示的哀悼，向孙德胜、黎笋、长征和范文同同志转达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同志的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联处处长德兰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随员 B. II. 库兹明诺夫。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01832

## 梅尔库洛夫与越南外交部苏东 司副司长康塔霍的谈话纪录

(1970年11月7日)

机密

摘自伊·姆·梅尔库洛夫日记

我应邀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访问了康塔霍。

康作了如下谈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遵照人道主义政策，决定今年对在越南北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采取以下措施：

1) 在圣诞节及1971年新年来到之际，破例允许飞行员的家属给飞行员寄送礼品包裹，其重量不得超过5公斤（按越南民主共和国目前的规定，重量不应超过3公斤）。包裹应按规定手续通过莫斯科邮政总局（莫斯科—越南通讯社）寄送，通过其他渠道寄送的包裹概不受理。

2) 越南北方在纽约设有在越南北方被俘的美国军事人员家属联络委员会，鉴于上述节日将要来临，美国飞行员家属也可由邮局或通过该委员会寄明信片。因此该委员会能够派代表去河内送达明信片。

康接着说，美国政府在所谓的战俘问题上往往想对美国和世界舆论混淆视听，可以预料，美国这次也会这样干。不能排除美国统治集团企图采取旨在激起世界舆论来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作法，

美国百万富翁们去年曾干过这种事情。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请求苏方共同采取行动来对付美国人的这些企图。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也向苏方提出请求，假如上述包裹是按规定寄发的话，在转寄时请予以协助。

有关转寄包裹和明信片的手续，驻纽约的美国战俘家属联络委员会将于近期发表通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决定拟于今年11月9日通过电台进行广播，此决定也可能将在报刊上颁布。

我回答说，将向大使汇报。

4) 康引用今年11月4日我们的谈话时说，已委托越苏友好协会研究“列宁在我们心中”关于授予维克多利亚游戏优胜者锦标事宜和以“关于列宁您知道些什么？”为题的“莫斯科新闻”报竞赛的事宜，大使馆可与越苏友协对此问题进行全面的协商。

5) 康引用11月4日同样的谈话时说，他正式宣布：凡涉及苏联各种组织与越苏友好协会关系的一切问题，苏联大使馆可直接向该协会提出。

我感谢康的通报。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东欧司专员阮谦顺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参赞 伊·梅尔库洛夫（签字）

No01833

## 国际调查委员会代表团走访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

(1970年11月13日)

国际调查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中有格·弗朗克（瑞典）和阿·依·波尔托拉克教授，从1970年7月16日至8月1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作了停留。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停留期间，国际调查委员会曾多次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调查美国在越南战争罪行委员会的领导人及其成员（主席是范文伯），也会见了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这类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见了老挝和柬埔寨及越南法学家联合会的代表们。就有关与苏联学问渊博的法学家和他们的越南同僚合作问题在苏联代表那里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科学国务委员会主席阮汉团同志进行了会晤。临行前，代表团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接见。根据需要，苏联代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阮汉团同志针对调查进行了一些私人会晤。苏联代表定期地向苏联驻河内大使馆通报了国际调查委员会代表团的工作过程。

### 1. 关于同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合作问题

就有权威的越南组织（北方和南方）与国际调查委员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并拟定了国际委员会第一次常会的日程安排。

但是，应该指出，对这一问题协议的一开头就受到对国际调查委员会持有戒备态度的越南北方的阻碍。我们的越南朋友长期以来

十分积极的与“罗素法庭”进行了合作。国际调查代表团首次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委员会范文伯同志会晤时，他多次强调说，越南同志们不认为“罗素法庭”不复存在了，他们认为在巴黎还有一个在继续工作的经常的新闻中心。应强调指出的是，这个中心似乎在继续“罗素法庭”的工作，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可成立新的法庭。

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明显地使人感觉到我们的越南朋友对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立场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因此，国际调查委员会代表团的团员们在首次座谈会上就阐明了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任务，讲述了与“罗素法庭”相比，国际调查委员会完全是以另外的组织原则进行活动的。他们表明，国际调查委员会得到比较广泛的社会阶层的支持作为自己的原则，他们谈到，国际调查委员会受到所有最大的国际组织方面的支持，一些有名望的社会活动家、法学家都参加了斯德哥尔摩的运动。

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我认为有必要以私人的方式与范文伯同志交谈一下，向他阐述苏联同志对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观点。谈话结果表明，越南朋友认为以那种形式组成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不管197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它是如何成立的，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其中具有高权威的社会活动家极少。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领导人的问题模糊不清的情况使人感到不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斯瓦恩斯特隆<sup>①</sup>作为候选人提名持怀疑态度（“斯瓦恩斯特隆不合适”——范文伯作结论说）。最终他们未能同意格·弗兰克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常会议讨论组织问题的声明，但是形势却要求按事情的本质采取刻不容缓的行动。

我曾想打消范文伯同志的疑虑，并说，我相信第一次委员会不只是研究组织的问题。后来，通过大使馆我得到答复，我已经使越

<sup>①</sup> 斯瓦恩斯特隆，瑞典记者，获1970年列宁国际奖。

南的朋友们对此点完全确信了。同时，我向范文伯同志阐明在斯德哥尔摩选出的成员就按苏联朋友的意见来看也需要进行补充。我向他通报说，预定当主席的不是斯瓦恩斯特隆，而是古纳尔·米尔达<sup>①</sup>，不过我认为还是有必要首先打消持有怀疑态度人的疑虑。

看来，这次私人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消除疑虑，但我的印象是，越南方面比较喜欢一种对其有利的联合方法，在这个组织中国际调查委员会与“罗素法庭”都能和平共处（他的一种新的目前的说法）。

正如我所想的一样，越南方面立场的突然改变是发生在根据越南朋友的倡议而进行的第二次私人谈话以后。范文伯同志向苏联代表通报了越南法院机关已公布了决议，要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来揭露美国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决议中写到，这次运动应看成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和外交的任务”。

在这次谈话的过程中已经拟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来帮助我们的代表团。一切使人感觉到，越南委员会的机构完全用另外一种速度开始在运转。

## 2. 代表团搜集证据的活动

停留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期间，代表团成功地搜集了美国在印度支那所犯下罪行的大量证据。

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主要是各种委员会关于美国所犯下的新的罪行的报道。

代表团坐车到犯罪现场，察看了遭到野蛮轰炸的居民点（宁平、发艳、海防、河隆区）。我们获得了物证，取到了野蛮武器的样品，拿到了相片。询问了众多的证人，其中有凝固汽油、磷、空

<sup>①</sup> 米尔达，瑞典经济学家，1974年获诺贝尔奖。



中轰炸的牺牲者和由于使用新式的最精良的武器的受害者。

越南朋友们根据犯罪事实为我们创造条件去询问许多证人，他们都是来自越南南方的集中营、监狱和在实行所谓的越南化和“加速和解”过程中的见证人。

最后，代表团得到审问三个美国战俘飞行员和一个美军的逃兵的机会。

这样搜集来的材料使我们有可能为国际调查委员会起草报告。

### 3. 协商援助越南朋友们

在精选证据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国际调查委员会，或是对越南的同志们）我不得不熟悉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揭露美国战争罪行调查机关工作的性质和程序。因此，在这方面具有了一定的经验后，向我们的越南同事提出一些建议，我认为是合理的。

苏联代表把注意力放在说服力不够的个别证据，其中有证人提供的证明，提出建议如何消除这方面的缺点，把注意力放在必须从法律专业范围比较准确地确认犯罪行为，以及尽可能合理地确认在有关罪行文件中的犯罪人员，并查明罪行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还提出其他方面的一些建议，其中一部分同看过的电影有关。美国官方的宣传机构企图推翻所犯罪行的事实本身，或者至少要推卸美国政府和美军指挥机关对所犯罪行的责任，我把我们所掌握的现有的关于美国能采取的一切形式和方法都告诉了越南朋友。

### 4. 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员

越南同志们同意提古纳尔·米尔达为国际调查委员会主席的候选人。他们认为应有四个副主席（从苏联方面希望为列·斯米尔诺夫，另外的从美国、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产生）。总的意见希望尽可能增加美国和日本的新成员。

提议建立常务秘书处作为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机构，由三人组成（由苏联、美国、瑞典各出一人），还应成立三个分委员会，每个分会在一定的范围内专门研究一些问题。

### 5. 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日程安排

1) 对这一问题非常详细地交换过意见。越南方面的意图主要是，希望尽最大可能使会议政治化。从而提出建议在第一次会议上研究入侵柬埔寨问题，建议代表国际调查委员会表示支持解决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原则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西哈努克王国政府和老挝爱国阵线都表述过这些原则。

很遗憾的是，我的同事格·弗兰克在那里，在越南，支持了就我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立场。我不得不声明，在斯德哥尔摩对支持越南问题的会议中存在着分歧，这些会议能够也应该确定他们对印度支那各种政治问题的态度，同时职权和活动范围都已由国际调查战争罪行委员会在本身的名称中规定了。苏联代表指出，如果调查委员会希望世界舆论都能相信声明和结论的话，那末委员会就不应该对各种没有调查过而且从观念上说不属于它调查的事情作任何论断。当然，国际调查委员会仅仅是在类似的组织中所特有的那些方式方法的帮助下来制定政策的。苏联代表劝越南同志相信，各国人民以怀着信任感的那种态度来对待该委员会的文件时，才能去评论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成绩。正因为如此，重要的是要使人们凭习惯的感觉认为在委员会的活动中调查的法学方法具有优势，要使得委员会的任何结论根据都是来自具体的调查。

越南同志们口头上同意了这个理由并答应在其建议的文件中进行适当的修改。但实际上，在河内机场临行前所交出的文件的最后方案依然只字未改。

2) 在讨论第一次会议日程的过程中，越南同志们确定了其代

表团的成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代表团每方 4 人，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团每方 2 人。规定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由 5 名见证人来参加第一次会议。越南同志们建议，尽可能地利用从越南回国的美军过去的军事人员以及访问过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的外国人来作为见证人，他们能够提供美国在这些国家犯罪的证据。越南方面也要求邀请某些国际和国家的组织派代表参加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达成如下协议：国际调查委员会将听取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报告，听取印度支那 4 个（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代表团的报告，同时要审查所有报告附件的一切证据（文件、见证人、物证）。商妥，为了保证国际调查委员会的各项纷繁的工作，所有的报告应提前交给委员会的成员，以便他们能够研究这些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报告人发言要简明扼要，每人报告限 15 分钟。

越南南方所有其他建议（都附在报告中）包括程序细节，翻译系统的保证以及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承担印度支那四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一切开支的原则。

## 6.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法学家的共同备忘录问题

在第一次谈话中，范文伯同志同意我们的这种备忘录的想法，在备忘录中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政策进行分析。他仅指出说，应与调查委员会成员进行商量。过了一段时间，我提醒过这件事，并得到答复：“委员会成员表示同意”。但在从河内飞往莫斯科几小时之前，范文伯同志对我说，很遗憾，对我的肯定的答复不能算作最后的，因为他还应“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同志们商量”。不知近日抵达莫斯科的该委员会的秘书是否带来了对我问题的答复。他建议苏联法学家联合会的领导人就此问题与越南法学

家联合会领导人进行接触。我只能说，在河内我正是向越南法学家联合会的领导人提出过这个问题。

结束报告时，意识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但还是应当承认，对最重要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与之会谈的所有4个代表团都赞同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他们表示愿与代表团进行密切合作。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和召开，进行了全面富有成效的研究。

同时对召开第二次委员会也交换了意见，考虑到了下列各点：

1) 松米 (СонгММ) 是美国在越南犯罪的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的地方；

2) 长期以来，在美国积极进行着一场狂热的伪造运动，旨在歪曲这一罪行的真正历史；

3) 越南朋友们目前在这方面拥有大量的证据，并认为召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来专门调查松米的罪行是合理的。在到达莫斯科后，我简要地报告了走访的结果，以下是在走访体验基础上的建议。

1. 由于准确性与具有说服力是任何形式的宣传的极为重要的条件，考虑到这对国际调查委员会这类机构的工作尤为重要，应注意不仅查明事实，而且正确的法律鉴定都会具有重大意义，应该承认吸收精通刑法和国际法的著名法学家和专家到委员会组织中来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国家吸收这些人更为重要。由乌·斯坦达尔德领导的美国法学家越南问题委员会是充实国际委员会组织较好的泉源。从法学家委员会或许可以具体地推荐理查德·福尔克、约翰·符里德和乌利扬姆·斯坦达尔德到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组织中去。此外，让美国的著名的法学家马克·莱恩参加进去也是十分有益的。

邀请波兰和保加利亚的法律界人士加入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组

织，其目的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在该委员会中的力量。

2. 在国际调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周，在赫尔辛基或者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筹备会应认为是合理的。

这里所说的是，所有的报告以及附带的全部证明材料要提交给预备会。预备会的目的是要检查第一次委员会的准备情况。

印度支那四国每方派一名代表、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列·斯米尔诺夫、勃·斯万斯特姆·奈伦兹）（美国）、诺尔曼（国际民主法学家联合会）以及常务秘书处的成员参加筹备会应认为是合理的。

3. 必须制定国际调查委员会的章程草案和程序。

4. 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总结文件的名称问题应在筹备会上进行讨论。建议事先讨论以下名称：“犯罪的行为”、“有罪的结论”、“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各国人民在谴责（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各国人民的名义”。

5. 由于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即将召开，在宣传方面的措施分三个阶段来进行比较合理。

#### 1) 会议召开前

在这段时期应当通过苏联报刊，借助新闻社和塔斯社、外国的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苏联的和国外的——通过国际广播和电视组织及“国际电视台”）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来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罪行。在这次宣传运动的过程中，事实的叙述应该配合即将召开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必须讲述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员，讲述召开会议所举行的预备工作情况。

#### 2) 会议期间

在委员会秘书处要建立新闻中心，它将向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体提供一切必要的材料。

无论是在苏联报刊，或是在国外的报刊上广泛发表会议的召开

情况及国际调查委员工作的材料。委托国家电视委员会及苏联部长会议的无线电台，通过苏联电视以及通过国际电视系统网所包括的国家国际电视广泛地说明委员会会议进展情况。尽可能地用“国际电视台”与“欧洲电视台”交谈的方法在西方国家转播委员会会议的材料。

3) 会议以后

——委托国家电视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电视台（尽可能地与瑞典电视台一起）发行一部有关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的大型纪录影片。

——委托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电影事业委员会研究关于发行一部在松米惨剧的故事影片。

——责成国际调查委员会秘书处筹备出版一本“彩色的”关于国际调查委员会工作成果的书。委托“政治书籍”出版社和“进步”出版社用俄语和各种外语出版该书。同时，委托委员会秘书处尽可能采取措施在西方各国出版社发行这本书。

把国际调查委员会会议总结文件作为最广泛的通俗读物是十分重要的，这些读物应在斯德哥尔摩协调委员会和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资助下发行。此事可委托委员会秘书处，而在苏联可委托“政治书籍”和“进步”出版社去做。

（详细的报告存放在苏联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阿·波尔托拉克（签字）

№01834

## 伊沙耶夫与越驻苏大使馆 一等秘书阮文光的谈话记录

（1970年11月13日）

机密

摘自姆·普·伊沙耶夫日记

我接见了阮文光。

受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的委托，阮文光就今年11月初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通过的对在越南北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所作决定的基本点通报如下：

1) 在1970年圣诞节和1971新年来到之际，允许美国飞行员接受其家属寄来的新年包裹，重量为5公斤（通常为3公斤）。这些包裹应该由莫斯科邮局按有关规定的程序寄发。通过其他途径寄发的包裹不予受理。

2) 在圣诞节和新年来到之际，允许在越南北方被俘的飞行员接受其家属所寄的祝贺明信片。这些明信片可以由邮局寄发，也可通过纽约 КОЛИАФАМ 机构寄发。同时飞行员也可以给其家属寄送祝贺新年的明信片，并附有越南方面寄发的明信片。

3) 越南人民准备为美国飞行员组织庆祝活动来庆贺圣诞节和新年（指放映电影）。

阮文光强调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此项决定是出自对在越南北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所持的人道主义态度，同时他请求苏联方

面仍按往年做法，在寄送这些包裹时给予协助。

我向阮文光承诺将上述情况告知东南亚司的领导人。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一等秘书 姆·伊沙耶夫（签字）



No01823

## 谢尔巴科夫与越副外长

### 黄文进的会谈纪要

（1971年2月2日）

秘密

摘自谢尔巴科夫日记

与黄文进的会见是应他的约请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进行的。

按照协议，黄文进向我们通报了对印度支那当前形势的看法。

副部长通报说，美国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印度支那已经遭到失败，但仍继续侵略。莱尔德和罗杰斯在关于印度支那的战略会议之后所发表的最新声明证明美国人正在准备新的军事行动。

在越南南方，美国及其傀儡在加紧推行“绥靖”政策，继续轰炸居民点，使用有毒的化学物质。

美国短程轰炸机兵团飞机，其中包括 B-52，将炸弹投掷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前不久，在广平省上空曾扔撒过有毒的化学物质。

在莱尔德柬埔寨之行以后，美国便扩大了自己在这一战线战争的卷入程度。美国广泛采用短程轰炸机兵团，其中包括 B-52，第 7 舰队的战舰以及雇佣军队。

在老挝进行着特别广泛的空袭，尤其是在老挝的南部地区。有几天空袭中出动的飞机达到 400 架，投掷的炸弹达到 1000 吨。又

有数千泰国士兵被引入老挝。西贡聚集兵力的目的在于在老挝南部开始类似1970年入侵柬埔寨时的军事行动。正是由于这个原故，罗杰斯在今年1月29日宣称将在印度支那无限制使用美国的短程轰炸机兵团。而此时，被他重又捡起的美人所谓保护自己在南越士兵的生命这一老生常谈的论调已经不堪一击，只不过用来蒙骗世界公众舆论而已。

但是，越南人民决心实现胡志明的遗训，响应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70年12月10日的号召，将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黄文进接着指出，苏联对今年2月1日老挝爱国阵线<sup>①</sup>中央委员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所作出的及时反应具有巨大的意义。副部长受委托对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有力支援，尤其是对阿·尼·柯西金2月1日在莫斯科接见叙利亚代表团时的讲话，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随后，他通报了总理范文同同志希望2月3日与大使会晤，以通报越南方面对多勃雷宁<sup>②</sup>与基辛格<sup>③</sup>会谈的意见，对此大使早先业已通报。

对黄文进的通报表示感谢，表示准备会见范文同同志。

从我们方面，根据中央委托，向黄文进通报了老挝南方军事行动的准备情况。接着，同样在从中央收到的材料的基础上，向黄文进通报了阿·尼·柯西金与美国参议员马斯基会谈的情况。黄文进感谢通报事项，并表示将向范文同同志报告。

① 老挝爱国阵线，1956年1月成立，由1950年成立的寮国自由民族统一战线改组而成立，主席苏发努冯。1979年改组为老挝建国战线。

② 多勃雷宁，安·费·（1919～），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

③ 基辛格，亨·阿·（192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博士，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参加会谈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联司工作人员：阮进春、邓庭凯，还有大使馆译员 E. A. 巴兹迪列夫。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No01822

##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美国 在老挝战争升级的声明

(1971年2月10日)

几天以前，美帝国主义者动员起数万西贡和美国士兵，与万象傀儡和泰国雇佣军相配合，在美国的指挥下，侵入老挝的领土，开始了对这个国家的大规模侵略行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舆论都坚决谴责这一行径。尼克松政府又一次演出了一场闹剧，它强迫傀儡阮文绍发表所谓西贡傀儡军队沉重打击老挝的声明。同时，他们又提出许多骗人的论据，把这一切说成是“自卫行动”，目的在于确保美国军事力量的安全，声称这一军事行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但是，任何诡计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是侵略者，它粗暴地蹂躏了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平与中立，破坏了1962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而美国是在这一协议上签了字并且保证遵守不怠的。

美国佬把大量武装力量集中到纬线17度以南，并把部队推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与过去一样，妄图实现其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又一军事冒险步骤。这是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直接威胁。

美国的这一系列行径是使得印度支那地区战争升级的极其严重的新步骤，在东南亚以及全世界造成了十分危险的形势。

这样一来，在过去的10个月中，尼克松政府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将其蔓延到印支半岛的两个国家——柬埔寨和老挝的国土上。

这充分证明，尼克松政府并不想建立和平，相反，却企图拖延、强化与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美国不仅不尊重，反而意欲践踏老挝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它没有停止侵略战争的愿望，反而竭力破坏印支各国的和平。美国这一系列厚颜无耻的侵略行径彻底暴露了尼克松总统的所谓“五点和平计划”以及其他“倡议”的阴险本质。

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走狗集团一面奉行利用印支人打印支人的所谓尼克松主义，一面利用西贡傀儡军队充当美国人在老挝进行侵略的炮灰，从而更加充分地暴露了自己凶恶的人民叛徒的虚伪嘴脸。万象统治当局在自己一连串颠倒黑白的声明中，千方百计煽动美国和西贡傀儡侵犯老挝主权，摧毁这个国家，并容忍他们灭绝老挝人民。

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向热切期望在自己国家的西部边界有一个和平中立的老挝，并且愿意与这样一个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睦邻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严格遵守 1962 年有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始终不渝地尊重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坚决要求美国也同样无条件地按照这些协议办事。但是，美国在签订 1962 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之后，便急不可待地推翻了老挝三方联合政府，公然撕毁 1962 年日内瓦协议，并且变本加厉地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进而终于采取了目前这一系列针对老挝的蛮横无耻的行动。

在当前极端严重的形势下，作为 1954 年有关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协议和 1962 年有关老挝问题日内瓦协议签字方之一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特郑重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把西贡军队引入老挝王国领土对这个国家进行侵略并践踏老挝王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从而破坏 1962 年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老挝爱国阵线中央委员会2月8日关于尼克松政府在老挝进行战争升级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坚决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在老挝、南越和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全部撤出在印度支那的美国及其仆从的军队，以使印度支那每个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内部事务。

越南人民将始终忠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高级会议的历史性声明，与兄弟的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坚决继续并加强反对共同敌人——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决心加强积极的攻势行动，在所有战线上不断打击敌人并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坚信，老挝军队和人民在老挝爱国阵线的英明领导下，一定能够粉碎尼克松政府新的战争冒险行动。老挝各阶层人民都将奋起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帮凶，并将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老挝人民必将在保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的斗争中赢得胜利。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政府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新的战争冒险准备，同时严正警告：越南人民定将保持高度警惕，彻底粉碎美国任何新的冒险行动。尼克松政府及其各傀儡集团应对这些战争行动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全部责任。

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紧急呼吁忠于和平与正义的理想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各国际组织、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及时制止美国在老挝以及整个印度支那所采取的新的战争冒险步骤，加紧支援越南人民以及老挝与柬埔寨人民抗击美国拯救祖国的斗争。

尼克松政府将美国—西贡侵略者引入柬埔寨，不但未能挽救将南越的战争“越南化”的计划，反而在柬埔寨屡遭惨败。尼克松政府这一次又将战争扩大到老挝，那就不仅在老挝，而且在越南和柬

埔寨都必将遭到更为惨重的失败。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抗击美国拯救祖国的斗争事业一定能够取得光荣的胜利。

河内

1971年2月10日

№01824

## 苏外交部东南亚司副司长弗多文与 越驻苏大使馆参赞武俊的会谈纪要

(1971年2月25日)

秘密

会见是应武俊请求进行的。

武俊接受委托通报了目前印度支那出现的形势。

老挝。侵入老挝南方的美国——西贡军队，按武俊的说法，陷入了困境。

美国指挥部封锁“胡志明小道”的计划已经彻底破产。在军事行动开始后的12天内，西贡军队仅沿9号公路深入了15~20公里，而军事行动也仅限于宽15公里的走廊地带。直接在老挝领土上作战的西贡军队数量为10000人。沿“胡志明小道”各支线深入的这些部队不仅分散，而且与直接位于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交界处的30000人主力部队相互隔离。主力部队没有可能支援被围困的各分队，因为越南爱国者在南越北部广圻省，也就是在那些打算在战斗中利用“胡志明小道”的部队的后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老挝的军事行动过程中，共歼灭1800名美国—西贡军队的士兵与军官，击落126架直升飞机。使用“B-52”反坦克炮射击直升飞机尤为有效。

在老挝北方，爱国力量占据了王国首都琅勃拉邦周边的重要阵地，攻克了桑通，并包围了龙镇。



对于泰国部队是否参与老挝南方作战行动的问题，武俊的答复是否定的。

柬埔寨。武俊指出，观察柬埔寨的军事形势不能与老挝和柬埔寨割裂开来，并作了以下通报。在柬埔寨的西贡军队数量为 20000 人。目前，主要战斗在 7 号公路的另一侧进行。在这些战斗中，柬埔寨爱国力量歼灭了 2000 士兵与军官，其中包括驻柬埔寨西贡部队总司令杜高其中将以及西贡军队的 2 名上校和 2 名中校。

南越。据武俊说，爱国力量正加强军事行动以遏止与分散美国—西贡军队的力量。

由于美国—西贡部队反战情绪日益严重，士兵拒绝参加军事行动，敌方的军事形势随之更趋复杂化。西贡现行制度的反对派日益加紧自己的活动。最令人瞩目的事实是阮文绍被直截了当地称为美国的走卒和入侵老挝的罪魁祸首。

对老挝的军事入侵在全世界，也包括美国本身，掀起了一个广泛的抗议浪潮，虽然，正如交谈对方所指出的，还没有达到 1970 年 5 月英国入侵柬埔寨所引起反响的程度。

武俊强调，总的来说，印度支那的形势是复杂的，美国还可能有新的挑衅活动，直到派遣陆战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登陆。但是，他指出，我们对此是有准备的，绝不会有一个入侵者会活着逃出越南民主共和国。

对武俊的通报表示感谢。指出，苏联极为重视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

武俊接着说，今年 3 月将在荷兰召开世界各国红十字协会代表会议，根据他们的材料，苏联代表团也将出席。

武俊请求给予协助，请苏联代表团在大会上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罪行，尤其是在没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

武俊指出，看来需要作好准备，我们的敌人可能提出关于美国战俘的问题。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仍打算拜访苏联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向其递交有关材料，请求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

随后，武俊提及有关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活动的问题。他指出，加拿大政府不久前曾建议恢复这个委员会的活动，再次召开有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波兰同志们拒绝了这些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是与苏联、波兰和老挝同志们的立场相一致的，认为恢复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活动是不适当的。

武俊也注意到印度政府关于在老挝协调问题上的建议。这些建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 尊重老挝中立、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必要性；

2. 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队；

3. 国际监督委员会方面协助老挝各方根据1962年日内瓦协议在老挝进行政治协调。

武俊指出，印度这些建议的第一、二点与美国政府根据不久前提出的类似建议所制定的计划完全一致。实际上，这与举世皆知的尼克松五点计划和雅加达柬埔寨问题会议的决定毫无二致。

武俊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拒绝这些建议，故而也请求苏联方面予以拒绝。

在作答复时向会谈对方指出，我们业已拒绝英国人、加拿大人以及日本人利用日内瓦协议的机制以掩盖美国在老挝进行侵略活动的企图。我们也已向印度人说明在老挝恢复国际监督委员会活动是不恰当的。

会谈结束时，武俊通报说，两位菲律宾国会议员乌里耶弗和巴尔别洛请求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允许他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友

好访问。据武俊说，这两位菲律宾人 1970 年初曾在苏联。因此，他请求在可能的情况下，向越南同志提供我们所掌握的有关这两位活动家的资料。

指出，如果我们确有某些材料，就一定提供给越南朋友们。

参加会谈的有东南亚司的参赞 A. A. 斯米尔诺夫同志，该司三秘 Ю. М. 戈里雅琴可夫同志，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译员武欢。

№01830

## 佐林与越驻法总代表团团长 武文松的会谈纪要

(1971年3月17日)

秘密

摘自 B. A. 佐林的日记

今天会见武文松作礼节性拜访。

1. 在举行的会谈中，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度评价苏联对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给予的援助与支持。

武文松指出，根据越南同志的看法，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遭到挫折，如果美国继续进行侵略，等待美国人的只有新的惨败。而尼克松放弃“实力政策”，那么政治协调的大门就会是敞开着。

在指出尼克松政府企图利用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武文松说，这些飞行员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被俘的，如果有必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对美国施加压力，让全世界都看看美国人在北越领土上所犯的罪行。

2. 武文松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与法国发展合作，不过他强调这不单取决于河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相关的是法国仍坚持戴高乐确定的立场，尽管现在法国政府的立场不十分坚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的。他表示赞成继续与苏联共同努力对法国的立场施加影响。

3.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总代表团团长说，周恩来是在印度支那冲突危险尖锐化的时刻访问河内的。越南同志向中国代表团陈述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他说，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同意这一估价。

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援助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美国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因此，中国人民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能够保住自己的独立，准备给予必要的支援，不惜作出牺牲。周恩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 1971 年补充援助。

据武文松说，越南代表团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对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并希望沿着这个方向取得更大的进步。

他接着说，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是全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苏采取共同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在国家间进展，这有助于在援越问题上苏中协同行动条件的成熟。

武文松肯定地说，中国人在河内的会谈中向越南同志指出，在对越南人民的援助方面，中国和苏联的行动并行不悖，中国表示完全愿意保证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的运输通过本国的领土。

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既符合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也符合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

武文松说，党的代表团，就他所知，将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首，即将前往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向苏共领导人全面通报印度支那的形势。

从我们方面，提请武文松注意，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不同意。强调指出，苏共中央与苏联政府将始终不渝地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全面的支持。向会谈对方表示，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准备与总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武文松称，越南劳动党的领导高度评价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上，驻巴黎大使馆给予越南同志的帮助，并希望已建立起来的合作将持续下去。

出席会谈的有大使馆公使衔参赞 В. И. 奥别列柯同志。会谈由参赞 В. А. 泽连佐夫同志翻译，由大使馆一秘 В. А. 戈里茨基同志记录。

苏联驻法国大使 В. 佐林

No 01828

## 谢尔巴科夫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会谈纪要

（1971年3月26日）

绝密

摘自谢尔巴科夫日记

应我们的请求，范文同接见了我们。

受中央委托，向总理通报了苏联专家关于保存胡志明主席遗体<sup>①</sup>所需条件的意见并递交了德波夫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信。

范文同说他已经听说此事。越南劳动党很重视德波夫所说的意见。这个问题——他接着说——无需长谈，因为所有的越南人都很关心已故主席遗体的状况。如果以后苏联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大使馆转达。

我们方面询问了总理是否见到苏联专家代表团带到河内来的胡志明陵墓设计草图。

范文同表示只见过越南的设计草图，苏联的草图他仅听说设计得很完善，甚至连内部构筑都设计好了。在知道专家小组将于2月27日返回莫斯科后，他表示同意让有关委员会审查设计草图并表明自己意见的建议。总理接着告知，陵墓拟建在河内，因此在最近时期动工建造不会有任何干扰。

---

① 胡志明于1969年9月2日9时47分病逝。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公园群众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9月2日被定为越南国庆日。为了不让胡志明逝世纪念日与越南国庆日相重，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把胡志明的逝世日公布为1969年9月3日9时47分。

在随后的会谈中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关于2月22日黄文进递交的范文同就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建造新水泥厂一事致阿·尼·柯西金的信件，通报说已将信件主要内容转达莫斯科。但又指出，苏联专家们关于修复与扩建海防水泥厂可行性的意见仅仅是初步设想，因为他们尚未提交技术—经济报告。

通报了赴海防迎接“胡志明号”海轮之行。对越南同志组织欢迎该轮及全体船员表示感谢，并强调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同时告知总理该轮的有关资料，以及该轮隶属远东航运公司，故将定期行驶越南。当然，该轮巨大的吃水量不允许其直接进入海防港内泊地，但是，与根本无法进入越南民主共和国任何港口的“河内号”油轮不同的是，“胡志明号”内燃机船可以先在锦普和鸿基部分卸载之后，驶近海防的各个码头。

强调指出以伟大的越南革命者命名的轮船现在将遍访全世界港口这一事实的意义。

范文同说，黎清毅在莫斯科期间曾与阿·尼·柯西金会晤。据黎清毅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允诺将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设计划的项目，表示同意我们关于必须掌握已有设备，将培养干部与建设国民经济项目相结合的意见。总理指出，正因为如此，越南同志希望苏联专家不仅参加建设，而且也要参与计划。

我们方面提出苏越签订的协定往往过于空泛：其中既没有确定建设的期限和设备的供应，也没有指明双方应负的责任。提议将来应使这些问题具体化，更何况越南同志现在已经有了经验。

总理同意这一建议。

参加会谈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苏联及东欧国家司副司长阮进通、该司工作人员邓德凯、大使馆译员 E. A. 巴兹迪列夫。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No 01829

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  
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  
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

（1971年5月21日）

绝密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苏共24大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极为关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党的最高机关一党代会就个别国家的问题作出特别决议，还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越南问题由苏共代表大会作出特别决议，这是第二次。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这一切表明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在苏共的国际活动中占有何等地位。对于我们，重要的是预见印度支那所有事件今后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能对这一地区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也确定了我们的政治路线，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纲领，促进印度支那的政治协调，在武装斗争中与和平劳动中，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后仍然能够得到苏联兄弟般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共二十四大有关印度支那的决议向我们指明，现在越南劳动党在自立的道路上已经强大巩固，党的路线总的来说（虽然尚为缓慢）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民主

共和国已成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已经拥有相对来说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地区确立我们的政策。并不排除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我们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何况除越南而外，在这一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什么人更可以依靠。

关于我们目前在越南具有较为有利的前景这一点，可以越南劳动党近几年在其立场中所发生的两大进展为证。第一，自1968年起，越南劳动党不无成效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第二，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这一切都是不容置疑的进步。

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能说我们将来在越南和印度支那实施我们的路线有可能会容易些。这个地区是各种最为对立的影响与倾向的焦点，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都是绝不应该的。何况越南劳动党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中还有许多尚待克服的消极方面。

\* \* \*

印度支那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军事的和政治的极度紧张状态，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力量为一方与以美国及其盟国，首先是印度支那各国的反动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范围的扩大。如果事态仍然继续朝1970年和1971年初那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越南劳动党未必能够长期顶得住那样的战争速度与规模。印度支那其他解放力量（越南南方的、老挝的以及柬埔寨的）就更加不可能承受。因此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这一点似乎已为越南同志所懂得和认清。正如黎笋同志指出的，在现阶段，他们不希望战争升级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西贡入侵老挝的军队于今年3月受挫之后，军事行动似乎消停下来，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

争却又活跃起来。

在巴黎，朋友们对停火和战俘问题作了若干说明。老挝各战斗力量之间已经恢复了联系；越南同志已经与西贡政权的某些人士建立了接触。与此同时，尼克松宣布在1971年再次撤军10万人。如果事态真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战争激化危险性就有可能减弱。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人滋生着一种黩武情绪，酝酿着在1972年给予“决定性打击”和“推翻尼克松”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重新激化。

目前，在印度支那已经形成了各解放力量斗争的统一战线，覆盖着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全部疆土。这一战线的主导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一百万人的武装力量。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才得以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尽管斗争因而大大复杂化，并给印度支那所有解放力量造成了严重困难。虽然1970~1971年的军事行动仅在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展开，但是越南同志认为主要战线是越南南方，因为在那里对峙着斗争各方的主要力量。

印度支那解放力量在顶住柬埔寨与老挝境内的军事压力以后，在1970~1971年“旱季”的结束阶段给予越南南方北部诸省、下寮和柬埔寨等范围内的敌军以显著的打击，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则改善了在战争中的地位。爱国力量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粉碎了侵略者切断“胡志明小道”的企图，从而保证了连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老挝与柬埔寨各解放区之间的交通线的相对安全。此外，不久前在下寮“越南化”的西贡军队的一支相当大的集团军被击溃，严重削弱了西贡军队甚至凭借美国的支持，与爱国武装力量对抗的能力。从越南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各个方面抵抗斗争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放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印度支那各国，相互对立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正进行着一个分化与集聚的过程，一个各种内部政治矛盾深化的过程。在越南南方，朋友们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政治斗争，将越南南方的城乡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削弱西贡政权的政治基础，达到孤立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并将其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目的，从而在西贡建立“和平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同志竭尽全力可能粉碎“越南化”与“绥靖”计划的实施，将工作深入到政府人士、社会团体、军队中去，与西贡的各种政治与宗教派别建立接触，并安排与之合作。越南同志保持着与反对派活动家杨文明将军联系，此人目前被认为是今年秋季即将进行的南越大选中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越南朋友眼下还没有就对他的态度确定官方的立场，但是，显然认为在与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斗争方面，杨文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在他一旦掌权的情况下，可以与他进行有关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越南人竭力阻止在当前执政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广泛的反共联盟（这一点美国人正在逐步得逞），并竭力以一个由各政党和各团体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与之对抗。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寄希望于与佛教徒，尤其是集聚于安广佛塔周围的佛教徒之间的合作。

越南同志日益认识到在敌人营垒中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朋友们对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对于越南南方各工会组织扩展联系的必要性，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在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对越南南方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西贡周围、湄公河三角洲等）失去控制；由于敌人实施“绥靖”行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西贡政权（在国会等）的合法反对派大多数目前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持相当保留态度更谈不上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朋友们遭遇到大量非常严重的困难。反对派只赞成在支持西贡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权的同时与阵线对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积极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活动，给予他们政治与物质的援助，保持与他们的密切合作。这一合作关系近年来在以越南劳动党、老挝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之间直接全面的互相支持为基础形成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得到了巩固。印度支那各国解放力量不断增长的团结的外部表现是，在广州举行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高级协商会议，西哈努克 1970 年 5~6 月和 1971 年 1~2 月，老挝人民代表团 1970 年 10 月以及宾努 1970 年 11 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这些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密切协同行动显示在美国—西贡下寮战役期间。

现在，河内已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国解放阵线交流意见，协同行动与合作的中心。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总的来说，承认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与越南劳动党保持一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依靠它丰富的经验和支持。然而，有时越南同志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过于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态度、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从属于越南利益的明显企图，造成了老挝和柬埔寨的朋友们暗中不满。在越南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曾发生过某些分歧，例如在对待“越南化”的问题上，南越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它的实施对于解放斗争的未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但此类负面现象迄今未对印度支那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统一行动造成严重影响。印度支那解放运动队伍中的向心倾向无疑超过离心倾向，而这一情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

越南同志维护着自己在印度支那事务中的方针，目前并不急于对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框架内的各解放力量进行组织定型的工作。他们显然对于根据党的路线与老挝朋友和柬埔寨朋友在直接合作的基础上目前所达到的相互协作的程度，对于他们在印度支那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主导地位，眼下还是满意的。

越南朋友认真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它是印度支那半岛事态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加强自己影响的意图，这一意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遭受到了挫折。在印度支那政治军事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北京领导人企图将自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独特方针强加于人。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及时认清了北京的图谋，包括利用建立所谓“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意图，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一样，在其框架中，中国利益传导者以及与越南人抗衡者的角色都落在了西哈努克的身上。印度支那的同志们事实上拒绝了北京和平壤建立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他们审慎地对待西哈努克关于召开一个类似广州协商会议的新的印支协商会议的提议，明显地回避在印度支那事务中与西哈努克实现比现在更密切的协调与保持步伐一致的必要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误，在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世界舞台上威望的下降，迫使北京不得不对自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方针作出某些修正。北京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开始有了明显的和缓和某种程度的灵活，其表现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显示性地提供了一笔1971年补充援助；公开承认越南南方和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是协调越南问题的公正基础，进而间接地“恢复”巴黎谈判，以及周恩来今年3月对河内的访问。在北京采取了诸如此类的步骤以后，中越关系似乎开始有些热乎起来。越南同志看来产生了某些幻想，以为中国人可能开始在更大程度上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但是，越南人的希望很快便由于北京领导人对美国的调情而产生动摇。越南同志把这看成可能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新的磨擦的开始，是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施压的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朋友的策略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人达成

妥协的姿态，而在对自己比较重大的事务中，首先是在协调越南及印支问题的事务中，避免对他们作出让步，捍卫自己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

越南朋友在竭尽全力从军事、政治与外交诸方面解决越南与印支问题的同时，也把实现这些任务与接受援助，首先是外援，主要又是接受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相联系。在苏越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的道路上，苏共 24 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大会对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所给予道义—政治支持受到了朋友们的高度评价。他们期望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支持将会更为加强。但是，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也极力保留解决越南与印支问题的特殊权力，阻止——至少在现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参与印度支那的协调事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越南人也就无意在与苏联交换有关越南与印支协调问题的意见与信息方面再向前迈出信任的一步，无意与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充分的协同动作，尤其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

越南劳动党领导为赢得确保在尽可能充分满足自己要求的基础上协调越南及印支问题的有利国际条件，将其对外政治活动的目标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停止印支半岛战争的斗争统一战线。越南同志为达到自己对外政治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社会主义各国的声望与支持，并竭力将世界的，尤其是已解放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同情争取到印度支那解放运动这方面来，并促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站到自己这一边。越南人明显地扩大了与国际上民主公众组织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各不同阶层中也开展着一定的工作。

越南朋友的主要要求是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南方。由于美国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反对，因此越南人就将自己的全部努力放在敦促美国人宣布彻底撤出自己军队的日程表上。美国人为确定准确的日

期提出了先决条件，即停熄在越南南方对美国军队的战火，开始与美国进行有成效的谈判以及讨论战俘问题。越南方面迄今为止提出的是在1971年6月30日以前完成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军队。现在朋友们提出了更加建设性的建议。看来，如果现在另外确定一个较晚的期限，越南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确定这样一个日期的事实本身。可以设想，朋友们也完全可能同意将美国撤军的期限定为半年甚至还更长一些。

越南同志的一个原则性要求是将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排除于政权之外，因为这个集团被认为是不适宜于与之就协调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当然，西贡政权将会有类似杨文明将军这样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导致在越南南方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承认致力于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准备与之进行有关在南方组建以三方（1/3为爱国力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1/3为现政权的各界代表，1/3为中立的政治与宗教派别的代表）为基础的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临时政府可以安排越南南方的大选，然后再把政权移交给“正式的联合政府”。越南同志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希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活动在越南南方合法化之后，随着临时联合政府的建立，能够把越南南方相当多的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大选的结果又会导致正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预期，越南北方和南方将会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建立起彼此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进入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期内，越南就不得不保持分割状态，这是对1954年关于印支问题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大选之后立即统一国家这个基本原则之一所作出的瞩目让步。

越南人对于自己同意停火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美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和军事人员的日期；另



一方面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西贡政府之间排除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就组成“临时三方联合政府”达成协议。此时，与美国军队停火和与西贡军队停火是分别进行的，因而预料可能出现越南南方的交战行动仅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与西贡部队之间进行的局面，例如，在美国人单方面停火，撤出交战行动的情况下。

越南人把讨论战俘问题与达成停火协议联系在一起，放在美国宣布全部撤出自己军队的日期之后。双方都特别看重美国战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和在越南南方被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俘虏的军事服务人员。朋友们认为美国人是犯下反越南人民罪行的人，对他们的战俘地位表示怀疑，显然要释放这些美国人将取决于对监禁于越南南方集中营和牢狱中的所有政治在押犯的大赦以及对轰炸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失的赔偿。

越南同志原则上承认在越南问题协调过程中国际监督与观察的必要性。这一点可由他们对越南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态度证明。他们希望保留这个委员会的机构，尽管其活动现在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越南人强调应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协议已不能反映目前越南出现的形势，在当前局势下，个别问题甚至可以不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办。

越南人并不排除以后再召开类似 1953~1954 年关于越南或整个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它可以保证所取得的政治协调的实施。在将来也不排除召开印支各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会议，以协调地区问题。然而目前，朋友们坚决反对任何有关协调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认为这样的会议预先就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赞成召开那些能确保支持印支各国人民斗争和谴责美国侵略的会议。

越南同志也反对让联合国参与印支问题的解决。越南问题在政治解决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可能出现在印度支那对协调老挝和柬埔寨

问题有利的局面。显然，老挝问题的解决在回到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道路将是现实可行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由苏发努冯<sup>①</sup>在今年5月致梭发那·富马<sup>②</sup>信中提出的老挝爱国阵线关于在老挝进行政治协调的两点新倡议是经受得住检验的。至于在柬埔寨的协调，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在很多特征上将是与未来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协调相似的。越南同志支持老挝爱国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老挝与柬埔寨进行协调的纲领，但是在现阶段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老挝或柬埔寨先于越南达成协调。越南同志极力强调没有越南的协调就不可能有老挝和柬埔寨的协调。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认为，随着越南问题的解决，将有可能讨论那些在他们看来目前还仅具有“理论兴趣”的问题：在东南亚组织国际关系的新体系；使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中立化；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建立无核区等等。对于我们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同志也持相似的立场，据可能的判断，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对当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要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要历经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和谈判。迄今为止，各方都拒绝一切由对方提出的政治协调倡议；由于各自立场的重大差异，双方眼下都无意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而惟有在具体步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

\* \* \*

以下陈述几点导向性以及实践性的意见：

- 
- ① 苏发努冯（1909～ ），老挝王国副国王汶孔亲王的幼子，早年留学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加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1956年1月6日，老挝爱国战线党成立，被选为该党主席，在联合政府中曾任公共工程和计划大臣及副首相兼国民经济和计划大臣等职。70年代，当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
- ② 梭发那·富马，苏发努冯的同父异母哥哥，曾任老挝王国首相。

1. 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国内对我们不友好的势力也活跃起来，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也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苏联党政代表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应当成为本年这一趋向的重大事件。

2. 近些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独立自主的倾向、探寻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越南具体实践更正确结合起来的倾向日益增强。例如，在文化领域正进行着独特的越南化过程，亦即是清除那些贬低越南文化民族尊严和独特风格的毫无用处的中国和法国积淀。越南劳动党日益坚决贯彻执行加强独立自主的方针。对这种意向我们看来必须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当然，个别情况也存在着发展成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但对此可以进行斗争。

在这方面对于越南同志来说最为敏感的当数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明说，越南劳动党作为印支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解决涉及这些国家的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既应独立自主，同时又应与老挝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密切结盟。

对于越南劳动党来说，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肯定，越南劳动党依靠苏联顶住了中国领导人的粗暴压力。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让步，表面上同意越南劳动党关于在越南协调的纲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当然，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放弃改变越南劳动党的方针，使之朝着合乎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企图。从去年春季起，他们变化策略，开始向越南人送秋波。即使这样，中国人眼下也还是没有捞到预期的效果。不久前，毛派分子又给越南同志上了新的一课，毫不顾及他们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人亲近的步骤。越南人不便公开反对中国人的这

些步骤，但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用同样的形式也可以对他们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3. 认真考虑一些新措施以提高和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这应当说是合乎时宜的。例如，在东南亚的宣传问题方面可以提供我们的援助；安排在外交部的层次上更加系统地交流关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形势的信息，而在党的层次上则可以交换有关东南亚各共产党内部状况的意见。交换意见与信息的结果便可能产生越南劳动党有能力付诸实施的建议。

最近一年，越南同志以谨慎的形式重新提起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纲领中有关建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论点。这个问题是极其微妙的，但未尝不可将他利用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

4. 在整个战争期间，越南同志都在致力于实现建立支援越南人民、而现在已包括支援整个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世界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而苏联为此比任何其他人，其中包括越南人自己，做得都多。目前的任务是扩大这个团结的战线。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不少事情。例如，越南劳动党应该摒弃在筹备世界反帝大会这件事情上的旁观者立场。这方面还应对越南劳动党另外再做一些工作。

5. 至于进一步帮助越南劳动党消除模糊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是错误观点的问题，则应当更积极地吸引其他兄弟党来做这一工作，更密切地协调我们的行动。目前，华沙条约各国已协调了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共同立场，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注意到仍存在着不同点。越南人虽然谨慎行事，但确已开始利用社会主义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事情的这种发展是极为不幸的。

6. 在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的其他形式领域内，大使馆都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谈一谈某些个别的意见。

我们的经济援助已经成为加强苏联在越南地位的巨大杠杆之一。很快我们就将面临由短期（每年）援助朝着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的任务。我们已经积累了在越南进行经济活动的经验，制定出了合作的形式与方法。只是希望我们参与援越的经济组织更好地了解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不要让经济与技术的援助脱离政治路线。我们已经用解决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这一问题的实际行动充实了苏共 24 大的决议，这是很有裨益的事情。

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对我们来说合乎时宜的事情显然就是继续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武装力量建设。对这一问题正在准备国防部层面上的个别建议。

7. 根据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给印度支那人民以自由与和平”的号召，就更加要求加强我们对印度支那军事政治事件进程的影响，对以政治手段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影响。必须努力使越南同志充分懂得现在应该设法阻止战争的激烈化与扩大化，政治协调已经是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手段。下面（在其他各点中）将展开这一基本论题。在这方面，苏联党政代表团即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有许多事情可做。

8. 如上所述，越南同志已着手蓄积力量，准备在 1972 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难道就不会适得其反吗？我们认为恰当的办法是委托驻美国大使馆、近邻和远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时候发表我们的意见。越南人冒的风险太多、太大了。

9. 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向越南同志阐明，在反击美国侵略的

同时，必须将事态引向协调，始终将外交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制定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新的倡议和途径的过程中，似可与越南人讨论将美国撤军问题与建立越南南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区分开来的合理性。一系列迹象表明加以区分是明智的。这样的划分以及制定各个别纲领所提出的每项任务的实现途径，似有助于推进以和平手段进行协调。

10. 应该说服越南同志，一切斗争形式的中心应是美国撤军问题，与以临时联合政府更换西贡政权的任务似可分开解决，根据可能甚至无需美国人参与，而作为越南内部问题处理。既然在西贡政权的领导人物中间出现分裂，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倾向于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那么以越南自己各方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为基础，就协调的某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就一定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同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秘密会晤也不无裨益，这是美国人的建议。在这类会晤中，可以讨论诸如停火、战俘、美国撤军之类的问题。

11. 考虑到（今年10月）南越总统大选，需要劝说朋友们提出和平、消除美国霸权以及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新纲领。这会有助于在大选中动摇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的地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7年的纲领已被遗忘，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过时，而众所周知的十点纲领又尚待进一步确切说明。

12. 越南同志似乎开始明白，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抛弃了停火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们稍为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可以劝告同志们自己拿起停火的主张以用于武装并且更加明确地对这一主张发表意见，此时可动员起新的力量以支援协调。

13. 当初越南同志说，他们在一定阶段愿就从越南南方撤军的问题达成对等的协议。这个问题是协调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可能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以某些方式让美国人了解这一点，从而促成

美国撤军。

14. 似也应考虑一下就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新步骤。例如，在对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破坏获得相应赔偿的条件下，为换取在西贡的政治在押犯，可允诺摘除俘虏的罪犯标签，将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用在他们身上，并保证在达成协调时释放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15. 近几年来，越南同志已不再反对利用联合国讲台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似可以就为印支各国人民斗争的利益，扩大利用联合国的问题交换意见（向本届联合国大会提交集体控诉和谴责美国的决议案）。

16. 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采取措施扩大与老挝人民党和爱国阵线以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接触。这些党接近越南劳动党并形成东南亚的兄弟党群体，在很多问题上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相一致。

应建议越南同志鼓励柬埔寨朋友过渡到不仅利用武装斗争的策略，而且也利用其他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形式的策略。

17. 显然还需要与越南人就现在如何对待召开类似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新国际会议的意见交换看法。在我们看来，在当前条件下，对召开新日内瓦会议的意见也不宜断然拒绝，在将来，那样的会议可能会有好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在一定阶段肯定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达成政治协调，就必然要求国际保证，而这一点只有一个有关国家参与的会议才能办到。

18. 就印度支那各种问题在高层与越南同志进行详尽商谈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此，在这种例行会晤中，妥当的做法是，协商一致，责成双方外交部进行会晤并讨论整个范围内的问题，交换信息与意见。此时，正如早先多次强调的，越南同志应自己作出决定，

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行动。

19. 在与越南同志的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在印度支那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的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再一次得到苏共二十四大令人信服的确认；后者则由近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意欲接近美国的明显迹象所证明。但是，当然，始终应当考虑到越南人的微妙处境。在这方面有两条措施值得注意，必须一贯实行：有针对性地向越南人通报苏中关系的状况；请越南劳动党继续起到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No 01826

## 谢尔巴科夫与越副外长 阮基石的会谈纪要

（1971年7月1日）

秘密

摘自谢尔巴科夫日记

与阮基石的会见是应他的邀请在政府接待大楼进行的。

阮基石通报说，黎德寿和春水同志于6月26日在巴黎与基辛格进行了私人会晤。会晤表明，美国仍然指望通过战争解决越南问题，而拒绝政治协调。美国将从越南撤出军队的问题与保全西贡现政府的政权联系在一起，因而要求北越军队同时从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撤出。越南方面谴责尼克松政府的顽固态度，要求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和属于美国阵营的其他外国的军队，并停止支持阮文绍好战集团。越南方面声明，释放全部战俘应与美国及其阵营的其他外国军队从越南南方撤军同时进行。

阮基石指出，世界形势正朝着有利于越南的方向发展。所有的国家都在开展支持越南的运动。美国舆论要求政府在确定的期限内撤出美国军队。

此外，来到巴黎的美国社会人士各代表团请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更加明确地阐述在美国战俘问题上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

认为有必要提出有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以使尼克松政府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阮基石指出，南越人民的斗争进展顺利，南越的政治危机更形尖锐。有鉴于此，越南同志决定采取新的外交攻势。在黎德寿和春水征得河内的意见后，决定在巴黎提出新建议。

阮基石向我们递交了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7月1日发表的7点声明的全文，并作了若干说明。

副部长指出了越南同志立场中的新因素：

1. 新建议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1) 确定美国1971年撤军的时间表；2) 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集团。在新的声明中只字未提阮高其和陈善谦，目的在于孤立阮文绍；

2. 美国军队的撤出与战俘的释放应于同一天开始并且同时结束；

3. 越南方面认为南越即将开始的选举完全是骗人的把戏，美国企图借此保住阮文绍政权，越南同志提出建立民族和谐的代议制政府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过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4. 越南同志提出关于禁止对曾与这一方或那一方合作过的人士采取恐怖手段和歧视的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使敌人再也没有借口断言爱国力量在停火后将居民采取恐怖手段；

5. 越南同志又提出关于尊重将来签署的各项协议中所包含的国际保证的问题。

阮基石接着指出，尽管无论在世界舞台上，还是在国内，尼克松政府屡遭挫败，但仍然顽固推行“越南化”政策，这实质上是拖延战争，继续由美国人占领越南南方。但是，美国侵略者的一切阴谋诡计都必将被粉碎。越南爱国者决心遵守胡志明的遗训，与老挝和柬埔寨人民并肩战斗，直至取得完全胜利。

阮基石表示希望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能一如既往对越南同志的新倡议给予支持，以迫使美国从越南南方撤走自己的军队。

从我们方面，指出越南同志提出了政治和外交攻势的宏大纲领。新倡议正是在尼克松政府在国内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提出来的。不久前，美国参议院——以确定国家政策为己任的政府机构，通过支持 10 个月内撤出美国军队的决议。同时又指出，不能过高估计美国国内反战力量的这一成绩。众所周知，美国众议院已否决了参议院的决议。

指出，越南同志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最重要的问题——在确定的期限内撤出美国军队。将限期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与释放战俘的问题较紧密地联系起来在策略上是明智的。此外，据我们的意见，美国人未必会同意仅以释放战俘为交换，确定这样一个时间表。美国的企图是使撤出自己军队的问题服从最根本的任务——保住现行制度的政权。

说明，只有在撤出美国军队之后，才有解决南越内部事务的实际可能。越南同志要求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完全是正当的。根据在西贡的国际监督委员会波兰代表团团长特沃洛卡同志的通报，越南南方大部分居民支持停止战争，认为阮文绍政权是短命的，只有全民族一切力量的团结才是一个稳定的政权的保证。因此，阮文绍的惟一依靠就只有美国军队和傀儡军队。

表示坚信，越南同志的新倡议一定能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并保证，新建议一定会得到苏联的充分支持。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以支持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正义斗争的明确纲领武装了我们。苏联对越南人民不仅给予道义—政治上的支持，而且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提及已经告知总理范文同同志关于 1971 年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补充援助。

表达了与国防部长武元甲会晤的愿望，以便根据越南方面在与

今年4月以达加耶夫同志为首的苏联访越军事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问题，向他作一通报。

阮基石表示将把我们的请求向武元甲转达。

向阮基石通报了苏联人民沉重的哀痛——三位苏联宇航员不幸牺牲。指出，这是完成得十分顺利的科研计划的最后一个悲剧。请求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有关组织转达我们的谢意，感谢在《人民报》上登载纪念宇航英雄的资料。

副部长对这一出乎意料的重大损失表示衷心哀悼。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见习И. А. 诺维可夫。会谈翻译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工作人员邓德凯。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 谢尔巴科夫

№01825

苏外交部东南亚司副司长  
库兹涅佐夫与越驻苏大使馆  
参赞武俊的会谈纪要

（1971年7月9日）

秘密

会见是应武俊要求进行的。

受河内的委托，武俊通报如下：

1. 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黎清毅同志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捷共十四大。代表团成员有：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阮文镜（越南民主共和国前驻苏大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布拉格大使。代表团随行人员7人。

代表团将于5月22日由河内乘越南专机（机组人员8人）抵达北京，作两小时停留。

代表团将于当日飞抵伊尔库茨克，在该市过一夜后于5月23日经莫斯科飞往布拉格。代表团预计将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

越南同志请求准予专机伊尔—18过境飞行，同时从伊尔库茨克到布拉格指派一名苏联领航员并在伊尔库茨克提供机上食品（直到布拉格）。

捷共十四大工作结束后，黎清毅同志希望能在莫斯科逗留数日

并会见弗·尼·诺维科夫<sup>①</sup>同志。如果弗·尼·诺维科夫同志愿意，会谈可以涉及1972年苏越经济合作的有关问题。

黎清毅同志可望于5月31日或6月1日抵达莫斯科。从我们方面，表示将向领导报告越南同志的请求。

2. 根据所得到的消息，武俊注意到今年5月24日将于日内瓦召开国际法专家会议，以制定日内瓦战俘公约补充条款。此外，5月24日在日内瓦，国际红十字组织还将召开以“人道主义与人权”为主题的会议。越南同志们担心美国代表团可能利用这些会议的讲台，以臭名远扬的所谓在越南领土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问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污蔑。因此，越南同志请求苏联代表竭力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在战俘问题上的立场，如果美国代表发表污蔑性的声明，坚决予以反击。

指出，我对将于日内瓦举行的上述会议尚不知晓，但确信，苏联代表毫无疑问，一定会像在所有大小国际会议上一样，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 武俊对近东形势，尤其是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形势发展，表示极大兴趣。他建议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

说明这或许得要在下次再谈。

参加会谈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女译员和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三秘B. 什维多夫。

库兹涅佐夫

<sup>①</sup> 诺维科夫，弗·尼·（1907～ ），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01827

## 苏驻法大使佐林与出席巴黎越南问题会议 的越代表团团长春水会谈纪要

（1971年7月15日）

摘自 B. A. 佐林的日记

秘密。文件编号 №1

1971年7月22日

发文编号 №732

应邀拜访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驻地，并与春水同志举行了会谈。

春水同志向我通报说，今年7月12日黎德寿和春水同志根据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的请求与他进行了秘密会晤。

1. 会谈伊始，基辛格就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提出临时革命政府7点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宣传？为了给尼克松政府制造麻烦？或是为了严肃的谈判？为什么这7点不是在秘密会晤时提出，而是在全体会议上提出？这个美国人已经得到了答复，正如春水在第120次会议上所作的声明，进行宣传的是美国代表，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则对谈判表现了严肃对待的态度，他们提出的具体建议就是一个明证。由于美国不想与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进行秘密谈判，阮氏萍当然就只有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了新的建议。

2. 就临时革命政府新建议的实质，基辛格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声明了如下几点：

——尼克松政府只有在就全部问题，包括解决何时以何种方式从越南南方、老挝以及柬埔寨撤出北越军队、是否在印度支那还是仅在越南停战等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才确定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南方的最后期限。

——尼克松政府无意干涉南越内部事务。

——尼克松政府原则上同意第一点中指出撤军与释放战俘及非军事人员同一天开始与同一天结束的那一部分。

——第4点（关于重新和平统一越南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之间的关系）和第5点（关于越南和平中立对外政策）可以作为讨论与达成协议的基础。

基辛格请求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此次会晤严守秘密并宣称，如果必要，他将再次要求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的代表会晤。

3. 黎德寿和春水向基辛格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提出新的建议充分表明了自己善良的愿望与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严肃意愿。如果尼克松政府对这些建议不作出认真的答复并仍然坚持过去的政策，越南人民就不得不继续斗争，直到最后胜利。同时强调，美国必须确定撤出其军队的最后期限并且撤换阮文绍军事集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达成和平调解。

越南代表对基辛格南越之行的印象感到兴趣，但他回避谈及这一话题。

黎德寿和春水同志就美国人最近以来加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非军事化区以北某些地区的轰炸，向基辛格表示抗议。对此，基辛格答复说，他在西贡逗留期间，美国军事指挥部向他报告了关于北越军队在这一地区大量集结的情况，而他曾指示减小轰炸规模；若不是他的介入，轰炸的强度还要大得多。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负责人强烈谴责美国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以及美国加强在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的军事行动，并



且声明，美国应对加强军事活动承担全部责任。基辛格对越南代表的这一声明未作任何反应。

基辛格对于越南代表提出的关于他是否准备与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进行秘密会晤的问题，未作答复。

黎德寿和春水同志注意到尼克松政府围绕基辛格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进行秘密会晤这一问题的种种卑鄙手腕。其中，他们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基辛格访问越南南方期间，在华盛顿就散布着关于基辛格打算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负责人会晤的传闻，而在美国的报刊上则出现了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似乎在今年7月1日前的秘密会晤中已经递交给美国方面的报道。

基辛格试图为自己辩白，并且保证说，这不是他从事政治活动的风格，他将在返回美国后查清这些报道的来源。

4. 根据春水同志的评价，与基辛格的会晤表明，尼克松企图拖延对临时革命政府7点的答复，并极力贬低其意义。

基辛格就临时革命政府的新建议所发表的言论仅涉及对美国有利的那几点，而对最主要的两点（关于撤出美国军队与撤换阮文绍）他却回避正面作答。显然，尼克松正在准备提出反建议，或许会提出点什么，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最后期限与撤换阮文绍）绝不会表明其立场，因为他对阮文绍在大选中获胜抱有希望。尼克松政府现正受到来自舆论的强大压力，它试图软化这种压力。美国在越南南方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在这一复杂形势下，必须加强政治斗争，以迫使尼克松确定撤出美国军队的最后期限。

5. 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以个人观点指出，临时革命政府的7点提得及时，并迫使尼克松政府处于困难境地。尼克松被迫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为数众多的美国人对临时革命政府关于撤军与释放战俘同时进行的意见持肯定态度。他不得不寻找一条摆脱所造成状况的出路，并且开始在7点的基础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

代表团开展对话。陈述说，在有关越南同志与基辛格会晤情况通报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即尼克松希望把撤出美军与释放战俘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行动与撤出北越军队联系起来。当然，绝不允许美国人把这个问题转移到讨论北越军队的命运方面去。在宣传方面必须继续坚持过去的路线（根据临时革命政府建议第一点的精神）。

同时也陈述了关于谈判策略与程序的一些意见。

接着又指出，在我看来，争取法国以增加对美国的压力是适宜的，并且可能值得向法国人建议，让他们直接向美国人声明临时革命政府的建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协调机会，应当加以利用。

春水对所陈述的意见表示感谢和赞同，并且强调，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很重视苏联同志们的意见，希望将来能就各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

他也希望在与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会谈中利用一切可能反复强调7点是达成协调的认真而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应强调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必须同时解决。

6. 在回答一些相关问题时，春水同志说他不知道西方报纸登载的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莱姆关于周恩来似乎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再次召开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说法是否属实。

至于法国1970年4月1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扩大会议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按春水的说法，并没有任何改变。他认为，首先需要结束越南问题的巴黎谈判。

7. 春水同志通报说，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弗洛曼—梅里斯曾将自己于今年6月28~30日在华盛顿进行的政治咨询通报黎德寿同志。弗洛曼—梅里斯通报的内容与他在今年7月6日会谈中对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B. И. 奥别姆柯同志的陈述完全一致。

8. 春水同志指出，7月15日举行的越南问题第121次会议是一次例会。

西贡代表坚持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就从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撤出北越军队，在印度支那停火，释放战俘，解决越南南方的内部政治问题以及谈判形式等问题并明确说明自己的立场。他强调西贡同意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就内部政治问题、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越南北方和南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美国代表勃留斯仅仅宣读了自己的发言稿，表面装作答复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前一次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而实际上只是重复了美国原先的立场。与此同时，他对7点建议提出了一连串阐释性问题，这些问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看来纯粹是企图拖延时间，回避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新建议作出正面答复，蒙骗公众舆论。

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团长阮氏萍再一次陈述了7点的主要论点，并要求勃留斯对新建议作出具体的答复。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指出，尼克松继续推行“越南化”政策是谈判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春水同志通报说，在长期缺席之后，美国代表团副团长哈比卜出席了上次会议，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他将参加谈判多长时间，他是否会取代勃留斯。因此，春水请求通过我们的渠道弄清代表团团长勃留斯面临被取代的原因以及什么情况使得哈比卜又重返巴黎谈判。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获得的消息，勃留斯在回答记者时声明，他并未提出从代表团团长的岗位上辞职的申请。

与春水同志议定继续保持接触，就在越南进行协调的各种问题交换信息和意见。

参加会谈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阮明伟同志。会谈翻译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黎文来，记录为大使馆一秘 B. A. 戈里茨基。

苏联驻法国大使 B. 佐林

No01835

## 伊万舒津就越南形势给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1972年11月27日）

绝密

我现在报告如下：

收到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副参谋长陈文广中将 1972 年 9 月 15 日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译文。

报告中说明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是为了确定西贡当局和军队的代表进行合作并吸引到爱国主义者方面的可能性。为此目的，与文职的和军方的机关许多领导和活动家建立了联系，举行了会晤，其中有吴庭柱将军（第二战区的司令员），阮康和宋文明将军（原为西贡行政当局的领导人），黄孙兰（原先的第一军区司令员）以及其他一些人。

据报告人说，在这些会晤过程中很多将军发言反对阮文绍统治及美国所奉行的“越南化”政策，承认爱国主义力量取得了很大成绩，并同意参加未来的越南南方联合政府。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深信，这些人虽有反对共产党的观点，但他们在推翻阮文绍专制制度及在成立联合政府的事情上给予大力帮助。

陈文广阐述了在越南南方规划实行的“巴·别”计划的内容。规定这项计划要解决一系列的任务，其中的一项任务为要从肉体上消灭西贡行政当局反动成性的领导人，因为他们坚决反对越南民主

共和国所实行的方针。

“巴·别”计划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与安全部共同制定，两部负责对该计划的领导和执行。

可以看出，执行“巴·别”计划的准备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到今年9月中旬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派往越南南方的共计406人，他们经过特种训练并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这些人负有执行“巴·别”行动计划的使命。拟于9月底完成向越南南方转派受过专门训练的执行人员的工作。

报告中指出，预计在今年10月实施“巴·别”行动计划。可以认为，该项计划顺利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作战行动计划的实施，可使越南南方爱国主义者的活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并对巴黎谈判的进行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陈文广详细地阐明了关于美国战俘问题。在作战行动中被俘的美国人的总数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为1205人，其中在越南北方被俘的为671人，在越南南方被俘的为426人，在老挝被俘的43人，在柬埔寨被俘的65人。

战俘中有767名飞行员，其中3人受过宇宙飞行的训练；有15人都经过4000小时以上的飞行。

全部美国战俘分别关押在11所监狱里，根据他们不同情况，视军衔而定，进行分类关押，俘虏中有16名上校，104名中校，235名少校，其余的人军衔级别较低。

可以看出，在对战俘审讯的过程中，越南人民军司令部对美国的武装力量、战斗技术装备和各种类型的武器，其中包括化学武器，能够获得重要的情报，从而能制定出对付敌人的方法。

报告人说，美国政府不知道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战俘的准确数字，因为人民军司令部严格保密，目前正式公布的战俘名单仅为368人。

报告中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认为，释放美国战俘问题是解决越南全部问题的一部分，只有在政治问题及军事问题解决以后，这一问题才能解决。

普·伊万舒津（签字）

№313/001286

1972年11月27日

No01844

## 关于在越南美国战俘问题的报告

(1972年12月1日)

文件摘要 No38995

截至今日为止，美国在印度支那，也就是在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及柬埔寨战场上被俘战俘的总数为1205人。其中在越南北方被俘671人，在越南南方被俘143名飞行员。这样，在越南北方和南方领土上被俘的飞行员及破坏人员（在舰船上搞破坏活动的美国顾问、潜水员）的总数为814人。此外，我们俘获了美国在印度支那其他范畴的军事人员391人，其中在越南南方283人，在柬埔寨65人，在老挝43人。814加391共计1205人。

这里还有一些关于1205名战俘的资料。

在越南北方俘获624名美国飞行员，其中上校7名，中校85名，少校183名，也就是说，被俘的美国空军和海军高级军官的总数为275人。624名美国飞行员中有受过将来要进行宇宙飞行的训练有素的三名宇航员，例如，在河内近郊被俘的杰姆·卡特洛。其中还有每人都飞行4000小时以上美国空军的杰出的飞行员15名，其中有诺尔曼·克拉尔维斯多、卡尔麦特·杰姆、印基斯特·沙什特以及其他一些人。这些就是在越南北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的具体的资料。

另47名在越南北方被俘的俘虏中，破坏队的36名顾问被派到与老挝接壤的越南北方边境地区，部分破坏分子从直升飞机和侦察



舰艇上对我们的运输干线进行侦察，还有从被我们击坏的舰艇上掉进海里被我们捞起的一些海员。这样 624 和 47 加起来总数就是 671。

在越南南方从美国的飞行员中我们抓获了 143 人，主要是直升飞机驾驶员，一部分是喷气式飞机驾驶员。

在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抓获的 391 名美国军事人员中有 9 名上校，19 名中校和 52 名少校。其余是大尉及以下的，还有一些是美国士兵。

这样，总结这 1205 人中目前关押在越南北方监狱的包括：

- 在越南北方被俘的飞行员 624 人；
- 在越南南方被俘的飞行员 143 人；
- 在越南北方被抓获的破坏分子和其他美国军事人员 47 人；
- 其他范畴被抓获的美国军事人员 391 人，其中在越南南方被抓获的 283 人，在柬埔寨 65 人，在老挝 43 人。

现在他们全部被关在越南北方的监狱里。现在我们关押美国战俘的监狱有 11 所，以前只有 4 所大监狱，但自从美国人在河内企图营救他们的战俘以后，我们把监狱增加到 11 所。其中每所监狱关押美国战俘大约 100 名。

在越南北方被捕的 7 名空军上校及在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被捕的部队各兵种的 9 名上校（共 16 名军官），我们把他们关在一起并做他们的工作，以便了解清楚在美国军队中出现的情况，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和情报来决定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我们也把 104 名美国中校关在一个地方，以便获得关于部队部署的资料，机密情报和有关美国国防部的情报。

235 名美少校集中关押在两处。

这样，我们对美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分配了专门的监狱：一所分给上校，一所分给中校和两所分给少校。我们把大尉军衔及其以

下的战俘安置在其他监狱里。

现在讲几句关于美国战俘的政治观点和心境的情况。

368名战俘是倾向于进步的，他们懂得从他们方面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谴责美国政府并表示坚决反对这场战争。我们能够释放这批368名战俘的首要条件是，在全世界进步人民，其中也包括美国人民，斗争的结果下，出现了良好的国际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尼克松不得不作出政治解决的决定。对这类战俘我们在进行工作，一方面向他们说明尼克松政府所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本质，以及一方面使他们懂得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损失的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可以确信，在政治观点方面这批战俘是有进步思想的。

战俘中有372人持有中立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观念不完全进步，但也不很反动。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对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还不十分明确。其他的人持有反动观点。虽然对他们进行了工作，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但他们仍不改变其反动观点。

结果形成了以下情况：

- 持有进步观点的368名战俘有可能首批获释；
- 372名战俘持有中立立场；
- 465名战俘抱定反动立场。

高级军官中的全体战俘都持反动观点，也就是说，他们不谴责尼克松政府，不反对其所执行的政策并对我们的方针进行歪曲。我们明白，这些军官都是富有家庭出身，他们的反动观点正好由此作了解释。

我们也很明白，关于美国战俘问题在解决越南南方问题中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继续对美国战俘进行宣传和教育工作，从而使他们懂得美国在越南所进行的这场侵略战争的实质，懂得尼克松的毫

无意义的顽固立场的实质，这种顽固性只能拖延战俘的释放和返回祖国的期限。最近我们将要释放一些战俘，目的是要对尼克松政府施加压力，看看尼克松的反映及美国舆论界的反映，以及达到表现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善良心愿的目的。

因此，在印度支那战场上（越南北方、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被抓获的现在关押在越南北方监狱的 1205 名战俘是美国军队的重要的力量，美国飞行员是其主要部分。

在约翰逊和尼克松时期大量的美国飞行员当了俘虏给美国空军带来巨大损失。这件事应该迫使美国政府和尼克松本人去深思。众所周知，关于美国战俘问题我们打算用以下方式解决：

1. 美国政府应该作出让步，也就是说实行停火，并赶走阮文绍，那时双方再开始讨论将战俘遣返给尼克松政府的问题。

2. 在美国方面将要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们能从倾向于进步思想的人中释放一些飞行员。尼克松不应阻碍这些飞行员返回祖国，也不应对他们采取任何有影响的惩戒措施。

3. 尼克松应当赔偿越南北方被这场破坏性很大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损失。

这就是我们能作为基础的解决美国战俘问题的一些原则。但是尼克松在解决越南问题中依然持顽固立场，拖延和解决美国战俘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向政治局汇报了关于美国战俘问题的具体数字和基本观点。但我们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不正确地对待这个问题。顾及着越南问题的军事上和政治上观点的调整，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假如我们走上向美国人妥协的道路，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损失。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依然不变的原因。在军事的和政治的观点得到调整的基础上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供养 1205 名战俘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但主要的是另一方面，

1205名战俘，尤其对美国空军来说是个巨大损失，同时我们能够收集到美国武器的资料以及非常有价值的美国军队的科学资料，例如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装备的资料，飞机战略战术技术特点的说明，空军的工作细则，以及美国军队其他各种类型武器装备的资料。我们能够识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意图和其他与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的问题。

因此我们深信，我们在关于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仍然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顺利地解决关于战俘问题，那末其他问题不会影响我们对美国政策的态度。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集中力量顺利地来解决这个问题，集中力量对在越南北方领土上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对在这场战争中被抓获的美国科学家、尤其是空军专家以及其他技术领域的学者审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他们的损失——对美国军队来说是巨大的，因为在其他任何的战争中都没有像在这场侵略战争中被抓获过那样多的美国人。

1205名关在越南北方监狱的美国战俘——这是个很大的数字。我们暂时仅正式公布了368名战俘的名单，其余的人没有公布。美国政府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但不知道战俘的准确数字，根据其损失只能大体上推测这个数字。因此按照政治局的指示我们对战俘数量保密。

我们继续对审讯战俘的资料进行收集与研究，其目的是在某种条件下有根据来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中和其他问题上的阴谋。在研究美国科学发明的事业中，在抵抗现代化武器类型，其中包括化学武器制定的办法中，收集与研究这些资料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这些武器在这场战争中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

我已向政治局汇报了关于美国战俘问题的基本点：即关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列举了在越南北方、越南南方、柬埔寨和老挝被抓获的美国战俘的具体数字。

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他们这样想：我们为什么把这些战俘留在我们这里而不采用尼克松的建议？我们是否想全面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指出，这种观点是大错特错的。这不是一场政治交易，而是顺利解决越南问题的重要条件和重要理由。

因此与美国战俘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对揭露尼克松在越南，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阴谋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并要指责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部分错误观点。我们坚决地遵循我们的立场——当美国政府在印度支那所有三个战场上将解决政治的和军事的问题时，我们就释放全部的美国战俘。

敬爱的同志们！

在政治局会议上我汇报了以下问题：

我们党在越南南方从3月30日到目前为止发动总攻的方针，在进攻中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和在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进攻的总结，进攻过程中所出现的优缺点，敌人最近的计划和我们的行动，对在战略和战术指导中所犯错误的分析，我们与越南南方政治活动家的接触……<sup>①</sup>

---

<sup>①</sup> 该档案以下缺页，故无法得知报告起草人的姓名。

## 【专题说明】

# 苏共与法共关于 人权问题的争论

(1977年2~4月)

60、70年代，西欧各国共产党形成了与苏共相抗衡的“欧洲共产主义”。关于欧洲共产主义，并无明确的界定，大致上是反对苏联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反对暴力、独裁的苏维埃专政形式，反对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主张多党制、尊重人权、保障自由的共产主义。法国共产党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苏共与法共发生在70年代的争论，是苏共与欧洲共产主义的争论。

(本专题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徐锦栋翻译)

№04086

## 苏共中央国际部关于《致法共中央 非公开信》的请示报告

(1977年2月16日)

绝密

苏共中央：

最近，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根据其二十二<sup>①</sup>大方针进行活动的消极面增大。在代表大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某些批评现在开始具有系统的和公开不友好的性质。例如，1976年10月到12月，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反苏分子在“互助会大厅”举行的群众大会<sup>②</sup>；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卡纳帕参加了法国电视台的反苏节目<sup>③</sup>；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就布科夫斯基被驱

① 法共二十二大于1976年2月召开。

② 指1976年10月21日法国数学家委员会组织的声援其他国家，包括苏联的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群众集会。《人道报》发表了公开信。法共代表皮埃尔·汝干发表了演说。10月23日塔斯社播发了苏共的抗议。

③ 法国电视台播放根据阿尔图尔·伦敦的长篇小说拍摄的电影中有关“1952年布拉格审判”的片断，卡纳帕在电视节目中露面，并发表讲话说，这部书是关于所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应了解的事件。“布拉格审判”指1952年“反国家阴谋罪”审讯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的审判案。斯兰斯基被处以死刑，1968年平反。

逐出境和释放科尔巴兰问题发表了反苏性质的声明<sup>①</sup>；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和《人道报》就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对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实际上把这些国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1977年初，马歇和卡纳帕从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某些方面进行批评转入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机制。

在主管部门，而在许多情况下是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赞同下出现了一些试图从理论上巩固这一路线和使党的积极分子和劳动群众相信这一路线的正确性的书籍。属于这类著作的有让·埃勒施泰因写的几本反苏图书，以及卡纳帕为美国《外交》杂志写的一篇文章。

如同现在所看到的那样，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攻击与内政战略的改变紧密相连。完全通过议会斗争道路争取社会主义、之后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保留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私有制（垄断性的所有制除外）这一方针与为了追求选票而对机会主义者作出的其他让步一样，都表明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

① 布科夫斯基，弗·康·（1942～ ），苏联作家、政论家。作为持不同政见者，1963～1971年的8年中曾4次被拘捕。1976年移居英国。科尔巴兰，路·（1916～ ），智利共产党党员，1958年出任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70年9月，智利人民团结阵线在大选中获胜，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任总统，组成新政府。阿连德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宣布要通过民主、多党制和自由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苏联认为智利是拉丁美洲国家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典型，通过智利共产党及各种方式予以大力支持。1973年9月11日，智利武装部队三军司令和警察首脑发动军事政变，阿连德总统殉难，人民团结阵线政府被推翻。苏联寄予厚望的通过议会过渡到社会主义也成泡影。智利共产党遭取缔，科尔巴兰一度入狱。法共认为，智利共产党及阿连德政府的遭遇是苏联的政策失当造成的。马歇说，苏联以布科夫斯基交换科尔巴兰出狱的做法是不应该的，同法西斯制度进行如此公开交易是“可怜的”。



在内政方面，这一路线并没有给法国共产党带来多大的好处。相反，在原则上对社会党人的让步和背离阶级立场使法国共产党在左派力量联盟范围内的地位遭到削弱。在1976年进行的部分选举中，共产党照例失去选票，而社会党的地位却得到了巩固。事态这样发展引起了法国共产党人的不安，法国共产党政策的改变遇到了相当部分的法国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抵制，党内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根据现有的材料，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中间对此也有不少分歧意见。但是，马歇及其亲信对任何不同意其路线的言论进行压制。

与此同时，法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下领导劳动者为捍卫自己的要求所进行的积极行动，为建立反垄断力量联盟和巩固党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工作。法国共产党继续为巩固和平和缓和，为裁军和巩固法苏友谊而努力，并表示打算在法国以适当方式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

尽管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奉行的方针实际上导致党员，尤其是青年人对苏联持先入为主的不友好的态度，但是大部分法国共产党员依然强烈希望加强同我国党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最近几个月访问法国的苏联共产党几个代表团仍然受到当地法国共产党员的热情的同志般的接待。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给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寄去一封非公开信。

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草稿。<sup>①</sup>

Б. 波诺马廖夫

<sup>①</sup> 参见本卷№04087文件。

№04087

## 苏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给法共中央 一封信》的决定

(1977年2月22日)

绝密

1. 原则上同意给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信的内容。委托 Б. И. 波诺马廖夫同志根据书记处会议上交换的意见对信件草稿进一步修改，之后送政治局审批。
2. 关于发信的时间问题以后再议。

№04088

**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苏共中央  
致法共领导人信及发信时间的决定**

(1977年3月15日)

绝密

1. 批准苏共中央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一信的内容（附后）。
2. 于今年3月17日~18日将苏共中央的信发给法国共产党领导人。

**第49号会议记录第15点附件**

(1977年3月18日)

绝密

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以来，在法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的讲话及其在电视和广播电台上发表的声明中以及一些出版物中，经常出现批评苏联及其政策、尤其是批评苏联民主的极不友好的声音。这种情况过去有过，现在还有，尽管你们党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声明说，法国共产党不打算使同苏联共产党的论战进一步升级。

在“批评自由”和关心“自由和民主”的口号下，你们党的某

些领导人、工作人员和出版物在对苏联共产党的政策进行毫无根据的攻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批评苏联民主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坚决不同意我党和苏联人民几十年来所坚持的许多原则立场的言行一次接一次地发生。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不得不给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这封信。

1976年10月21日，法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代表参加了反苏分子在“互助会”大厅举行的群众集会，之后就释放科尔巴兰同志一事发表了诬蔑苏联共产党政策的声明。在最近接受记者采访和在法国电视台反苏节目中发表的谈话表明，法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代表实际上正在从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某些方面进行批评，事实上已经转入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现存的政治体制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表示怀疑。他们大声疾呼建议我们重新看待，或者说要我们抛弃整个苏维埃民主体制，以便向所有社会主义的敌人提供无限的“自由”。但是难道可以忘记苏联的社会和国家体制经受了60年的时间检验，保证了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取得胜利，保证了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同社会主义的政治敌人（开始同地主和资本家，后来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武装战斗中，列宁领导下的这一体制经受了锻炼，并作为民主的最高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民主是劳动人民的民主，而如今是考虑到苏联的各个阶级、社会集团、各族人民的利益的全民民主。

几十年来，我们两党有着密切的、建立在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同志式的友好关系。我们之间一向有这样的惯例，某个党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以首先通过秘密的途径找另一个党交换意见，取得必要的解释。如果有必要，可以派遣代表团。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关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现在仍然准备遵循这种办法。最近，这种实践被你们的领导人

抛弃了。现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一次接着一次发表公开讲话，其大部分内容是对苏联的情况和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的不客观评价和批评这种政策。

苏联共产党也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在长达几十年中，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一样，对苏联人民选择的制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为了捍卫这一制度，我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同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失去了几百万自己的儿女。法国共产党同其他共产党一道经常强调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保证了消灭人剥削人，为全体劳动者确立了真正民主和自由的政治体制，并且首先是保证了他们享有免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享受劳动、免费教育和医疗的权利，享受通过几百万个苏维埃制度和其他群众性组织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苏联有不要帝国主义战争和不允许在战争中利用人民群众的自由，有不要战争宣传和侵略宣传的自由。也就是说，有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过的权利和自由。正如法国共产党不止一次声明的那样，这有助于你们党在法国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苏联，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变化都只是朝着一个方向进行，那就是朝着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提高人民的福利和文化、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苏联人民的权利并使其得到更加充分和可靠的保障的方向。在苏共中央1977年1月31日《关于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60周年》的决定中重新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今后准备更加注意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并且指出，在这一方面，党的二十大、苏共中央1964年十月全会、苏共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大的决议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看来，发生变化的不是我们。我国制度的发展不会给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命运担心。与此同时，你们党

对苏联的立场却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种立场变化一开始是缓慢的，后来越来越快。对社会主义成就的高度评价渐渐地被毫无根据地批评苏联共产党的活动、批评苏联的秩序和我们现存的政治体制所取代。现在，法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转入对我国的政策进行激烈的攻击，而且这种攻击的路线与目前反苏运动中资产阶级宣传的路线准确吻合，这自然使帝国主义者及其附庸感到高兴。苏联共产党还注意到，法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最近的一些讲话的调子和以往明显不同。在他们现在的一些讲话中，除了一些宣言性的附带说明以外，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找到对苏联的成就及其在创建新社会的事业中的成果进行肯定性评价。

法国共产党某些领导人攻击我国政治体制的根据如同他们所声明的那样，是因为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错误地”采取“行政措施”对付那些违犯法律、从事仇视苏联社会活动的为数不多的公民。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声明中说，这些公民的行为似乎没有任何危险性，甚至没有任何违法之处。照这些声明所说，类似在苏联散发从帝国主义中心或其他敌人的中心得到的旨在反对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传单和小册子，和在法国或者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差不多是一回事。

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令我们震惊，令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震惊。这是完全错误和危险的态度。把劳动人民在法国或者在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帝国主义的帮凶旨在在苏联或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混为一谈，这怎么可能不背离阶级斗争的观点呢？

其实，脱离我国社会的根基、走上反对这个社会的道路、并且通常同帝国主义集团有联系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出现，这根本不是苏联内部发展的理所当然的产品。众所周知，过去我国有过一些公开反对苏维埃制度的人和政党，他们常常从口头转入行动，直至

暗杀列宁及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其他领导人。那个时候这些人和政党依靠的是尚未被消灭的剥削阶级。

现在我国已经没有剥削阶级了，因此反对苏联的那些人失去了社会基础。但是，还有一些反苏性质的言论，这并不奇怪。众所周知，提高千百万群众的政治水平，培养他们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道德，使人们的思想不受资本主义残余的腐蚀，所有这一切是比改造社会的物质基础更为缓慢的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进程。此外，今天这一进程是在大量的、每天的反苏宣传和帝国主义“中心”的直接破坏活动的背景下发生的。最近以来，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资本主义的残余在某些人的思想意识中得到系统的强化，并受到来自外部、来自帝国主义宣传中的鼓励。至于谈到资产阶级国家的间谍机构和其他破坏机构，与它们有联系的侨民组织，正在千方百计利用某些人的落后情绪为他们敌视社会主义的利益服务。共产党人应该懂得，只要在世界舞台上还存在两种对立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这两种制度之间的阶级斗争依然是世界发展的主要内容，这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

为了造成一种在苏联有许许多多社会主义的敌人的印象，我们的阶级敌人耍出了各式各样的花招，其中最常使用的一种花招是把那些对某个问题有不同观点的人统统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把那些在学术问题上，以及与其创作组织有分歧的作家或演员也称为“持不同政见者”。这种作法的欺骗性是可想而知的。

苏联社会舆论、苏联人民和我国的国家机关一样，对待反苏积极分子的态度和对待在某些问题上同国内普遍流行的见解有意见分歧的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即便是对最公开的社会主义的敌人，我们一开始也是尽量设法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是在当他们进行反苏活动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害，从而违犯法律的时候，才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也是根据

法律、在严格遵守法律的情况下进行。采取这种强制措施是必要的，不仅不是像你们领导人所断言的那样破坏了自由和民主，而是为在多年的艰苦斗争中获得了自己权利的我国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提供保证的必要手段。

显而易见，为这种人要求行动自由就是为帝国主义声音的传播者要求自由，就是要求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宣传机器都在不怀好意地高谈什么“保护苏联的人权”，并且积极利用逃出苏联或者被驱逐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准确地讲就是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人），为他们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上发表言论提供最广泛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国家的高层国务和政界活动家不断接见他们。法国的同志们应该明白，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庞大的宣传机构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保护苏联的人权，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要利用这一点来激化他们在几十年中进行的反对苏联、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发展密切相互联系还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证实。在这些人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在6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帝国主义推出“软化”社会主义的口号的缓和开始时期宣布自己是苏维埃制度的各色的敌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包括现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指责正是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曾经和正在提出的那些指责。他们的要求也和西方国家“软化”社会主义的要求相类似。许多事实表明，这不是偶然的，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所谓的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从境外（从资产阶级的间谍机构，从你们所知道的人民劳动联盟，从得到帝国主义慷慨提供资金的《自由》和《自由欧洲》电台）得到带诽谤性声明的材料，然后以自己的名义散发，并且被当作“来自俄国的可信材料”寄回西方国家。

一旦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中的某个人来到了西方国家，那么



他就马上撕下了“为完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战士”的假面具，变成公开的反动分子，成为君主主义者（诸如索尔仁尼琴），或者成为施特劳斯<sup>①</sup>和撒切尔<sup>②</sup>的崇拜者（诸如布科夫斯基），并唆使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更加起劲地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兄弟党，其中包括英国、荷兰、奥地利、葡萄牙、希腊、芬兰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们的出版物报道过这种情况。奇怪的是，法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却对此保持缄默。不仅如此，他们还呼吁我们给这些人以“表达意见的无限自由”，同他们进行“讨论”！

这种呼吁一般是以所谓自由是不可分的观点为根据的，这不单是值得怀疑的观点，而且是绝对错误的“非阶级的”观点。实际上，倘若自由是不可分的，那么共产党人，其中包括法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够去反对私有制对生产资料的自由、也就是去反对剥削的自由呢？因为你们的党是反对剥削自由的，在这一点上它是完全正确的！

不，同志们。自由，这不是抽象的概念。

自由它如同民主，如同存在对抗阶级和有阶级斗争的世界上的所有政治概念一样，是一个阶级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共产党人看来阶级永远是“可分的”。给劳动人民以自由，这就是也应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口号。而给劳动者的敌人，给那些反对社会主义、践踏社会主义社会法律的人以自由，这不可能是我们的口号。

---

① 施特劳斯，弗·约·（1915～1988），1961年起任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

②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 ），1975年成为保守党领袖，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她秉性倔强，当政后奉行货币主义学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非国有化计划。她曾指责苏联扩张，苏联报刊回击她，称她为“冷战的巫婆”，是“铁女人”。从此，“铁女人”的绰号流传于世。

至于说苏联共产党，它过去和将来都要捍卫社会主义的利益，捍卫苏联人民的利益，并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一立场。我们苏联共产党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过去和将来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捍卫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装出我们这里没有难题和未被解决的课题。我们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它是创造性的问题，与建设共产主义有关的建设性问题。我们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事业，对待自己的成就。总而言之，最广泛的社会批评，这是我们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要不抱成见地了解一下苏联的出版物，了解一下在我国的党组织、苏维埃组织、工会、青年组织和所有的创作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等）中所进行的讨论，就可以看到，到处都在自由地开展批评，各级都在实行批评，而党总是对批评予以支持和鼓励。而且批评不局限于所发现的现有缺点，还可以提出改变现在组织机构的工作、更换不称职的工作人员的建议。按照我们的规定和惯例，对每一条批评意见都要认真研究并对其采取措施。有关在单位和出版物上发表批评意见的材料所有的人都可以享用，你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种材料。当然，苏联人对苏联现实的某些方面所进行的批评常常是尖锐的、深刻的，因为这是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共产主义建设、有利于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批评。

“持不同政见者”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实质上是否定社会主义，是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同共产党人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在行动上正在变为有组织的、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反苏活动。给这样的活动以自由就意味着不要巩固，而是动摇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法国共产党正为在法国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同践踏劳动人民权利和利益的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这是合法的斗争，

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充分理解和支持这种斗争。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敌人站在一起，如果允许自己对这些国家中兄弟党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发展真正的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策经常表示怀疑，就不能有效地为在法国争取自由和民主而斗争。

苏联共产党员、苏联人民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许多其他参加者一样，理所当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自己的体制和制度的基础上取得了全世界历史性胜利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要像法国共产党领导层中的某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他们轻易要求我们改变政策，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压力的让步）改变这个制度？

法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为了对他们要求修正苏联制度的基本原理的行为进行辩解或者说进行解释，经常提出一种论据，说什么由于捍卫在苏联发生的那些事情，法国共产党曾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实际上，你们党的历史、包括近几年的历史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是的，在二十二大之前法国共产党不顾反动派的攻击，保持了自己的立场，成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参加国家机关和地方机关的竞选中，法国共产党一年一年地扩大自己的影响，选举总统的竞选活动（在杜克洛<sup>①</sup>竞选总统和密特朗竞选总统的选举中）令人信服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法国共产党没有吹毛求疵和直接攻击苏联的那些年代里，你们党是有成就的，是沿着上升的路线前进的。

在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危机的条件下，在法国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践踏，宪法形式上宣布的那些有限的自由受到了侵犯。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尽量闭口不

<sup>①</sup> 雅克·杜克洛（1869～1975），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临时总书记。

谈那些破坏自由和民主的令人发指的事实，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疯狂的诬蔑诽谤运动。

资产阶级不择手段进行的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目的是，转移劳动人民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去注意引起资本主义衰落的成堆问题；败坏社会主义的名声，使群众对社会主义和为之奋斗的共产党员产生不满情绪，使共产党员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基本群众隔离。同志们，你们的领导人参与反对社会主义的行动究竟帮了什么人的忙呢？只能是帮了你们敌人的忙，有助于他们反对你们自己，反对共产党，反对左派力量，难道不是这样吗？

法国的共产党员们知道，苏联共产党历来严格遵循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就是在最近也如此。尽管你们的领导人经常利用提供给他们的资产阶级宣传技术条件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表现出巨大的克制和忍耐。

非常遗憾的是，法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不正当地利用我们的克制和忍耐。他们所选择的行动方法，他们的许多言论的性质和基调同各兄弟党公认的关系准则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现在法国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公开建议就“苏联的民主”进行讨论。但是他们究竟是要讨论什么呢？在讨论中打算捍卫什么呢？是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还是捍卫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或者是苏联人民获得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同自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权利？就这些问题进行什么样的讨论呢？60年前苏联人民选择了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这样那样的干扰和障碍，苏联人民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苏联共产党反对任何讨论，其中包括就民主和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讨论。在柏林会议上，苏联共产党代表团重申，考虑到对共产主义运动积累起来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的必要性，我们赞成进行同志式的讨论，赞成对各个党在党的关系方面的

观点和经验进行比较。当然，这里说的是共产党人之间从他们的阶级立场上进行的同志式的讨论，是对经验进行对比，而不是远离这种态度的检察官式的指控和训斥。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最近特别故意强调独立、平等、不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的原则的意义。我们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重要的。法国共产党还经常说，必须表现出“互相团结”。但是，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要求别人遵守这些原则的同时完全不认为他们也必须遵守这些原则。

我们深信，承认平等、独立、阶级团结的准则，承认每个共产党有独立决定自己政策的权利，首先要求每个党及其领导人表现出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其他党的政策予以尊重的态度。

当然，谁也不会干涉法国共产党人建设那种符合法国民族传统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追求。目前的国际环境、世界舞台的力量对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有利于你们减轻负担。但是，你们的这种需要时间才能实现的追求，决不应该成为法国共产党内的任何人使用恶意攻击的言论反对早已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利。在劳动和斗争的60年中，社会主义制度已变成为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目前苏联正在进行为争取稳固和公正的和平，反对军事危险、反对军备竞赛和扩散核武器而斗争。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本身既包含积极的外交活动和增强苏维埃国家的国力，也包含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在国内沿着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前进。大家都能看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力量在取得国际舞台上的胜利、巩固缓和、保障世界和平和削弱帝国主义阵地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随着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发展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对有利于和平进程的影响正在扩大。懂得这一点的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西方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进行各种活

动，企图从内部削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最近他们在履行赫尔辛基协议<sup>①</sup>的借口下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和广泛的破坏活动（寄送反苏书籍，派遣以旅行者身份出现的各式各样的反苏“中心”的密使），这些活动自始至终都是为了破坏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提高政治警惕性、努力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我们来讲是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从为争取和平和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观点看，这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这一事业中，我们希望得到所有为这些目标而斗争的人的支持。

最后，请允许我们再次坦诚地对你们说，无论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我们坚信，那种毫无根据的批评只能给我们共同的敌人带来好处。

考虑到上述情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类似的行动表示坚决的反对，并且认为，对你们的那些破坏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有半个世纪历史兄弟友好的传统，对苏共的政策吹毛求疵，把不符合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国际斗争利益的观点强加给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同志所应担负的责任应该引起注意。我们希望，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认为研究我们的这封信是有必要的。

今天，苏联共产党和过去一样，坚决主张维护同法国共产党的兄弟友谊，巩固我们两党之间的团结。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两党

<sup>①</sup> 赫尔辛基协议即197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全”）第三阶段35国首脑会议所签署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文件包括：《指导与会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宣言》、《关于建立信任的措施和安全与裁军的某些文件》、《人道主义与其他方面的合作》、《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等。文件体现了欧洲政治缓和、增进东西方经济交往、人员相互往来的精神，称为“赫尔辛基精神”。不过，苏联出于保持欧洲边界现状的愿望，强调“边界不可侵犯性”；美国和西方国家最希望的是推动“人员和思想的自由交流”，实际上对“赫尔辛基精神”仍然各执一词。赫尔辛基协议是70年代东西方缓和的结果。

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出发点是，这封信将会被正确地理解为关心并有利于巩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坚不可摧的基础上的合作的利益。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摘录已送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基里连科、斯洛夫夫、波诺马廖夫。

№04089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将苏共中央  
致法共中央的信通报给某些资本主义  
国家兄弟党领导人的决定

(1977年4月4日)

绝密

1. 委托苏联外交部向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领导人介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给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的内容。(1749/15) 批准发给驻奥地利、希腊、丹麦、冰岛、加拿大、塞浦路斯、葡萄牙、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的指示(附后)。

2. 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向智利和乌拉圭共产党领导人介绍这封信的内容。

第51号会议记录第9点附件

绝密

维也纳、尼科西亚、雅典、里斯本、哥本哈根、纽约、都柏林、波恩、渥太华

苏联大使：

请把下面这些话亲自转告穆里同志(也转告弗洛拉基斯、耶斯佩森、奥里尔登、卡什坦、帕帕约安努、库尼亚尔、格斯赫尔、米



斯同志)：

鉴于法国共产党领导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政策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寄去了一封信。

注意到我们党之间存在的关系的兄弟性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这封信的文本寄给你们（分别发出），供奥地利（希腊、丹麦、冰岛、加拿大、塞浦路斯、葡萄牙、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了解。

执行情况请电告。

## 【专题说明】

# 苏美谋求缓和的接触

(1976年12月至1977年4月)

这是一组1976年11月，卡特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后，有关苏美关系的文件。

70年代，苏联谋求与西方某种程度的缓和。东西方缓和的重要内容是苏美两国关于军备控制的谈判。苏美两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始于尼克松任内的1969年11月。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和勃列日涅夫签订了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双方将进攻性导弹的数额冻结在1972年的水平上。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签署了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协定。卡特当选总统后，勃列日涅夫立即探询美国在这方面的态度，书信往返频繁。1979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维也纳签署了到1985年都有效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本组文件能反映70年代后期的苏美关系。本组文件译自英文。

(本组文件由叶书宗编辑和校注，  
盛懿翻译)

№02509

## 多勃雷宁与哈里曼的会谈纪要

(1976年12月1日)

绝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华盛顿特区

摘自 A. F. 多勃雷宁日记

12月1日哈里曼前来拜见我。

1. 他说12月29日星期一，他在卡特<sup>①</sup>的佐治亚州普兰斯寓所拜会卡特，哈里曼经同意给卡特带去了发自莫斯科的代表勃列日涅夫的电报以及苏联大使发给哈里曼的电报。哈里曼按照指示把情报带给卡特以引起他的注意。

当选总统（卡特目前的头衔）授权哈里曼把以下答复转达给勃列日涅夫（哈里曼熟知手中文件的内容）：

卡特收到了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来的电报，并对其中表达的观点感到愉快。就个人而言，他高度重视他得到表达总书记观点的电报这个事实。虽然他在就职之前不能指导谈判，但是他愿意宣布他与总书记在促进两国关系方面有着共同愿望。他同样认识到共同限

---

① 小詹姆斯·卡特（1924～ ）生于佐治亚州的农场主家庭，曾任佐治亚州州长。1976年11月大选，以51%对48%的微弱优势，战胜杰拉尔德·福特，当选美国第39任总统。按美国惯例，当选总统要到第二年春才正式宣誓就职。

制核武器和停止军备竞赛的重要性。

卡特先生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经常表示这些观点，他认为美国大多数人同意他的愿望，即在我们两国限制核武器和在世界其他地区停止核扩散。

他满意地注意到有关在两国采取措施反对核扩散方面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勃列日涅夫和他观点相同。

当选总统卡特还希望在其他领域也建立起建设性的关系，对此勃列日涅夫曾提及过。由于双方有着良好的愿望，当选总统卡特相信美苏之间的合作会有所进展，这种合作将促进整个世界的和平。

哈里曼继续往下读，还说卡特非常满意总书记电报的语气，考虑到他在就职总统之前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同时宣布一旦他宣誓就职他将尽快和经常就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行动取得一致。卡特还说他愿相信限制将互利双方，在削减过程中双方的相对力量将不会有变化。而且他强调必须找到措施让我们的人民确信协议将得到履行。

现在就有关限制核武器中对目前的问题发表意见对卡特来说太难了，不用说卡特不可能受过去谈判的影响，不过同时他很愿意对过去两年多的工作予以考虑。

哈里曼还说卡特希望在最高级首脑会晤即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个人会晤时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作出安排。

卡特认为如果有可能实施在谈判的关键时刻派遣特别可靠的总统的代表向勃列日涅夫亲自表述总统的建议和思想，这在以前也曾做过，那么在他就任总统后开始的谈判将会加速。

哈里曼还充满信心地报告说，卡特曾问他如果卡特邀请总书记访问美国参加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制定协议，总书记是否会接受邀请。

据哈里曼自己说他向卡特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大致意思是他认

为勃列日涅夫会接受这样一个邀请，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起最高级首脑会晤互访的一定程式，现在轮到总统邀请总书记访美的时候了。

2. 与哈里曼谈话时，有关他对卡特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态度的解释，我询问哈里曼他是否能简要陈述卡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我问他当卡特公开提出冻结战略武器方面的计划即把战略武器限制在他所制定的时间、质量框架内时他脑子里具体在想些什么。

哈里曼说他与卡特谈话时曾问过此类问题，然而卡特回答他暂时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般特征的思想和信念。这一点对他很重要，但是他还没有明确阐述过综合性的完整的立场。

他意欲阐述这样一种态度，即当他提名的国务卿、国防部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候选人上任时，作为他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就是指导他们拟定这一立场，它将包括对整个问题的复杂的政治和技术的各个方面。

我提请哈里曼注意，在他今天转递的卡特的思想里有这样一点，即卡特说他不可能被过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所影响，我说如果是对将来谈判的严重复杂性感到害怕而这样那是不可理解的。以前所有的谈判都是代表美国，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新总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中断在他之前已经获得明确的每一件事。我提醒哈里曼在我们以前会见时曾向他指出过这一点，当时根据指示已经把莫斯科方面明确的态度向他表示以让他转达给卡特。

哈里曼说他在与卡特谈话时曾重新提到这一点，曾经特别关照卡特注意那种情况。

卡特曾回答哈里曼，他理解这一点，因此他在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中已经作了解释，即他将对近两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所做的工作予以考虑。然而同时卡特希望保留他自己解释可能的

新想法或者在完成最终协议，特别是如果它们能促进解决尚在争议的议题时想到修改想法的权利，原则上他希望保留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可能。

3. 谈话中，哈里曼强调卡特对防止核武器扩散问题很感兴趣。在他就职前与苏联的谈判计划中核武器防扩散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将被优先考虑。

卡特非常担心核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在他看来，虽然在过去几年里失去了许多机会，但是现在还有时间采取一些共同措施阻止这个进程。至此卡特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没有更具体的思想，用哈里曼的话说，卡特自己说他的具体立场还需要详细考虑。

苏联驻美大使 A. 多勃雷宁（签字）

No 02510

##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7年1月26日)

绝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华盛顿特区

摘自多勃雷宁日记

国务卿万斯今天转达卡特总统给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以下信件：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昂尼德·伊·勃列日涅夫阁下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自就职美国总统以来，我就想与你共享我的有关我们两国关系的观点，我想就收到你的非正式来信表明我的态度。在此我想说明我的目的是在互惠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与苏联的关系，我将亲自关心这个目标，国务卿万斯也将如此。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你的公开声明，它们令我相信对巩固和维护持久和平的前景我们怀有共同的愿望。

以我对你在图拉十分重要的演讲的理解，苏联将不再谋求武力上的优势，它将反对这样的构想。它只要求一种足以威慑任何潜在敌人的防御。美国也不为自己谋求任何更多或更少的利益，因此我们两国用一致和智慧应该能够避免新的军备竞赛。我向美国人民宣

布消灭所有核武器是我坚定的目标。

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有三个领域可以取得进展。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尽快达成协议，在进一步限制和减少战略武器方面同样继续达成协议，而且我希望在普遍禁止所有核试验方面不久将取得真正一致的结论。同样我们将力求达到更坦率地正视我们国家的战略政策。重新努力在平衡削减中欧军事力量谈判中取得进展同样也很重要。

我们同样有责任实施一项政策，直接阻止在世界紧张地区可能导致危险冲突的爆炸。美国将支持在合理运用联合国解决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近东问题。在南非我们同样鼓励所有各方为取得安全和正义的和平解决而开始谈判。

我相信苏联将对这两个危机地区的和平进程予以援助。

我的政府十分重视在我们两国人民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增进双边的经济关系，同时我们不能对人类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

我们代表不同的社会制度，我们国家之间历史和经验互不相同，在我们两个社会中，两种理想的竞争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共同构造一个更和平、正义、人道的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要求对人类的主要问题有共同的回答。我希望为了促进发展，使世界不发达地区有更好的食物和高质量的生活，我们两国能更紧密地合作。

我盼望与你会面讨论我们不同的和共同的利益，同时我建议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力量尽我们所能促进苏美关系。我建议如果你愿意，万斯国务卿准备在春天与你会面以回顾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讨论还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到时我们双方同样将就你我之间的下一次会谈交换意见。

我非常欢迎你就这些或任何其他问题向我提出任何具体的想



法，我将进行充分研究。

致以崇高的敬意

杰米·卡特

1977年1月26日于白宫 华盛顿特区

苏联驻美大使 A. 多勃雷宁（签字）

№02511

##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的信

(1977年2月4日)

绝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华盛顿特区

摘自 A. 多勃雷宁日记

我拜访了国务卿万斯，谈及我受委托的任务并向他递交了勃列日涅夫致卡特总统信件的正本：

致美国总统杰米·卡特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担任领导的各位同事就你再一次担任美国总统向你表示祝贺。

我仔细地熟读了你的1月26日来信，并且觉得总体上是建设性的和令人鼓舞的。我们满意地接受对这一事实的认可，即你的政策目标是促进与苏联的关系，并且你对此十分关心，这符合我在不久前曾公开表示过的我们的基本立场。现在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准备通过共同努力在我们两国关系间实现新的较大的变化。

据我理解，我们正在和你们建立起系统的、互相信任的对话。

当然从我们接触一开始就一些原则问题我们更有透明度和彼此理解是很重要的。

这里最重要的一点——也是被过去经验所证实的——就是必须

严格遵守平等、互相承认合法利益、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这样，只有双方采用这种立场完全按照 1972 年签署的有关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才能在苏美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固的进步的发展关系，并且就将会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找到双方共同接受的解决途径。

由于客观原因，目前美苏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朝着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减军备目标两国确保合作，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完成我国人民，包括所有他国人民的消除战争威胁当然首先是核战争威胁的任务。

如你所知我们必须及时地完成一项有关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协议。我们相信这项任务是完全能做到的，因为这个协议的主要特点已经在海参崴达成的协议基础上决定了。成功地引导这件十分重要和必须的事情得出结论就要求我们在这个领域开始艰苦的工作，制定更进一步的措施。无疑这将给苏美两国关系有建设性的发展以新的推动。

我们相信，当国务卿万斯来莫斯科时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将在会谈中占主要地位。

按照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毫不拖延地实施美苏关于限制地下核试验和关于和平目的的核爆炸条约。同时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我们准备与美国合作——加强努力谋求全部和普遍禁止核试验和阻止核扩散。

我们想在关于削减中欧军事力量和武器的维也纳谈判中带来一种转折，我们希望新的美国政府认真对待华沙条约国去年提出的建议。

在武器限制和裁减军备方面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有待解决，苏联已就这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我们希望你们的政府能建设性地对待这种回顾。

当然在世界上还不可能达到停止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我们不能不对我们国家及其盟国的安全表示关切。我们的防御潜能足以使没有谁敢冒险进攻我们或用进攻威胁我们，在这方面，用你的话讲，我们不想为我们自己谋求更多或更少的利益。

我还要再一次坚决地强调苏联不谋求武器优势。我们深信对所有国家尤其是每一个国家真正的安全不是建立在军备竞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裁减军备限制战争的物质基础上。我们将来的努力同样旨在实现这个目标。

我将简要涉及一些其他问题。

由于在世界事务中客观的作用和角色，我们两国共同的或相类似的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帮助解决引起国际紧张局势的问题，用我们的观点，这里的任务就是消除引起这些问题的根源。

在这方面的主要含义就是如你，总统也正确提到的在近东建立一个强大的真正的和平。从1967年以来十年几乎过去了，这尖刻的“十周年纪念”不仅仅让我们想起在解决近东冲突事务中简单失去的时间，而且也让我们想起新的危险的爆炸的可能，就像1973年10月和最近在黎巴嫩发生的一样。

此外我们深信如果在我们着手解决近东问题时，我们严肃客观地考虑到各方面合法的权益，既有阿拉伯的包括巴勒斯坦人，又有以色列的，那么，可靠地消除这种国际冲突的永久根源是很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寻求美苏之间的相互理解特别是有关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那么关于政治解决近东问题无疑有成功的可能。

我们相信在其他一些国际问题上我们两国之间进行合作同样也极其重要：如怎样进一步在赫尔辛基所采纳的决定基础上促进欧洲安全；在西柏林问题上严格遵守四国条约以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等。

在你的信中，总统你谈到南非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

立场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与南非人民联合起来，为他们的自由和独立而奋斗。我们承认他们自己决定命运的权利。无论怎么说苏联在这一地区不谋求任何好处，与美国在那里敌对也没有任何益处。

注意到总统对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赋予重大意义，就我而言，我想强调我们曾经而且还在努力不断发展我们在这个领域的关系而且获得越来越大的规模。这将对双方，我强调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对此必须取消所有不公平的限制和人为制造的障碍。如果没有这一点，没有对任何想把贸易跟一些与政府权限有关的问题连在一起的企图予以拒绝，那么不仅仅是两国的经济关系，而且两国的所有关系都将遭到打击。

总统先生，我希望为了我们之间积极的合作，我们怀着良好的愿望和真挚的态度，你我将能够为解决我们的问题作出积极的贡献。这些包括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内的议题显然将是万斯不久访问莫斯科时相互交换意见的主题。

最后，我想强调和你一样我非常重视我俩的个人会晤。我将准备与万斯一起考虑有关安排这次会晤的问题。万斯如你所写是肩负着这一任务而来的。

致以最好的祝愿和敬意

勃列日涅夫

1977年2月4日

万斯认为这封信很好，今天就转达给总统

苏联驻美大使 多勃雷宁（签字）

№02512

##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7年2月14日)

绝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华盛顿特区

摘自多勃雷宁日记

今天总统助理布热津斯基打电话给我，他说卡特总统刚写了一封信作为对勃列日涅夫来信的回复。

由于白宫被预先安排与墨西哥总统的会晤，布热津斯基请助理国务卿，刚才还和他在一起的克里斯托弗把信给我。

布热津斯基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他将准备在我们下一次非正式会晤时用两天时间讨论有关这封信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预先安排好星期五即2月18日与布热津斯基共进早餐）。

一小时以后，克里斯托弗向我递交了卡特总统签署的给勃列日涅夫的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阁下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一开始通信就使我们立刻注意到世界和平的中心问题。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不仅在尽可能缓和紧张局势方

面，而且在取得一系列互相理解以在世界上创造一种更多可靠更少危险的政治气候方面都负有的特别责任。

我了解并羡慕你们国家的历史，还在孩提时代我就阅读了你们的经典作品而形成了我的文学爱好。我同样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你们人民忍受了多少苦难。我知道你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和每个苏维埃家庭所遭受的损失。这就是我相信为什么在我们的献身和平的宣言中我们俩真诚的原因，它给了我对未来的希望。

问题是我们如何能使这种献身成为现实，我们如何能扩大合作的同时减少和最终限制我们的竞争。这种竞争事实上耗费巨大，而且无可否认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变得非常危险，这就是我们为何必须不让这种竞争无约束发展的原因。用我的观点，这个要求至少首先要拓宽我们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在限制核武器领域。其次面对有可能引起我们之间直接对抗的世界不稳定地区显示出高度慎重的约束。

我尤其欢迎你的在停止军备竞赛思想指导下发展合作，及时地在裁减军备方面达成具体协议的愿望。

显然用我的观点，在限制军备领域我们必须予以强调，我将亲自关注它。我能向你保证，在我政府中有责任处理这些事务的官员将以最细心的方式和最积极的态度考虑一切及所有你的建议。

不是说我们必须通过成功的攻击获得相互的安全，而是我们必须发挥作为最大国家的作用，开始大幅度降低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标准。我们虽然没有时间限制，但我们真的很有必要及时地取得最大的进展。

我同意在我们互换意见和3月底在莫斯科与国务卿万斯会谈中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可能包括大量降低武力标准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如果我们承认这仅仅是通向更大规模削减我们各自核军备进程的第一步，那么也许我们能使这些谈判有一个

成功的结局。鉴于此，我对研究把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问题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分离出来的可能性是否没有用表示惊讶，下一次谈判时我们可以马上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如果我们有远大的目标，特别是如果我们想达到真正的削减军备，只保留最低限度足以为我们双方的安全提供保障的军事标准的话，那么很明显，处理这些现在看来非常重要将来又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我希望我们额外的私下交换意见和在莫斯科与国务卿万斯的谈判将尽可能地涵盖最大范围。我能向你保证在分析我最近实施的军备控制政策时，所有合适的建议都将被考虑到，就像我与你大使谈话中所提到的。我希望我们不仅仅考虑尽可能大幅度地减少核武器的总量，即保留最少量的导弹使每个国家在遭到第一次打击后能保障它的安全等问题，而且还要考虑限制投掷重量问题，禁止所有可移动导弹问题，在民防领域拒绝采用长备措施等问题。还有要采取措施预警导弹试验和就卫星非武装化取得一致及就拒绝发展那种摧毁观察卫星的能力达成一致等方面增进信赖。我们还必须研究实际措施以满足双方遵守协议的愿望。这些诸如现场检查和无干扰空中观察的措施不能成为不正确解释的主题。这些就是用来取得进步，赢得社会对我们的努力予以支持和理解的手段。

在所有这些领域里，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做得比这些更多，就像我们的技术专家所说的现在这样做也许只是权宜之计。如果我们心中怀有这个远大的目标，我们就能够为我们的世界其他地区大大改变危机的程度。

想在谈判中获得比对方更多利益的企图将使谈判产生相反的结果。我们将努力摒弃骗局和不必要的拖延来进行磋商，而且不带强制和不公正的草率。

我欢迎你们准备在禁止普遍核试验上努力达成一致。我认识到



在有关其他国家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他们继续进行核试验计划和可能用于矿业和建筑业的和平的核爆炸，但是我相信会有满意的方法去考虑这些问题。我们打算要求国会批准我们两国政府早已订立的两个协议，但是我把它看做只是实现完全禁止核试验总体目标的第一步。在实现这个总体目标之前，我国政府将遵守这些尚未批准的协议。

就我所知，在过去有过印度洋大量武装化的建议，这些建议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请求我的同事们系统研究印度洋问题，以便我们准备更明确地谈论达成一项能促进世界和平的协议的可能性，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想法。我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意识地对这一地区两国的军事行动予以特别的注意是有理由的。很明显，共同的利益要求就这整个地区普遍减少军事努力取得协调一致。

如你从我的公开声明所知，我倾向于积极地继续努力减少在第三世界买卖和转让常规武器，我希望你将参预这些努力，这对于我来讲好像是无意义的竞争。我们作为主要供应国对限制这种转让有特殊的责任。显然其他供应国同样也应该参预这种努力。我们将扩大包括他们在内的有关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我同样欢迎你的愿望即把维也纳谈判转移到更加致力于削减在中欧的陆海空三军和武器直到能接受的最终标准。我们非常忧虑在东欧出现你们军事力量的急剧增加。最近我们正在回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时我们正责成我们的代表对双方已经公开的事实材料进行研究。

我希望这些将是我们完成分析后万斯先生要仔细讨论的问题。当然，当我们指导这些具体分析时，我们将与我们的北约盟国就每一件事进行磋商。

我想就四国协议作一个观察。如你所知，我们认为这个协议适

用于整个柏林而不仅仅是西柏林。对于我们遵守双方信件和这个协议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尽量避免敏感的话题，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完全遵守这个协议对于我们发展在欧洲的和平关系的能力至关重要。最近在柏林产生新的恶化和限制的倾向似乎得到维护，而这种倾向可能会打破那里业已存在的微妙的政治平衡。我希望在消除这些紧张局势中你将与我们合作。

我们期待着双方进行合作以实现进一步履行在赫尔辛基达成的有关人权的协议，就像我跟多勃雷宁所说，我们希望协议的各个方面都能实现。我们的意图不是在国际事务中去干涉别国，我们不希望给苏联制造麻烦，但是对于我们的政府必须不时地公开表示我们人民和我的真诚和深切的感受。我们帮助促进人权的义务将不会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或以与达到合理结果不相称的手段来表达。当然我们同样欢迎在这些敏感问题上进行亲自的信赖的交换意见。

我注意到你对我的有关促进两国经贸关系重要性预先观察所作的反应。你们在这一方面开放市场与我所敬仰的坦率精神相一致，但是为了消除障碍，我们必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从我这一方面，我想尽我所能达到互惠贸易，但是你要意识到国会施加的压力，对此我必须予以考虑。

请允许我就我们努力改善其他地区局势谈几句，这些地区还存在着分歧和潜在的冲突。在近东我希望与该地区的各方开始直接谈判，我希望积极推动能达到公正可靠解决的进程。万斯先生如果在3月底的谈话中有机会知道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包括反映我们作为日内瓦会议共同发起人直接利益方面的观点，他将会十分高兴。

在南非，我们相信非洲人民应该不受外界干扰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怀着这样的目标我们支持符合大多数人愿望的和平解决，限制那些增加暴力可能的行为。

为了与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创造基础，我们采取步骤开始与他们谈话，在其他地区，我们同样将用我们对真正的自由自决和经济进步的挚爱指导我们的行动。

为了能清晰地表达我们的观点，并对事关两国人民和世界和平命运前途的论题进行更广泛的回顾，我希望我们能继续互换信件，通过这些坦率的通信，我们能为准备我们亲自会晤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我将满怀希望参加这次会晤。

致以我最好的祝愿和敬意

杰米·卡特

1977年2月14日于白宫 华盛顿

考虑到这封信是总统亲自在白宫准备的，克里斯托弗没有对这封信作任何说明。

苏联驻美大使 多勃雷宁（签字）

№02513

##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就“人权” 问题与万斯会谈的决议

(1977年2月18日)

绝密

摘自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草案第46页

1977年2月18日

发给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就“人权”问题与万斯会谈的有关指示，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就这个问题的指示草案有待通过。(附草案)

中央委员会

秘密

华盛顿

致苏联大使

首先，拜会万斯并告诉他，你有指示要告诉卡特总统和他的国务卿如下内容：由在莫斯科的美国人提出的关于释放（亚历山大）金兹伯格——一个由于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按照我们的法律条文证明他有罪的苏联公民——的问题引起了极端的迷惑。

事实上以与“人权”有关的名义来干涉我国内政并不能改变事

情的本质。

显然每个人都有权对不同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包括对在任何国家内的人民的自由和权利的看法。我们对这些问题和它们在当前美国的情况也有我们的看法。

但是把这些看法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因此而复杂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美国政府的代表们在苏联国家管辖权内竭力制造问题进行所谓讨论，人们将如何看待它们的立场？它损害了两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完全是公开的，美国的这种立场我们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你和我都清楚我们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对不同问题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在苏联我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我们的制度宣布不仅能为全体苏联公民真正提供工作、教育、社会安全、医疗保险和退休的权利而且真正保障这些权利而感到自豪。

同时苏联的法律保卫我们的人民免受各种反社会倾向的袭击，这种倾向诸如任何形式的宣传攻势、种族歧视和国家分裂思想的传播，免受使人民道德败坏的企图的袭击。在我们国家，任何人都无权践踏每个人都必须公平履行的法律。

我们不想把我们对于权利和自由的理解强加于人。尽管有很多事情在我们人民看来是无法接受的，而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却继续进行着。

不难想象，如果我们从我们自己的道德原则出发，硬把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与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发展联系起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包括数百万的失业者、少数民族权利的被剥夺、种族歧视、妇女没有平等权利、国家机构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用累进定罪来迫害人民，等等。

顺便提一下，如果有人谈到人权问题，那么人们应该怎样评论

在一些国家由美国系统支持的独裁的反人民政体，那里，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也受到经常性的粗暴的侵犯。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所有这些问题上升为我们国家关系的一部分，那么显而易见，结果便是我们之间和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更加恶化而有损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而我们国家间相互影响和合作的目标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同样所有保障人类的权利将会遭到危险，这些权利包括生活在没有战争和军备负担的世界上，生活在安全和人民之间有着友好关系的环境中。

然而，我们坚定地相信，国内出现的反映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问题不应该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主题。

很显然，这个原则与其他一些基本原则在1972年签署的苏美两国共同关系准则中表述得很清楚。人们同样应该记得当1933年建立外交关系时，我们双方有义务绝对尊重各自的毫无疑问的权利，即有权建立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生活方式，并且避免介入对方国家的内部事务中去。

然而美国的言论并不总是和在各方面都照着这个准则去做。事实上所谓“关心”“苏联的人权”是为支持甚至明确地说是煽动一些人从苏联社会中分离出去服务的。美国政府对一些美国记者在苏联境内的行为不只是公开的同意他们的行为，这些记者的惟一兴趣是寻找或宣传所谓“持不同政见者”，而且美国驻莫斯科美国使馆的一些人员直接参预其中，我们可以特别地提出我们所知的名单。

（给苏联大使，如果对话者坚持要问我们在说谁，你可以说是一秘。）

当由于苏联公民犯法，苏联政府按照苏联法律采取任何国家有权采取的行动时，美国方面就以此来伤害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且据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代表秘密会见了掌握国家国防机密的（安德烈）萨哈罗夫。由大使馆开创的这样的会见最后一次发生

在2月8日，这是一起极不寻常的事件，而且以人权为幌子掩盖了这是美国情报机构反对苏联社会制度的一个直接举动。如果因为牵涉美国的公众舆论，美国国会的观点，那么人们不应忘记在苏联同样也有它自己的公众舆论。它坚决拒绝所有企图强加于我们的与我们的社会民主和法制相抵触的价值观念。

其次，会谈以后应该通过塔斯社把下列通告送达莫斯科：

“2月”“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拜会国务卿万斯并提醒他注意美国方面的言行举止与积极发展苏美关系的目标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必须强调苏联方面绝对不能接受所有干涉苏联内政和用‘维护人权’的借口插手与别国特权有关的问题的企图”。

苏联方面同样可以对有关美国的人权保障问题提出一些疑问，而且有充足的理由。比如数百万人的失业、种族歧视、妇女得不到平等权利、公民人身自由受侵犯、犯罪率的提高，等等。然而很明显，所有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另一个或者把这样的问题带进两国关系领域，那么对于解决作为两国间互相影响和合作主题的问题只会加大难度。

代表两国人民利益的苏美之间和平共处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只有当他们彼此遵守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时才能有富有成效的发展，就像在苏美关系基本文件中所声明的。

电报完毕

№02514

##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的信

(1977年2月25日)

绝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华盛顿特区

摘自多勃雷宁日记

我拜会国务卿万斯并请他把勃列日涅夫 1977 年 2 月 25 日的信直接转给卡特总统。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仔细阅读了你今年 2 月 14 日的来信，我想真诚地谈一下你这封信在我们国家所产生的印象和想法，按我的理解你欢迎这样坦率的对话。

全面评论你信中包含的支持和平和减少军备竞赛当然符合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明确赞成最终消灭核武器，而且赞成在有效的国际控制下实行普遍的全面的裁减军备。

然而，首先如果我们不重视前几年我们已经设法取得的成果。其次如果我们放弃可靠真实地处理决定更具体的步骤而赞成采用一种为大家所不能接受的建议，那么朝着这些高尚目标前进的进程不会加速，相反只会减慢。

回顾你从特定角度表达的观点，很遗憾其中我们没有发现要建设性处理或准备寻找解决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这些问题方案的愿



望，而这些问题是我们之间交换意见的主题。

按照我给你的信，我们坚信首先必须在海参崴协议的基础上完成起草一份新的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协议。这里已确定协议的基本特点及随后谈判认可的附加解释性声明是艰巨工作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对显然处于僵局的情况找到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有必要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现在已经到了如此程序即文件已拟定出来，其内在相互联系，你不可能在不损害整个文件基础的前提下抽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比如我们足以记得，总统你也应该从谈判的文件中知道计算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方法由于整个复杂的巡航导弹协议的达成而被确定了。美国方面不仅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法，而且在去年1月实际上还同意了在战略武器最高限度内具体计算空对地巡航导弹的公式。所留下的只是要在海洋和陆基巡航导弹的具体计算公式上取得一致。事实上美国后来努力建议从主要协议中取消海洋和陆基导弹问题。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破坏已达成的协议的企图。

现在建议我们从协议中撤销整个巡航导弹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回到我们曾经前进了一大步的老路上去，被迫面对这个毫无希望的建议。同意这个建议将意味着我们在堵塞战略武器竞赛渠道的同时又打开了另一条渠道。他们将摧毁巡航或非巡航导弹的种类真的对人民有很大影响吗？没有理由相信，当各方开始部署时谈巡航导弹问题比现在还在发展时谈更容易解决，我们从经验得知不是如此。

就在美国称为“逆火”的苏联中程轰炸机问题（这还是我们从你信中得知的一个事例）想要保持人为的紧张是与协议相悖的。无疑在这方面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解决办法，即与谈判的主题相背并且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协议的签订更加复杂或者甚至不可能签订。

在这个协议中美国真的比苏联获利少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而且如果有谁有不同观点，那是个严重的错误。

联系到你提出的在海参崴已取得一致的有关大幅度降低战略武器标准的可能性，我想提醒你，我们一贯主张停止军备竞赛，包括削减战略武器，海参崴达成的协议可以证明这一点。这意味着苏联单方面削减战略运载工具不仅是这样说而且事实上正在为削减武器而努力。

我们赞同在协议中及时巩固在海参崴已经取得的成果，并且我们希望有利发展，如上所述我们开始准备下一步的谈判，包括一旦目前协议结束后可能出现的削减问题。

然而我们希望各自明白，任何这样的步骤首先必须符合平等的和给双方同等安全的原则。对于我们，总统先生，似乎无人能对我们这样提出问题的权利进行争辩。

如何用这种观点看待苏美戏剧性地削减核导弹力量的计划？在你的信中是被与目前形势各方面相割裂而提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以下这些因素对美国一方有利将变得十分重要：如各方地理位置的不同，在苏联领土附近美国核装备的航空运送基地的存在，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和北约盟国拥有核武器和其他情况。

很明显，考虑削减苏联和美国核导弹力量问题时不可忽视所有这些事实，所以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提出这样计划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表面上可能是吸引不知真相的人民，但事实上直接为一方获利。你自己也曾公正地指出过，一方企图获得超过另一方的利益只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在禁止所有可移动导弹（包括与苏美谈判主题无关的中程导弹）、限制投掷重量、就地检查等计划方面同样表现出你们只追求单方面的利益。

你当然很清楚为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用这种消极的态度提出

来。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组织工作性的会谈，寻求共同接受——我强调共同接受的协议。苏联将继续坚决维护它的利益。同时美国方面建设性的和现实的交涉将总会发现我方对达成协议的支持和准备。当国务卿万斯来莫斯科时我们希望真正看到这种可信的交涉。

与停止军备竞赛有关还涉及到战略武器限制和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密切注视着美国方面支持我们的建议，包括建议禁止制造新的类型和系统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禁止化学武器，签订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有关这个或其他问题包括印度洋问题，我们都不止一次具体地表述过我们的建议，特别是在联合国。牢记加强和平和国际安全利益，我们同样可以讨论你信中提出的问题，比如警告导弹发射试验，减少给第三世界出售和提供常规武器等等。

我们十分重视在不损害各方安全的情况下削减在中欧的军事力量和武器装备的协议。

但是就你的信和维也纳谈判而言，只考虑单方面利益的做法是很明显的。这种做法就是美国处理一系列声明的惟一方法。比如美国方面就是带着考虑想要在东欧大量增加军事力量来看待它在维也纳谈判中的立场，这里不仅对真实的情况缺乏客观的估计，而且由苏联和其他谈判国所提出的并在维也纳谈判中直接取得进展的建设性建议也被完全忽略了。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为寻求最终解决而作准备，这种寻求并不意味着某些人单方面获利，但是如果我们被期望单方面减少我们的防卫力量而把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置于不公平的地位，那么这样的期望是行不通的。

我们不可能同意信中提到的有关对四国条约履行情况所作的估计。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侵犯过西柏林特殊的地位。呼吁在这一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分明是错误的行为。在那里仍然出现混乱的事实是与受西方三国默许的联邦德国所采取的非常明确的政策有关的，

即实际上旨在取消四国条约及其决议的基石——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不能由它管辖。但是破坏这个决议的企图是导致局势恶化的非常危险的道路。我们相信所有利益各方都应该严格无误地遵守四国条约，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避免回到柏林经常成为危险冲突和斗争策源地的时代。

粗看起来，我要说你的信对美国解决近东问题或促进我们两国经贸关系领域发展，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改变以证明使它们达到成功解决的意图。

最后，再一次提出所谓“人权”问题。我们对这一事情本质的限定及美国政府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已经通过我们的大使予以报道，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习惯强加给你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意图，但是我们也不允许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不管为了达到目的运用哪一种冒充的人道主义，我们将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企图。

还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情况：当美国总统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信的同时又开始与自称是苏联的敌人并反对苏美正常友好关系的叛徒通信，我们不愿意在处理任何外交事务包括，苏美关系问题时考验我们的耐心，苏联不能被那样对待。

总统先生，这是我和我的同事就你的信的一些想法，我没有选择温和的措辞，也许它们可能更顺耳些。由于我们讨论的事情太严肃了，以至于没有任何余地可以模棱两可或沉默不语。

我的信是出自我对我们之间现在和将来关系的真挚的关心。我的主要目的是用所有的坦率和信赖来唤醒你。

我希望怀着对我们作为两国领导人的崇高责任感，我们将能沿着和平之路，为我们和所有其他人民的利益，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向前发展。

致以敬意

列·勃列日涅夫

1977年2月25日

万斯把信件专心地读了两遍，然后：

就个人而言我欢迎总书记坦率的直言不讳的话语。我们的总统处理一些国际问题尚过于轻率，比如我跟他说过几次，参考和你（苏联大使）的会谈及整个谈判的历史，苏联方面非常重视解决巡航导弹问题。他没有注意到用他的努力不需要长时间谈判就能对遗留的矛盾问题达成协议，反而认为这些问题可以拖到以后解决，我告诉他事情并非如此，可是……（万斯摇摇手以示他不想说服总统他是正确的）。

我希望勃列日涅夫的这封信，万斯继续说，将使总统以另一种方法看待形势。

当然我不完全同意信中所写的内容，但是我希望它是总统现在需要收到的一类信件。

苏联驻美大使 多勃雷宁（签字）

No02515

## 卡特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1977年3月4日)

绝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 华盛顿特区

摘自多勃雷宁日记

今天早晨布热津斯基向我递交（万斯不在）卡特总统 1977 年 3 月 4 日致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的原文。

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列·伊·勃列日涅夫阁下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你的 2 月 25 日来信，由于它适度严厉的语气，由于其中没有认识到我的良好愿望，由于对我以前信中所提出的具体建议没有积极的回答而引起我的关注。我们两国之间分歧很大，我希望你我不要怀着与我们各自动机有关的疑虑使之更加恶化。

事实上不管是在海参崴还是在后来的谈判中我们都没有就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最终达成协议。我确信将来能达成协议，我保证做到。我理解你对这些问题被搁置到将来谈判时再解决关切，然而我相信我们无疑将从中得益。我们将对尽快达成协议给予推动。我想强调拖延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的目的只是运用所有它的

积极的政治影响帮助尽快达成协议。我同样确信通过展示我们共同的良好愿望，我们将能够在诸如常规武器、战术核装备和投掷重量等问题上取得一致。

我一刻也不容许自己低估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解决问题将取决于决心、耐心和果断。牢记这一点我想提两个旨在解决我们之间分歧的具体的建议。

首先我认为如果你与我们都采用你的观点即在以后的4~5年里做到大量削减战略武器标准，那是极其有用的。在过去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中，我们曾经朝着模糊的目标采取小步骤。我建议我们现在要取而代之，努力确定一个具体的长期的目标，朝着这个目标我们将以更大成功的保证一步一步地前进。

其次在双方倾向一致的问题上尽快签订正式协议将帮助我们寻求稳固的相互理解。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有协议或在这些问题上能很快达成协议的事实，比如：

1. 战略运载工具限制在2400个（或比这更少双方都能接受的数量）；
2. 装备有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发射器限制在1320个（或者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更少的水平上）；
3. 使双方都满意的鉴定的决议；
4. 导弹试验的预警；
5. 禁止普遍试验，包括有关完成目前和平计划的临时决议；
6. 卫星非武装和不发展摧毁和破坏卫星的能力的协议；
7. 印度洋非军事化；
8. 限制国内防卫措施；
9. 共同阻止给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
10. 禁止移动的洲际弹道导弹；

当然以上所列并非全部，还可以加上其他相关的无争议的问题

题。关键是要及时地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些基础上我们能够达成协议，这样对着手处理紧接着的更难操作的问题产生必要的推动。

我们正在尽我们所能解决这些问题，为万斯国务卿与你在莫斯科的会谈作准备。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们的下一次通信建立在错误的观念上，即我们缺乏真挚和诚实，或者缺乏必须就互利的协议尽快取得进展的意志。我不低估与实际问题或技术细节有关的困难，但是我坚决保证在为我们两国之间稳固与和平关系创造基础的过程中取得成功，我们不追求任何形式的单方面获利。

我没有把我们的信件视作谈判的正式文件，但是如果我们私下交换它们并建立在严格信赖的基础上，它们能帮助我们双方对历史发展方向获得必要的理解，我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之下给你写信的。我希望你知道，坚持削减武器对我来说是个人信念问题，它同时也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渴望。我希望并相信你和你的人们也将献身于同一个理想。

诚挚地 杰米·卡特

1977年3月4日于白宫 华盛顿特区

布热津斯基说这封信连夜直接转送到莫斯科以便那里能当天收到。

布热津斯基评论说他们认为这封信是“积极的”“不是吗？”他问道。

我回答就我自己来说，粗略读了这封信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对于我们解决那个问题没有很大的推动。按照列·伊·勃列日涅夫最近写给总统的信，主要意思就是想在海参崴协议的基础上安排制定一个新的关于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协议，事实上在总统的信中，我们关



于“逆火”和巡航导弹的立场被忽略了。就后者而言，给人的印象好像美国想在生产和部署方面都有自由而不是把它们成为协议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些也许重要但与上面谈到的协议设有直接联系的问题，因此这些问题在总统的信中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它有意无意地游离当前阶段关键问题的本质。同样我不能不指出苏联在非武器领域的许多建议在总统的回复中以沉默而绕开了，好像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信中提出的一些其他问题。

布热津斯基说关于这一点他不准备在当时具体考虑总统信中的种种建议。

苏联驻美大使 A. 多勃雷宁（签字）

№02516

## 勃列日涅夫致卡特的信

(1977年3月15日)

秘密

抄件 1

苏联驻美使馆华盛顿特区

摘自 A. 多勃雷宁日记

我拜会了万斯，通过他把勃列日涅夫的信转达给卡特总统。  
亲爱的总统先生：

获悉你3月4日来信，我想再一次就我们对有关限制防御战略武器协议（1985年期满）准备情况阐述我们的理解要点，并就遗留至今的尚未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更详细地说明我们的立场。

从常规的考虑说来，很明显我们倾向于尽可能快地订立协议，不要拖延，但是假如我们为自己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即真诚地限制战略武器，遵守不损害任何订约一方的利益的原则，那么基于虚假的简单的形式作努力将难以促进事情的发展。同样假如我们在做了大量工作基础上把这些问题搁置一边，又提出一些新的特别是与已定协议主题无直接关系的问题，那么对于协议的准备也没有任何促进。

当然在我们两国之间订立限制战略武器协议对于苏美关系甚至在更广泛范围内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它将只是在协议表示真正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这一方面成为可能，在相反的方面，它可能会有相反的效果。

如果巡航导弹问题被排斥在协议之外，那可能就是如此。这个问题不仅仅牵涉到新协议的核心而且至关重要。许多问题已经解决了，甚至一些具体的公式也被同意了，现在建议把巡航导弹问题搁置在协议体系之外将不仅意味着回到最初的立场，而且将会在新的危险的范围内听任为发展军备竞赛打开渠道。

我不认为这一定符合尽快订立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目标。然而有关整个复杂的巡航导弹问题，我们坚持我们的具体的计划，包括将以 600~2500 公里射程巡航导弹装备的重型轰炸机视为单个放置以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飞行装置的运载工具，根据重型轰炸机的类型，建立这种飞行装置最高限额不得超过 1320 个；射程超过 2500 公里的空对地巡航导弹将被完全禁止；除重型轰炸机外其他以 600~2500 公里射程巡航导弹装备的飞行装置也一律被禁止。

所有基于海洋与陆地的超过 600 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同样应该全部禁止。

我想再一次提醒你，我们的协议即计算所有装备有多导头分导重返大气层飞行装置的巡航导弹的最高限额（1320），其中至少一个导弹要以多导头分导重返大气层飞行装置的试验仍然是以达成有关巡航导弹问题最终协议为条件的。

至于你们称为“逆火”的苏联中程轰炸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种飞机的导弹射程的正式数据（2200 公里）并表示准备在谈判记录中反映这个数据。并且同时我们表示不想提供这种飞机覆盖洲际距离的能力。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下，即由于“逆火”轰炸机曾经和将来都被从进一步的谈判中撤销。我们将继续维持这个立场。

在目前协议中，自然要对洲际弹道导弹的移动发射器问题找到解决办法。早先我们建议订立协议，在协议期间各方应该通过协议克制部署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移动发射器。在今年 2 月 25 日的信

中我已提出过我们处理有关苏美战略武器削减问题的办法，我重申在协议签署后我们准备立即讨论这一问题，不过在此我们必须考虑我在2月25日信中所提及的一些因素，比如各方地理位置的不同，苏联领土附近美国核装置的存在和运用空中基地运载工具进行操作，美国北约盟国的核武器及其他情况也不能忽略。

对上述提出的有关巡航导弹的事实和意见予以考虑，双方不仅可以限制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标准（2400和1320）而且还可以讨论这种运载工具的数量。这种运载工具还是目前协议期满之前削减的对象。

我们意欲在将要举行的与国务卿万斯的谈判中维护上述表达的代表我们官方立场的意见。无疑，总统你在信中提出的其他问题同样也值得注意，我们准备就这些问题阐述我们的初步想法，当举行有关这些问题的专门谈判时我们留意寻找共同解决的机会。我们应该取得进展，在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签署的同时可以签署有关这些问题的双方一致的协议。

最后我想指出，总统先生，我不太理解你对我2月25日来信语气的陈述。这封信的语气是平常的、工作性的和尊敬的。如果你是指直接和坦率可以用来表达我们的观点，那么我的理由一直是这样的对话特点是与我们对此事的利益相符合的，但是假如你的意思是指这是我们对提出超乎国家间关系范围的问题的意图原则态度，那么我方将不予置评。

我相信我们私下的一致将有益于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建设性发展。

致意

列·勃列日涅夫

1977年3月15日

万斯说将把这封信报告给总统

苏联驻美大使 多勃雷宁 (签字)

No02517

## 多勃雷宁与美国国务卿万斯的谈话纪要

(1977年3月21日)

绝密

抄件1

1977年3月21日

苏联驻美使馆 华盛顿

摘自多勃雷宁日记

我应万斯之邀拜访了他。

万斯说考虑到我在他到达那里的当天晚上就要启程赴莫斯科，他想用最概括的措辞描述他们就限制战略武器与苏联签订新协议的办法。对此他多次强调他要继续作一些研究报告以供总统参考，这份报告还没有完成，可以作一些变动，这牵涉到一些数据，同样它不反映美国的最终立场。

万斯说按照他们的观点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制定两个不同的协议是可能的，一个是他们所希望的综合性的，一个是有所限制的，在第一个不能通过的情况下可以采纳第二个。

第一选择，按照万斯的意见，更完整的协议应该有下列几部分组成：

1. 美国方面相信在这一阶段同意对海参崴协议确定的战略武器标准作一定削减以取代只适应接受双方已有或计划拥有的实际武器标准是有益的，它将反映双方开始真正裁军的意图。按照他们的

观点在这个范围内限制标准有下列特点：

——总数不超过 2000 个战略运载工具；

——不超过 1200 个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IRV）发射器；

2. 苏联方面考虑到它在投掷重量方面的优势必须同意就苏联正在制造和重新装备以供发射美国称作 SS-18 的导弹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装置作一定限制（对此他说希望苏联拥有 150 枚这种 SS-18 导弹而不是 300 枚）；

3. 双方同意随着对在大气层试验导弹数量的限制，冻结生产和部署新型号的洲际弹道导弹；

4. 禁止生产和部署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对此美国有责任停止发展和部署它的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 M-X；

5. 禁止所有超过 2500 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在苏联方面同意这个建议的情况下美国将准备以不把“逆火”轰炸机归为具有洲际运载能力的工具来接受苏联有关这一问题的立场。美国同样将考虑苏联关于这种轰炸机操作半径的数据。

万斯说这是可能选择的第一个协议的大体框架。

（如果这个无法达成）那么作为对这个协议的替代，万斯继续说可以考虑卡特总统早已闻名的建议，即完成海参崴的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包括所有双方已达成一致的条款，但是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巡航导弹和“逆火”轰炸机问题）留待下一次即第三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时解决。

听了万斯的陈述我告诉他，恕我直言，美国的这些建议没有为在莫斯科达成双方共同接受的协议建立真正的基础。

我还说首先考虑第一个“综合性”的选择，看来它比第二个有限制的选择更糟。它的缺点在勃列日涅夫给总统的上一封信中令人信服地阐述过。用美国方面已经表示的考虑判断，美国努力追求单

方面利益是极其明显的。我问万斯，按照美国政府的观点，所有这样的交换中苏联能得到什么。

如果我可以概括，在随后的讨论中，万斯为美国立场作以下辩护：

用他的话讲运载工具标准全部从 2400 降到 2000 不仅会影响苏联，而且同样会影响美国。美国目前拥有 2150 个运载工具。虽然他认识到削减将给苏联很大打击，但是他又说削减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射器会给美国造成比给苏联更大的影响，因为美国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发射火箭方面比苏联更发达。

作为对长期令美国担心的苏联在投掷重量优势问题的反映，包括他们建议限制我们的重型火箭，万斯坚持说美国方面将准备停止发展和生产 M-X 即它的新的更赋精确度的重型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这样，以他的观点，从将来的角度看将会对苏联方面在投掷重量方面相应的妥协的决定作补偿。

谈到限制射程超过 2500 公里巡航导弹，万斯主张剩下的导弹（射程不超过 2500 公里）是中程而非洲际的，对此他竭力提出类似我们“逆火”装有射程 2200 公里导弹的飞机，然而这在苏联被称为战术武装而非战略武器。

我用勃列日涅夫通信中所提出的理由强调与我们有关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建议保持一致，与我们在以前与美国谈判时的立场保持一致。

在回答我的观点时，即如果我们把早已共同商定的议题搁置一边去考虑新的妨碍达成协议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加快协议的准备工作，万斯特别反驳道，新政府不认为它自己完全受前政府做法的约束，卡特政府努力争取一个真正的、不只是表面的战略武器限制。

我指出对于处理如此重要的谈判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即我



们是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任何一个新政府重新估价它的前任所已达成的协议无助于加强国际协议的基础。

所有这些我说依我个人看法，提出的两个选择不仅不能直接达成彼此互利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且相反极大地削弱了尽早完成第二阶段谈判的可能性。我恳求万斯在最后回顾他们的立场时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每一个看法予以考虑，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信中已提出的关于解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可能的途径。

万斯说，他表示的立场不是最终的，但是苏联同样必须理解美国的立场，即美国不能考虑全部接受苏联的办法。用他的话讲苏联的办法就是美国方面应该全部接受苏联在尚待解决问题上的立场，而不是寻求双方的妥协。

我对万斯重复说，依我看来他所表示的考虑无法成为他所提到的妥协的基础。

万斯说总统很有可能将召集不止两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以确定美国在莫斯科谈判的最终立场。

最后万斯要求我转达苏联领导人，他将带着卡特总统赋予的重任前来莫斯科努力就他此行的中心议题取得一致。如果有必要，他准备逗留一两天对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议尽快取得结论的可能性作详细考虑。

苏联驻美大使 A. 多勃雷宁（签字）

们是在与美国政府打交道。任何一个新政府重新估价它的前任所已达成的协议无助于加强国际协议的基础。

所有这些我说依我个人看法，提出的两个选择不仅不能直接达成彼此互利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而且相反极大地削弱了尽早完成第二阶段谈判的可能性。我恳求万斯在最后回顾他们的立场时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每一个看法予以考虑，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信中已提出的关于解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可能的途径。

万斯说，他表示的立场不是最终的，但是苏联同样必须理解美国的立场，即美国不能考虑全部接受苏联的办法。用他的话讲苏联的办法就是美国方面应该全部接受苏联在尚待解决问题上的立场，而不是寻求双方的妥协。

我对万斯重复说，依我看来他所表示的考虑无法成为他所提到的妥协的基础。

万斯说总统很有可能将召集不止两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以确定美国在莫斯科谈判的最终立场。

最后万斯要求我转达苏联领导人，他将带着卡特总统赋予的重任前来莫斯科努力就他此行的中心议题取得一致。如果有必要，他准备逗留一两天对限制战略武器的新协议尽快取得结论的可能性作详细考虑。

苏联驻美大使 A. 多勃雷宁（签字）